

Lingnan University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Theses & Dissertations

Depart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8-11-2016

在不明不暗的虚妄中寻找青春：当代中国“80后”非政府组织工作者的价值观和行为转变研究

Guoyuan SUN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cs_etd



Part of the [Critical and Cultural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孙国嫻 (2016)。在不明不暗的虚妄中寻找青春：当代中国“80后”非政府组织工作者的价值观和行为转变研究。(博士論文，香港嶺南大學)。檢自http://commons.ln.edu.hk/cs_etd/29/

This Thesis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Depart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Theses & Dissertations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Terms of Use

The copyright of this thesis is owned by its author. Any reproduction, adaptation, distribution or dissemination of this thesis without express authorization is strictly prohib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在不明不暗的虚妄中寻找青春：
当代中国“80后”非政府组织工作者的价值观和行为转变研究

孙国嫒

哲学博士

岭南大学

二零一六年

在不明不暗的虚妄中寻找青春：
当代中国“80后”非政府组织工作者的价值观和行为转变研究

孙国嫒

此论文为文化研究哲学博士学位课程之部分要求

岭南大学

二零一六年

论文撮要

在不明不暗的虚妄中寻找青春： 当代中国“80后”非政府组织工作者的价值观和行为转变研究

孙国嫒

哲学博士

这是一个关于人的成长和转变的叙事研究。本研究的问题意识是：一方面，199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市场化，青年文化呈现出去政治化、物质主义、“小时代”的窄化的走向。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希望进入“体制”，以求得社会认可、物质有保障之生活。但另一方面，1990年代以来亦是中国民间非政府组织（NGO）迅速发展的时期，一小部分青年人选择在NGO工作。然而，NGO长期以来面临着公众的不理解、政府一定程度的漠视甚至猜测以及物质上的低回报。本研究正是希望进入NGO工作者的生命故事，理解他们为何逆社会窄化的价值之流、选择在NGO工作，形成了怎样的文化以及如何形成这一文化。另一方面，本研究亦希望向组织内部回观以批判性地分析NGO携带的意识形态、操演等如何对工作者的价值观和行为产生不经意的影响，以期改造其身处之社会脉络。

因此，本研究试图回答的研究问题是：在1980年代以来的社会脉络之下，“80后”NGO工作者如何与发展主义和“小时代”的青年文化、以及NGO内部的文化与操作进行协商？形成了怎样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

本研究通过叙事研究方法，深入理解10位NGO工作者的生命故事和日常实践。采取Dorothy Holland等(1998)的形意世界(figured worlds)理论视角，本研究认为：一方面，NGO工作者在参与NGO的过程中增进了自我认识和成长，对社会发展有更深入的理解和反思，并且形成一定的介入社会和公共生活的行动。另一方面，NGO的操作中，可能带有缩窄批判思考和开放的学习多种思想资源的空间，缺乏对社会问题成因和解决方案的深入分析与公开论述，习惯性地以“主流”/“另类”二元简化的分析视角，这无益于NGO工作者的成长，也可能阻碍NGO对于社会和人的改造的工作。

声明

本人谨此声明，本论文为原创性之研究成果，所有已发表或未发表著作之引用，均已适当注明出处。

(孙国嫒)

年 月 日

畢業論文核准頁

在不明不暗的虛妄中尋找青春：
當代中國“80後”非政府組織工作者的價值觀和行為轉變研究

孫國嫻
哲學博士課程

論文審查委員會：

	(主席)
許子濱教授	
	(校外考試委員)
古學斌教授	
	(校內考試委員)
劉健芝教授	
	(校內考試委員)
許寶強教授	

導師：

許寶強教授

副導師：

陳清僑教授

代教務會核准：



莫家豪教授
研究生課程委員會主席

01 AUG 2016

日期

Terms of Use

The copyright of this thesis is owned by its author. Any reproduction, adaptation, distribution or dissemination of this thesis without express authorization is strictly prohib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目录

致谢.....	iii
第一章：楔子——现象、自述和研究概览.....	1
一、 自我书写和反思.....	1
二、 与本研究的扣连.....	10
三、 研究概览和关键词的厘清.....	14
四、 各章简介.....	19
第二章：文献回顾.....	22
一、 中国“青年”的历史脉络和“80后”代际研究.....	22
二、 有关中国NGO领域的研究.....	28
三、 理论视角：通过进入形意世界以改变“自我”.....	40
第三章：研究方法.....	48
一、 研究概述.....	48
二、 叙事研究及其在“NGO”研究、青年研究中的应用.....	50
三、 研究过程及田野介绍.....	53
四、 次原居民人类学和反身性.....	59
第四章：“自我”的历史.....	62
第五章：1980和1990年代之脉络在NGO工作者的“自我”中的沉淀.....	102
一、 金钱和权力日益渗透进日常生活之中，成为组织生活和情感的主要力量之一.....	104
二、 应试教育之殇：塑造着缺乏自主性、知识面窄、批判思考能力弱以及被竞争文化和成功文化浸染的“自我”.....	109
三、 性别文化的压抑塑造了在性别身份上的顺应、困惑、不满、束缚的“自我”.....	113
四、 中小学教育体系和普及文化中的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价值观教育：使得具有正义感、社会责任感的“自我”塑造成为可能.....	116
五、 小结.....	122

第六章：脉络下的偶然：在 2000 年代通过志愿行动而进入 NGO 之形意世界	121
一、 1980 年代以来的 NGO 形意世界的发展简史和大学空间的演变及特点	127
二、 进入志愿参与的形意世界的空间和途径.....	143
三、 志愿经历对参加者的影响.....	151
四、 最终选择进入 NGO 全职工作的原因.....	159
五、 小结.....	161
第七章：进入 NGO 形意世界后的“自我”转变与协商.....	163
一、 对话人的工作领域：青年工作概述.....	164
二、“自我”之转变与协商：工作场域中的社会介入.....	165
三、“自我”之转变：自我认识、疗愈、增强内在力量 vs 无力、运动创伤	179
四、“自我”之转变：社区和日常生活中的改变 vs 无暇建设自己的日常 社区生活.....	187
五、“自我”之转变：性别意识和行为.....	192
六、“自我”之转变：如何看待并且协商在发展主义、成功者文化脉络下 对“好生活”的希望和追求.....	199
七、 小结.....	205
第八章：结论.....	208
一、 主要发现及讨论	209
二、 研究意义、贡献和限制.....	213
三、 写在最后的话.....	215
附录一：自传书写指引.....	217
附录二：半结构性访谈大纲.....	218
参考文献.....	220

致谢

在岭南大学读书的第一个圣诞节前夕，副导师陈清侨教授曾对我说，“读博士是自我改造的过程，重要的是这个过程中，你的自我改变”。在论文即将暂告段落之际，这句话足以点睛地概括我近四年的学习经历——这正是一场自我发现和自我改造之旅。正是进入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这个新的形意世界，我才有机会经历这样的变化。因此有了这份致谢。

学习和研究不可能是个体行为，它必然凝结着众生的爱、生命和能量。我的学习和研究之旅亦是如此。首先，最想衷心感谢的是我的导师许宝强教授。没有他的指导和支持，我想我无法完成这一论文，也不会成为现在的自己。如果本研究有一些价值的话，也全部得益于他的悉心指导。当然，文责自负。这三年多，无论是在导师办公室，还是在社会这一更大的场域，我都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他有着很深的对人和世界的关怀，而且极具行动力。归因于他的因材施教，这三年多的学习体验，充满了进入非舒适区的挑战和成长。他主张并实践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并且极其重视学习者的能动性，三年多的指导中有大量的提问而非给出答案，也令我有大量的试错经历，我在犯错及对其的反思中获得了成长。他鼓励我慢慢改造身体和学习习惯，学习批判性思考和认真做事。在指导我的过程中，他不厌其烦地、不断地支持、推进我的思考，并且提醒我培养面对绝望的勇气与行动力；他也为我创造了同学之间的支持体系。他身上有一种极强的生命力量，可以推进学生在绝境中放胆往前走，总是给人以信心和能量。也感谢陈清侨教授，总是在一些关键时刻给我一些关键的提醒和建议。同样地，从他身上的学习也不仅仅是在办公室中，而是在更广阔的世界里。感谢口试委员会的许子滨教授、古学斌教授、刘健芝教授的批判和建议，促使我进一步的思考和修改。

感谢文化研究系的各位师友创造了一个独特的、自由的学习空间。特别感谢陈顺馨老师，给了我很多支持，无以言谢；感谢罗永生老师在 2012-2014 年给研究生班的支持和点拨；也记得第一年尾和叶荫聪老师的几次对话，对我的提醒，很受用；感谢刘健芝老师出席了我在岭南的所有阶段性 seminar 并提出宝贵意见；游静老师的 *Perspective in Cultural Studies* 一课让我对文化研究的思考问题的方式有了很多了解；犹记得和 Lisa 一起打羽球的美好时光；感谢 Rolien 的微笑、陪伴和鼓励，无论是带我认识了学校后山行山路线，还是在校园路上、办公室走廊的亲切交谈；还要特别感谢特聘教授王晓明老师，听他的课、读他的文章、与他的各种聚餐和会面，都能感受到那份对生命和社会的热情与思考，心里已然把他作为人生导师；也感谢 Tejaswini Niranjana 老师和 Meagan Morris 老师开设的研究生 seminar，提供思想的冲击和支持；感谢戴锦华老师面谈给我的启发。感谢文化研究系办公室的 Josephine、Jenny、Chester 的支持，特别感谢文珊珊在我最后冲刺阶段对我的鼓励和支持。感谢文化研究系提供的研究基金，支持了我于 2014-2015 期间在北京进行田野研究的经费。也感谢大学提供的助学金支持了我衣食无忧地在香港四年的生活和学习。

感谢文研系的研究生同学们的一路鼓励和支持，Roberto、许统一、Jay、Tobi、Toto、Sonia、Maroles、Mikee、Mandy、特别是来自台湾的 Ted 让我逐渐认识台湾和香港以及“中国因素”；感恩于最后一年中，Ted、Anneke 和我这三位同届学伴之间的彼此见证和心有灵犀；温翠艳的充满爱和生命能量的支持；特别感谢沈丹，在她毕业后的一年中给予我的巨大支持。感恩认识 MCS 的一班人，尤其是王靖薇和兰舒。也感谢岭南其它院系的研究生同侪，包括但不限于林青杨、李春愉、宫梦婷、官文博、洪真如、杨杰铭、Anson，和你们的碰撞，给了我很多研究的灵感和对人生的体悟。感谢我做助教时认识的众多学生，特别是 Eddie Pang。感谢 LBY112 办公室的各位伙伴，特别是欧阳丽嫦、庞九、Karen、林万仪、严晓辉、爱金、梅姐、阿康。很有缘分认识你们。还要特别感谢我在岭南遇到的来自各方

的智者，特别是 Erebus Wong，我从他身上学到太多，无论是对禅修、对精神的发展还是对文化价值的理解；也特别感谢单德兴老师在禅修、太极和修身治学方面的启发和鼓励。感谢岭南彩园计划，让我在岭南的最后一年多，感受到这里越来越浓的社区感。感谢岭南大学的支持系统，特别是学生服务中心的 Tim 和教务处的 Vicky 和 Polly，更不必说维持学校清洁和“安全”的清洁姐姐和保安人员，没有你们的支持，我定无法顺利完成这一研究。感谢岭南大学的后山，在我无力时给我最温柔的支持。

还要特别感谢校外师友：十分感谢陆德泉老师在我第一、二年阶段的不断鼓励和建议，这个研究题目也是在他的启发下选定的。也特别感谢有机会于 2014 年 1 月到 5 月参加古学斌老师组织的读书会 and 开设的定性研究方法课程，也由此开辟了另外一个支持系统——与郭燕萍、Billy, Phoebe 的互相支持，特别感谢 Billy 最后阶段给我的情感疏导和论文建议。得益于文化研究前辈开辟的亚际文化研究网络，特别是亚洲现代思想（MAT）项目所组织的学术研讨，我渐渐走进文化研究的世界，因为这个网络，也有机会向来自上海、台湾、马来西亚等地的学者学习。也特别有幸在热风论坛上深入认识的师友，特别是罗小茗和一群上海大学的研究生朋友、台湾的刘雅芳和陈良哲，也有幸在台湾社会研究年会上认识了很多老师同学，让我对研究燃起激情并打破对社会的简单化想象。很感谢台湾和香港这片沃土——所谓“帝国的边缘”同时也是异常丰富、杂糅的地区，正是在这里我开启了自己的学术生涯以及尝试切入“边缘”身份的感受和视角。众多散布在各地的研究生（或已经毕业）朋友向我提供了情感上和智性上的支持，他们包括章光洁、邱亦欣、张婧、梁小岛、闫保华、易莲媛、宫一栋、白美妃，我知道我向你们传递了太多的负能量，但是你们总能转化这些能量。也要感谢我的学长潘家恩及其妻子杜洁、学长 Muriel、学长薛翠的适时支持，尤其是潘家恩向我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参考文献和思考视角。感谢邹崇铭等香港朋友一直以来的各种支持。感谢最后阶段中，沈丹、梁小岛、邓婉晴、李洁、曾颖芳和张婧阅读、校对我的初稿，并提供宝贵意见。也要感谢五年前在 IDS 的师友们，是他们让我有勇气闯入读博生涯。特别感谢 2005 年一路认识的“公益”领域的伙伴们，他们是一群鲜活的生命，因篇幅有限，无法一一具名，但她们曾经深深地改变了我，对此一直铭记在心。感恩这段学习经历也让我更接近自己的信仰，在信仰的指引下，学习在日常生活和行动中的不断修行，一心走路。

最后要感谢家人，因为我的读博行为，让他们在过去三年多承受长期的分离和缺失家庭成员的陪伴，但是仍给我无限的支持和爱。感谢朱明的慈悲和智慧，没有你在情感上、精神上（必然也包括物质上）的支持，我必定无法完成这篇论文。感谢父母给了我生命（力）和对我从小的照顾，这是我成人后做任何事情的基础，还有他们的善良、朴实和智慧，构成了我的福气的重要部分。论文将要提交的最后时刻，也不禁回想起曾外祖父、祖父和外祖父分别在 100 多年前及 70 多年前，在战乱和贫穷中，带着对生活的希望和勤劳与毅力，迁徙到天津，于是有了今天的我。毫无疑问，这份作品必然凝结了先人部分的生命，或者说，凝聚了超越时空众生的能量。对此，只能心存感激，并且尽力，在未来的人生、求学道路上，努力多做一点点、做好一点点。

为免堕入‘不可救药’的‘乐观’，对于这些另类尝试，有必要进行仔细的考察分析，找出其可能的局限。（许宝强，2007：306）

须将研究者自身整合入研究过程，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反省所处位置如何影响我们的问题意识、研究方法，以及论文书写。（夏晓鹃，2002:22）

第一章

楔子——现象、自述和研究概览

本导论试图为读者提供关于本论文的总体图景，包括提出该研究题目的原因、研究发问和章节安排。导论将以我的自传和反思开始，以交代研究提出之动机，同时帮助读者理解本论文以叙事为主要特点的整体风格。

自我书写和反思

回看自身生命变化的历史，2005 年开始进入非政府组织（NGO）¹全职工作后的种种经历，将我塑造成了另外一个自己——时而觉得有力又时而觉得无力：而这牵引着我开始了这项研究。

生于 1980 年代：在“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教育和热气腾腾的“改革开放”的氛围下的成长

出生于 1980 年代初天津的工人家庭，在社会转型的 1980 和 1990 年代下长大，我的童年生活是朴素而简单的。在学校中的我，接受的是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教育。这样的教育对我似乎是有效的，那时心里有种正义感，相信建设共产主义是我们的使命，就像熟稔于心的《中国少年先锋

¹ 本文将主要以 NGO 一词指代研究对话人所工作的团体，但是同时也会交叉使用民间团体、“公益”团体、社会团体等名词。虽然不同名词的产生和使用的脉络不尽相同——这一点在本章后文中会详述——但本文认为，这些名词均可以指代，“改革开放”之后，政府从社会的全面管理中逐渐部分退出、社会扩大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由自下而上的社会力量而非由政府组建的非政府、非企业的组织。因此为了行文方便，本文下面将交叉使用这些语词。关于这一点，本章后文将详细说明。

队之歌》的歌词中写道的那样，“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样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表现在正规课程——比如语文、思想品德、政治、历史——以及校班会课、少先队、共青团的活动之中。仍能记起语文课本中很多鲁迅、毛泽东的文章。鲁迅的弃医从文、医治中国人的思想的责任感，让我在书桌上摆了一幅他的画像。

除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²以外，“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中学的体验中也如影随形。高中政治课的政治经济学反复提到这样的论述：中国要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印象深刻的是高中政治课本中有一句话，“金融是反映一个国家经济的晴雨表”，带着经济强国的想法，这样的话让我暗下决心，大学要报考经济、金融类的专业。1990年末，读高中时，正值中共十五大召开，其中重大的政策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启国企改革。作为一名学生，我接受的教育告诉我，国企改革是改善中国经济的出路。那时中央电视台的大量节目也配合这样的政策的宣传，比如铺天盖地的讨论《谁动了我的奶酪》一书³、滚动播放刘欢演唱的《从头再来》⁴。在这样的氛围下，我相信国企改革是提高经济效率的有效方法，却没有丝毫思考这对下岗工人意味着什么，即便我的妈妈在那一年，因为“国企改革、下岗分流”而提前退休。

除了学校生活，伴随着媒体的逐渐开放，青少年时代的我也开始接触不少普及文化，打开了对世界的认识。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等节目⁵，深度报道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闻，打开了我对社会的理解和想象。大概这些新闻类的节目，让我增加了人文社会关怀。1980年代中后期开

²实际上，为了聚焦主题，本节省略了中学时期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影响。高中近代史的学习，尤其是抗日战争前后的历史，配合着当时在《南方周末》和中央电视台节目中常常报道的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王选调查日本侵华战争的细菌战受害者和民间对日索赔运动，让我产生了反感日本的情绪，包括中学时抵制日货，大学毕业后的2004年甚至还参加过反日游行。

³该书出版于1998年，在New York Times Business畅销书榜中位列五年之久。该书在中国国企改革政策推动期间，被中央电视台反复宣传，鼓励人们要学习面对工作和生活中的变化。

⁴在1998年便开始了针对“下岗工人”的“主旋律”宣传，以陈涛作词、王晓峰作曲、刘欢演唱的当年红遍大江南北的《从头再来》一曲为标志，参见尼古拉斯（2015）。歌词是，“昨天所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的回忆。勤勤恳恳已度过半生，今夜重又走进风雨。我不能随波浮沉，为了我挚爱的亲人。再苦再难也要坚强，只为那些期待眼神。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⁵《南方周末》、《东方时空》、《焦点访谈》这类报刊、电视节目实际上背后也是被国家意识形态和商业力量双重影响的，可以参考汪晖（2000）。汪晖以《东方时空》节目为例提出，虽然其制作团队具有民间背景，但是作为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仍受到政府意识形态的影响，有时候充当宣传的工具，同时因广告收入也是重要考量的因素，因此也受市场力量的影响。

始流行的香港电视剧，让我对商业和“经理”这个职业非常向往。1990年代的《南方周末》是我最钟爱的报纸，它报道了大量和南方“改革开放”有关的经济、社会、法制等的新闻。反映南方改革开放新生活的广东产的电视剧，包括《公关小姐》、《外来妹》、《情满珠江》⁶也令我印象深刻。电视剧所描绘的生活超乎我当时的日常经验，与报纸《南方周末》的影响协同起来，让我对南方的“改革开放”的新世界心生向往，对所生活的、仍旧有不少社会主义影子的天津的生活感到厌烦，厌烦它的一成不变、缓慢的节奏。

我的大学：死气沉沉与迷茫

因为受爱国主义、社会责任感的感召而且相信“经济救国”，以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话语的影响，大学的我选择了经济学作为主修专业。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初的大学生活让我感到“死气沉沉”。我所在的系所，课程体系严重滞后，任课老师照本宣科。我没有学习到什么是做学术、如何做学术。面对迷茫的大学一年级新生，学长提供的建议是，要明确自己的目标——找工作、考研究生还是出国读书——似乎只有这三个选项，于是我选择了以出国读书为目标。而伴之而来的是，这个目标重新组织了我的大学生涯，包括为了GPA，继续上没有兴趣的课，复习单调的课程，而不知道或者不敢尝试与这个目标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课堂之外的社团组织还算活跃，但在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初、我所在的大学中的“公益”类大学生社团较少，比如，2000年代开始的如火如荼的、在高校中发展壮大的三农学社，在我的大学是我三年级的时候才成立⁷（也就是2001-2002年）。1999年入学时，虽然参加了一个新创立的环保社团，但是因为活动设计了无新意，我没有继续参加。因此大学的我，与“公益”社团擦肩而过⁸。

⁶ 这三部电视剧都是当年收视率较高的电视剧。以《公关小姐》为例，当年创下了几个第一，包括大陆最早的反映改革开放、最早反映公关行业的电视连续剧。获第九届全国“大众电视金鹰奖”优秀长篇连续剧奖等众多奖项。《公关小姐》将广州的形象以及岭南的文化推向了全国。

⁷ 一般来说，大学一年级是参加社团的主要时期。

⁸ 不过重新阅读这段书写，我回想起2000年时，在大学BBS(互联网的电子公告牌)上结识了学长，一起野营，无意间遇到WWF(世界自然基金会)的京津志愿者小组，也参与并且协助其组织过活动，但那时并没有特别意识到这是“志愿者团体”、更未深入卷入。另外记起大学四年级(2002、2003年交接之际)时，曾经关注大学校内BBS的爱心板块，有过一次到天津福利院志愿服务的经历，但那半天的服务只让自己发现，当我面对脑瘫儿童时的不知所措，而有经验的同行志愿者却很有娴熟地抱着他们。那是一次受挫的体验(没有任何事前的介绍、培训、在场的支持)。也就没有了第二次参与的兴趣。

进入社会这所大学：现实煎熬中看到一束光

大学毕业时，我并不知道“我是谁”，凭着想去认识这个自己生活的社会的懵懂想法，放弃了继续读研究生的机会，开始进入社会这所大学。第一份工作是在上海的一家港资的市场研究公司，这似乎让我得以进入小时候看的香港电视剧中的生活。然而，我很快地发现自己体会到，大学中学习的《资本论》中提到的资本对工人的剥削离现实生活并不遥远，我发现自己每天下班后精疲力竭、而且要经常加班，但只能获得很少的工资。在午夜或者周末，当忙着做市场调查报告的时候，我就会想，“这是我想要的生活吗？我的生命的意义就是帮助这些企业多销售几盒巧克力或者高档化妆品吗？”我知道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有趣的是，正是因为这份工作需要做广告测试，我无意中在用于消费者测试的时尚杂志上，看到一篇介绍 NGO 工作者的人物专访，由此才知道原来还有 NGO 这样的工作。顺藤摸瓜，我按照文章后面附的《中国发展简报》——一个报道民间社会的民间机构——的网址，开始寻找 NGO 的工作或志愿者机会，我想了解自己生活的中国、尤其是乡土中国⁹。在网上找工作、参加面试的过程，让我开始接触这个领域里的工作、人和一些理念。比如一位面试官发来李昌平¹⁰的文章给我参考。李昌平提到贫困背后是一种制度不公平，城市人群也参与制造了贫困，这个观点让我重新解读当时自己在上海的都市生活与贫困的关系，之后突然“看到”了在上海的建筑工地里的建筑工人。2005年8月，在做了一段时间志愿者之后，终于得到了一个全职的工作机会，自此直到2010年9月，我先后在上海一家环境教育团体从事志愿者项目和环境教育课程的协调、在北京的某国际机构 H 和广州的某推动“公民社会”培训的组织从事青年教育——面向城市青年和协作者的社会意识和参与的教育等工作。在此之后虽然没有全职在 NGO 工作，但是之后的硕士项目也是研究这一领域，同时也曾长期为一些组织兼职工作，并且和之前的同事和合作伙伴保持着很多联系：所以在来岭南大学读博士之前，我实际上一直没有离开 NGO 这个场域，并且认为在 NGO 工作的

⁹ 大概那时工作之余的时间接触人类学，开始受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的影响，而且2003年之后，“三农”问题开始被电视传媒所广泛报道。

¹⁰ 李昌平，三农问题的研究者和政策倡导者，曾经在县镇基层工作17年，在2000年上书国务院总理，反映湖北农村的问题，指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生涯对我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影响非常之巨大，而且是正面影响。

NGO 于我而言是一所学校

进入 NGO 工作，为我打开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在这里认识的人更加多元，或者说有机会接触到很多“稀奇古怪”的人。在环保组织工作的时候遇到很多有趣的人，包括不少国际义工：比如来自美国的大学生，在中国组织打工子弟学生合唱团；也了解到一位来自法国的摄影师跟踪拍摄热带雨林树木的经历，他自嘲自己没孩子、没房子、没车子。这让我知道原来生活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在这个领域里，我参加了很多免费培训，在培训上不仅结识了很多在 NGO 全职工作或者做志愿者的志同道合的朋友，接触了不少之前不知道的理念；同时，也对“参与式”的培训方法有了一些接触和反省。2005 年 10 月，作为某跨地区草根机构的义工，我与来自上海、杭州的 5 位第一次见面的义工朋友一起坐 40 多个小时的火车到昆明参加 3 天的培训，和他们结下了很深的友谊。那时，我第一次学习关于“公民社会”的理论框架——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三个部门之间的关系，以这个视角看待在 NGO 的工作。随着参加 NGO 的培训越来越多，我开始发觉每次的教室的布置很特别，或者是大圈围坐，或者是分成几组，每组围圈而坐。培训的过程常常做很多小组活动、用大白纸写下每组的活动报告并且派代表向大组报告，也有一些培训使用角色扮演、戏剧等方法。当参加了两三次这类活动之后，我意识到小组讨论中经常发生跑题的问题，原来，如何在小组内进行讨论也是要学习的，而这很少发生在我曾经的中学和大学生活之中。因此，我意识到这些培训本身也在改变着我们这些成人的思考和学习习惯，不是仅仅从培训师那里学习，也是向同伴学习的过程，而且是通过彼此之间的讨论进行学习的过程。

2006 年进入 H 机构工作，对我来说是重大的人生转折时期。我一直觉得 H 机构于我而言是一所学校¹¹，在那里工作的三年半的日子让我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接触并学习了大量的与发展问题有关的议题、“概念”和“理论”。因为

¹¹ 除了我以外，不少前同事也认为 H 机构是一所学校，培养了很多工作者，之后在其他国际机构和本土机构继续从事相关工作。

H 机构的项目主题跨度大，涉及环境、救灾、教育、乡村发展、劳工、性别、公民社会支持等，所以我有机会了解不同的项目主题，而且较为便利地得以参与 H 机构支持的培训、会议等活动，认识 NGO 的资深工作者，极大的扩展了视野。那一时期接触比较多的论述或者语词包括：“以权为本”、“公平”、“参与”、“公民社会”、“参与式教育理念”、“性别平等”、“环境保护”、“世界公民”、“批判思考”和“独立自主的人的培养”、“公平贸易”等。然而，现在回看这段经历，发现议题太多使得我对其浅尝辄止，缺乏深入的理解和分析，人也变得很浮躁。除此之外，作为一家以以权为本为工作原则的机构，H 机构受“公民社会”的理念影响较强。一方面，和慈善机构相比，H 机构对贫困和发展的问题的反思更强，从权利的角度，认为贫困是来源于不公平——制度的不公平，包括政治和市场制度。这样的理念深化了我对贫困问题的理解。但是另一方面，H 机构并没有对“公民社会”的视角进行问题化，因此那时的我从没有质疑过“公民社会”，相反，认为“公民社会”是值得追求的、美好的理想社会的图景。

在内部的组织文化上，H 机构实践着其对外宣称的理念——平等、公开、透明，这让我耳目一新，而且更加认可机构的理念。比如内部的工作指引、管理政策的修改和提出都要经过员工的咨询。也有员工代表小组参与组织的管理。H 机构的员工和管理层之间也比较平等，比如直接称呼名字等等。

H 机构为员工提供很多培训机会。深刻改变我的是 2007 年举办的为期十天的社会性别培训。在那之前，我根本不知道社会性别是什么——比如我会笑话男同事拿着女性才背的包，结果被男同事笑，说我没有社会性别意识。这次社会性别培训让我看待世界的时候，戴上了性别视角的眼镜，开始认同女性主义，之后很积极地将社会性别带入到我支持的教育活动中。培训里有不少体验式环节，让我们回忆小时候在家庭、学校中的性别体验，过往的人生经验重新被唤起并且得以从性别的视角去阅读，比如我回忆起小学老师对男生的偏爱，如果男生学习不好，会认为他们是聪明、只是不勤奋而已；如果女生学习好，老师不会说这个女生聪明只会说是因为勤奋。

除了机构整体的理念、培训、团队氛围之外，我当时的主要工作是青年教育，这让我逐渐地确定自己对于教育工作的热忱。青年教育工作本身强调社会公平、公正，强调对“主流”发展模式的反思，因此在工作中自然而然地接触很

多社会发展议题，无形中提高了社会知识面，以及对这类社会议题关注。那时的自己，认为这个工作非常有价值，对此抱有十足的确信，因为认为这个工作可以改变青年，让他们开始关注社会、关注不公平的问题，而且提高社会参与的行动能力；而青年人的参与，也会有助于社会贫困等问题的改善。除此之外，这类教育工作使用了很多文化性、体验性的活动方法，吸引了我的兴趣，比如观看纪录片、拍摄纪录片、去乡村实地走访、戏剧体验活动等。这段经历让我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对于人的改变的工作的兴趣，然而，现在回看，发现那时候的自己对很多议题的认识都非常表面，而且被不同的体验式手法的形式所吸引。虽然青年教育强调批判思考，但是现在回看发现，那时我并没有对批判思考、“教育”以及“教育”的过程是如何发生的等有深刻的理解，也并未真正实践这些理念。

机构的同事，在我看来，都是一些理念相似的工作人员，他们中不少人在日常生活中也在实践其在工作中倡导的理念。比如，尽量不用一次性筷子；把购物的收据收集起来，当作便签纸二次使用；骑单车上下班；购买有机蔬菜等等。因为处于这样的一群人中，我也开始尝试将一些发展理念¹²在日常生活中活出来，比如购买一些社区支持农业的蔬菜；减少不必要的消费，很少逛街买衣服；衣着以休闲衣服为主。

我逐渐意识到 NGO 的工作让自己成长很多。但是，我也常常经历沮丧和挫折。记得 2008 年秋天的一个深夜，我接到当时一个合作伙伴的电话，她们在某市的大学中组织纪录片放映和讨论，然而活动举办前一天的晚上被叫停，而彼时，所有的导演都已经提前从外地来到了这座城市，海报已经贴好，场地已经预定。这个突发事件，让我觉得深深的无力。

挫折不仅仅来自工作上，日常生活中也充满着矛盾。比如我曾经很长一段时间不知道怎么向别人介绍自己的职业。我介绍自己是做“公益”的，对方常常听成是做“工艺”的；我说我是做“扶贫”的，很多人——尤其是白领——会说“赶紧给我扶扶贫”；我说我是做“教育”的，对方就问“是在哪个学校做老师？”除此之外，这些人还会好奇这个工作有没有工资等等。随着年龄越来越长，不仅对这个工作身份有不确定性，我也开始越来越焦虑于长期的工资较低，“现实”

¹² 不仅仅是环保理念，这些生活方式也包括了劳动关系、城乡关系的反思。

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尤其是与在商业机构工作的同龄人相比，有时候看到同学、亲戚的稳定、舒服的生活，也会问自己为什么要这样生活。在婚姻和生育方面，与父母的想法的差距也有越来越大的趋势。我意识到这类的挣扎不仅仅是我自己的个人感受，不少在这个领域工作的伙伴也有类似的感受，比如很多人面临着和家庭在职业选择、婚姻生育方面的冲突，面临着年过三十却觉得自己无法“安家立业”的焦虑。

正是带着这些具有较强情感的矛盾状态——一方面觉得在 NGO 中体验到自我成长，另一方面，“现实”的各种压力让人焦虑——这项针对“80 后”NGO 工作者的生命叙事研究开启了。在启动研究的初期，希望透过这个研究，理解“80 后”NGO 工作者——第一代自大学或者大学毕业后便有机会开始接触 NGO 并且在其中全职工作的一代人——的“自我”转变，尤其是 NGO 是如何影响其成长，希望这样的经验可以为教育工作者和 NGO 工作者所借鉴，以促进更多的青年人的正面的“自我”转变，进而推动社会转变。

置之于黑暗方才开启反思之旅程……

带着曾经的对 NGO 工作的价值的确信以及在 NGO 的场域中所养成的身体/思考惯习，我进入了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开始求学生涯。而这个过程，尤其是第一年，我仿佛进入了黑暗无力的世界¹³。站在今时今日回顾过往——虽然造成这样的结果并非单一原因和单一事件——我意识到，这和我进入了新的形意世界¹⁴（Holland 等，1998）有着重要关系。我带着所谓的对城市化生活的“反思”，进入到岭南大学的生活，出现了诸多不适应：比如不太适应香港居民偏好在外面吃饭、聚餐而不自己煮饭的文化；宿舍明文规定不许煮食；来香港之前，因为长时间在广州郊区的村子中居住，经常购买村民种的应季、新鲜的蔬菜，日常使用的清洁等产品也都是纯天然产品；但是到了香港，发现日常购物是去百佳超市或者富泰街市——很少能买到新鲜的、农夫直接销售的农产品，宿舍的卫生管理更是讲究效率并使用大量化学清洁产品；宿舍位于车水马龙的

¹³ 我并不想把原因完全归因于曾经在 NGO 中养成的惯习，或在香港、岭南大学、以及文化研究系的新的场域的限制。其中肯定也有我个人的性格因素使然。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¹⁴ 关于此概念的具体阐述，请见第二章。

街道旁边，夜晚的交通噪音让人无法入睡；之前出于环保与身体保健的考虑，很少使用空调，但是在集体宿舍中，要常常忍受彻夜开空调的生活；舍友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大学毕业生，对生活的想象常常是很“主流”的，比如她嫌弃百佳超市不如以前自己生活的城市的沃尔玛大，选择太少，比如她读书以外的时间，常常煲各种电视剧、流行的真人秀节目以放松和娱乐，大家缺乏相似的生活习惯等。除此之外，面临新的形意世界中的、香港人与人之间保持着有礼貌的疏离的状况，也让我感觉极度不适应。而我自诩的在 NGO 中获得的自我成长，似乎在这新的形意世界中，并没有让我顺利适应，反而增强了我的不舒服、痛苦¹⁵。这个过程本身似乎足以让我反思并且挑战最初的研究假设。

最初的研究目的是，理解 NGO 工作者是如何成长的，希望通过这个研究，让更多人看到 NGO 对于“人的改造”的意义，希望更多的人加入这个领域。其中暗含的假设是，认为这些 NGO 工作者的成长是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其个体成长的。

上述进入博士学习生涯后的日常生活中的诸多不适应，只是挑战这个研究假设的一个注脚。更为重要的是，在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的不断学习，经过与不同的师长、同学的对话以及阅读对话人¹⁶的故事，我开始逐渐意识到这些预设的问题在于，NGO 是携带着其特定的一套价值观以及操作方式，并不必然如其宣称的那样带来“公益”，也可能产生不经意的效果。

长时期的、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坚持这些预设的过程，也正反映了我——研究者本人——因为曾经在 NGO 工作，而受其价值观和操作方式的影响之深以至于无法意识到自己欠缺对 NGO 的操作的批判思考。仔细思考其产生的原因至少包括以下 3 点：1) 因为被所谓的“主流社会”的价值和操作的挤压——比如“发展主义”、“成功者文化”的意识形态和操作——而为了与之对抗，特别强调对社会问题的分析和“社会介入”，而且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参与 NGO 的工作，壮大 NGO。其带来的不经意的结果是，因为倾向于对抗这种论述和操作，而对自身的论述和操作缺乏足够的批判距离及反思。2) 曾经在青年教育领域里工作，

¹⁵ 但是今时今日，我并不认为出现这样的痛苦是负面的事情，而正是在这样的痛苦中，我才有了机会，认识自己身上的过去的历史痕迹。当然当时没有这样的意识，而是陷于痛苦，想要逃离。

¹⁶ 本研究使用“对话人”一词指代参与本研究的 10 位“80 后”“公益”工作者，他们透过讲述和让我走进其日常生活中，与我分享其记忆和日常生活，也积极地参与构建了这一研究产出。因此，我没有使用“被访者”一词进行指代。

受其论述的影响，我认为青年人应该关心社会、参与社会，这成为了一种不经反思的“政治正确”的说法和做法。3) 在国际基金会工作的位置，让我更容易相信那些“论述”，缺乏将这些理念应用到具体工作场景以发现其内在矛盾的较多可能性。

这样的预设带来的结果是，缺乏对当代社会的各种价值和操作的复杂性¹⁷的认识，而将其用“主流”/“另类”进行二元切割的简单分析，也缺乏对 NGO 的价值观和操作的复杂性的批判认识。而本研究的中后期开始，尝试打破上述“迷思”，提供并不同于对“主流”/“另类”进行二元切割的对 NGO 的价值观和操作进行简单分析的、更加复杂的叙事版本。

与本研究的扣连

正是带着我对自身生命经验的反省，本研究采取叙事研究的方法，将关注点指向，“80 后”NGO 工作者与不同社会力量——尤其是 NGO 自身——协商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价值观和行为（以下本文将以“自我”一词指代价值观和行为）变化。希望由此理解，NGO 工作者，1) 为何在“发展就是硬道理”及与之如影随形的、窄化地以经济资本的富裕为定义的、成功梦想的狂潮下，却选择了社会认可度低、经济回报低乃至有一定的政治敏感性的 NGO 工作；2) 上述的社会文化以及 NGO 的组织、操作及其文化是如何影响工作者的“自我”，工作者如何与之协商、转变。在 NGO 的实践场域，因资源有限，这类反思性的梳理“自我”变化和社会脉络关系的工作，仍旧较少；在 NGO 研究中，也较少涉及这一主题和这一人群（第二章将就此详细论证）。因此，本研究希望通过对话、自我传记书写等形式，为接受访谈的对话人提供重新叙述、梳理自身转变的机会，理解“自我”变化与社会脉络及其所处的 NGO 的脉络的互动关系，直面这一过程中的挣扎和解放，为进一步的“自我”转变提供助力。这一研究希望对话人乃至更广大的 NGO 工作者在阅读生命故事之中，看到自身所进行的实践的意义和价值、看到其身处的脉络——既包括宏观性的社会转变也包括其所

¹⁷全文提到希望打开 NGO 操作的复杂性和人的转变的复杂性。这里的复杂性指打破二元化的思考/行动方式，比如“主流/另类”的分类方法等。这类二元的分类方式先验地简化了对于 NGO 操作和人的转变的理解，比如遮蔽了 NGO 的操作中也有“主流”的元素，“主流”社会亦有解放性的元素。当打破二元化的思考/行动方法之后，NGO 操作和人的转变过程中的各种影响因素的互动、交织作用，才可能被看到。

处的 NGO 行业和组织——以及自身和身处脉络之间的复杂关系。

对于 NGO 的管理者和促进者而言，透过阅读这些 NGO 工作者的生命故事，希望有助于其批判性地理解工作者身处的脉络，认识 NGO 对于工作者的影响过程，希望这将有助于其协助 NGO 工作者的“自我”转变和团体的发展。环保领域资深工作者冯永锋（2015）曾经提到基金会工作者对于 NGO 工作者的刻板印象：某基金会的资助总监曾说道，精英们都在政治、商业、军事、科教、传媒等领域，流落到 NGO 行业的人，基本上都是社会的废材，因此这个行业的发展非常困难。这番话代表了不少政界、商界和学界的从业者对于 NGO 工作者的看法。而本研究正是希望提供 NGO 工作者的生命故事，以促进 NGO 的管理者和促进者对于 NGO 工作者的认识。

对于 NGO 研究而言，与众多以政府——社会关系为研究焦点的研究不同，本研究转向以工作者的“自我”转变为焦点，企图理解在文化上，NGO 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影响。本研究通过分析 NGO 工作者的生命故事，以理解 NGO 作为一个团体以及作为扩展中的社会的一部分，是如何影响人的价值观和日常行为——希望这将有助于理解 NGO 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具体将在第二章展开）。

除此之外，本研究也希望与青年研究和文化研究进行对话，概括而言，包括以下原因（具体将在第二章展开）。本研究是置于中国“青年”的转变脉络之中的。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中国“青年”是被召唤出的社会身份，自身份形成之初便被期待承担国家和社会改造的神圣使命，从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到五四青年以至 1949 年之后，这样的使命一直延续到 1980 年代末（陈映芳，2007）。1989 年学生运动结束后，中国“青年”显性的改造社会的运动停止，社会不再对“青年”投射改造社会的期待，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也开始容忍¹⁸自由取向和非政治取向的青年（同上，243-244）。1970 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乃至 1990 年代的激进的市场化的发展，不仅带来了社会不公、环境危机等问题，也在重新塑造着新的中国人：例如王晓明（2000）指出，1990 年代以来形成的“新意识形态”和成功者文化等成为日渐普及的文化，包括对物质利益、“发展”、“进

¹⁸ 陈映芳（2007：237，244）在这里使用了“容忍”一词来分析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对于这类“非青年”的态度，她特别以 1980 年代末和 1990 年代初的王朔作品的流行作为例子，认为作为非官方意识形态的王朔作品，得以在小说出版市场上销售走俏，电视剧也在中央电视台播放，是因为政府和共产党的容忍。然而，是容忍还是鼓励这类非意识形态化的作品的流行，也值得探讨，但这超出了本文的关切重点。

步”、“成功”的看重而忽视“精神自由”、民众生活保障等；张慧瑜（2013a，2013b）、邵燕君（2013）则认为当前的中国青年人文化是犬儒主义的、“小时代”的文化，只关心自身的物质生活改善，退出公共领域的参与。不仅如此，关于当代中国“青年”的论述被“成功者”的故事/论述——其背后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流逻辑——所主导，不同生命经验的青年在这样的成功者文化的氛围下，被收编、规范、塑造，而那些不能按照主流标准取得“成功”的青年的生命经验被边缘、无视甚至污名化，他们难以表达、甚至没有语言以表达（王翔，2014）。

正是在这样的脉络下，本研究关注 1980 年代以来、伴随着社会的逐步扩张而逐渐出现并发展的 NGO 领域的工作者。很多 NGO 声称其团体是为了回应中国出现的社会问题，以民间志愿动机为出发、以公共的利益为使命。这样的一场 NGO 运动本身，似乎隐含着改造社会的动机或者结果。因此本研究尝试进入这一领域的工作者的生命经验，以理解他们是否正在以 NGO 行业这一较为非直接抵抗性的形式从事社会改造。

本研究特别尝试理解在 NGO 领域全职工作的“80 后”青年为何“逆流而上”、选择与主导的“成功者”形象相左的、物质收入回报低、社会认可度低甚至有一定政治敏感性的 NGO 工作；在进入 NGO 领域之后的“自我”发生了怎样的转变以及是在何脉络下发生的这种转变。希望透过这个研究，在发展主义和“小时代”文化盛行的当代中国，挖掘改造社会的力量的可能性及其可能阻碍的因素，并且描绘出“成功者”之外的沉默的、不同的“青年”形象。

之所以选择“80 后”NGO 工作者作为切入点，有以下原因：出生于“改革开放”之初的 1970 年代末到 1980 年代的“80 后”群体这一代际，具有一定的反映社会变迁的代际特点（李春玲，2013:82-83）。而本研究选取“80 后”中以 NGO 行业为职业生涯的青年人，虽然他们在“80 后”人群中所占比例较少（0.6%），但其职业选择与所谓的“成功者文化”、“小时代”文化似乎呈现出相反的特质。因此“80 后”NGO 工作者这一研究主体本身充满了内在的张力。而这矛盾张力本身使得对这一群体的研究，有助于回答这一研究的问题意识，即理解在当代中国“自我”是如何变化及其变化的可能性和阻碍性。同时，考虑到

现有青年研究较少研究在职青年（风笑天¹⁹，2012）、现有的“80后”青年研究较少研究这类在政府、事业单位、学校和商业公司之外工作的群体²⁰，对“80后”NGO工作者的“自我”的研究也将丰富已有的青年研究和“80后”青年研究。

然而，本研究并不认为NGO工作者必然创造着新文化，而是问题化其身处之NGO团体之脉络，批判性地理解NGO对“80后”NGO工作者转变的促进和阻碍因素，以此提出进一步改造脉络的可能性。

最后，作为具有生命故事叙事特性的研究，本论文也希望能够有助于与更广泛的“80后”青年乃至公众进行对话。本研究较为可能接触到那些与对话人具有相似身份和生命经验的青年人，具体而言，很可能是以在城市生活的知识青年为主。希望这个研究能够促进这些读者有动力反身、思考自身的生命历史及“自我”变化的过程。正如居于中国社会的多数人一样，这些读者也是在不断地追求“好生活”。“好生活”既包括物质层面的，例如收入、住房、医疗等；也包括非物质层面的，例如摆脱精神困顿、迷茫、忧郁、愤懑，又比如追寻生命的意义、对社会发展的思考甚至身体力行参与其中。这些对“好生活”的追求和本研究中的十位生命故事的主题是相似的，但却可能是不尽相同的生命意义系统。对于那些思索着关于追求“好生活”的内涵和意义的读者，特别是面临着对现有生活的疑问的读者，这篇论文可能会对他们的思考产生一些助力。同时，更大范围内的青年和公众对于NGO工作者的认识也将有助于这个行业的发展。正如自然之友²¹的创办人梁从诫，在2000年代初曾经说道的那样，自然之友面临的重大困难和障碍之一是公众的不理解和政府的不理睬（王名，2012：10）。十多年过去的今天，虽然“慈善”“公益”这些语词越来越为人所知晓，但是NGO模糊的面目和位置仍然如是。故而，本研究希望能引起更多的公众人

¹⁹风笑天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在青年研究领域内的四本有代表性的杂志上的论文抽样分析发现，青年研究的研究对象以在校的大学生和青少年为主，忽视对在职青年的研究；在研究主题上，主要包括职业与就业、思想观念、教育与成才、失范行为，分别都超过了10%，而在生活方式、青年文化、社会参与的研究分别只占7.9%、6.6%、5%；在研究方法上，调研研究和实地研究各占52.5%和15.1%，而其他三分之一的研究是通过引用其他文献的论述性文章。风笑天认为青年研究亟待增加对在职青年的研究，甚至应该以在职青年为青年研究的主体，因为大学生的生活环境相对于在职青年要简单一些，在职青年面对着更加复杂的社会环境，比如“成家立业”的问题，社会适应问题，社会流动问题以及社会参与问题等。

²⁰比如研究“80后”青年的重要著作《境遇、态度与社会转型：80后青年的社会学研究》（2013）一书，基本上没有对这类在NGO的青年群体的专章研究。

²¹中国最早合法注册的民间环保组织之一，创立于1994年。

士对于这一领域及其工作者的认识。

在上述问题意识下，指引本研究的具体的研究问题是，“80后”NGO工作者的“自我”是如何与发展主义和“小时代”的青年文化、以及NGO内部的文化与操作进行协商？形成了怎样的“自我”？

本论文选择两面作战²²的研究位置。一方面希望理解NGO工作者的价值观和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及其形成的因素，打开“圈外人”对NGO工作者和NGO的认识及在此基础上增进彼此理解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够向内、批判性地理解NGO对人的成长带来的不经意的效果，希冀创造有助于人的成长的脉络的发生。

研究概览和关键词的厘清

NGO在当代中国的复苏和发展是一个晚近现象，开始于“改革开放”之后的1980年代。1949年到1970年代末是中国NGO萎缩甚至消失的三十年²³，也是中国共产党以政党组织为核心和体系，通过各种形式的集体化运动，对中国社会进行组织化社会改造的过程，其结果是个人均归属于单位或者人民公社，而这些组织皆以共产党为核心领导，且成为共产党和政府管理国家、组织社会的实际行动主体（林尚立，2007：3-4）。因此可以说，1949年至“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NGO。中国官方所称的社团，实际上多数并非自下而上的成立和管理，而是由政府建立并管理，包括八个人民团体，例如工会、共青团及妇联，他们并非独立的社会力量，而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²⁴（王绍光、何建宇，2004：72；林尚立，2007：4）。在“改革开放”之前，即便这些名义上被称为社会组织、但实际上主要由政府参与建立并管理的社会团体的数量也很小。据估算²⁵，1950年代全国性的社团只有44家，而1960年代也不过100

²² 感谢王晓明老师在2014年5月26日的面谈中谈及此点对我的启发。两面作战一词很形象、犀利地概括了我想要做的计划，这意味着不仅仅要分析NGO“外部”的压力，也要分析来自“内部”的、潜在的不利因素。

²³ 可参考刘培峰（2008）《扩展中的公民结社权》，页58。另外林尚立（2007）也提到，民国时期活跃的NGO，或自我解散、或被取缔，或被重新改造，所剩无几。

²⁴ 人民团体是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资源上由财政统一供给，在领导人任免上，通过统战部协调（贾西津，2008：190）。

²⁵ 在1989年国务院颁布《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之前，社会团体无须登记注册，因此这一时期中国没有对社会团体的官方统计（王绍光、何建宇，2004：72）。

家，地方性社团大约有 6,000 家左右，这相对于当时 5 亿人口的国家来说，对国家和地方社会几乎无法发挥作用（林尚立，2007:4）。“文革”期间，不少团体甚至完全停止工作，比如基督教青年会（王名，2012: 263-264）、中国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总会²⁶，2012）等。

1980 年代之后，NGO 经历了从无到有、数量和规模迅速发展的阶段，展开了一场以有组织的志愿活动和 NGO 为主体的“结社革命”（associational revolution）²⁷（王绍光、何建宇，2009: 71; Salamon, 1994）。截至 2014 年底²⁸，根据官方统计数据，合法注册的社会组织共有 60.6 万个，其中，社会团体²⁹31 万个³⁰，基金会³¹4,116 个³²，民办非企业单位³³29.2 万个（见下表）；共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 682.3 万人。考虑到这类组织注册的高门槛因而存在大量未经合法注册的组织的情况，在中国实际运作的 NGO 及其工作者的数字更为庞大。在上述三十多年间新兴的 NGO 从无到有的背景下，本研究企图尝试理解 NGO 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特别地以其对 NGO 工作者的价值观和行为的影响作为分析焦点。

在进一步展开分析之前，有必要对本文所使用的 NGO、民间组织、“慈善/公益”组织等词进行讨论和界定。在中国，对于日益出现的这类非政府性、非营利性的组织，有不同的名称指代，包括 NGO（非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公益/慈善”组织、民间组织等，这些语词产生和发展的脉络、推动使用的主体各有不同³⁴，对这些不同语词的演变的论述分析是有价值的，但是超出了本研究的研

²⁶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2012. 中国红十字会的发展历程. 2012 年 8 月 2 日.

http://www.china.com.cn/zhibo/zhuanti/ch-xinwen/2012-08/02/content_26100750.htm 浏览时间:2015-8-1

²⁷不少学者也认为，中国在 1980 年代之后的“结社革命”也构成了同时期世界范围内的“结社革命”的一部分（王绍光、何建宇，2009: 71; Salamon, 1994）。

²⁸这组数据来自于中国民政部《2014 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

<http://cws.mca.gov.cn/article/tjbg/201506/20150600832439.shtml>, 浏览日期: 2015-6-24

²⁹社会团体指“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中国民政部，1998a）

³⁰包括工商服务业类 34099 个，科技研究类 16923 个，教育类 11412 个，卫生类 10060 个，社会服务类 44630 个，文化类 30101 个，体育类 20848 个，生态环境类 6964 个，法律类 3270 个，宗教类 4898 个，农业及农村发展类 60202 个，职业及从业组织类 19867 个，国际及其他涉外组织类 516 个，其他 45946 个（中国民政部，2014）。

³¹基金会指“利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赠的财产，以从事公益事业为目的，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成立的非营利性法人”（中国民政部，2004）

³²其中：公募基金会 1470 个，非公募基金会 2610 个，涉外基金会 9 个，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 28 个（中国民政部，2014）。

³³民办非企业单位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中国民政部，1998b）

³⁴不同时期在中国出现、主导对于这类团体的指称有以下变化：从 1950 年代开始的“社会团体”到 1980 年代的“非政府组织”、到 1990 年代开始的“非营利组织”、“慈善团体”、“公民社会组织”再到 2008 年之

究重点。但本节将简要对其进行梳理，以指出本研究所使用的语词及其原因。

表格：2007-2014 年中国全国注册之社会组织统计

年份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社会团体	212000	230000	239000	245000	255000	271000	289000	310000
基金会	1340	1597	1843	2200	2614	3029	3549	4116
民办非企业	174000	182000	190000	198000	204000	220000	255000	292000
小计（社会组织）	387340	413597	430843	445200	461614	494029	547549	606116

注：根据 2014 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³⁵，2015-06-10）之数据，制作本表格

中、英文为主的学界多以非营利组织、NGO 等指代这类组织。王名、贾西津（2006）曾使用非营利组织一词进行描绘。他们对非营利组织的定义是“不以营利为目的且有正式的组织形式、属于非政府体系的社会组织，他们具有一定的自治性、志愿性、公益性或互益性，但并非面面俱到，需要客观而动态地加以观察和理解”，他们认为在一定意义上该词与 NGO、公民社会组织、第三部门等词汇相通。王名（2008）曾采用民间组织一词，指“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由各个不同社会阶层的公民自发成立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非营利性的³⁶、非政府性和社会性特征的各种组织形式及其网络形态”；他认为这一概念类似英文中的公民社会组织或 NGO，但具有转型时期的中国特色³⁷（1-2）。伴随着三十年的发展，中国的民间组织与国家体系、市场体系之间的关系既有独立性、又有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和共同发展的关系（同上，2）。这里的民间组织，排除属于党政部门的人民团体和事业单位、以及属于市场的社会企业的民间团体，包括在民政部门登记的 1）社会团体，2）基金会，3）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在民政部门之外登记

后“公益/慈善组织”、“社会组织”。

³⁵ <http://www.mca.gov.cn/article/zwgk/mzyw/201506/20150600832371.shtml>，浏览日期：2015-6-24

³⁶ 非营利性主要是和营利性的企业相对所言，这里包括非营利组织的捐赠人、理事会和实际管理者不能从组织的财产及其运作中获得利润；在组织的运作和管理机制中，有效规避高风险与高回报的自我控制机制，以及避免以利润作为激励手段；在财产保全机制方面的非营利性，不得已捐赠以外的其它方式变更财产及其产权结构，当组织终止活动并注销时，剩余财产不得以任何形式转移改私人所有，而只能用于合乎其宗旨的其它社会活动（王名：2008：6）

³⁷ 这里说的转型时期的中国特色是指，公民的主体性、外部环境的规范性和内部治理的制度化程度上与西方语境下的公民社会组织不同（王名，2008：2）。

的 4) 社区基层组织, 5) 农业专业协会³⁸, 6) 以工商形式注册的非营利组织, 和 7) 境外在华 NGO。马秋莎 (Ma Qiusha) (2006: 1) 则使用 NGO 一词, 但是其所指与王名的民间组织类似, 既包括根据中国民政部的分类标准下的社会组织和民办非企业的团体, 也包括以工商形式注册的和非注册的团体。由此可见, 这些学者虽然使用了不尽相同的名词, 但是认为这些语词之间是可以互相替代的, 都指称那些在政府之外成立的、非营利性的团体。

除了上述通常存在于学术研究之中的非营利组织、NGO 等语词以外, 在 2000 年代后期的中国社会脉络下、出现了日益普及化的“慈善/公益组织”这一语词。杨团认为“慈善组织”指, 由民间兴办的“公益”团体, 其组织目标指向社会整体、奉献者以外的特定社会人群或者对社会和人类发展更为长远的目标(2009)。朱健刚将“公益”定义为由民间发起的、为了公共利益而开展的志愿性行动, 包含原有的慈善的内容, 也覆盖了环保、健康甚至维护公民权利的志愿行动, 指称政府、市场之外的公共领域(2012:227); 而“公益组织”则指“专业性的职业化的非营利组织…包括直接从事公益的专业性的公益组织(NGO), 也包括各类支持性的公益组织, 基金会、能力建设机构等”(朱健刚: 2012:3)。从上述不同学者对“公益/慈善组织”的定义可见, 其所指称的皆是, 由民间发起和管理的组织, 与 NGO 的内涵相似, 但是在中国特殊语境下以“公益/慈善”组织作为指代³⁹。1990 年末期, 该语词于中国的中文学术研究和媒体报道世界中出现, 在 2008 年之后更开始越来越频繁地被使用, 而 NGO、公民社会组织的使用普及率在这一时期则明显较少, 不少 NGO 工作者也开始较为频繁地使用“慈善/公益”来命名自己工作的团体、所从事的工作以及自我的身份。“公益/慈善”似乎成为了官方和民间不断协商、得到官方默许甚至支持、而取代 NGO、公民社会组织的名词⁴⁰。

³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2006), 农民专业合作社依法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登记。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gov.cn/flfg/2006-10/31/content_429392.htm 浏览日期 2015-6-24

³⁹ 对于“公益”的内涵的讨论, 也可以参考王硕.(2013)。

⁴⁰ 这一点及其可能的原因需要另外撰文进行研究, 超出本研究的研究重点。关于中国“慈善”的语词的出现、发展、传播以及“慈善”行为的演变的梳理可以参考杨团(2009)。她认为, 尽管“慈善”在中国民间社会中的历史源远流长, 但是 1949 年之后, 慈善领域被“公有化”, “慈善”一词被认为是封建残留、精神鸦片、不会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 因此这一词汇在中国的政策、媒体、日常生活中消失了三十多年(杨团, 2009)。但是“公益”一词被保留, 纳入政府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之中(同上)。1990 年代末, 巨大的自然灾害的发生经媒体报道掀起民众自发的捐款、捐物高潮以及官方非政府组织

(Governmental NGOs) 在政府体制中的推动, “慈善”一词才逐步被政府及媒体使用, 进入民众的视野之中(同上)。2008 年的汶川大地震和奥运会后, 志愿者、NGO 开始进入日常民众的视野和生活, 极大

除了上述的学界和组织工作者之中常使用的命名以外，2007年开始，中国政府官方使用社会组织⁴¹一词——包括经各级政府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中国民政部，2011）——替代民间组织，并且认为社会组织有扩大民主和社会治理的功能（林尚立，2008⁴²：264）。这些社会组织均为依法注册的团体，但是因为法规规定，这些团体必须有来自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或者是上述部门授权的组织作为主管部门，方能注册，大量没有政府资源的社团团体没有进行注册，但是实际上开展活动⁴³。

本研究认为，社会组织是官方最近开始使用的命名，较多地出现在政策文件之中，在学界并未较多地使用该词，且缺乏一定的理论性讨论，因此本研究并不主要使用该词。“公益/慈善”具有较难定义的限制，因为公共利益的界限制定具有模糊性，并且“公益/慈善”名词本身存在以公共利益为实现目标的道德因素，并且可能阻碍其工作人员的自我反思。因此本研究不采用“公益/慈善组织”作为主要使用的词汇。建基于对问题意识的扣连：伴随着“改革开放”、由于政府放开对社会的全面管理而产生的、由民间社会主要建立和管理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急速发展的脉络下，本研究试图理解其中全职工作者，在发展主义和“小时代”的社会文化下，选择进入既非政府性的、又非营利性的团体工作以及在其中经历的“自我”变化；因此，将主要使用 NGO 这一语词指称，

地推动了“公益/慈善”理念和行为的普及，“公益/慈善”开始较为频繁地出现在媒体、政府政策文件之中，也被认为是慈善进入现代公益阶段的开始（杨团，2009；朱健刚，2009）。在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所引发的全国300多家民间组织和300万志愿者参与救灾和灾后重建之后，一些学者和民间组织领导人认为中国进入了公民社会元年（朱健刚，2009；徐永光，2008）。然而，2010年左右开始，“公民社会”成为一个越来越敏感的词汇，越来越不为人所提及。比如2010年底，深圳市委向广东省委提交的有关深圳建设公民社会的工作，遭到省委书记汪洋的批评，认为这种做法是不讲政治；2011年，“公民社会”成为中共高级干部避之不及的敏感词，媒体也使用“民间社会”来代替“公民社会”，有心改革的领导干部使用“社会建设”这个命名（钱刚，2012）。正是在“公民社会”变得敏感的同一年中，“慈善/公益”变得越来越普及。例如：2009年之后，大学中新成立的研究中心更多的是使用“公益”一词，比如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中山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2009年之后出版的年度杂志也常常含有“公益/慈善”这一语词，比如《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09）》、《中国公益发展报告（2012）》等。由 NGO、公民社会组织的流行转变为“公益/慈善”的流行的原因，超出本文的研究范围。但是个中原因似乎可以从2005年开始由慈善立法的提出到最后审议稿的出现可以一窥：贾西津（2015）指出，民政部门和一些专家希望立法的是非营利组织法而非慈善法，但是之所以最终慈善法进入立法程序，源于立法的政治共识只到慈善法的层面；非营利组织法涉及结社权等问题因而在体制之中存在着张力，而慈善普遍被认为是好东西，没有人否定需要发展慈善。

⁴¹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社会治理现代化，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组成部分。转引自澎湃新闻新闻：<http://www.thepaper.cn/baidu.jsp?contid=1329172>，浏览日期：2015-6-24

⁴² 收录于王名（2008）。

⁴³ 在2010年之后，各地方政府开始逐渐放开社会组织的注册，一些地区逐渐取消需要业务主管部门的注册的要求。

政府逐渐退出部分社会管理职能之后逐渐出现的、由民间自愿成立和管理的、非营利性质的社会组织，具有一定的自治性、志愿性、公益性或互益性。但同时为了行文通畅、将交叉使用其它语词，但是皆用来指称那些并非由政府、而是由民间社会发起和管理的、非营利性的组织。这里的 NGO 有如下特征：1) 不隶属于国家：区别于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2) 不属于企业：具非牟利性质。它们包括在民政部注册的、由民间发起的社会组织以及在工商部门注册的或者没有进行注册的、但实际上符合上述特征的组织。这一定义有效地回应本研究的问题意识：在过去三十多年间、中国社会开始出现的、有别于政府体系以及市场体系的社会空间的脉络下，试图理解自下而上出现的 NGO 是如何形塑其工作者的价值观和行为。这样的定义基本上和学术研究中研究中国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公益/慈善”组织的所指大致相似。特别地，本研究同意 Anthony Spires (2007) 的观点，已有的研究较多偏重政府类 NGO (Governmental NGO, 简称 GONGO)，对于自下而上成立的 NGO 的研究较少，故而本研究将主要研究这些自下而上成立的 NGO 的工作者。

各章简介

本章楔子对于理解本研究的研究动力至关重要。以作者的自传书写和反思为基础，展开我作为一名“80后”NGO工作者在进入NGO领域前、中、后的自我的变化、生命困惑以及对此的反思，正是基于这一经验发展出研究主题——理解“80后”NGO工作者的“自我”转变与所处脉络的协商关系，特别是中国1980年代以来NGO的发展对于工作者的影响。同时，这一章也表明研究者开展这一研究的位置、前提假设和动力。除此之外，这一章对于研究的问题意识、研究问题和主要观点进行了概述。

第二章梳理了与本研究有关的文献。“80后”NGO工作者处于历史的中国“青年”的一部分，也是“80后”青年的一部分，同时，他们亦置身于自1980年代开启的NGO行业的发展之中。这一章就上述脉络进行了梳理，并且整理了重点的NGO对于人的培养的理解，作为展开本研究的10位对话人在NGO中的“自我”成长的背景及对话对象。第二章亦梳理了已有的对NGO的批判知识，如其

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与新道德主义的关系，最后提出以形意世界概念作为展开本研究的理论视角。

第三章主要讨论本研究所使用的叙事研究方法的方法论以及研究过程，并且分析研究者在其中的反身的重要性。

第四章以 5 位对话人的生命故事集中呈现了 NGO 工作者的成长过程，以呈现本研究的叙事研究之性质，并为读者提供较为直接地进入 NGO 工作者生命经历的可能性。

第五、六、七章是本论文的主体部分，以进入 NGO 形意世界之前、进入的过程以及进入之后的“自我”转变为线索展开叙述和分析。在这个基础上，深入分析将得以展开。第五章将主要分析 NGO 工作者成年前的 H-I-P(history-in-person 的简称，指嵌入人之中的历史)，即在 1980 和 1990 年代之社会脉络下形成了怎样的价值观和行为。这些 H-I-P 将作为后文进一步讨论其如何进入 NGO 形意世界、如何在其中经历（不）转变以及经历了哪些（不）转变而奠定分析基础。经过对 10 位对话人的生命故事的分析，第四章提出“80 后”NGO 工作者的 H-I-P 带有较强的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改革开放后的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烙印：对金钱和权力的体验参与塑造着其压抑的感受，向往成功者文化、城市生活的意识；中小学的应试教育参与形塑了其竞争主义、较弱的社会意识和参与；以及窄化的性别文化形塑的性别观念、行为和情感。另一方面，伴随着改革开放，社会空间的扩大和媒体的兴起，“80 后”也受到普及文化的影响，其中的社会主义、爱国主义以及朴素的善恶观也一定程度地沉淀于其 H-I-P。正是带着这样的 H-I-P，他们在未来有可能进入 NGO 形意世界，并且以之与这一世界中接触的新的文化资源进行即兴和互动以不断地改写着“自我”。

第六章聚焦于“80 后”NGO 工作者被招募进入 NGO 行业的转换期，分析促使其接触 NGO 领域的主要因素，以及这一阶段“自我”经历的变化；希望在这一基础上，打开 NGO 行业自 1980 年代以来的发展历史脉络。这一章提出，正是 1990 年代以来，尤其是 2000 年前后，NGO 行业的迅速发展，透过大学、传统媒体、互联网新媒体以及举办各种志愿者活动，居于城市、以大学生为主的“80 后”NGO 工作者才有可能较为便利地接触和 NGO 有关的文化资源，被招募进入 NGO 志愿者的形意世界之中，这为他们进一步进入 NGO 领域全职工作铺垫了可

能性。而其曾经携带的 H-I-P 在这一时期也为其进入这一形意世界创造了可能性。

NGO 工作者带着在第五、六章描述的阶段中所形成的 H-I-P 和位置而进入 NGO 形意世界全职工作之后，他们经历着和不同力量的互动与协商，其“自我”转变具有多面向性和不确定性⁴⁴，这正是第六章将要分析的主要内容。希望在此基础上，批判性地理解 NGO 对于其工作者的改变的影响过程及其带来的意料之中的和不经意的结果。一方面，NGO 工作者在参与 NGO 的过程中增进了自我认识和成长，对社会发展有更深入的理解和反思，并且形成一定的介入社会和公共生活的行动。另一方面，NGO 的操作中，可能带有缩窄批判思考和开放学习多种思想资源的空间，缺乏对社会问题成因和解决方案的深入分析与论述，习惯性地以“主流”/“另类”二元简单化的分析视角，这无益于 NGO 工作者的成长，也可能阻碍 NGO 对于社会和人的改造的工作。

第八章作为结论，将尝试再次总结全论文的主要论点、意义及限制。最后将以我开展这项研究的学习过程中的个人反思——亦是本研究主要发现的另一种回响——作为结束。

⁴⁴本文所使用“不确定性”一词意指，人的“自我”转变并非有确定的转变方向和结果。第二章有关使用形意世界这一理论视角会对此有所谈及。该理论认为人是在活动中，与环境发生即兴性的互动，是一个试验性发展的过程，在这样的活动中，人有可能改变。同时，H-I-P 也会促进和限制人的改变。具体参看第二章中的相关部分，页 44-45。

今日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着力点，是要努力破除那种机械两分的思维习惯……[其]最大的意义，并不只在揭破虚幻、粗劣和溃烂的事物，而更在发现活生生的、创造性的文化因素，在激发全社会对真正优异的文化的强烈渴望，在鼓舞人们去努力创造这样的文化。（王晓明，2013:37,40）

第二章 文献回顾

正如上一章所言，本研究尝试处理的问题是，“80后”NGO工作者的“自我”是如何与发展主义和“小时代”的青年文化、以及NGO内部的文化与操作进行协商、形成了怎样的“自我”。这一章将围绕这一研究问题，梳理已有研究的知识地图，建立本研究之对话对象。首先，“80后”NGO工作者的“自我”形成是在“青年”形成的脉络之中的，其中既包括“中国青年”形成的历史脉络，也包括“80后”青年这一代际脉络。因此有必要对与此有关的研究做出梳理。其次，本节将梳理相关的NGO研究，以及NGO领域对于工作者“自我”变化的已有研究或论述，在这个基础上提出聚焦于研究NGO对于其工作者的“自我”之影响的必要性。最后一节提供分析这一问题的理论视角——在形意世界中的“自我”改变（Holland等，1998）。

一、 中国“青年”的历史脉络和“80后”代际研究

本节将对已有的中国“青年”研究分成两部分进行回顾。第一部分是有关中国“青年”的历史维度，即不同时期的青年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和1949年后的历史影响着当代中国“青年”的生成及其特点，并且在“80后”青年文化中留下深刻的影响和痕迹。第二部分则聚焦于来自学界和大众媒体对“80后”青年群体的论述，“80后”NGO青年正坐落于“80后”青年的脉络之中。

（一） 有关中国“青年”的历史脉络

陈映芳之《“青年”与中国的社会变迁》（2007）一书，系统地研究了自清

末民初到 1990 年代的逾百年的社会变迁中，中国“青年”的不同意涵。她指出，“青年”在中国是伴随着现代化的过程而出现的词汇，是被召唤出的群体。在近代中国初期到 1976 年文革结束期间，“青年”被塑造为承担国家命运和社会改造的神圣使命的群体，“青年”被呼吁从家庭走出来，为国家而奋斗（陈映芳，2007）。可见，自近代以来，中国“青年”处于社群关系——家庭、国家等集体——的包裹之中，其主体意识和自主行动，并未受到重视。有关中国“青年”的论述，并不尊重“青年”的独立声音，忽视他们的“青年”自主性。

1949-1976 年间，“青年”继续承担神圣使命，被塑造成革命的先锋。这一时期，社会的自主空间较小，由上而下的政治力量控制全体社会，将其纳入管理，人口和信息不能自由流动。新闻媒体、工作“单位”等由中国共产党统一指导和管理，宗教、职业、社会团体亦不存在；家庭不再是培养青年思想意识的主要空间，政府透过学校、工作单位、媒体等承担“革命青年”的培养（陈映芳，2007）。这一时期，学校系统内实施政治教育，教育课程政治化——教科书、读物、艺术作品的内容将执政党正当化，在正规的教学课程和非正规课程中灌输学生忠于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透过高扬英雄模范人物尝试塑造着“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个人自我牺牲，服从、忠诚、献身的道德规范。在学校中设有小组、学习、相互批评和评选积极分子的制度（陈映芳，2007）。“曾经是反体制的激进青年的存在场所的学校开始转变为‘革命青年’的育成机构”（陈映芳，2007：186）。但是这个时期，也培养了“反抗青年”，中国革命的斗争史被当作重要的政治教育资源，革命家成为青年偶像（陈映芳，2007）。这一时期的青年的培养模式，在 1980 和 1990 年代依然有不少存留，对于“80 后”的成长，仍然留有影响，比如学校教育/课程依然强调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精神等，这一点将在第五章中进一步展开。

1970 年代末开始，出现了传统孩子观的回归（陈映芳，2007：255-259）。家庭再次成为青年职业选择、婚育态度和行为方面的重要影响力量。

1980 年代，青年开始受西方文化影响，主要通过西方思想理论、西方消费品和流行文化的传播（Xu，2002）。在一九八九年六四结束之后，“青年”的“神圣使命”开始解体，社会开始默认和理解青年的去神圣化，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也开始容忍自由取向和非政治取向的青年（陈映芳，2007：239-244）。在 1980 年

代末、1990年代初的一系列调查表明，与其他非社会主义国家的青少年相比，中国“青年”缺乏团体价值观和社会生活倾向⁴⁵（同上，234）。

综上所述，通过历史脉络的梳理，中国“青年”呈现出处于不断地被中国社会的变迁所影响的特点：1978年之前被召唤以承担社会改造的使命；1980年代之后，伴随着开放政策又开始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尤其在1989年之后，开始去政治化、回归家庭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中国“青年”是如何与变迁中的中国社会脉络进行互动、协商，尤其是这个过程的个人生命故事，在上述研究中均没有看到，这也是本论文尝试去理解的。本研究也希望尝试在陈映芳对中国“青年”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研究的基础上，继续绘制2000年之后的青年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并且聚焦于“青年”自身的视野和声音的挖掘，以理解个体成长与社会变化之动态和复杂关系。

（二） 学术研究和大众媒体中的有关“80后”青年的论述和研究

近年出现的对“80后”青年的研究，丰富了陈映芳的“青年”与社会变迁的历史研究。从代际而言，“80后”NGO工作者也是位于“80后”之中，因此“80后”研究亦是本研究的脉络之一。

1. 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下的“80后”

“80后”一般指伴随着改革开放出生、并成长的一代（李春玲，2013；张瑜、白杨，2010）。“80后”是独特的中国概念，它并非是简单的“年龄群体”而是“社会群体”的概念，是指一群共同经历某些重大历史事件、拥有相近的思想观念、价值态度、行为方式、利益诉求的一代，“80后”代际折射的是中国巨大的社会变迁（李春玲，2013:82-83）。中国的社会变迁和“80后”的观念与行为，是互相影响的关系，前者塑造后者，后者对前者进行反应（同上，429）。对“80后”产生影响的社会变迁包括：1）令“80后”广泛受西方文化和生活方

⁴⁵ 这是根据1989年对中国、美国、澳大利亚三国青少年的价值观的调查而得。“团体价值观”这一项包括“世界的和平”、“国家的安全”、“家庭的平安”、“平等”等。“社会生活倾向”根据1988年日本总务厅青少年对策本部举行的世界青年意识调查显示，以“为社会尽力”作为人生目标的年轻人比率并不比其它非社会主义国家明显偏低。

式的影响的开放政策；2) 市场经济带来的竞争和谋利的氛围，包括城市化的发展，GDP 优先考虑，消费主义盛行；3) 生活水平的提高令“80 后”较少经历生活的逆境和挫折；4) 独生子女⁴⁶的处境，令他们得到多重的家庭关爱；5) 互联网的出现，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资讯、广泛的社会交往渠道和开放的自我表达空间；6) 大学扩招、自主就业政策；7) 国家意识形态合法性转向绩效型合法性；7) 国家将教育、医疗、养老、住房保障等责任转嫁到家庭，令“80 后”生活压力剧增。8) 市场化、全球化和消费主义全面的塑造了“80 后”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政治态度（同上：83，431，433，434）。

然而，虽然李春玲提到“80 后”是拥有着共同思想观念、价值态度、行为方式和利益诉求的一代，这个群体也是空前多元的一代，受地域、家庭、教育背景、阶级出身等影响(李春玲，2013；吴小英，2012:42；黄洪基等，2009)，因此上述概括未必具有普遍性。

按照出生于 1980-1989 年的人口统计，中国“80 后”青年人口为 2.2 亿，约占总人口的 1/6；其中 0.4 亿为大专/大学生在学或毕业生，独生子女 5000 多万（李春玲、施云卿，2013:432）。“80 后”中的流动人口相对较高，其中 31% 的人口为流动人口(范雷，2012:58)。“80 后”在民营企业工作的人口达 55.7%，在社会团体及自治组织工作的人口为 0.6%⁴⁷（范雷，2012:58），按照“80 后”人口为 2.2 亿计算，这部分在社会团体及自治组织工作的人口约为 132 万人。

2. 有关当代中国“80 后”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主要论述

1) 青春染暮气：为了个人物质生活而奋斗的“80 后”

“个人奋斗”已经成为“80 后”的重要生活态度之一。一项于 2007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展的针对 33 所大学历史系大学生的问卷调查的显示，当被问及信仰体系时，72.7% 的学生选择“个人奋斗”、10% 选择“不知道”、17.2% 选择“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Rosen, 2009:365）。Rosen 认为，“80 后”青年是

⁴⁶独生子女政策在不同地区的政策和实施情况并不相同。李春玲（2013）也指出，“80 后”人群中的独生子女比例只有约 20%，主要是城镇家庭子女，但是大多数农村家庭出身的“80 后”多成长于少子家庭，比如在 2-3 个子女家庭长大。

⁴⁷ 根据 2008 年数据。

实用主义的和以成功为导向的，他们的公共生活的参与是为了实现其个人的目标、其所谓的“公共参与”常常是一种私人生活层面的参与，比如在朋友、家庭和网络中，较少会冒政治风险参与公共活动（2009：368-369）。

随着进入劳动力市场，“80后”成为了无奈而焦虑的奋斗者，面临严峻的竞争压力、就业压力、高房价，生活成本和养育子女的成本攀高等等，奋斗目标也变得具体化——工作、房子、爱情；生活中充满着较难实现的物质上的需要而带来的矛盾（李春玲，2013）。2013年5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莫让青春染暮气》认为，在社会急速变化的时代下，中国的“80后”青年一代开始出现怀旧、叹老，并且在精神面貌上失去年轻人的精神状态——朝气、锐气、敢想敢干、直抒胸臆、敢为风气先的精神（白龙，2013）。“眼前的这个年轻人像是从少年直接迈入中年”（同上）。白龙认为这是他们成长的时代带来的结果：社会的激烈竞争，城市化带来的个体的无助和压力，高度流动的社会带来的精神上的迷茫和认同感的缺失。白龙认为年轻人关系着社会的未来，呼吁社会应该提供给青年人更多的机会、公平的竞争环境和广阔的上升空间。同时，青年人应该担负起社会责任和对国家发展的使命（同上）。

然而阎云翔认为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社会结构发生的最大变化且仍旧正在经历的是“个体化过程”，青年人不再认同为了社会和国家承担责任，转变为为自己而活的、强调个体的价值观。因此《人民日报》呼吁青年人承担为了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是不合时宜的，尤其是国家已经撤出对人民的社会保障责任（2013）。正是因为社会制度未能提供足够的社会保障，青年人普遍感到失败的代价太大有关，不敢失败；只能顺从单一的社会理想——成为亿万富翁或高官——而互相竞争，“几乎全国人民都用着同一个标准来衡量自己的人生”（同上）。

也有学者指出，奋斗的“80后”的现象的深层原因在于，1990年代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而出现的成功者文化⁴⁸、消费主义和犬儒主义，塑造了“小时代”的青年——不关注国家、社会，只关注自己的小日子，而且以有房有车的成功中产阶级文化为奋斗目标（张慧瑜 2013a, 2013b）。犬儒主义不仅是一种支配性文化，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他们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但依然这样做。

⁴⁸可以参考电影《中国合伙人》，该电影的故事所表现的竞争者文化和丛林法则，成为了主流意识形态。（张慧瑜，2013）

“小时代”的青年觉得自己是异常羸弱，丧失行动力的（张慧瑜，2013b），这揭示了“小时代”的青年不仅仅是思想上的犬儒主义，而且没有行动能力。“80后”对政府满意度低，对官员信任度低，生活安全感略低，感受到一定的社会不公平感，认为公平重要，但是也相对看重效率（范雷，2012:59）。他们与其他代际一样⁴⁹习惯服从权威，较少意识到自身应该承担的公民责任（同上，59-60）。

然而，“80后”并非铁板一块，仍存在着数量占极少数的反抗物质主义、成功主义的青年人（阎云翔，2013）。但有关“80后”的社会运动和社会参与的研究较少，比如在对“80后”进行专题研究的第一本书《境遇、态度与社会转型——80后青年的社会学研究》（2013）中，只有分析“蚁族”的章节涉及“80后”社会参与和社会运动。而本研究希望补充这方面的研究，聚焦研究于NGO工作者的社会意识和参与，以更加深入、全面地绘制“80后”青年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并且理解为什么他们在成功者文化、消费主义、“小时代”文化下，会选择于NGO工作以及其中“自我”的形成、甚至转变过程。

2) 2008年之后：“80后”被媒体论述为有责任感的利他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

2008年——“80后”进入成年期后——经过雪灾、守护奥运会圣火传递以及汶川大地震等事件中的积极参与之后，“80后”被主流媒体塑造的形象发生逆转，由“小皇帝”，自我，依赖，犬儒，实用主义，迷恋平等，热衷看电视、网络游戏、快餐和好莱坞电影，反叛，“垮掉的一代”，转而被描述成利他主义者，具有担当的、爱国主义的，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产物

（Rosen, 2009；李春玲, 2013）。这样的表现也被认为与政府长期的爱国主义教育有关⁵⁰（李春玲, 2013；Rosen, 2009）。当代青年不再毫无批判地接受西方思想和媒体信息，他们视国家利益为国际关系的终极目标（Rosen, 2009: 361-362）。08年反对西方媒体对于西藏暴乱的不实报道以及自发保护奥运火炬

⁴⁹但其公民责任意识比其它年龄阶层偏高。

⁵⁰ 一些调查显示，自1991年开始以强调中国过去的羞辱、热爱祖国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效果非常成功（Rosen, 2009:367）。

传递的中国“80后”青年让媒体和不少研究者认为“80后”比上一代人更呈现出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田方萌，2010:17，王小东，2010:28；唐杰，2010:26）。有着强大的国家意识形态宣传系统、政治教化、政治动员系统的当代中国，年轻人表现出强烈的国家意识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青年人依然处于被督查、被评价的地位，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观念与行为（陈映芳，2010:31）。

小结：

本研究意图选择“80后”青年这一代际概念缘于，一方面，“80后”代际正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和与之相关的NGO领域的重新出现的双重脉络下成长的；另一方面，对于“80后”青年的研究和论述方兴未艾，而其中有关NGO工作者的研究较少。因此，对于NGO工作者的生命故事的理解，有助于理解中国当代社会脉络的变迁和NGO发展对当代中国“青年”的影响。

通过以上的有关“80后”的论述和研究的梳理而看，“80后”青年呈现出爱国主义的倾向，同时在政府退出社会福利保障的背景下，生活压力巨大，为物质生活而不断奋斗；在社会参与上，呈现出回归家庭的物质生活的趋势，对于公共事务的参与较少。然而，在这些研究和论述中，缺少来自“80后”群体的声音，他们往往是被代言的，尤其缺少透过其日常生活中的互动的研究，以理解在面对这些生活压力的背景下，“80后”青年是如何进行回应和协商的：这正是本研究尝试贡献的理解和视角。同时，本研究也希望聚焦于理解“80后”中有较强的社会参与意识和行动的、在NGO工作的青年人，希望增进对这一“80后”青年群体的理解。

二、 有关中国NGO领域的研究

（一） 已有的NGO研究

中国的NGO研究发展较为滞后（朱健刚，2012）。已有的NGO的研究，主

要侧重于理解 NGO 在当代中国的价值和功能，并且较为主导的研究思路是从政府——社会关系的角度理解 NGO 是否在促进公民社会的形成，比如 Ma (2006)，王名 (2008)，冯利、章一琪 (2014) 等。除此之外，也有研究涉及 NGO 对公民培育——尤其是从社会资本角度——以及对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的价值，比如冯利、章一琪 (2014)、Ma (2006)、梁莹 (2011) 等。朱健刚在《中国公益研究十年：知识生产的停滞与转型》(2012: 224-244) 一文中，通过扩展文献研究的方法，检视关于中国 NGO 研究，指出 NGO 研究在 1949 年之后绝迹，2000 年左右才逐渐开始发展起来，但是还未形成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主要研究涉及四个领域：1) 志愿服务和行动，2) NGO，3) 法律政策，以及 4) NGO 文化研究。其中以 NGO 的研究占主要内容，主要研究政府——社会/民间关系⁵¹、社区影响、公益创新、管理技术等等。而 NGO 文化研究，主要是以 NGO 史为研究内容⁵²，以及少量的 NGO 传播和 NGO 教育的研究。

以政府——社会关系为主要视角的研究

Ma 的《当代中国的非政府组织：走向公民社会之路？》一书以公民社会作为概念框架，检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新兴的、在政府体制之出现的社会团体与政府体系的关系，提出：1) NGO 在中国已经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相对于政府的自主性，正在推动公民社会的形成，有助于发展新型的政府——社会关系，虽然仍未有足够力量以监督政府行为 (2006: 1-3)。公民社会这一理想(ideal)已经成为许多 NGO 的目标 (同上，46)。冯利、章一琪的《中国草根组织的功能与价值——以草根组织促发展》(2014) 一书，通过对 35 家草根 NGO⁵³ 进行调研并结合二手资料，以公民、公民社会、社会资本等理论作为分析视角，提出草根 NGO 的发展促进了公民社会的培育；同时弥补政府公共服务的不足，对政府问责；一定程度上弥补市场失灵，灵活地回应弱势人群的需求，监督企业的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等。

⁵¹ 比如，Wu & Chan (2012)；Wu (2012)；Perry (2013)。

⁵² 比如秦晖的《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中西公益事业史比较研究》(1999)。

⁵³ 这里的草根 NGO 指，“自发的 (民间的)、自治的 (独立的) 非营利组织” (冯利、章一琪，2014: 4)。

NGO 对于民众的公民养成的影响

除了认为 NGO 推动了社会——政府关系朝向公民社会发展以外，上述研究也提到 NGO 的发展促进了民众和志愿者的公民精神和公民参与能力。Ma 认为 NGO 成为中国民众发展个人兴趣、自我表达、参与公共事务和集体公民行动的重要途径（2006）。NGO 提高普通公众的社会资本、公民性和公民权，包括学习如何与他人、与组织内成员、与政府互动；在民众心中撒下人权、社会责任、志愿精神、人本、民主的种子；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自身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力/利，NGO 成为他们表达兴趣和参与决策的平台和机构渠道 (Ma, 2006: 135)。梁莹（2011: 318-324）通过 2006 年在南京市的 550 份入户问卷调查的分析数据发现，公民志愿参与态度越积极主动，民主、法制、平等、自由、权利、责任等意识越强。同时，她认为草根 NGO 对公民文化的成长影响深远，在草根 NGO 中，可以获得对民主的感性认识，体验民主文化，并获得民主训练。冯利、章一琪（2014）认为草根组织在公民培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人权的保障方面——公民权，政治权，社会、经济、文化和发展权利，对个人责任意识的激发和个人权利意识、公民素质和责任意识的塑造；在公民社会的发展中，促进了公民精神——独立性和自发性——的培养，加强了公民的结社能力和公众参与能力，培育了社会资本。

上述研究提供了从公民社会的视角以理解 NGO 参加者在知识、技能、自信、互信以及对民主社会的培育等方面的改变，这些角度也是本研究理解 NGO 工作者的“自我”转变中可以进行比照的。公民社会这一理念是如何影响 NGO 工作者的已有研究不多。本研究聚焦于这一行业和组织的价值观、操作、管理等对于工作者的影响，希望可以补充宏大叙事和分析中缺少的对日常生活层面和人的“自我”层面的认识以更深入理解 NGO 行业如何影响中国人的价值观、行为、社会关系等，包括理解所谓的公民社会视角与 NGO 工作者“自我”转变是否存在关系以及怎样的关系。

NGO 与文化改造

虽然上述研究中提及 NGO 正在推动公民文化、民主文化的形成，但是总体

而言，对于 NGO 的文化改造的作用的深入研究较少。这里的文化指生活的整体方式 (Williams, 1958; 1977)，即理解 NGO 工作者的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人与人的互动、人的行为、论述及其意义体系，以及意义生产的机制及其过程。Ma 在其研究中提到，NGO 提供挑战消费主义和追求物质财富积累的文化，提供另类选择的空間 (2006)。她以环保组织为案例，认为这些团体的意义并不在于其具体的、解决实际问题的项目，而在于其教育、动员公众了解有关中国环境问题并采取行动的愿景、策略和方法 (Ma, 2006: 117)。环保组织挑战中国当下的追求商业和物质财富以及美国式生活标准的主流期待，并且提供“另类选择” (Ma, 2006: 118-119)。“在许多社会中，NGO 起着倡导‘另类’发展的角色，特别强调价值。在当下的快速全球化的过程中，NGO 的这种价值导向的特点对于这种极端市场导向的趋势是一个平衡” (Katrin Fiedler, 2002; 转引自 Ma, 2006: 118-119)。环保组织也对下一代的理想主义和社会行为产生影响 (Ma, 2006: 119)。

台湾学者对于 NGO 的文化改造的意义进行了一些梳理和分析 (李丁讚、吴介民, 2008)。在台湾解严前的 1985 年，黄武雄便提出 NGO 具有建立新价值观和教育的功能，而不仅仅是“制衡”和“监督”政府。NGO 可以让成员在团体中共同讨论、学习、成长，进而慢慢形成新的法律、制度、价值和文 化，为社会引出新的方向和目标，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育”的过程 (同上, 411)。不少社会学者指出，NGO 的功能和角色不仅仅包括向“外”和向“上”，也包括对“内”培养民主参与的态度和能力，建立“文化价值”与“生活伦理” (同上, 415-418)。台湾在对 NGO 的文化功能的探讨和研究，是中国大陆 NGO 研究所缺乏的视角。而这也正是本研究希望开始初步探讨，以贡献中国 NGO 研究。

对公民社会和 NGO 的批判

在中国大陆，学者对公民社会/NGO 的研究中，鲜有对其持批判距离，文字中常常流露出的是一种对公民社会组织/NGO 道德价值的认可和对其社会功能的肯定。当然，放在中国大陆的国家威权统治的脉络下，这是可以部分理解的，因为公民社会/NGO 在中国仍处于政府的高压管控之下的边缘、弱势位置，甚至

“公民”、“公民社会”在中国常常属于敏感词汇，被限制出现在主流媒体中。但是也有一些研究者/实践者发出了一些反思声音。刘韬（2014）认为，中国 NGO 中有三套话语体系共同发挥作用：1）来自官方的话语体系，或将 NGO 看作不稳定因素，或将其视为解决现实问题的尝试；2）二战后，来自西方国家的话语体系，其中贯穿两条交错影响的子系统——社会发展和公民社会，前者是殖民体系崩盘后的新方法，后者则源于冷战及意识形态阵营对峙；3）带浓厚精英色彩的民间话语体系：来自民间的守望相助的传统和人性之善的动因以及三十年来政治、经济、社会的不平衡。刘韬认为这三个话语体系都欠缺反思力量，没有意识到自身深深地被工业革命带来的现代话语体系所影响，因工具理性而带来道德上的自鸣得意、相信进步主义，进入盲动主义的迷思，缺乏对深度思辨的兴趣，对什么是“人”、“社会”、“进步”缺乏根本性思考；身处其间的 NGO 工作者往往高举多元的旗帜，却在行动中消解多元价值和意义。戴锦华⁵⁴（2015）也认为国际 NGO 在中国的正面角色似乎已经成为社会共识，而其携带的冷战意识形态却较少被认识和分析。她认为 NGO 并非外在于新自由主义，不少海外 NGO 成立的目的是指向对抗社会主义阵营。1995 年之后，国际机构在中国引入的理念、语言等，既是示范，也是规范，充满着权力关系。她认为来自 NGO 的反发展主义的力量与发展主义也可能是同构的。刘韬与戴锦华提出的 NGO 可能带着冷战意识和新殖民主义的视角对本研究有帮助，同时，也希望本研究中来自青年工作者的生命故事可以检视这些力量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参与者的“自我”。

NGO 是新自由主义的伙伴这一观点，在美国的左翼学者、社会运动家中也有一些讨论。James Petras（1997）讨论在拉丁美洲的帝国主义和 NGO 的关系：自 1980 年代早期，新自由主义统治阶层意识到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在制造社会两极化和不满，于是企图通过推动草根 NGO 的发展解决这个问题。这些 NGO 具有一些特点：1）和新自由主义一样具有反对“政府主义”的主张，支持并推动政府减少社会福利与保障，或者通过鼓励底层民众自助而非挑战不平等的政治、经济体制。2）强调解决社会问题是个人责任，而不是政府责任。3）强调项目，而不是运动。4）去政治的性质，对底层民众的去政治化，比如不介绍帝国主义

⁵⁴ 根据 2015 年 2 月 5 日笔者与戴锦华的见面讨论的记录。地点：岭南大学

的性质、新自由主义的阶级基础等，而是通过讨论“无力”、“极度贫困”、“性别/种族歧视”等，避免讨论造成这些问题的社会体系原因。5) 促成了一种新型的文化和经济殖民主义和依赖。比如 NGO 的项目是根据处于帝国中心的资助方的指引进行审批、管理和评估，形成一种迎合资助方和评估者的需要所规训的结果。Petras 在 1990 年代末的这些观察对于研究中国 NGO 来说也有启发意义，尤其是他指出的这类 NGO 操作强调项目而不是运动，强调对社会问题的个人责任以及推动形成一种新型的文化和经济殖民主义。本研究也将有意识地带着这些视角去批判分析中国 NGO 工作者“自我”是否受这些因素的影响。

对公民社会/NGO 的批判资源可以借鉴台湾学者丰富的理论思考。台湾民主化背景下的公民社会发展的经验，可以提供给中国大陆另一种公民社会/NGO 研究的批判视角。台湾 1990 年代之后公民社会的发展及其研究表明，公民社会亦可能成为协助政府进行现代化、受企业影响的场域(李丁讚、吴介民, 2008)。台湾 1990 年代的 NGO 数目明显增加，但是多属于“服务性”社团，目的是提供社会福利，维持社会秩序，以提升统治的合法性，可能成为国家控制和规训的工具(同上, 421)。同时，1990 年代之后，台湾企业集团扩张和国族主义议题升温之后，资本对国家的自主性增强，经济逻辑也开始进入台湾日常生活逻辑。在这个脉络下，NGO 开始企业化，以企业的运作原则来经营(同上, 423)。可见，NGO 并不是和政府与企业部门完全分开的，有可能受到政府和企业逻辑的影响，成为权力运作的场域。这一视角也将带入本研究进行检视。

除了来自政府和企业逻辑的影响，宁应斌也对 NGO 可能存在的新道德主义进行了批判。宁应斌(2013)提出要小心公民社会，公民社会不是所有公民的总和，而是再现公民的场域，进出这个场域均有垄断的控制。在台湾社会的协同治理下，NGO 在不同层面或场域成为权力中心——换言之，公民社会也是一个权力运动的场域——对社会进行控制和对民众进行管治。而不少台湾的 NGO 实际上是道德进步主义的一部分，自上而下地推动现代进步的观念和普世价值，比如环保、动物保护、性别平等、多元和尊重等等，并且处于道德高地的位置，对民众采取一种绝对价值的教化态度。这种道德进步主义背后的前提假设是现代的进步观：认为时间是线性的，后期阶段总比前期阶段要进步；人类的同一性；欧洲文化中心论等。宁应斌认为进步与否是难以判断的，公民社会或者社会运

动团体需要经常去认识和分析社会，而不是对这种道德进步表现得十足自信其正确和自认进步的自满，对于不进步表现出一种愤怒、仇视的情绪，应该接受“自身行动的道德后果总是不确切的”（宁应斌，2013：11）。“如果当前社运及其话语是建立在‘促成进步’的前提下，而世界又不断复杂变化，进步与否因此总是难以判断，需要经常创造性的认识与能动”（宁应斌，2013:11）。从国际关系看，推行道德进步主义的 NGO 实际上也可能成为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事业的一部分，比如以同性恋权利、妇女权利为借口的外交军事策略或者对其他文明的贬低，以这些价值为名义的对各种侵略殖民行径进行漂白等活动；西方基金会通过对医疗、教育、慈善、扫盲、学术补助等公益援助，伸张其文化帝国主义（宁应斌，2013：25-26）。

虽然中国大陆 NGO 领域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脉络与台湾不同，比如在中国大陆，公民社会、NGO 工作还不为多数公众所知晓，在政治上受政府的猜疑和压制，在文化上也并不必然掌握“进步”话语和认可等。然而，宁应斌对于公民社会的批判视角仍有其特别价值，也是本研究采取的分析视角之一：不先验地认为 NGO 及其工作者所从事的工作必然带来进步，警觉 NGO 也是一个权力运作的场域，充满了现代性的价值观，以及也是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权力运作场域，对民众——包括 NGO 工作者——的“自我”有一定的塑造性。对 NGO 站于道德高处的位置、运用政治正确的价值和通过情感进行运作保持警惕。因此可以说，NGO 的操作是拥有着复杂性的，而非简单的道德进步和政治正确。而本研究也试图理解在中国大陆脉络下的 NGO 团体的价值、文化和操作、以至“自我”塑造方面的复杂性。

（二） 有关 NGO 工作者的研究

正是因为较少研究关注 NGO 带来的文化影响和对于参与其中的人的影响，本研究希望聚焦于此。特别是，本节将梳理已有的对 NGO 工作者的研究，提出对于 NGO 工作者的研究将有助于理解 NGO 的价值观及其操作对于人及社会的影响。

学术界对 NGO 工作者的研究较少（Fechter & Hindman, 2011: 1-18）。即便是在英文世界里，发展研究也往往聚焦于发展政策、组织和受益群体，而发

展工作的中介者——发展工作者——缺席了，他们的价值观、日常生活往往被忽略（同上）。Ann-Meike Fechter 和 Heather Hindman 编写的《在发展工作者的日常生活之中：援助世界的挑战和未来》（2011）一书是少数的例外，也可能是第一本以民族志的方式理解发展工作者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的著作。她们提出，缺乏对发展工作者的研究造成了对发展政策的执行和成效的理解困难。不仅如此，发展工作者的日常生活是充满矛盾和张力的，而不是公众和发展政策制定者眼中的那种善良和利他主义的刻板印象，他们也面临着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平衡，职业发展的考虑以及薪酬的考虑，而且，和其他工作者一样，面对着新自由主义操作的压力——去政治化的雇佣和追求效率的“最佳操作”（同上）。两位作者也质疑发展人类学更关注制度、团体、论述和政策分析，而非文化或者人⁵⁵；而发展研究中的民族志转向，关注的是发展对象的文化，而非发展工作者的复杂性。

台湾社会运动/知识界中有一些涉及民间团体组织者的研究，如李易昆（2014），吴永毅（2010）等。吴永毅（2010）以自传研究为方法，试图理解社会运动组织者是如何生成并维持的。他提出其过程需要经过实验的微观公共空间，以作为个体性和社会运动之间的中介过程，在其中互相协助、改变参与者的自我。他认为这种改造不只是意识改造，还需要有行动，特别是是否选择另类生涯，进入、创造一个组织/集体/社群生活，在这个场域中改造身体习惯。吴永毅对社会运动团体的研究，注重对其负面影响的研究，而非仅仅偏向组织的正面作用——认为仅仅研究其正面作用是脱离现实的。对组织的负面作用作为研究对象在方法上具有可能贡献，因为其材料将会融入更多的不同的视野因此更加具有丰富性（2010:363）。李易昆（2014）则在研究台湾社区大学作为社会变革的中介者与社会变革这一目标的关系时，发现其自身——作为组织者——的发展与社区大学的发展是相互关联、互相影响的，组织者的成长本身也是社区大学的工作成果之一。这两份研究因其研究者——行动者为一身的作者位置，对自我反身的深入、批判，呈现出参与者在微观层面——人的身体、情绪、意识等——参与/卷入社会运动中的转变。然而，在中国，这类对组织者的学术研究

⁵⁵Fechter & Hindman 也提到发展人类学家的困境，对不少人类学家来说，发展工作者是不易接近的，因为书写发展工作，有可能遭到发展工作者的误解、法律诉讼、关系破裂，认为是一种职业和个人背叛。所以他们发现虽然缺乏对发展工作者的学术研究，但是却有不少发展工作者发表过一些他们对发展行业的观察文章（比如 Leonard Frank, 1986）。

较少。Fechter 和 Hindman 一书中对于发展工作者的日常生活中的矛盾和张力以及对发展行业的新自由主义操作形成的援助文化等反思,对于理解中国的 NGO 工作者也有参照价值。但与其问题意识不尽相同,本研究关注的焦点是,中国 1980 年代“改革开放”的脉络下,通过考察于 NGO 领域介入较深的 NGO 工作者的生命经历,希望有助于理解 NGO 在中国社会的文化改造中的作用以及 NGO 对参与者的自我的影响。

对中国 NGO 工作者进行的学术研究包括王名、Ma Qiusha (马秋莎)、Wu Fengshi (吴逢时)等。王名(2008)和 Ma (2006)在其对中国“民间团体”的研究中,涉及了对于中国 NGO 行业第一批创立者的初步研究。Ma (2006)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作为 NGO 创始人的领导力、动力(dynamics)、进入 NGO 的动机、成功因素等。王名(2008)在对 NGO 发展历史的梳理中,指出 1990 年代中期到 2000 年中期的 NGO 的发展中,主要的骨干包括政治精英——受过良好教育、担任或曾担任党政部门及事业单位领导的官员阶层;知识精英——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成为民间组织的精神脊梁,包括硕、博士研究生和留学归国人员;以及企业界的精英——为民间组织提供经济资源(43-46)。而王名主编的《中国 NGO 口述史》第一辑(2012)和第二辑(2014),正是记录了二十七位第一批参与或者创办中国 NGO 的领导人的口述史,为 NGO 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珍贵的、历史材料。这些领导人多是中国第一代 NGO 的创始人,如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的创始人徐永光,自然之友创始人梁从诫、农家女创始人吴青等。另外,其访谈重点是其创办机构的组织发展历史和社会脉络,而不在于创办过程中对于其“自我”的影响。最后,这两本口述史更多的是以对话形式展现个人和组织的成就,而未进一步的批判分析。本研究一方面会借鉴这两辑口述史中对 NGO 在 1980 年代开始到 2000 年代的组织发展状况和政治、社会环境脉络,另一方面将重点理解于 2000 年中期开始进入草根组织工作的“80 后”青年的生命故事,尤其是理解 NGO 作为一个行业对于青年一代的“自我”的影响,以描绘 NGO 工作者的不同代际和阶段的面貌,以理解 NGO 行业及其所处的社会脉络转变。

长期研究中国环境运动的学者 Wu Fengshi,对社会运动者的政治倾向——自由主义、民主、公民社会——进行了初步研究(2012)。为了回应中国 NGO 的研究主要是关于组织发展和特点的研究,而对于 NGO 创始人的政治取向却没

有触及，Wu 转向研究中国 NGO 领导人的政治取向，尝试理解其集体身份认同。她观察到 2008 年之后，中国的 NGO 数量激增，但是 NGO 的参加者的政治经济、教育和职业背景也愈来愈多元化，而公民社会内部是复杂的，有着不同的政治取向。根据田野调查，Wu 发现，三农学者和自由主义学者与不同的 NGO 联合，但在这之间存在着很长的政治光谱，在这光谱之间是占多数的、没有显示出任何政治理念取向的 NGO(34)。这是一个关注 NGO 工作者个体政治身份的研究，但是关注点主要是在政治取向上的认同，以理解中国的公民社会可能的政治意义，且没有从个人生命历程的角度进行研究。本研究虽然也关注工作者的身份认同，但研究重点超越政治取向，而是理解 NGO 青年受到哪些不同理念的影响而产生的不同面向的“自我”改变。

相比学术研究，NGO 领域对于 NGO 工作者的讨论更多，虽然仍属于边缘的讨论话题，综述如下：

第一，《博盟访谈录：社会组织的功能在组织社会》一文。在中国 NGO 工作的这 16 年间（1996 年到 2012 年），博盟认为中国的 NGO 的变化除了数量、规模、能力、政策空间的提升以外，更包括培养了一群 NGO 专业人士——这对行业发展很重要。他认为在中国发展 NGO 的土壤非常薄弱，中国的教育体制并没有培养出愿意改变现实的人⁵⁶，而常常是接受规则、接受在现有条件下生存；企业和政府更倾向培养能赚钱或者能够自上而下办事情的人；而与之相比，NGO 似乎更容易培养改变不理想的规则的人。但是实际情况在他看来也并非如此。他在工作中接触的很多 NGO 的创始人和员工都在或多或少地发牢骚，抱怨不理想的环境，觉得自己无力改变，只能接受。博盟认为 NGO 并没有鼓励工作人员从自身不公平、不合理的事情开始做出改变，所以他们在面对更大的社会层面的问题上也缺乏改变的能力。他强调指出，

如果要衡量 NGO 的贡献，不是看你做了多少项目，筹了多少钱，做了多少社会服务，最基本的东西是培养人，学会怎么样改变自己，改变自己的家庭，改变自己的工作环境，学会了这个，以后才能谈怎么改变这个社会。

⁵⁶ 博盟也提到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状况。

博盟强调的是，相对于对“外在”社会的改变，NGO工作者内在的、日常生活层面的改变也是社会组织的重要价值；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差强人意。

第二，南都基金会进行的NGO人才调研项目。南都基金会作为关注民间组织发展的国内非公募基金会，于2012年和2014年对中国NGO行业人才发展现状进行调查⁵⁷，发现NGO行业工作者的薪水低、社会保障少、家庭反对多、工作强度大、工作与生活平衡满意度低等成为困扰NGO行业工作者的主要因素。上述因素在本研究的访谈中也逐渐浮现出来。因为该研究的目的和方法所限，虽然展现出NGO行业工作者的某些工作和生活现状，但是无法了解他们的日常和工作中，自我转变的重要面向和过程，而这是本研究希望贡献的内容。

第三，三农领域的人才培养研究。

1990年代末，伴随着三农问题的激化，以及一些教育者对于现代教育制度的反思，一批大学中的三农社团涌现并开展大学生支农活动（白亚丽，2012）。白亚丽，作为参加三农人才培养计划的长期工作者和行动研究者，将2000年左右开始的三农人才培养计划概括为参与农村发展实践的青年主体教育型的教育实践，该计划培养了一批关注、实践乡村发展的青年人（同上）。该计划的教育模式是以参加者为主体的、以实践为导向，其特点包括：选择来自乡村并愿意回家建设、对社会问题感兴趣的年轻人，向他们提供系统性的培训课程，并安排短期、长期的下乡实践，在实践中学习，并且配合实践前后的理论学习、思辨和反思。这一模式非常强调理想主义、社会责任感、精神传承、集体主义、尝试构建和实践新文化——利他主义和理想主义。这一教育过程对参加者的影响，包括价值观上的转变、对乡村问题和社会现实的再认识以及择业观的变化——如部分参加者最终选择和社会发展、农业有关的工作。白亚丽的论文对这一乡村建设教育活动的历史脉络、过程进行了梳理，为本研究中的对乡建体系的青年的成长提供了背景资料。而本研究希望通过叙事研究的方法，深入乡建工作者的生命经验，以理解乡村建设运动对参与的青年的影响。

第四，社区伙伴（PCD）对于青年实习生培养的经验整理。

PCD是一家总部位于香港、并在中国大陆开展可持续发展的机构，其中包括

⁵⁷ 委托零点市场研究公司进行，采用的电话访谈的定量研究方法，共收集样本474，其中北京样本数96。报告参见：零点研究咨询集团（2014）《2014中国公益行业人才发展现状调查报告》
<http://www.naradafoundation.org/content/3655> 浏览日期：2015-3-10

青年培养的工作。PCD自2004年开始在中国大陆开展NGO工作者人才培养——主要是长期青年实习生培养。在PCD看来，其青年人工作针对并批判中国当代社会的“全球化、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为导向的主流发展”塑造了青年以物质为基础的单一的想象，希望揭示并克服“过分重视经济、物质、消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朝向竞争、疏离的态势”（社区伙伴，2012:5）。社区伙伴机构与那些不甘被这种想象所束缚的年轻人一起工作，为他们搭建一个“看到有主流生活以外的另类选择”（同上）。

社区伙伴推动的实习生计划的特点⁵⁸主要是：1）将年轻人放到基层社区或社区组织1-2年，创造路径和具体的场景让年轻人在行动中反思社会议题；2）提供培训，既包括发展观和对中国社会宏观问题的分析，也包括回应现实实践议题的操作内容，特别的是加入了个人成长环节——认识自我的部分，包括认识自己的历史、性格类型以及自我认识的方法等；3）把对人的关怀和情感作为人的培养的关键因素；4）创造文化反思的氛围和场域。

社区伙伴于2012年将其青年实习生培养经验集结出版了《让梦想扎根——一群青年人的成长与对话笔记》一书。该书进入个体的生命经历，展现了参与其青年工作的实习生和工作者的故事、思考和对话，主要是聚焦于他们在NGO中的实习、之后的工作和生活的经验与反思。但与该书不同的是，本研究将扩展个人生命经验的时空和厚度，检视NGO工作者的童年、大学生活乃至在NGO工作的日常生活，理解更长时期中的人的发展和过程，在这个基础上理解并改造社会脉络。

小结

综上所述，对于中国NGO的研究仍刚刚起步，而且多数在公民社会框架下、从NGO和政府的关系的视角进行研究。而且，已有的对NGO工作者的研究较少，尤其关于中国“80后”NGO工作者的研究更少。本研究希望借鉴上述的对NGO的批判研究视角——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与新道德主义的关系、NGO领域作为权力运作的场域等——对NGO与参与者的“自我”的影响关系进行检视，以进一步探求NGO行业在当代中国的文化改造中的（不）可能位置。在研究方法上，

⁵⁸ 主要根据该机构的一些公开出版物和非公开出版物整理而成。

借鉴已有文献使用生命故事作为研究方法的角度，希望与 NGO 就青年培养这一主题进行对话。

三、 理论视角:通过进入形意世界以改变“自我”

为了处理 NGO 工作者的“自我”是如何在特定社会脉络下转变的这一研究问题，本研究尝试借鉴 Dorothy Holland、William Lachicotte Jr.、Debra Skinner 和 Carole Cain (1998) 的、有关人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 of the person)的理论框架，“自我”⁵⁹和形意世界 (figured worlds)。

1. 以“自我”——关于“我是谁”的理解——为视角

在“西方”心理学、人类学甚至宽泛的人文学科中，“自我”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主要可以将其归为三种研究取向 (Holland 等, 1998: 20, 22, 26-27): 第一种是普世主义(universalism), 认为自我本质上是一种由生理、种群决定的复杂的结构和过程。第二种是文化主义(culturalism), 认为文化对自我的塑造具有重要作用。第三种是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vism), 认为前两种取向——无论认为文化还是生理因素对自我发挥主要决定作用的取向——皆落入本质主义范畴。建构主义认为，“自我”是通过具有权力的论述及其人造物作为中介的、社会性建构而成的⁶⁰。

Holland 等进一步对福柯式的建构主义理论中的“自我”进行批判性发展，认为“自我”并不完全是被社会性的论述所塑造，相反，其亦具有一定的能动性。她们借鉴前苏联社会历史学派的观点，提出“自我”是一个动态的、不断进行和成为(becoming)的过程，而且具有一定的、改变其所处的环境以及其自

⁵⁹ 在 Holland 等 (1998) 中，使用了自我、主体性、身份认同等不同概念进行论述，这些概念在其框架中有相似之处，均指不断形成的、对自己是谁的理解：一方面，被权力、环境所形塑和影响；另一方面，在一定条件下，也具备改造自身、他人和环境的可能性。Holland 等定义的“身份认同”，并不同于一般人类学和文化研究所指的文化身份认同——那些在社会结构中形成的身份，比如种族、性别、民族、性取向等。与之不同的，Holland 等定义的身份认同的内涵更宽，主要指，在历史性、社会性和文化性生产的世界中的、与实践和活动密切相关的那些身份认同 (Holland 等, 1998:7)。故此，除非特别说明，本文以下使用的“自我”取 Holland 等的界定。

⁶⁰然而，也有社会建构主义学者接受拉康的观念，比如 Hollway 认为，虽然论述权力的影响力较大，但是嵌于身体中的自我(embodied self)也有一定的自主性 (Holland 等, 1998: 28)。宁应斌、何春蕤 (2012) 也提到相似观点，称其为弱的社会建构论。

身的能动性（1998）。本研究中的“自我”，是取自 Holland 等的定义，指人告诉自身和他人“我是谁”，并且根据这一对自身的理解开展行为，这是一个持续变化的过程、以及通过行动成为(becoming)这样的自己的过程、也是个人世界与文化的及社会的世界的交互之所在（1998）。换言之，一方面“自我”受到所处的社会脉络的影响，另一方面，其对环境亦可能产生影响，同时带来一个改变了的“自我”。

“80 后”NGO 工作者的“自我”也是一个变动的过程，从青少年到大学时期到进入 NGO 领域，均经历着转变，这个变化过程受到其身处的社会中的“发展主义”文化和“小时代”文化的建构，也受其身处的 NGO 的文化和操作的影响；但是，NGO 工作者也并非完全被建构，其在具体的情景中也在与所处的社会性、文化性脉络进行互动，重新生产着“自我”：这将是本论文第四、五、六、七章探究的内容，即“80 后”NGO 工作者如何理解自己并且按照这一理解进行怎样的行动、发生了怎样的“自我”转变。

2. 参与构建并且在形意世界中转变“自我”

Holland 等认为，“自我”正是进入形意世界并且与之发生互动，才可能发生一系列转变。形意世界指社会性生产的、文化性构建的各种活动(activity)之总和(Holland 等, 1998: 40-41)。这一世界中的众元素包括，人、活动、论述、操演(performances)和人造物，正是在这些元素的共同生产(coproduction)的过程中，形意世界得以成形；同时，形意世界亦形塑这些元素的共同生产（同上，51）。形意世界充满着意义，人正是通过进入形意世界、通过活动和实践，通过使用、回应人造物等，逐渐理解所处之世界和正在形成中的“自我”的意义。因此，这里将 figured world 翻译成形意世界，指这个世界里既包括不同的人、文化人造物、论述、操演这些“形”——物质性意义上的存在，也包括这些物质性存在所再现的“意”，人正是在这个世界中开始理解、生产意义。

形意世界具有四个特点(Holland 等, 1998: 41)。1) 它是一个经由人们的参与得以发展的历史性现象。所谓历史性现象是指形意世界是经由参加者的参与而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2) 借鉴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形意世界充满着权力关

系。在形意世界中，人们的社会位置影响其是否能够或者多大程度上能够参与进去。有些形意世界，人因其社会位置，可能不得不永远无法进入，或者可能拒绝别人的进入，或者可能恰巧错过进入，亦可能完全进入并学习。然而，不同于布迪厄的是，这一分析视角特别重视日常的文化生产，比如活动世界中的那些普通人——而非仅仅是位高权重的人——及其行为，包括他们的正式、公开的行为和那些非正式的故事（同上，57-59）。除此之外，形意世界与其它的形意世界以及更大范围的社会性力量之间，存在着部分独立、部分偶然相关的关系（同上，60）。本研究中的对话人所处的 NGO 的形意世界便是如此。其所处的特定的 NGO——作为一个形意世界与其他 NGO 的形意世界，通过机构和人员的合作、参加相同的培训等活动并且建立关系和信息往来等过程中，形成部分独立、部分偶然的关联；特定的 NGO 的形意世界也与媒体、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的形意世界也存在着上述的部分独立、部分偶然的关联，比如特定的 NGO 的形意世界一方面受到这些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的规范、管理，但另一方面也会有大量的协商的空间的存在，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中国根据法规登记注册 NGO 的门槛较高，但是仍旧存在着大量未注册、但活跃的团体。除此之外，特定的 NGO 的形意世界也与中国的经济、文化等更宏大的形意世界、与全球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形意世界具有既部分独立又部分偶然的关联。3) 形意世界是通过社会性的组织和再生产而形成的：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通过与他人一起工作而再造而成的。换言之，这个世界不是一个个人的世界，是有社会性的。4) 形意世界是充满人类的和社会的特点，充满人的声音和语调。

Holland 等主要引入了四个关键概念以理论化形意世界。第一，**活动 (activity)**。为了理解人类的行为，Holland 等引入列昂节夫(Leontiev)的活动理论(Activity Theory)。列昂节夫在人/团体及其身处的环境两个维度之外，提出第三个维度——活动。所谓活动是指，在历史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建构的社会互动的脉络下，人们对其所处环境中接触到的事物之回应。活动是一种社会行动和互动，是做事情。所做之事是历史的、集体性定义的和社会性生产的活动；人是主动地介入环境，而非被动地与环境接触(Holland 等，1998: 39)。自 1990 年代始，面对中国日益出现的环境恶化和“三农问题”（农村、农业、农民），一些民间人士开始组建民间的志愿者团体，进行环境调研、公众教育、

组织大学生进行乡村调查等，这就是一种活动——由人在面对历史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社会脉络下，对所处环境所做的主动的回应：通过自下而上的、小规模的人员的汇集和组织、在小范围的乡镇和城市开展的活动，而不同于自上而下的“体制”改革，也不同于“暴力式”的“革命”等。

第二个概念是**文化人造物(cultural artifacts)**。社会历史学派的维果斯基，在恩格斯有关创造和使用工具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的观点的基础上，发展出符号化中介(semiotic mediation)的概念，认为人通过工具——符号、象征、语言等——作为文化性中介，与环境进行互动(Holland等, 1998:35-36; Cole, 1996:61)。Cole引用Marx W. Wartofsky的观点，将文化人造物分成三类：1) 基础性人造物(primary artifacts), 指那些直接在生产中使用的物品，按Wartofsky举例，比如，锤子、电脑等；2) 第二人造物(secondary artifacts), 指对基础性人造物和使用基础性人造物的行动模式的再现，比如如何使用电脑的说明书、使用锤子的照片或“电脑”/“锤子”这个语词等；3) 第三人造物(tertiary artifacts), 拥有其准则、习俗和结果等的相对独立的“世界”，比如艺术、游戏等，也指那些有其独特规则、习俗和结果的、日常活动中的活动环境，比如社会机构等(同上)。

文化人造物不仅具有物质性，也具有理念性(ideal, conceptual)的维度(Holland & Cole, 1995:476)。理念性指文化人造物具有历史性，是在过去由有目的的行动的人参与互动的过程中形塑而成的，因而带着人的目的。历史中形成的人造物也制约着当下谁能使用、如何使用这一文化人造物(Holland & Cole, 1995:476)。比如早期的电脑的设计，主要是由美国的科研人员和公司生产，这样的历史带来了其只能以英文作为输入和输出，并且需要用独特的计算机程序语言——只为少数计算机专家才能容易使用，普罗大众、尤其是非英语的普罗大众很难使用。这便是早期电脑作为文化人造物的理念性限制，供英文世界的较有文化资本的人群使用。

尽管文化人造物对人的行为和意识具有限制性，维果茨基认为并且重视人通过创造和使用文化人造物，对环境、他者以及使用者自身发生影响的能力，形成一定程度的不完全为环境所影响的自我掌控，并且形成一定的自我认同(Holland等, 1998: 62-64)。与福柯关于论述对人施加权力(power)影响而使主

体处于一种被塑造的主体地位不同的是，维果茨基继承了马克思关于人的成为 (becoming) 是可能的思想，认为人能够通过利用人造物以回应、改变环境，以此打开了人的自我改变的可能性（同上，64）。比如人类可以通过发明、使用一些语词去影响自己的意识、行为，乃至影响他人和更广大的社区。“女性主义”这套语词便是一例，透过使用这套语词，对于一些人来说意味着重新理解自己的生命经验和开展新的日常互动的可能性，而且自 20 世纪后半叶开始，世界也因之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然而，改变不是必然发生的（同上，35-38），而是需要一个长期的、可持续的、集体的努力，并非仅仅通过个体的力量所能完成。文化人造物作为中介是一个高度社会性的过程，它是社会性生产的、在实践中习得的、长期而言通过与他人合作共同使用，以及受集体生产的实践的影响（同上，38）。比如，“女性主义”这一套语词是社会性生产而成的，发生影响力需要集体性的努力。“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以及对世界的影响经历了漫长的斗争、协商的过程，以及不同地区、团体的人们的参与和投入。对于其中参与的个体来说，是否能在日常生活中改变性别不平等的论述和实践等，则是不确定的。

对 NGO 工作者而言，生活中的世界，充满了文化人造物，包括 1) 办公场所：办公室的地理位置、房产性质（购买、租赁等；商业中心的写字楼还是居民区的民居转为办公之用）、面积大小、内部装修、布置风格、空间设计、有无环保设备，媒体使用情况，办公文件（计划书、项目报告）；出差中的文化人造物比如乡村环境等等；2) 家庭：住房情况，房子内部的装修、装饰风格等；3) 与人有关的其他文化人造物：衣着、饮食、交通工具、电子产品使用、接触的媒体等。这些文化人造物不仅具有物质性，也具有理念性，比如一些 NGO 工作者的衣服偏休闲装甚至简单款式、棉质的衣服，其再现了 NGO 工作者对于自身工作的理解，比如可能是考虑到穿着与服务对象，特别是社会基层人们相似的普通款式的衣服，以尽量能够深入到社区；对于很多环境保护工作者，这类着装可能表征了他们对于环境保护、消费主义等的观念；也一些工作者可能是表达自己对环境的态度和“天然”的生活方式的选择。通过不断实践这一着装风格，工作者不断转变对自己的理解，认为自己是 NGO 工作者、环保主义者或者反对消费主义者，同时也通过这类着装风格向他人传递自己的价值观。但是这样的

着装也常常会令其家人、朋友觉得“难看”而遭到不断否定、质疑甚至排斥，这使得 NGO 工作者处于不断地协商的过程中。

第三，**即兴(improvisation)和试验性发展(heuristic development)**。即兴是指，人对外界环境的未计划的回应，是打开新的可能性的起点。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充满着即兴行为，比如，在课堂上、在工作单位中、在家庭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常常就是即兴的，而并非预先准备好对话稿。而正是在这样的即兴对话中，一些新的信息、想法便可能被接收，成为新的想法、对话、行动产生的来源可能。正如布迪厄的实践理论(practice theory)所提出的，即兴是日常行为的特点，是回应特定的环境和条件的行为，过去发生的即兴行为可能形成当下生活的惯习(habitus)，成为下一代的环境和条件以及惯习(Holland 等，1998: 17-18)。Holland 等修改、补充上述观点，认为这样的改变也可能发生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可能开启“自我”的改变(同上，18)。她们进一步认为，这样的即兴过程，也是试验性发展的过程。根据韦氏词典⁶¹，试验性发展(heuristic development)指，通过试验性的、试错的过程以发现、学习和解决问题。试验性发展包括两个过程：1)人、文化资源和实践中的情境(situations in practice)三者交汇带来的产物(product)——即兴；2)挪用(appropriation)即兴的产物，试验性地成为下一个活动的基础。这样的试验过程不断发生，促进人的能动性和改变的发生(同上，40)。但是，人并不可恣意地借由试验过程以发展“自我”，嵌入人之中的历史(history-in-person, 简称“H-I-P”)是过去经历的沉淀，它一方面是人在当下展开即兴的基础，同时也可能一定程度上限制即兴的开展(同上，18)。以本研究中的 NGO 工作者为例(在后面章节中将具体展开)，不少对话人正是在进入 NGO 这一形意世界之后，与接触到的新的论述、人、人造物等发生即兴的过程中，有些人的“自我”因此发生了改变，有些则没有。比如有些对话人进入环保团体的形意世界，看到很多同事和志愿者自带筷子外出就餐，在那个当下，与这一新出现的环境发生即兴，如果 H-I-P 对于环保有一些预备知识和意识，在这一当下，第一次接触使用环保筷子这一文化人造物的群体的活动和人，可能尝试理解这一人造物及其使用行为所具有的意义——通过减少使用一次性筷子以保护树木和环境，于是在当下可能即兴地决定也购置

⁶¹ 参见韦氏词典网络版 <http://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heuristic> 【2015 年 4 月 23 日登陆】

一双环保筷子，在外出就餐时使用。在这个不断实践的过程中，其“自我”发生着变化——渐渐认同并实践环保理念，后文中的子康便属于此例。然而，另外一位对话人美凤也遇到相似环境，但是因为她的 H-I-P 中比较少接触这类环保理念和行动，包括没有在环保团体做志愿者的经验等，因此当与这一场景相遇发生即兴时，并没有主动接受自带筷子就餐的实践，感到道德压力，产生了较强的排斥感，因此在那段时间，她的“自我”并没有明显地被所处的形意世界所改变。

综上所述，Holland 等提出的形意世界理论概念有助于分析、描述本研究中的 NGO 工作者的转变过程和原因。中国的 NGO 领域是一个形意世界，是为了回应社会问题的出现而采取的集体性的、社会性的和文化性的行动和互动。它是具有历史性的，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因应环境、社会以及国际政治关系等原因而重新出现的。NGO 领域中分布着各种人、论述、人造物和操演，正是在这些元素的互动中，NGO 领域才慢慢出现并且发展，而 NGO 领域的发展，也让这些元素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交织在一起。这一形意世界内部充满着权力关系——布迪厄意义上的权力，比如作为资金提供者的基金会比作为资金申请者的草根机构更有权力，前者也更有论述能力，因而获得论述上的更高的位置和影响力；国际机构比本地机构似乎亦更处于有权力的一方——前者的筹款能力较强、工作人员的收入较高等；有官方背景的机构在合法性和政府关系资源方面也居于更有权力的位置。NGO 形意世界也位于充满着权力关系的中国“社会”之中：虽然“改革开放”后政府开始从社会管理中逐渐退出，但是 NGO 对于政府和民众来说还属于新鲜事物，政府为了维持社会控制和稳定，希望将 NGO 纳入到稳定社会的管理之中，因而对于 NGO 的管理与限制较多。相对于企业及其员工而言，NGO 及其工作人员也处于弱势地位，比如较为流行的论述是，企业在合法性、经济实力、所谓的“内部管理效率”等等强于 NGO，企业员工的收入也高于 NGO 工作者，使得前者获得一种更高的位置。从国际关系上来看，中国的 NGO 的发展也受到国际基金会和国际 NGO 的资金、关注议题的影响 (Spires, 2007)。回到 NGO 内部，亦存在着权力关系，比如员工与管理层之间的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工作者的出身社会阶层对于其是否能进入这一形意世界以及在这个世界中所居位置均有影响。NGO 的形意世界具有两个维度：1) **观念维度** (conceptual)：为行动、

文化生产、操演等提供意义的脉络 (Holland 等, 1998: 60)。NGO 形意世界中的论述、人造物等提供了从事 NGO 工作的意义, 影响 NGO 工作者对世界和价值的理解。2) **物质维度**(material): 形意世界充满了人们的活动、实践、操演、熟悉的叙事论述方式和内容等等为“自我”的形成提供条件 (同上)。NGO 形意世界中的办公室地理位置、内部装饰、工作者喜欢穿着的衣服款式和布料, 上下班的交通工具, 以及项目工作等等都是物质维度上的形意世界, 影响着 NGO 青年的“自我”的形成。

本论文下面的章节将引用形意世界之理论概念以探讨中国“80 后”NGO 工作者的“自我”转变。

唯有从自身经验开始，我们才能理解他人。

(Michael Jackson, 1989: 17)

原居民身份并没有赋予我们对本土事物（研究对象）以无所不知的能力，也没有确保我们能够手握打开别人不能打开的终极真相之钥匙。

(张少强、古学斌, 2006: 128-129)

第三章 研究方法

一、 研究概述

第一、二章从我的个人经验出发，提出研究主题，并进行了相关文献的回顾，已有的青年研究和 NGO 研究呈现以下特点和研究空间：NGO 在中国发展已三十年有余，但是 NGO 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已有的研究多数聚焦于政府——社会/民间关系，有关 NGO 在社会中的文化和教育功能研究不足；有关 NGO 的价值观和操作等对其工作者的影响的细致研究也较为缺乏，特别是，对于“80后”NGO 工作者的“自我”转变的相关研究较为不足。在方法上，也少有相关的叙事研究。而“80后”NGO 工作者的叙事研究有助于对中国“80后”青年的理解。

因此，借鉴 NGO 与新自由主义、NGO 与新道德主义的关系的批判以及形意世界 (Holland 等, 1998) 等视角，本研究企图理解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社会脉络的转变以及 NGO 领域的出现及运作与“80后”NGO 工作者的“自我”改变、协商的关系，并批判性地检视 NGO 在其中的角色。具体的研究问题是：“80后”NGO 工作者如何与发展主义和“小时代”的青年文化以及 NGO 内部文化与操作进行协商？形成了怎样的“自我”？

由于本研究焦点在于 NGO 工作者的“自我”转变，故而较为合适采用以探讨个人成长轨迹与社会转变之关系的叙事研究方法，又由于我自身所处学院的限制——学期中要兼顾教学助理之工作而无法离开香港到中国大陆（以下简称大陆）进行研究，难以进行为期较长的田野观察：因此最终本研究采用了以叙

事研究为主、参与式观察为辅的定性研究方法，进行少量、但力求深入的研究。

“80 后” NGO 工作者分布在不同的地域和工作领域。在研究范围选择上，选择了其中我较为熟悉、曾经并且仍旧参与其中的“大地”⁶²青年协作者网络（以下简称“大地网络”）为研究田野。“大地网络”的发起机构莲花⁶³是一家总部在香港的机构，是最早在中国大陆推动青年人教育的机构之一，该网络也是大陆少数以青年工作协作者为成员的网络之一⁶⁴。“大地网络”是一个松散的、以协作者为主要参加者的网络，主要依靠莲花组织培训的机会，互相熟识，成为该网络的成员，莲花通过参与推动该网络以支持其青年人工作的发展；除了培训以外，成员也通过自发的邮件组等方式进行交流，而其中部分核心成员和莲花有项目上的合作关系，网络成员也自发组织活动和项目，向莲花申请资金支持。选择“大地网络”有以下原因：第一，本研究以叙事研究作为主要方法，分析“80 后”青年的生命经历及其与所在脉络之协商，这一研究方法的性质要求研究者能够深入研究对象丰富的、深刻的生命经历，这需要研究对象对研究者有较高的信任、开放的分享。在学制所限、没有长期的时间以建立深入互信的网络的条件下，选择曾经长期参与的 NGO 网络成为田野，使得获取深入的生命故事成为可能。第二，该网络成员来自多样的工作领域，包括乡村建设、环境保护、性别平等、乡村教育、“公民社会”推动等，这些领域也一定程度地覆盖了当前部分主要的 NGO 工作领域，使得透过理解这一网络成员的生命经历，可以部分地理解“80 后” NGO 工作者的“自我”协商。第三，该网络的青年协作者多数都参加过莲花机构的相关培训，对社会发展的反思性和对自我觉察的接触要多于、深于宽泛意义上的 NGO 工作者。这使得本研究希望透过叙事研究方法以深入理解这些对话人对于个人成长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成为可能。第四，该网络的成员的工作中均包括青年人教育的部分。作为教育者，思考、学习非常重要，通过打开他们对于自身“自我”转变的理解，希望有助于他们扩展对教育的理解，进而影响其青年工作的开展。另外，因为他们比较关注人的成长，因此他们也有一定的进行自我经验梳理的意愿，使得这个研究可以成为双方都能获益的过程。然而，也因为该网络并不涵盖多样的 NGO，因此我并不认为研究结论

⁶²根据学术研究伦理，该协作者网络、10 位对话人及其曾经工作、志愿服务的团体均采用匿名处理。

⁶³ 匿名处理。

⁶⁴ 根据我的观察，也可能是唯一一家。

可以类推至宽泛意义上的 NGO 工作者的特点。但是，透过对少量的 NGO 工作者的生命叙述的分析，的确将有助于读者开启对之进行深度理解的旅途。正因为觉知本研究选择少量访谈对话人，在后文的分析中，将放置网络成员的叙事于其所处的具体脉络中。同时，将通过文献梳理搜集其他“80 后” NGO 工作者的生命经验，与本研究中的对话人的故事进行比照。

“大地网络”的成员分散在中国各地，主要以北京、广州等地为主。因为需要在 3 年之内完成研究的时间限制，原本计划在北京和广州两地开展研究的思路，改动为锁定在该网络在北京的成员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最后共有 10 位北京“青年协作者”呈现于本论文。北京是草根 NGO 数目最多的省市之一⁶⁵，因此选择北京作为主要研究地域有一定的分析价值。

因我曾经并且现在也属于这一网络，又和其中部分对话人有多年的共事关系并因此结下个人友谊，这为本研究进入田野带来一定的方便性，确实获得不少对话人更内在的生命叙事，展现出 NGO 工作者“自我”转变的复杂性。而在多年工作后进入了学院，对他们进行研究，又类似“次原居民人类学者”（张少强、古学斌，2006）的身份。本章将对我这一所谓的“次原居民人类学者”的位置进行反身。

下面将主要讨论本论文所采用的叙事研究方法及相关的已有研究，之后将介绍田野情况、研究过程，最后讨论“次原居民人类学者”的反身问题。

二、 叙事研究及其在 NGO 研究和青年研究中的应用

叙事研究的适用性、有效性及分析方法

本研究希望通过理解“80 后” NGO 工作者的生命故事，以理解其身处之 1980 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脉络的转变，而叙事研究应是合适的方法。自 1980 年代开始出现的叙述研究转向，被认为挑战了社会科学领域的实证主义范式（Lieblich, Tuval-Mashiach 和 Zilber, 1998[2008]:2）。叙事研究指，使用或

⁶⁵ 参考《中国民间公益组织基础数据库数据分析报告》（2014）。中国发展简报的《“中国公益组织名录”特别报告》（2013）也指出了这一点。

<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upload/userfiles/files/NGO%20Directory-3-26.pdf> 浏览时间：2016-5-1

分析叙事材料的研究——这些叙事材料包括来自访谈、日记、自传、文学作品、人类学学者的笔记、个人信件等等不同的形式——通过叙述的分析，可以比较不同团体、了解社会现象或历史时期，或探索一个人的个性特质等（同上，3-4）。

在社会学和人类学等领域里，叙事研究常常用来呈现因性别、种族、宗教等原因处于边缘、弱势地位的特定群体的特性和生活风格，以呈现那些常常不被聆听的声音（同上，6）。叙事研究也被认为是探究真实生活的问题，有助于接近与这些问题具有密切关系的人，探索其主体性和内在经验（同上，7）。如前文所述，以叙述研究理解青年文化的研究比较少，而对于理解中国青年文化，倾听来自青年的经验非常重要；同样的，针对 NGO 工作者的“自我”变化的研究也较鲜见，而这对于理解 NGO 的价值观和操作非常重要。不仅如此，叙事研究也有助于本研究深入理解研究对象的内在生命经验。因此，这一方法应适合处理本研究问题。

然而，进一步的问题是，叙事研究是否能有效地理解“80 后”NGO 工作者的“自我”及其变化，并且在这个基础上理解其与社会脉络的关系？叙事是人们理解其身处的社会的重要途径（Paul Ricoeur, 1991；转引自 Lawler, 2008: 33），因为叙事搭建了个体与社会、自我与他者、以及过去与现在的桥梁（Lawler, 2008:37-40）。个人的叙事必然借用了其所处之脉络提供的文化资源，比如其他人的叙事、记忆、所处脉络之习俗规范等，因此叙事并非仅仅是个体的叙事（同上，37-38；Lieblich, Tuval-Mashiach 和 Zilber, 1998[2008]:11），故而透过阅读 10 位对话人的故事以理解其“自我”的变化及其所身处的社会脉络是可能的。

然而，认为通过个人叙事可以理解脉络，不等于认为叙事可以完全再现（represent）叙事者的生命的全部面向。Amia Lieblich, Rivka Tuval-Mashiach 和 Tamar Zilber（1998[2008]:11）认为，由访谈或其他渠道收集的生命故事，仅仅是讲述者生命故事的一个面向、一种假设性建构，研究不可能完全接触到其生命故事的全部，因为：1）身份认同是不断变化的，而研究采集的生命故事是在某个特定时间被记录、誊写并被阅读的文本，是静态的存在，因此也无法全部表征不断变化着的身份认同。2）叙述发生时的脉络、访谈目的、听众性质、

叙述者与倾听者之间的关系、叙述者的情绪等都会影响叙述的内容；因此这一叙述只能反应在这些脉络下的生命故事的一个面向。叙事研究不接受研究是要去发现所谓的客观的“真实”，而是认为世界都是通过符号进行中介的，因此并不存在没有中介的“真实”世界；相反，为什么一些叙事会被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叙述出来、为什么一些“不真实”的叙事会在一定时期被阅读者所接受，则可能成为研究的重要问题（Lawler, 2008:40-44）。另外，因为叙事研究的这种特性，研究者的反身和开放性对于分析的有效性来说非常重要（同上，47），需要对自己的阅读与诠释的行动保持不断的反身和自我觉察（Lieblich, Tuval-Mashiach 和 Zilber, 1998[2008]:11）；也包括对研究者自身使用的语言之敏感及批判⁶⁶。因此，本研究并不尝试声称这 10 个生命故事完全代表他们的全部生命经历，而只能是在一定时空脉络下的生命经历的部分面向。而本研究开展的具体时空脉络、研究方法及其反身，会在下面的研究过程中详述。

本研究所采用的叙事研究方法具体包括传记研究、访谈和文件分析方法。叙事研究的分析方法可以分为三种：1) 同感模式：研究者尝试进入叙事者的处境去理解之。2) 互动模式：研究者批判性地阅读叙事者的故事。3) 交换模式 (transactional mode)：透过不断的跳入、跳出叙事，而诠释出叙事者以及叙事文本表面中没有包含的意义（Crotty 1998，转引自 Lawler 2008: 44-45）。Lawler (2008:45-46) 强调叙事本身是叙述者和研究者共同生产的过程，研究环境中的诸多因素在影响着叙事，比如研究者提出的问题、研究者在访谈中的干预、研究框架、执行访谈的环境等等。透过叙事分析，研究者需要在脉络中进行阅读，并且尝试挖掘叙事者可能没有意识到的、叙事中的隐含意义和前提假设。本研究对于叙事的分析正是尝试结合这三种方法。

已有的有关社会工作者的叙事研究

过去有关社会运动的历史研究，常用口述史——也是一种叙事研究——来汇集材料，但是近 20 多年来的社会运动社会学却几乎没有用传记作为主要研究方法（吴永毅，2010:42）。社会运动成员的叙事面向被长久忽略，1990 年代末，

⁶⁶ 感谢 2015 年 12 月，导师许宝强阅读本文的过程中，对这一点提出的补充。

叙事研究的转向影响了社会运动研究，少数学者开始以叙事研究角度理解社会运动，认为成员诉说的故事是构成社会运动集体认同非常关键的成分（同上）。台湾亦开始出现一些研究社会运动者的叙事研究，比如吴永毅的《左工二流志：组织生活的出柜书写》（2014）、李易昆的《逆风行者——朝向“解放-社会变革”的成人学习之路》（2014）等。

而在中国的NGO领域、社会运动领域采用叙事研究方法的研究仍为数较少，主要有：王名编写的两辑《NGO口述史研究》（2012, 2014）记录了中国NGO的第一批创始人和领导人的访谈；高小贤、谢丽华主编的《中国妇女NGO成长进行时》（2009）记录了中国妇女NGO的第一代创始人和领导人的回顾；寇延丁的《一切从改变自己开始》、《行动改变生存》对NGO和社会运动者的故事的撰写、以及北京拉拉社群所编写的《另一种书写——有关北京拉拉社区发展的一项口述历史研究》。除了《另一种书写——有关北京拉拉社区发展的一项口述历史研究》以外，上述研究都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也就是不以理论研究的问题意识作为书写导向，不过也收集了宝贵的行动者和参与者的故事。本研究希望在这些已有的叙事研究的基础上，透过对“80后”NGO工作者的生命历史的研究，说明叙事研究作为一种方法，有助于对NGO及工作者以及其所处时代脉络的理解。

三、 研究过程及田野介绍

2012年9月进入博士生学习之后，我便开始频繁参与“大地网络”的活动，包括参加网络内的培训、和网络成员的一些见面交流、支持网络成员的研究及培训设计等，自2013年6月开展部分初始访谈。当时，一方面因为我的思考习惯和交往圈子仍受曾经在NGO工作的影响，因此习惯于继续参加NGO领域的活动，比较频繁地往返香港和广州（平均1.5个月往返一次）；另一方面，当时认为这有助于更了解研究对象，为研究框架的提出以及未来的田野研究做准备。之所以有这样的行动选择，今日回看有以下原因：我虽然在2005-2010年间于NGO全职工作五年，但是2010年秋天到2012年初，因出国读书而离开了NGO的全职工作，身体上、交际网络上渐渐远离这一领域，而这一时期也是NGO在汶

川大地震之后、迅速发展的时期，包括政府对于 NGO 的政策转变、国内企业家对于 NGO 的资助力度变大，因而 NGO 的生态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因此我希望能够继续参与 NGO 的活动，以增进对这一领域最新发展和趋势的了解、并建立人际网络，从而确定研究选题和计划，并为未来的深入的资料收集工作做准备。但是事后反思，这一阶段的问题意识还未清楚、研究方法还未确定，因此该阶段搜集的材料（包括叙事材料）基本无法直接用于本研究分析，其中在广州建立的网络和进行的试验性访谈，最终没有纳入本研究范围。但其积极影响是，这一阶段的工作使我对“大地网络”的工作有了较多的了解、与网络成员建立了更多的连接及了解，我亲身体验其培训理念与手法，使我与成员有了相似的经验，这些都为后期、正式开展研究奠定了无形的基础。换言之，正因为这一时期的铺垫，我更多地掌握了对话人所处的脉络，和部分对话人的生命历史，更不必说，这一过程所建立的信任感。然而，需要反思的是，做博士研究的第一、二年，我的身体习惯仍受之前的工作所影响、未深入进入学术研究的形意世界，彼时对于每天大量时间安静地坐在书桌前读书、思考并不习惯，也没有进入到深入读书和思考的体验之中，身体依然习惯亲身参与 NGO 的活动，情感上亦是，并且认为这是了解 NGO 最新状况的重要途径，而忽视并错失了通过阅读相关研究、新闻报道、参与学术讨论以及在这个基础上的深入分析和思考等也是加深理解的重要途径。

2013 年 9 月到 2014 年 6 月，一方面与第一年相似，我仍继续往返广州参加一些和“大地网络”或者 NGO 领域有关的活动，但是频率有所降低，平均 2-2.5 月往返一次。这阶段还帮助“大地网络”的成员机构之一完成了一份青年工作研究报告，获得了与网络成员在共同工作中了解该网络的机会，这些新的认识有助于我对于对话人所处的脉络的理解。除了这些参与而积累了对该网络和网络成员的了解外，这一年也开始物识潜在对话人，对他们进行甄别，邀请他们开始写作自传。最终十位对话人几乎覆盖了“大地网络”在北京的成员。对话人的甄别标准包括：1) 他是否是该网络成员。2) 是否有在青年人工作领域超过 3 年的工作经验。制定这一标准是因为考虑到在一个领域工作时间超过 3 年，对工作的体认会相比那些只工作 1 至 2 年的人要多且深，而本研究希望较为深入、细致地理解 NGO 团体对于工作者的影响，所以选择超过 3 年相关工作

经验的对话人。而实际上进入研究的对话人的工作时间多数超过 5 年。3) 是否出生于 1978 年至 1989 年之间: 根据上一章文献综述中对于“80 后”的界定的讨论, 选择了这一年份区间。而实际上进入研究的对话人呈现出出生于 1980 年的早期和中期。4) 对话人的选择在性别上兼顾平衡。对话人招募有三个渠道: 1) 透过我认识的关系邀请对话人 (7 人); 2) 透过该网络的发起机构——莲花机构推荐合适人选 (2 人); 3) 由已参加的对话人推荐加入研究计划 (1 人)。

在招募、邀请对话人的过程中, 我向她们讲明研究的目的是: 1) 研究从事青年人工作的“80 后”青年的成长及其关键因素; 2) 展现“80 后”NGO 工作者的生活方式、态度, 研究成果本身也是集体发声; 3) 研究过程本身希望能够协助参与者对自身成长多几分觉察和认识, 并且透过小组讨论彼此映照、支持⁶⁷。换言之, 对话人自始至终知道这个研究的目的, 是为了理解他们为什么形成这样的“我”以及如何形成的。

在这 6 女 4 男共 10 位对话人中, 性别上基本反映了 NGO 工作者的性别比例。学历多数是本科以上学历, 其中多数 (6 人) 是重点本科毕业, 也有一名中专⁶⁸毕业背景。出生地点多数来自乡镇, 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长大的从业者较少。他们先后分别在 9 家草根组织就职。Spires、Tao & Chan(2014) 于 2009 年初至 2011 年初在北京通过机构推荐、网络搜集、滚雪球等方法, 共收集 92 家草根组织⁶⁹; 即本研究涉及的草根组织约占 10%。关于最先受到哪类机构影响方面, 3 位来自乡村建设领域, 3 名来自乡村支教领域, 4 位来自环保领域。其中 7 名对话人选择以 NGO 作为第一份工作, 3 位是从其它行业转行到 NGO。北京的草根 NGO, 在工作领域上, 拥有组织最多的领域依次为公益行业支持、儿童青少年、教育助学、环境保护、综合志愿服务, 而最少的是同性恋、女性权利领域⁷⁰。而本研究中有些对话人所在的工作领域是较多组织工作的领域, 比如 3 位对话人曾经或正在环保组织工作, 1 位对话人在教育助学领域工作, 2 位对话人曾在公益行业支持工作; 而 3 位对话人所在的乡村发展领域, 在北京属于中等偏少的行业领域, 2 位对话人后来转向的同性恋权益运动和女性主义社区工作则属于较少

⁶⁷但是针对第三点设计的小组讨论, 在时间框架的限制下, 最后没有实施。

⁶⁸中等专业学校的缩写, 通常是在九年制义务教育结束后进行, 在级别上相当于高中, 但普通高中侧重基础知识的传授, 毕业后一般参加普通高考, 是为升入大学做准备。而中专更重视专业技能的培训, 毕业后一般都已经掌握了相应的职业技能, 步入社会可以胜任某种职业。

⁶⁹两条标准, 第一, 成立 2 年以上; 第二, 由民间创办。

⁷⁰参见《中国民间公益组织基础数据库数据分析报告》(2014)。

的领域。总的来说，他们所涉及的工作领域呈现了北京的 NGO 中的不同领域，但是并没有涵盖所有领域。

草根 NGO 总体规模偏小，缺乏合法身份、资金和人力资源。大多数 NGO 依赖外国组织提供资金，此外，国内基金会、国内企业、国际在华企业、政府以及官方 NGO 也向北京的 NGO 提供资金（中国发展简报，2013）。不同于在官方 NGO、国际机构以及本地基金会的工作者，这些在草根 NGO 工作的对话人，收入较低、工作较为不稳定性、社会认可较低。他们在北京——较多草根 NGO 集中的省市——工作，与其他 NGO 工作者在地域上有较多相同之处；但是不同于在中西部以及东部沿海的中小城市，在北京的生活的生活成本较高，这也给他们的物质生活带来一定压力。

对话人的工作都曾经或者仍旧涉及青年教育，因此他们在工作中有机会接触和教育理念和教学法有关的内容，比如参与式的、民主的教育过程，对于人的改变和文化的改变的一定的重视，对于在生活中践行理念的重视；对于自我认识、自我觉察的探索较多。然而，上述特点在不同的对话人的经验中的沉淀和表现并不相同。

10 名对话人中有 4 位，在访谈计划开始之前，已经因曾经共事而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另外 2 位，也认识较久；有 4 位对话人则只有一面之缘或者不曾认识。但是无论是哪种情况，正是透过访谈，我才对他们有了比较深入、立体的理解。与之前已有工作或者私人友谊关系的对话人进行访谈时，的确较为容易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和内在生命故事，以至一些比较隐私的话题，这是我和她们分享相似的经验与身份认同带来的便利——使得我虽然在田野集中停留时间较短，但依然可以较快速地找到访谈渠道和进入较深入的访谈过程。和其中 4 位对话人虽然以前并不熟悉，但是透过访谈依然比较容易地打开了对话的广度和深度，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比较愿意真诚地和我分享——或许这也和 NGO 领域较为单纯的工作环境有关，也可能是我拥有一些和他们相似的工作经验，所以比较容易对话，甚至有对话人在谈到一些个人故事时会落泪。几乎所有的对话人都是经过联系之后，便答应接受访谈；只有 1 位对话人起初答应，访谈过一次之后，因第二次访谈时间距第一次访谈相隔很久，且正值他工作较忙，因而希望退出，但最后在我的积极跟进和对话人的慷慨支持下，还是完成了跟进访谈。

然而，虽然在访谈过程中有因我的身份而带来的上述便利，但同时也因之带来了另外的问题和挑战，即如何在较为熟悉这一群体的情况下，保持批判分析的距离。这一点将在本章后文中展开讨论。

10 位对话人中有 7 位在访谈之前提供了自传书写⁷¹以及其它曾经写过的文字，包括资金申请文件，博客文章、发表过的论文或者报刊文章等等。另外 3 位对话人中，有 1 位提供了非自传的其他文字材料。这些都成为了文件分析的素材。不过研究过程发现，对话人或者因为工作较为忙碌，或者因为不擅长或没有习惯通过文字进行表达，最终这部分文字的素材不算丰富。当然，也有一半的对话人与我分享了其较为丰富的自传材料。

集中性的田野研究分别执行于：2014 年 1 月 4-22 日，2014 年 7-8 月，2015 年 2 月 28 日-3 月 21 日以及 2015 年 5 月 7-9 日，合计约 3 个月有余。在北京田野期间，主要工作是与对话人进行访谈，所有访谈均在对话人觉得方便的地点展开，包括对话人的家中、办公室以及公共空间（比如咖啡馆等）。所有的访谈过程均进行了录音——除了部分涉及较为敏感的话题——并整理成访谈记录以进行进一步分析。由于访谈主题较为复杂，涉及成长经历中从小到大的重要事件及其影响因素，访谈往往分 2-4 次进行，每次在 3-5 小时不等。平均每位对话人的访谈时间约为 10-20 小时。之所以访谈时间较长，可能因为我不太愿意过于强势地把话题仅仅围绕在我设计的半结构式访谈大纲之上，而是更开放地让对话人在一定的范围内比较自由、随意地挑选他们想要谈的话题。比如一位对话人美凤——后面会听到她的故事——于每次访谈开始，都会主动告诉我她最近在做青年培训中的思考和困惑。这让我意识到青年培训的工作对于她生命的意义和她投入在这个工作上的热忱。

除了进行访谈之外，我也根据机缘，参与式观察了部分对话人的日常工作，比如参加他们的例会，观察对话人与同事的关系，观察其办公室的风格；也参与式观察他们的青年培训活动等。除此之外，我也参加了一些非对话人所在机构组织的青年培训，以了解这一领域的基本状况。另外，在北京期间，我也和对话人共同工作、一起组织了一次一天的面向 NGO 工作者的培训。2014 年 1 月和 2015 年 3 月的访谈期间，我分别住在一位对话人所在机构和另一位对话人家中，

⁷¹ 自传书写指引和半结构性访谈大纲可参考论文附录。

这计划外的安排也提供了近距离地理解她们的工作和生活的机会。在这些过程中的参与式观察都成为了本研究的一部分。但是因为对话人来自 8 个机构，而田野时间较短，因此本研究的主要发现仍主要依靠访谈资料和对话人的自传、日志等材料。

除了实地的田野调查，我也通过 email、微信等网络通讯工具与对话人保持日常互动，了解大家的日常生活状态。此外，在田野期间以及在香港读书期间，我都保持了写日志的习惯，这些田野笔记和自我反思日志也成为研究分析的素材之一。

除此之外，我还与 NGO 圈外工作的朋友、同学进行了交流，包括通过微信朋友圈⁷²浏览、微信交流以及面对面的非正式聊天，了解他们对于自己的日常生活的内容和意义的看法，与他们就本研究的主题和发现交换意见，帮助我以有距离的不同位置和视角去理解 NGO 青年的生活。

下面谈谈对访谈和自传等素材进行叙事分析的方法。我的分析步骤是：将自己浸入于访谈逐字稿中，尝试开放地、仔细地、带有同理心地进入叙述者的故事和世界。在反复阅读多次叙事后，尝试理解其整体印象，写下主要主题。这些主题，一方面来自于文本浮现，另一方面，也受研究问题的引导——理解其“自我”的协商——同时也受既有理论框架的影响——比如形意世界等。但另一方面，我不断觉察研究问题和理论框架的影响，保持开放地阅读文本的心态，在上述两种力量带来的张力中，逐渐批判地理解文本。那些被反复叙述的、并且有很多细节支撑的部分，会成为可能的主题，同时也注意那些不被言说的、或者一笔带过的部分，视其与叙述者整体故事的脉络的关系，可能也会被认定为主题。除此之外，也留意叙述的形式和对话人的情绪（Lieblich, Tuval-Mashiach 和 Zilber, 1998[2008]）。将个人故事与脉络结合，进行批判性理解也是本研究所使用的方法。关注叙事中有谁的声音？谁的论述？是否有一定的社会规范和习俗在其背后？叙事中是否有和历史、记忆有关系的内容？叙事的讲述方式与叙述者身处之脉络是否有关系？在文本阅读和分析的过程中，一方面，同理地理解叙述者想要表达的内容，另一方面，批判性地挑战其假设、观点等等，希望在这个基础上深入地理解那些隐含的假设、观点以及社会脉络在个人

⁷² 一种类似 Facebook 的、在中国大陆较为流行使用的互联网社交媒体。

故事之上的沉淀。

在论文写作的最后阶段，我将论文初稿拿回给对话人阅读、补充、修正，并批判性地听取其意见并修改。他们也阅读了我的自我反身和反思，这个过程又加深了彼此的认识，同时避免了我片面地、去脉络化地解读和分析。然而，每一个普通的生命是非常复杂、充满矛盾和隐晦的，难以用一个整合的叙事布局来掌握（吴永毅，2010:365），本论文也只是故事的众多阅读版本其中的一种，有待于 NGO 内外的不同故事版本以绘制出更加复杂、丰富的 NGO 的价值观和操作的画面。

四、 次原居民人类学和反身性(reflexivity)

如上文所述，本研究的研究主题正是我曾经全职从事五年并且之后断断续续卷入其中的青年工作领域，“大地网络”也是我曾经并且现在依然在参与的网络。因此我在本研究中采用的方法，可算是一种次原居民人类学的方法（张少强、古学斌，2006）。次原居民人类学是张少强和古学斌在对原居民人类学的批判性讨论的基础上提出的。最早提出原居民人类学（indigenous anthropology 或者 native anthropology）的非裔美国人类学家 Delmos Jones 提出，原居民人类学家更容易进入社群，所作的诠释更可信，与被压迫者更有团结感，有更真实的“圈内人”的视角、对当地文化的了解更多（Jones, 1970; 转引自 Urrieta, 2003:114）。张少强、古学斌则认为，原居民人类学具有本质化研究者主体位置的倾向，似乎只有原居民才可能完全认识当地社会文化。而实际上，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总不会完全相同或者完全不同，而这“需要研究者有所警觉和反省，从而加深自己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和理解”（2006: 119）。所以，原居民人类学者与其他人类学者一样，不可能和研究对象一致，这一点需要被正视；原居民的身份不是单一和完整的；原居民的身份除了带来某些研究的便利，也会产生种种不确定性；其人类学研究只是部分的借助原居民身份而建立，只能是次原居民人类学（同上，129-130）。

研究者的反身性对于人文社会科学而言非常重要，对次原居民人类学研究更是如此。反身性指，回向研究者自身、一个自我参照的过程（Davies, 1999:4）。反身性之重要在于，认可研究者和研究过程均对研究结果发生某种影响，包括

研究者的个人的历史(personal history)、其所处的学科环境以及更宽泛意义上的社会文化环境；而对此的认可，在本研究中并非为了尝试保持研究的客观性，而是认可研究者在参与构建研究生产中具有积极角色（Davies, 1999:4-5; 8）。不仅如此，后现代主义认为研究本身即是对现实的一种建构，因而反身性的重要性在于对这种建构的自我审视，而并非将其隐藏或者不认可其存在；全然地认可、使用研究者的主观经验和研究者所处的社会文化脉络，正是研究的内在组成部分⁷³（同上，5-6）。研究者本身就是一个研究工具，透过自己的体验和思考，去逼近对某一个文化社群的理解。Cohen 提出：

人类学者的装备中准绳的、最强而有力的调查和诠释武器：他或她自己的意识与经历（Cohen, 1994:4, 转引自张少强、古学斌，2006:118）。

除此之外，研究的过程和结果正是研究者及其所处的社区乃至社会的一种再现（Davies, 1999:8-9），因而透过对研究的反身，也有助于认识研究者自身及其所处的社区和文化。

透过本研究的研究过程，我也体认到，透过对研究者自身经验的检视，才可能超越作为圈内人的习以为常的惯习，对作为自身经验一部分的研究对象的文化进行批判反思和认识。而本研究尝试不断反身我曾经在 NGO 组织工作的经验，以及离开之后进入学术机构的学习经验，去理解“80 后”NGO 工作者的自我转变，批判性认识 NGO 领域的价值观和操作等对居于其中的工作者的自我成长的影响。但是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特别是对于我——身处 NGO 领域五年有余、且深受其影响——大概经历了读博的第二年时才慢慢地打开有距离的批判视野。在转变之前，我的研究意识和思路是尝试整理 NGO 如何对社会文化和 NGO 青年的“自我”产生积极正面之影响，对“发展主义”等文化带来可能的转变。但是随着进一步的反思——面对自身身体和思想中的复杂性和习以为常的惯性——以及在学院中学习何为研究、阅读对 NGO、“公民社会”的批判性文献，尤其是和导师不断对谈，以及真诚地面对田野访谈材料中的故事，我才不断地拉开距离，以批判性地审视 NGO 操作中的盲点及其产生的效果——包括意料之外的结果。而这一过程在最后一年的论文书写的过程中发生得最为频繁和剧烈。对

⁷³然而，反身性也存在着可能导致研究者沉浸于向内的探索(self-absorption)的倾向（Davies, 1999: 5）。

我而言，冲出自我中心与执着的设限带给自己的是更加自由和“真实”，也更能看到、听到对话人的故事和对话对象的论述。因此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我对在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的三年学习经验，包括与导师会面、日常生活和思考做了田野日志；对过去的成长经历进行了反身和自传书写。这些皆部分地影响了研究的过程和再现。

透过不断的反身，我慢慢地加深了对对话人的认识和理解：对于那些已经认识多年的对话人，我发现透过多次的访谈和分析，才更加立体地认识他们，深入了解其生命经历，产生较深的生命联结；而对于那些原本没有机会深入交流、甚至第一次见面的对话人来说，我幸运地发现在如此短的时间中，却接触到了那么丰富的生命故事。因此在田野中我感叹自己，“原来对自己的同龄人是这么的无知”！不仅如此，透过聆听她们的故事，我也更加“看见”了自己。透过对谈，我意识到，出生在 1980 年代初的城市、父母在国有企业工作，因而在住房、医疗、教育等享有公有制的福利，大家庭中有经过“文革”后的第一届高考恢复而得以上大学的亲人的引领、一路顺利地重点中学和大学毕业的经历，是一种幸运和奢侈，而后有机会在英国和香港开始研究生学习、研究和书写，更赋予了自己一种“特权”位置。如何利用这样的位置，做出对来自的群体有帮助的事情，是在这种反身中带给我的思考。张少强、古学斌认为“民族志研究从头到尾都无法回避我们到底站在哪个立场说话，我们的主体位置在哪里，为谁说话，为什么要这样说话，等等问题”（2006：128），在我看来，这一观点不仅适用于民族志研究、而是对于社会人文研究亦非常重要。在这个研究中，我试图选择的位置是，尝试为这些在“主流”叙述和 NGO 研究中身影模糊、声音隐藏、不同程度被投射以刻板印象的“80 后” NGO 工作者而书写，同时又不流于简单化的分析，批判性地呈现出他们的价值观、生活方式与其所处的社会脉络和 NGO 的操作之间协商的复杂面向乃至陷阱和困境。在这个基础上，希望有助于 NGO 工作者的自我觉察和 NGO 的内部价值观和操作改造的可能性；也希望向“80 后”青年和更广泛的公众提供关于“80 后” NGO 工作者和 NGO 的另外一种复杂的叙事，为他们重新认识 NGO、认识自身和所处社会提供一些思考资源。

第四章

“自我”的历史

本研究的核心探究议题是理解 NGO 工作者的“自我”的形成和转变。欲理解这一转变，需放置于其整个生命过程中的各种生命经验，包括个人经验、职业经验等等。因而，这一章将展现他们的生命故事，希望令读者深入触碰这些生命经验，进而可以进一步理解其“自我”转变的脉络、过程和核心因素。这样的书写安排，也是希望能够将生命经验带回研究之中。

本章主要聚焦于 10 位对话人中的 5 位的生命经验，其中 3 女 2 男。将以第一人称的形式进行呈现，以体现本研究的叙事性质。这 5 份生命叙事是从更长的访谈记录、自我传记书写等材料中抽取压缩而成。之所以选择这 5 个故事，是考虑他们既展现出故事的多样性，兼顾了性别、城镇或乡村出生、日后工作团体所属类型等的多样性，又呈现出 10 个生命经验中的共性之处。本文中的生命故事中的姓名、机构名称等均进行了匿名处理。5 份生命故事不应被解读成对 10 位对话人的生命经历的概括，而只是希望这些生命故事可以有助于读者感知这些 NGO 工作者在具体脉络下的“自我”转变及其挣扎过程。

5 份生命叙事为后面三章进一步分析 NGO 工作者的“自我”转变和协商提供准备。每个叙事都呈现了其“自我”的发展过程：每个叙事的第一部分首先展示了对话人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重要的价值观、行为方式。第二部分则叙述了对话人在大学或开始工作后如何接触 NGO 以及做志愿者的主要经历和“自我”变化。第三部分则侧重于对话人在 NGO 全职工作之后所经历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变化以及这个过程种种协商。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些“自我”的历史。

美凤

女，1980 年生人，出生于北方乡镇，一般本科毕业，在 NGO 工作 10 年。我在初入 NGO 工作时，和她成为合作伙伴，认识将近 10 年。她身上有很强的社区感或者说家的感觉，这使得我们在合作项目结束之后，走得越来越近，成为多年好

友。

我出生在北方乡村，爸爸在半集体半国有企业工作；妈妈在家种地。我有一个双胞胎姐姐，但是我和姐姐的性格和现在走的道路完全不一样。因为是女孩子，我从小就觉得不被家里的人重视。在我整个成长经历中有一种被压迫的感受，这让我更容易和被压迫者产生共情，能够理解她们，要去跟那些被压迫的人在一起，不愿她们再经历我经历的那些事情。

我觉得我家挺黑暗的。在这种家庭宗族里，有一种共存、彼此依附的关系，同时每个家族成员也要尽力去维护这些资源，并且要有所贡献。如果你对这个家族没有贡献，就会被抛弃，所以小时候我有种不安全感。高中去县城读书，不得不住在姥姥家。几个舅舅相对有钱，为姥姥姥爷提供金钱上的回报。而妈妈在这方面没有能力，所以把我送到姥姥家照顾姥姥姥爷，作为回报大家庭的方式。作为一个小孩子，我没有能力改变这种状况，只能住在姥姥家，每天除了学习，要洗菜、做饭、买煤，干这些粗活、重活。那两年的生活是我生命中的一场噩梦。姥姥年轻时是生长在旧社会的地主家小姐，脑中充满着各种封建礼教的遗毒……旁敲侧击地给我上了关于家庭礼数的各种课程。她非常重男轻女，偏爱孙子、孙女。我听到她曾经背后议论说，让我这个女孩子读书是一种浪费。我有很多来自家庭的束缚，比如姥姥告诫我不要和别人吵架，一个巴掌拍不响，如果你参与了争吵，说明你也有问题。因为姥姥的管束，我也不敢和同学——尤其是和男孩子——一起玩。这种自我约束和限制极大的影响了我的发展，我从小没有自由地选择过生活，一直在这种传统的定义下活着，被规训，被教育，被要求没有自我。

从镇上来到了县城读高中，学校里的同学都是县城人，我变得沉默和自卑，觉得自己是一个边缘人，一改初中时的活跃和组织能力。我用一天都不说一句话来表达，我是独立的人。那时是被压迫的状态，整个精神是被压抑的，而且根本找不到出路。

我成长的年代也正是家乡经济发展的年代，我所在的大家庭也是，有些亲戚特别有钱，学校里很多越来越富的家庭出来的孩子。我印象深刻的是高中时，一个同学因为感情纠葛，差点捅死她的前男友，但是后来因为她父亲是煤矿老

板，最终用钱解决了问题。我当时就感受到权力的力量，我不明白为什么金钱和权力可以这样运用，严重伤人之后，就像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一样。

虽然我小时候的经历充满了压迫，但是我也经常反抗。在姥姥家、在学校里，我的忍耐、沉默也是一种反抗——那是一个孩子在无力的局面下的唯一的武器。

我从小比较野，不安分在家。我特别喜欢看书，小学二年级就看完了整套《红楼梦》。但是家里没有书，我看的书都是找同学、老师借的，自己也订阅报刊杂志。高中时，我大量地课外阅读，通过邮局订阅《读者文摘》、《中学生博览》、《语文报》。这些书刊极大的扩展了我的知识和视野。在同学里算是有好多多余知识的人，但没有人可以交流。

说到我为什么有那么强的社会责任感，我觉得和小时候的经历挺有关。我记得很清楚中学有一篇语文课文是《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很有触动，感受到以国家为己任。我觉得小时候其实读过很多类似的故事，包括看过很多惩恶扬善的小说包括武侠小说，都是强调那些特别有理想的人。我小时候想当侠客佐罗，要去惩罚邪恶。我特别喜欢鲁迅，他的文章非常有力量，我还模仿过鲁迅写文章。比如鲁迅说的“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我觉得鲁迅代表一种正义，强烈的社会正义感…他的文章是特别有力量的，他的笔是讨伐的匕首，他要用文字去医治人的精神。

我有着很强的要读书上大学的念头，虽然父母觉得无所谓，他们只是不反对我读书。这个强烈的念头大概也是因为我希望要离开，我不想过和身边那些人一样的生活，我觉得我和他们不一样。后来我到了北京读大学——一所非常普通的大学的成人教育课程，学费还很贵。这所大学是一个腐败滋生的地方，各种权力关系成长出来的孩子都聚集在那里。县委书记家的孩子都算是一般的家庭背景。她们的人生与我的成长环境完全不同。我对很多国际品牌的认识都来自于这些室友，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男朋友，选择男友的标准都是门当户对。在那种环境下人会产生强烈的自卑。你不得不承认资本和权力让一切都黯然失色，你所坚持的东西是很脆弱的，因为那些东西太强大了，它快速地置换了所有的价值标准。

我的大学没有公益社团，因为对写作感兴趣，所以参加了广播站的编辑工作。而接触 NGO 和我当时的男朋友立业有关。他来自中部的一个乡村家庭，在北京读完研究生之后在一个有官方背景的报社做记者。大概在 1999 年或 2000 年，他读大学时，中国环保组织绿色光的创始人 M 先生到他们的大学演讲，他接待过，因此成为了绿色光的会员，每个月都会收到一份会刊。当时他的工资每月只有 500 元，却花了 50 元缴纳了会费。因为和绿色光接触的原因，他也常登陆他们的网站，收到活动信息的邮件。有一次，他看到了一个以互联网为载体的草根志愿者团体——滇魂——的招募编辑志愿者的信息，觉得非常适合我，因为他觉得我在大学的生活很空虚。所以我在大学时就开始了第一份志愿者工作，与滇魂在全国不同地方的志愿者远程联系、编辑每个月的机构电子简报。因此在 2000 年代初期，我就认识了好几位现在仍在公益领域活跃的伙伴。也因为做这份志愿者工作，我开始读这些志愿者写的对志愿工作和生活的思考，她们都特别有才，特别有思想。

大学读的是热门专业，因为当时觉得毕业后家里有关系可以让我进政府工作。但是阴差阳错，毕业时，我那有关系的亲戚去世了，于是我没有机会进入体制工作。我也不希望花几十万，进入体制工作，于是选择留在了北京自谋职业。大学毕业那年，我和当时的男朋友——现在的老公立业交往。我妈不同意婚前同居，我如果想留在北京，必须结婚，否则回老家。而当时的我从来没有想过可以不结婚，从来没有质疑过为什么要结婚，所以我就顺从了父母的意愿。

大学毕业后，我和很多大学生一样很迷茫。立业在绿色光的网站上看到“绿水自然平台”（简称“绿水”）招聘编辑，推荐我去应聘。当时我正想找编辑工作，所以就去应聘了，无关社会理想。在进入这家机构工作之前，我的思想上、身体上都还有着很强的过去的生活烙印。面试那天我还穿了一双高跟鞋，一件特别粉色的羊绒衫，一条紫色的裤子，一个三彩的风衣里面全是粉红色的里子，穿得特别职业，我就去了。去了一看这个破庙，哇塞，这是什么地啊，怎么里面这么破烂啊。他们问了我好多问题，可能当时不打算要我，觉得我怎么穿得那么主流。他们每个人都穿着平底鞋，穿得破破烂烂的；而我穿的那么好，不行，他们大概会觉得和我不是一路人。但是我居然应聘成功了，开始从事青年人工作——我的第一份全职工作，也是第一份全职的 NGO 工作。我觉得我的经历挺

悲惨的，成长过程中有一些坎，比如我没有上一个好大学。如果上了好大学，我不见得选择去 NGO 工作。当时觉得学校牌子不太好，所以选择上降低要求，这样就有机会接触到 NGO。

追求公正、公平的行动者

进入 NGO 全职工作之后，我有不小的改变。我成为了追求公正、公平的行动者。因为我被欺负太久了，突然被人唤醒了。把我唤醒的是第一份工作。当时做世界公民教育，帮助青年人认识社会问题，找到社会问题与自己的关系，并且通过行动去改变不公平和不公义。这些东西，不断地灌输到我的大脑里面，给我洗脑，它要置换掉你以前的东西。我听到这个世界还有另外一个声音告诉我，不能忍受不公平和不公正。那时候它对我的影响是日常的、潜移默化的。

女儿的出生是重要转折点。我觉得自己不能再忍耐了，作为母亲要保护孩子，另外一方面，我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后这样忍耐地生活。我要保护她、照顾她。于是开始不断地，把以前在世界公民教育学习到的那些理念，在生活中检验，看是不是有效。在日常生活中的行动和反抗的体验特别重要。行动者不是只有在社会活动中才是行动者，而是在每时每刻、在你的生活里、你的工作里，都应该这样，是整合的。比如一个特别小的事情，我买了一台手机，联通公司在月账单里扣了我 100 块钱，我特别生气，不断地给联通打投诉电话，可能打电话的成本足够我赚好几个 100 块钱了，但是我还是要讨个说法，让他们纠正自己的做法。有了不断的在日常生活中“维权”，对不公平对待发声、争吵之后，当我一次次‘得逞’之后，我发现这挺厉害的。于是一次一次的这种正面结果强化了我对于通过行动进行“改变”的信心。

一个人只要在日常生活里面能发展出这种能力，在其他方面都可以用的上去，所以我在做社区工作的时候，我不会说让女工们想在一个大的问题上做改变，而是让他们能够确认，在一个小的事情上自己是有力量的，不断地做这些小的事情，就会加强这个能量。面对大的困难的时候，她就好像做了十次这样的积累，突然就能跃过去了。

性别意识的觉醒

说来不敢相信，现在的我做了很多和女权主义行动有关的事情，但是曾经

的我在性别意识方面是那么保守。那时，自己的思想中内化了社会对女性的要求，比如我有处女情结，认为一个女人如果和一个男人发生性关系，就必须结婚，因为她已经贬值了。面对家人生孩子的要求，我选择接受，甚至自己也认为结了婚就要有个孩子，孩子可以维持一个家庭的幸福。我当时不觉得自己有别的选择，没有人告诉我：女人可以不结婚，可以不生孩子。

性别意识上的转变其实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我2007年时参加过一个为期五天的社会性别培训，那仿佛是一个种子，我开始有了一套性别的视角去看问题。因为那个培训，我开始思考性别是怎样从小在我的生活里面体现。但我这个人比较慢热，那时我们机构内部的这类性别的讨论，不是特别积极，而且那些新视角远远不如现实来的厚重和强大，我长期浸泡在过去的那种生活的“糖水”里，在婚姻中的我，全然依靠对方，经济上和情感上。一次培训想带来改变挺难的，需要放在日常生活中检验才能够对人有改变。

2007年到2012年我开始了第二份工作，这份工作对我影响很大，我的视野一下子打开了。也因为这个工作，我有机会接触很多学者、NGO工作者，其中包括后来的合作伙伴、活跃的女权主义者叶行。2009年生完小孩，我的老公长期被调到外地工作，多数时间是我一个人面对一边工作一边带孩子的艰难状况。这样的经验让我更能觉察到女性在这种社会结构里的那种压力、不平等。2011年与女工社区一起工作，接触了很多底层女性，听她们的故事，协作她们反思自身经验，形成团队。她们被雇主的剥削和她们的智慧对我改变很大。因为这个原因，我开始和叶行一起工作，联合创立了一个青年团体，并与一些女权主义分子在工作上紧密合作。由此，我才真正开始形成性别意识。

无根的人

现在在北京生活得非常不舒服，我觉得自己没有选择权，选择留下来或者离开。我和北京本地的文化没有任何联结，无法进入；和居住的小区的人没有共同的生活习惯——比如去菜场买菜或者一起锻炼身体——以及价值观——比如把所有的资金都放在孩子的教育上，牺牲自己的生活品质，在自身权力方面选择退缩。我也没有在北京买房、安家，这也是我没有归属感的原因之一。在NGO里，买房子的人大概也不是特别多，年轻人都是在租房子，那你又不可能在

一个地方稳定地居住，所以你是特别不确定的。

北京对外地人也是非常残酷的，不能享受公共福利，甚至想买个车、买个房都要排号。如果你没有房子，你会觉得自己特别不稳定的。没有户籍的子女为了在北京上幼儿园、读小学、中学，都要缴纳另外的费用。因为没有户口，不能上公立幼儿园，我把孩子送到私立幼儿园，每个月仅仅孩子的生活费加上学费就要四五千块钱⁷⁴。

在NGO还好吧，就是你还可以有一种理想和价值观，这个东西是你特别强大的动力，你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中，你有些价值肯定，所以你会特别投入。可能是因为NGO的理想和价值，让我越来越离现实的生活远去，与周遭的邻居产生价值的隔离。另外一方面，因为在NGO工作太投入，我忽视了自己日常生活的经营。说到底，你突然会觉得你是个特别孤独的人，因为一旦工作结束了以后，你的其它部分的事特别单薄，你的日常的朋友，你的日常的家庭生活……当然也是我自己没有去发展这些东西。除了你的工作是你特别用力去做的，其它的都没有特别投入地做。

虽然如此，我还是喜欢这座城市的。因为和老家省城相比，这里还有我可以做的事业，还有可以谈的来的工作伙伴，还有相对而言优质的医疗条件，这些都是我想留下来的原因。

文袁

男，1985年出生，来自北方乡村，重点本科毕业，后取得硕士学位，在NGO工作近10年。我和他是在2008年的一次培训上认识的，后在培训后的同学聚会上时有见面，并保持联系。正是因为本次研究的访谈，我才有机会更加走进/近他的世界。

我出生在一个北方小村子，4岁时我爸为了给我好的教育，全家迁到县郊。老家的学校到现在为止还只是只有一个学生和教师。如果不是我爸做的这个决定，就没有现在的我。

⁷⁴ 2014年北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是6463元人民币，数据来源：北京市社会保险网上服务平台 http://www.bjrbj.gov.cn/csibiz/home/static/articles/catalog_75200/2015-06-15/article_ff8080814a0ee7c6014df4db0ccb0165/ff8080814a0ee7c6014df4db0ccb0165.html 浏览时间：2016/4/5

在老家，家里有田有地，也干养殖。但是搬家之后，生活就很苦了。没有地种了，必须找活、干活。爸妈干过很多活，都是苦活、累活。不干活就没钱吃饭，生存压力很大。到了新的地方，邻居孩子吃的、穿的都比我和弟弟好，他们经常联合起来欺负我们。一些邻居很势利眼，总是嘲笑我们家。比如耻笑我妈那么辛苦，以后孩子考上大学也拿不出那么多学费。我妈辛苦攒着自家产的鸡蛋送给有钱的亲戚，人家根本看不上，我妈心很凉。我和我妈站在一起，当时我想“总有一天，我要让你们好好看看，我要赚一大堆钱，你们要在我面前磕头”。这样的经历更强化了我要为了家庭好好学习；我要离开这个地方。让父母生活得更美好的愿望，以及对那些对我们家不好的亲戚邻居的愤怒，让我更加觉得只有靠自己，靠自己更有能量对抗。有点生于忧患的感觉。也因为这样的经历，从小有自卑，面对强横的人，总是以躲的心态走的，不太敢面对他们。

我的境遇是因为教育而改变的。自从上学，我的成绩一直非常好，也是班长。我读的小学还不错，该上的科目基本都不缺，音乐课、体育课的老师都有，还经常搞个文艺活动。五、六年级的时候，来了一个刚毕业的老师，带来素质教育。那段经历对我来说太重要了。他真是拿他的生命、整个人在和我们一个班级、四五十人在互动。他培养了我的情感和兴趣。他主张学生自由发展，每天拿出一堂自习课，鼓励大家到讲台演讲、讲笑话。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对相声、小品、唱歌感兴趣的。他上课经常跑题，讲着讲着就讲历史故事了；虽然跑题了，但是我们觉得特别幸福。这个老师是启蒙老师——让我开始思考我未来要什么，我发现自己的兴趣了。以前觉得只要成绩好就行了，但那时发现原来人是很多不一样的。四年级之前我是副班长，五年级时，这位老师有些重男轻女，认为班长应该是男生当，把我调成班长。成为班长让我感觉要承担点什么。

中学就是应试教育，一切以考试为目标。我期许自己是个人才，对人才的定义是有文化、考大学。而我一直是要考当地最好的初中、高中。初中时经历了很多煎熬，0.5分都会让我郁闷得睡不着觉，因为我想要考清华北大。当时有种逻辑上的推理，要保证一直厉害，就要超越同龄人。我周围的同学可能都不是我们市最厉害的一批人，最厉害的人比他们还厉害。所以我一定要比我身边的同学厉害很多，才可能跟那些人竞争。有点成功学的味道，不断地自我激励。我们乡里很久都不出一个大学生，我们家族几代才出了我第一个大学生。我通过写

日记排泄郁闷的情绪，日记里面就像成功学，每天都是在激励自己。

学业之外是打篮球，缓解压力。没有看过课外书，不敢看，觉得看课外书是浪费时间。这是我有点后悔的，但是没办法重新选择。在那种状态下，基本上都是目标导向的，其它东西都可以放下的。长期压力下，灵感进不来。这种状态伴随我，从小到大 15 年。基本上所有国庆节不出去玩，就在家里看书、写作业、做题。我那时听到的一种鼓励是，某某某爱学习，晚上学到几点。我心想她能学到那个时候，我也能，有点拼吃苦。我们都很认同这种应试教育的游戏规则。

初中三年，18 次考试，我有 15 次都是年级第一。现在回看，那时是为了年级第一而年级第一，已经不享受学习的过程了。这个不享受学习一直带到高中。但是这么大的压力，中考、高考时候就不行了，关键时刻掉链子，压力太大，而且透支。我平时是在一种硬扛着的状态。我否定这段经历。如果让我重新过一遍，我不想那么过了。我甚至想谈恋爱。为了考大学、成为人才这个志向，儿女情长都要被英雄豪气斩掉。我有喜欢的女生，但都压在心底。到了大学，很长一段时间都释放不出来，觉得自己没有爱的能力了。

我在大学里其实还是那种努力向上的人，希望自己做得出色可以吸引一群人，所以我尝试去做得优秀，去话剧团，去做主持人，要找到有成就的东西。我觉得我那么优秀，一定会找到很好的工作，一定很多女孩子喜欢我。

我参加公益社团是很偶然的。西南之眼⁷⁵很早就和我所在的大学的三农社团有合作，三农学会和校外的三农运动都有联系，和西南之眼也有联系。2004 年，西南之眼的发起人来我们大学做过演讲，后来三农学会协助西南之眼在学校里招募支教志愿者。我的室友小黄，2005 年大一时就参加了这个学会。当时他也想让我去，但是我很纳闷，我本人就来自农村，我为什么还要参加农村社团，没什么意思。我当时对支教是不太看好的，觉得支教有啥劲啊，不见得能做什么。他做了一段时间，暑假到陕西的一个乡村支教一个月。我觉得这个经历挺不一样的，甚至觉得，哇塞，每年可以公费旅游一次，挺好的。大二时，小黄负责招募志愿者，又鼓动我，说这个活动特别值得参加。但是我还是不想去，直到他说报名的人很多，200 多人呢。我没想到竞争这么激烈，这让我觉得应该参加，可以挑战一下自己，证明自己是个人才。当然，当时可能也有其

⁷⁵ 一家组织大学生和社会人士去乡村支教的社会组织

它的小想法，比如可以公费旅游，可以认识一些女生，谈恋爱。反正原因挺复杂的，很龌龊的想法也有，高尚的东西，好像那时并不多。后来我如愿入选，而且被指派为领队。当时面试我的人就是邱敏——后来邀请我加盟西南之眼的人。

这次支教经历，让我又增加了可以吹的东西，也认识了些不一样的人，而且我的交际范围跨校了。支教的故事、感受一直在的，从头到尾，跟学生、队友的离别，还有现场的一些经历，很投入地做。这是我人生的一个窗口。如果不是那个经历，我也不会想去西南之眼做志愿者，我也不会认识邱敏，认识了一些很不一样的人。

支教回来之后，邱敏给印象里不错的志愿者打电话，包括我，邀请我们回来参加活动。这个邀请，让我觉得我得到了认可，很受激励。所以每次她叫我的时候，虽然从校区到他们办公室要一个半小时车程，但是我还是很快乐地过去。我很喜欢他们办公室，特别有人情味。第一次到西南之眼不久，我就有一种感觉，那里的人特热情，这热情让我不安，不安来源于我在北京经常接触的人都很冷冷淡淡的，比如我在大学里接触的人，没有特别热情的。但是到了西南之眼，有些人好像还和我不怎么熟，但每次去，办公室的行政会特别开心地说“文袁，你来了啦”，都能叫出我名字。就好像对你特别亲。这扑面而来的热情，一开始挺不适应的，怀疑是不是太假了，哪有这么热情的，我有点受不了。后来越来越觉得这特别宝贵，他们是很真实的。

不过在办公室做的事情都挺无聊的，都是些杂活。后来邱敏组织志愿者聚会，大家讨论要不要成立一个机构，那时经常聊这些事情，最后成立中原义工社，也就是我现在做的组织的前身。

其实虽然有了这些支教的经历，我那时整个人还是挺麻木、冷淡的，对社会的感知没有那么强，对中原义工社的工作也没有很深的感情，没有想要主动做事。我很佩服邱敏，她很有爱心，很有热情，是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欢。其实，我当时并不能理解她为什么能发自内心的喜欢？我觉得我做不到。所以后来，我正式在西南之眼做全职的时候，我对自己的期许是，我希望我什么时候也能从内在生出这样的热情。

读书期间，我信奉的东西，一开始就受自由主义的影响。我们学的商科有很多是讲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第一堂课，讲经济史，就是关于亚当·斯密的，他的核心思想还是政府是守夜人。虽然讲了后面的几次反叛，但是一提经济学就想到亚当·斯密就是一个自由主义的人物。虽然我爸妈说了好些次考公务员的事儿，但我没考虑。可能是大学期间，我对政府强权和体制的东西挺反叛的。其实周围的人也都挺反叛的，但是还是很多人都考公务员了，我们大学考公务员的特别多，政治素养很高（笑）。也可能我觉得这条路不够酷，不适合自己吧。也有对自己没信心，觉得这个社会现实是讲究拼爹文化的。一方面觉得自己本身也没有这样的资本，不可能在这条路上有多大发展，另外也是因为一辈子做一件事情，从去的时候就看到后面是什么样子，我觉得没意义，那样的人生是不够精彩的。我可能要做不一样的事情，这样才够酷，才符合人才的定义（笑）。公务员就成为了第一个被我否定的。那时候只想着商业的工作，没想到还有 NGO 的路可以走。虽然后来因为支教知道了 NGO，但是我没有想过毕业之后在 NGO 工作。那时 NGO 在我心里还是挺神圣、挺厉害的一个领域，但是待遇不高，所以我并没有考虑要进入 NGO，对自己的职业规划还是要赚钱，进入银行、证券。大四时，我也开始准备考研，因为我还是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人才，而研究生学历是我职业生涯的敲门砖。但是我也想过考到一个离西南之眼办公室近的学校，可以一边读书，一边继续做志愿者。最后考研失败，我想着找个轻松一点的工作，一边工作，一边再次考研。曾经在另外一家 NGO 工作过一个月，但是没有继续工作下去，那个 NGO 和西南之眼的分别是，没有牛人。邱敏被西南之眼请去做项目总监，打电话让我过去做项目主管。凭着对邱敏的信任，我就去了西南之眼。当时觉得在 NGO 工作是个很酷的方向，而且能和很多明星式的人物一起工作。那时我也意识到自己当不了伟人，来到城市之后，看到现实是，你的出身、背景决定了不可能成为伟人。我在乡村可能能成为一个厉害的人，但是让我在城市发展，有很多先天优势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也觉得我应该选择一个简单纯粹的行业，做一些想做的事情。但那时我决定留在西南之眼工作的时候，我两个舍友——包括小黄——晚上用各种方式劝我不要做这个工作，我就挺恼火的，觉得我的选择被否定了。我说，先干一年再看

看。他们就觉得挺可惜的，原来储备的一些东西可以找一个正儿八经的工作嘛，去银行什么都可以啊，也不是很差的。花点时间可以找个不错的工作。

西南之眼是我的第一份工作，但是它并没有给我确定感，我还是觉得应该做赚更多钱的工作。开始时，想着干一年就差不多了，反正工资也涨不上去。那时候挺浮躁、挺飘的，因为那时自己还是有在城市生活的压力，包括对家里的压力，我希望能赚点钱。我读大学是申请的助学贷款。所以工作也要省钱还贷款。后来邱敏帮我还上了，但是父母不愿意让我欠别人的钱，先帮我还上了。这让我心里不好受。

但是没想到工作几个月后，我发现在 NGO 工作的要求还是很高的，和我以前做事情的方式不太一样，很多东西要学，不是一两年就能学到的。在西南之眼给我影响最大的是两个人：一个是米老师，一个是邱敏。米老师 50 多岁，大家都特别崇拜她，所以我也觉得她是个牛人。能和牛人在一起工作，让我很有成就感。她是一个表率，视野很宽，要求也特别高，气场很强，很自信。有一件事印象深刻，我负责的第一个项目，举办仪式给志愿者颁发证书，事后被米老师批评了一顿。当时我觉得每个志愿者都不错，磨不开面子，决定给每个人发优秀志愿者的证书，在总结会的颁奖典礼上，由米老师颁发给他们。米老师说，你给每一个人颁发优秀志愿者，就意味着所有人都不是优秀，你把这样一个荣誉很廉价地送给了志愿者，你把做事的标准就降低了，那些真正优秀的志愿者会觉得没什么意思，而多数人也会觉得原来西南之眼的优秀志愿者这么容易拿。这些志愿者做了什么，要发荣誉证书？有什么荣誉，不就是暑假下乡吗？做了这么简单的事情，你就这样廉价地把荣誉授予的时候，这样会助长志愿者的浮躁。如果真要评选优秀志愿者，你就要把标准一五一十的说出来，否则就是典型的为了省事、不作为。另外，米老师说我在颁奖仪式上说了很多套话，她听得很不舒服。她问，“你做的这个活动和学校团委老师做的活动有什么不一样？学生在学校经历的已经是这样的走形式、走过场的氛围了，如果他们参与公益体会的还是这样一种氛围，而不是特别真实纯粹的东西的话，你说他们会喜欢吗？”我一听，问题出得好大啊。我才知道活动设计多么重要。而且我也意识到了自己身上那些因为从小到大做班长而沉淀下来的讲套话、官话的习惯，举办活动、写文章都像《新闻联播》似的。我写的很多东西，米老师也常会打回去，让我重

写，让我改掉党八股的写作方式。我的往来邮件中如果出了错别字，也会被米老师批评一顿。她说，“你知道吗，你跟人合作的信任感和做教育工作本身就在于每个细节。别人是通过每个细节去看到你的”。她教会我的是职业精神，你要负责，然后你一定要认真。

不仅如此，米老师做事情的那种不忘初心特别打动我。在我看来，她在经历一个时代。她给我们讲过她在1980年代在大学工作的经历，她对学生的关心和鼓励以及对大学教育的批判观点。她做的一切选择都是不违背内心的原则。我觉得米老师可能真的没有特别刻意要为我做什么，但是对很多年轻人都有关照在里面，是我生命里很重要的一个轨迹。算下来除了父母、小学启蒙老师，米老师是在我工作后给我启蒙的人，对我的影响力之大是不可替代的。我在很多时候会关注她做的事情和她周边的那些人，因为她帮我所建立的是包括对社会的理解、视角，我也在模仿她，虽然有些词可能我自己不懂，但是在那个时候我愿意去说，愿意去表达。

除了在西南之眼工作的经历，另外一个对我影响很大的事情是09年、我参加的为期一年的原野工作坊，对我是一个价值观转换、重建自我的过程。这个工作坊是NGO主办的，主要参加者是从事青年培力的协作者。我是里面工作经验最短的参加者，刚工作一年就去了。这个工作坊为期一年，其中集中学习有3次，第一次是利用多元艺术进行自我成长；第二次是利用多元艺术探讨发展议题——劳工、性别和环境；第三次是利用不同的艺术形式做社会行动。我参加的是第二次和第三次。

我原来没有什么独立思考能力。小时候家里的教育、社会给了什么，就是什么，挺单一的主流价值嘛。但参加了工作坊之后，发现原来这个世界还有不同的角度去看它的，比如说，性别的视角，环境的视角，城乡流动的视角。这些议题本身带给我的是，看问题的视角，看社会的视角，包括看自己的视角。那时候特爽的是，我觉得自己更有自由度了，就有点像外界给个东西之后，我是可以选择的，选择用这个东西看，用那个东西看，这在原来是没有的。这个过程中有些痛苦的是，原有的一些价值观在不断被推翻和被质疑。我觉得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有好多天赋在，但是随着教育和长大，这些东西就被包裹起来了。我觉得过去的那二十多年，自己是一个逐渐被蒙蔽的过程。比如性别话题，我一直

有**处女情结**的，觉得女孩子应该纯洁。协作者就问我，你理解的纯洁是什么，为什么女孩子要纯洁？男人就不应该纯洁吗？纯洁是怎么定义的？当时，把我问傻了，完全没有想过。武侠电影、小说里，男人要有英雄气概、救美，女人要怎样。所有电视里表达出来的是，一旦女孩子失去贞洁之后，完全就没有未来了。这样的事情太多太多了。另外一个价值观上的冲击是“**什么是成功**”。原来觉得是要有一些成就啊，至少在大家评价里，很多时候通过薪水这个标签来判断你的能力，还有就是通过你的家庭背景评判，还有学历、大学牌子，曾经不加怀疑地就接受了别人不断强调的东西。但是2009年时，我就要开始寻找自己定义的成功，而不是别人定义给我的。参加工作坊之后，我重新去寻找自己的定义的成功是什么。这个过程对自我的认知很多，对自己越来越了解了。我自己也开始有很多包容、悦纳，接受和喜欢自己。2009年我这个人开始完整了。

在NGO中，我找到了我的兴趣点，我对人感兴趣，我想看到人的变化、人的力量。我现在做的这个青年培养组织的价值也是去培养人，不仅仅是大学生，也包括我们团队内部的成长。我认为人的改变和成长，很重要的就是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培养，做自己的主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是比较忽视这些的，强调的是权威。我觉得人应该慢慢回归自律、自组织、合作。我们说，做别人的伙伴，但首先得先做自己的伙伴。开始尝试对自己好，爱自己，这个人才能成为自尊的、自信的，蓬勃生命的状态。就像一杯水，幸福满满的时候，就会自然向外溢。现在的社会是，往往人自己不满足，所以开始去索取，不能分享。我要做的教育是让自我先有一种能量去自我完整，然后向外扩散。我发现我是偏自由主义的，看重人、个体的自由。我挺排斥集体主义的。这确实和在NGO工作有关，NGO强调人的自我解放。当然也是受米老师影响。我本来觉得做乡村教育的事情，怎么会跟一个社会的大建构有关系呢？后来我明白了，我们的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泯灭个人，这是让我很讨厌的。因为在西南之眼工作，也经常去乡村走访，在过程中接触到人和事，以一个家庭面对的困难、故事让我觉得和国家政策很有关系。我并不主张暴力革命，我希望采取非暴力的方式，因此个体的改善和学习、训练就很有作用了。历史上总是被压迫者推翻了压迫者，但是还按照一样的逻辑建立自己的统治。没有根本改变。我觉得中国应该走条新路，其中理性、非暴力就变得很重要了。其实这些也都是公民社会的要素。公民社

会讲的就是权利、参与、包容、理解、支持，天然站在弱者的角度，反对暴力、压迫这些概念，非暴力的方式，重视人、个体的价值。但是人的发展是要社会联系在一起，不是孤立的人。我是比较认可 NGO 做的事情的，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三者制衡。

如果说刚开始在 NGO 工作还不坚定的话，后面我是越来越转化了。我不再那么强烈地需要别人给我认可，我开始了解自己，认可自己。我觉得人要有选择的自由，做一个积极主动的人。我原来是理性分析，忽略感受，但是现在更多能用内心去判断，相信内心的良知，我的内心、初心是什么。这当然也和米老师有关，米老师讲过一句话，同理心。她说，最好的选择是你不违背你的本心。很多人之所以跟普通人不一样，不一定是这个人背后有多么大的资源，而是这个人愿意遵循内心去做选择。而遵循内心做选择是少数人才做的，绝大多数人忽略这个路径的。我觉得好像这个事情能走到哪里、以后遇到的一些坎，完全来自内心力量，内心力量是可以发挥的。我之所以留在这个机构工作，是因为对自己越来越了解了。我对自己越来越了解了，我选择什么样的人共度一生，选择什么职业作为我终生的兴趣。我相信我现在选择的修炼的方式，让我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完美的人。我仍旧有那个成为人才的想法。但是对于人才的理解不一样了。所谓人才，我不想成为别人定义的那种人才，我想成为我自己。我觉得最出色的我自己就是最好的一个人才。这个自己，是内心、头脑和手结合的一个，又是在自我和他人之间有平衡的，在家庭和事业之间有平衡的，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均衡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才慢慢确定了自己的价值观。慢慢的我觉得这样的价值观和导向，让我收获的不仅是简单的成就感，有很多爱就进来了。幸福感就出来了。如果说教育的目标是为了让人幸福的话，要让那让人获得幸福的能力，从人格发出来的，从内心发出来的。这个内心的锻造要不断去寻找的。一个人要幸福，是对自己越了解，知道自己在什么场合下，做什么选择。比如说，我对自己了解到的程度，和我 5 年前不一样。5 年前有 ABC 三个选择，我看不清 ABC，混在一起的。现在你让我选择，我会做出不后悔的决定，因为我知道选择 A 之后，会有什么后果。我在选择一个东西之后，我就知道我愿意承担。不一样的地方是：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用心去做判断。而且对结果负责，对自己负责。

收入死结

虽然我喜欢自己的工作，但是我也在考虑可能等这个机构稳定了之后，换个身份，比如去基金会工作，有个比较高的收入，或者去企业做培训，以理事的方式继续做现在的这个事情。主要还是纠结在收入问题上。

现在国家目前这种社会保障体系并不完备的情况下，其实很多成本是我们家庭自己来负担的，养老、住房、教育这些，都是自己来承担的，这种成本的家庭转化其实让我们的很多东西特别单薄。如果说我们在一个社会里面社会福利相对比较好一点，无所谓啊，对吧？也可能就没有那么强的压力了。我们抵御风险的能力很差，我真的不希望自己以后成为一个被救助对象，但是我越来越担心再过个十年我会成为被救助对象。我只是瞎猜测了，有一种危机感在，但并不会影响我做这个事情。所以我就没有那么强的明确 NGO 绝对好，其实各种各样的行业而已，而且我会感觉有的时候想实现那个目标，也不被排斥商业。

和企业的关系

我有点不甘心，没在企业工作，觉得人生不完整。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在 NGO 积累的工作能力、方法适不适合在企业工作。在想我是不是应该到企业去锻炼，增加工作能力、方法。不过现在虽然在 NGO 做培训，但是很难调到企业去培训师，根本进不去。NGO 现在转行到别的行业特别难。但是商业的人想转到 NGO 就很容易，只要心里有这个东西，认同基本理念，就可以。

我觉得我见到任何一个企业的人总觉得自己好像差一截的，其实他并不是多么厉害，但是我就总觉得差一截，先天地觉得自己还是有弱势的，可能我因为来自乡村的自卑一直在，没有摆脱，也因为收入原因吧。

北京：留不留

去年年底我和媳妇还特别纠结要不要留在北京。北京房价太高、生活成本高，又没有办法有户口，我孩子以后上学也会很麻烦。所以我就想逃离北京，找个地方，我这些事情适当地做起来也就可以了。平时有份工作，生活能过得舒坦一点。但是后来也是因为米老师一句话打消了这个念头。她说，凭我对你的了解，如果你到了三线城市，会活得更惨。你的收入也会相应降低。生活成本方面，虽然比北京低些，但是也差不多。地方主义、拉帮结派肯定是更盛的。像我本身不擅长拉关系，回去也会郁闷。而且我也不能找到像在北京能聊得那么

爽快的朋友。除非到那里开创一个事业。米老师点了一下，说你留北京的可能性也是有的，你认识这么多人，你孩子上学以后也会有。而且一个孩子的教育，其实和很多东西有关，和家庭有关系，和平时长大遇到的人有关系。像你现在做的事情，接触的人是很不一样的，对你的孩子影响也很好的。朋友也挺重要的，你在北京等于是扎下了根。我和我媳妇也特别不舍得北京。确定留下来后的两三个月的时候，开始考虑买房子，三个礼拜之内就订了房子。

我和我媳妇在北京边上的河北买了套房子。我们的钱在北京买不起房子。这个房子，有一个公交车到北京站，一个小时。因为房价会一直涨的，工资跟不上。所以我就要想在工资不涨的情况下，怎么保值。我刚开始想借50万买房子，每个人借1万，找50人。后来发现很困难。我大部分认识的同学都是要在这个阶段结婚买房子的，已经付了一笔钱了，不好借。所以后来就两家各出5万块钱，自己又借了10万，凑了20万，买了一个7000多块一平的房子。只要人往那边聚集了，交通自然会配套跟上，我相信再过四五年，会好起来。房子要明年年底才能盖起来。我和我媳妇现在稍微苦一点、在稍微远一点的地方，租一个便宜一点的房子，和别人合租，客厅改的房间，省一些房租，付完月供和生活费，每个月争取攒出一点现金的。现在要开始攒钱了。不过我们最近想，这套房子近期没有办法住过去，因为太远了，每天上下班就要用3-4小时，不太现实。

水仙

男，1982年代初出生，来自中部乡村，重点本科毕业。在乡村建设（乡建）领域工作十年有余。我在NGO工作时便知道他，但是从未见过。经由一位“大地”网络成员的推荐，我对他进行了访谈。在他所工作和生活的团体完成了三次访谈，同时也前后在其团体短期生活、交流一周，参与式观察该团体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大学生培训，并与其团队同事交流青年人工作等话题。

我最后选择这样的人生道路是在一些矛盾和冲突中做出的选择，但也肯定是在一个大的背景下。我出生在鱼米之乡。家境中等。爸爸小学毕业，妈妈高中毕业。爸爸为了我读书，去当村官挣钱，他本来不想当村长，当村官是吃力不讨好的活，得罪乡亲，逼着村民交粮纳款。印象中计划生育、交税这些工作，父亲还

是完成得比较好的。经常出现交不起税或者计划生育这种事情，爸爸帮忙想办法应付、帮忙想着借钱；上面来抓人，爸爸就告诉他怎么去躲避。但因为人已经跑掉了，官府就会强制罚款，比如把村民家里的电视等值钱的东西搬走，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爸爸他们村官也就只能看着，这也是没办法阻止的，就只能接受。只要不抓到那就是万幸。童年经历这些事情，可能和我现在做这个工作有些关系，让我觉得社会这样对待农村，是很不公平的、没正义感的。除了家庭跟学校的教育之外，另外唯一的对性格、价值观有影响的就是看电视或者看课外书。我们小时候只看两种电视剧嘛，要么是看战争剧，要么是看武侠剧。战争剧就是所谓的爱国主义，武侠剧正面的影响就是会有一种比较讲义气，反抗强权啦，打抱不平啦。小时候，爸爸喜欢给我讲他小时候村里的说书故事，我还记得自己也听过几次说书，讲岳飞啦，杨家将啦，水浒啊。后来就没有啦。

我们省的应试教育很强，我也是一心想考大学。家里、老师给这个期待，一定要考上大学，考大学纯粹是为了完成父母的目标。所以平时只要有空闲就偷偷去玩。从小的教育，受家庭和学校的影响，不知不觉就给你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好好工作，有很好的收入。这不能说是我个人的兴趣和爱好。这个很单一的目标，充斥在整个应试教育里，从6、7岁开始上学，到大学一直是这样的。中间不可能有其它的，整个应试教育就是这样的。那时没有自己的主体性——思考和体验。对于农村孩子，考大学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背负很多家庭的期待和希望。父母从小就跟你讲，你看在农村干活太辛苦了，要尽量通过考大学变成吃商品粮，有城市户口。对农村老百姓来说，他们很清楚农民跟城里人的差距。只有通过高考、上大学，才能改变这个，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所以，他们往往跟我们说，“你看你叔叔当年就因为高考差那么几分没考上，现在一直还在种地”，考上的人现在又怎么样的。这对学生无形中的影响特别严重。那时候对农村的印象是，农村是全面落后的形象，物质贫乏，知识也很贫乏、很落后，反正农村就不是你待的地方，而是人人要赶紧逃离的地方。并且你待在农村你就会没面子，并且你家里也没面子。你考上大学了立马全家面子上就有光了。村里就是这样一种价值观。

整个教育过程中，阅历、视野都很窄，一年有一两个月的假期是在家，其它时间都在学校，各种补习，各种考试。高中开始每个月都有月考，成绩要排名，

如果下降超过五名就要罚几十块钱，上升五名就会奖励相应的钱。这样谁还敢说你是对学的东西感兴趣？老师为了让你更加刻苦学习、考试，不断地向你灌输只有考上大学才能怎么。我们那里的这一代人大部分都是这样子。城里的孩子相对来说更幸福一点，因为不一定有这么大的压力和动力不停地去学啊、考啊，视野可能相对广一些。但是对于农村，考大学大部分就是这样子，没有太大差别。

这种从小学到高中的学习经验给我一种很压抑的感觉。一般会有少数的同学在行动上比较叛逆大胆，但在那种环境下面，这样的人一般都会被扼杀掉或者变成疯子的。我行动上不是特别叛逆、大胆，但是我还是偷偷地看了一些课外书，特别是高中的时候，看武侠小说看得比较多。

上了大学，从应试教育突然解脱了出来，进入了拼命地玩、拼命地发泄的状态。不想认真学习，但也要应付考试，像我这样稍微有点心理压力的人还能保持在前三名，每学期都有奖学金拿。大学里只要作业完成，考试不挂科，有大量时间玩，大一、大二处于疯狂玩的状态，但大三、大四就会焦虑，不知道未来、人生究竟应该去追求一种怎么样的价值？我们到大学就觉得找到工作就好，至于找到的工作是好是坏、做和专业相关的还是其它工作，大家是没有主见和想法的。大三、大四特别迷茫，甚至觉得心理有点问题，看了很多心理方面的书，读一些励志的、心灵鸡汤的书。

如果那时还有外在压力、像高考那样的压力逼着你，你还是会有动力拼命考试、拼命学习；但没有了，就很空虚，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空虚之后有道德压力了，父母传统的价值观还是影响你。就是在这么一个很矛盾的状态下，大三时，听到哲学系王珏老师的《毛泽东与现代化批判》的课，打开了我的视野。他讲古希腊历史、西方哲学、西方社会的兴起，也讲中国社会改革的市场化、教育的市场化。我的知识面被打开了。如果不是听他讲，没有任何人会去讲这个东西。本专业的老师不会讲，他们除了讲专业知识，剩下的是告诉你怎么找好工作，赚更多的钱。同学中也是一样这样玩。去找本书看？不可能，没这样的因缘。他的课批判现在的功利化、世俗化大学，讲人生意义，认识论呀等等。当时对我很有冲击。我们这种从农村出来的大学生，本来从小接受了农村落后的那套价值观，很没自信，但对这些精神和心理上压迫潜意识里有反

抗。当有人教给你批判的武器时，我真的很兴奋。上大学后学校告诉你，你要做好职业规划，找个好工作。突然很多人会很空虚、焦虑。大学生心理问题比较严重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特点吧。很多人找不到一个发泄点、突破点，只能随波逐流了，没有别的选择。对这些社会问题感兴趣的，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我同寝室的几个同学正好都听他的课，觉得他讲得很对啊，批判这个大学、社会价值观，顺便讲了现代化批判，也讲了毛泽东思想，西方传统，给我们很开眼界。最后听了一个学期，我整个人从以前那种没有人生意义的感觉中抓到了些什么。对他讲的那些东西方社会问题很感兴趣，于是大四花了很多时间去图书馆找西方哲学、历史书来看，上讨论这些话题的网上论坛，于是接触到了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左翼思潮的网上论战。

我刚开始上 BBS 就是上北大⁷⁶一塌糊涂 BBS，一塌糊涂里有“毛泽东”板块。那时大学里弥漫的是自由主义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只有在网络里才有关于民族主义、左翼思潮的争论。但很奇怪，那时三农问题在网络上讨论的不多，大学生群体关注的很少⁷⁷。2004 年之前，我还没有接触更多的人，还不知道三农问题。那些论坛上的讨论有文革问题、毛泽东历史评价的问题、斯大林主义的问题。其实那时我根本不懂，但是带着一种情绪、某种历史投射的一种情感，愿意和其他网友争论，争个你死我活，不亦乐乎，其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啥。

我潜意识里有对大学那种很世俗、很功利，很让人沉闷的状态的反抗，主要是通过关注社会思潮的方式进行批判。这个状态一直延续到大学毕业、第一份工作期间。我学工科，大学毕业到了南方某大城市的设计院上班，是事业单位。经常干完老板给的活儿就关注这些，要不就看哲学书、历史书。

我们的工作是做城市交通、道路规划，我觉得很无聊，没有创新性。很多规划设计的模版，参照一下，改一改，为了完成符合规划设计的要求和标准，数据改改也行。比如建一个家乐福超级市场，要修停车场，需要我们规划交通。超级市场肯定要吸引很大的人流、车流，那么设计能不能满足这个要求？我们就通过规划设计处理这个问题，明明当地人流设置太窄不合适，人家投资

⁷⁶ 北京大学的简称。

⁷⁷ 经过对话，水仙说，进入社会团体工作之后，他才意识到，2004 年大学毕业之前，他的大学所在的城市是三农社团发展重镇，全国的三农社团也已经超过 70 家，但是大学时代的他由于个人原因对此知之甚少。

者让你建，即便建在那里不合适，你接下来要做的是，帮他论证这地方可以。和考试一样，你按照人家想象的答案做出来。这东西做多了，就跟流水线上做的工业品差不多啊，重复劳动。

当时每天都平平淡淡地上班下班，也不知道在干嘛，不知道未来一年、半年的方向，城市的虚华让我心浮气躁，盲目的生活让我倍感压抑而又苦闷不堪。别人可能工作之后会有压力，工作、买房结婚啊，我就压根都没想过结婚买房，没想那么快往这个方向走。以前考大学是父母让你考的，现在父母肯定希望你结婚、买房子，但我觉得这方面我不应该听父母的吧，自己一个人完全可以决定什么时候该结婚买房、过什么样的生活。至少我意识到，这个不是别人给你做决定的，哪怕社会主流价值观是这样子的，主流的人生道路是这样子。我为什么要这样，这时候已经怀疑了，至少有清醒的意识，觉得我应该多看看、多走一走，不为了攒钱买房结婚。2004年时候结婚买房的社会舆论很强，单位里面，前面后面旁边的人都是这样，每天都是这个话题，这个楼盘价格三千多四千多怎么样，首付多高还款多少。和他们完全没办法讨论，没有共同话题。上班的时候比大学更加孤独。上学时有一大帮朋友，工作后一下班各回各家，虽然单位也举办些活动啊，集体出游一类的，唉，挺无聊的，K歌，酒吧，觉得生活的还不如大学呢。单位中有职场竞争、庸俗的人际关系。整个一队人都是竞争对手，比如同事有什么新的软件应用，都不告诉其他人。

我的一位大学同班同学毕业后在上海同济大学读研究生，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比我更甚，对互联网思想争论比我更熟悉。我因为工作紧张原因，虽然也关注社会问题，但看的时间不多。2005年6月，有一天他从乌有之乡网站上看到一个农村发展人才培养计划招募参加者，于是决定休学去参加一年，并且鼓励我也去。开始是他做我的思想工作，而我则有很长一段时间的犹豫，思想斗争很厉害。他虽然自己很坚决，但家里人坚决不同意。于是找我去他家帮他做家人的思想工作。就是在帮忙做他家人思想工作的过程中，我反而更加下定决心辞职去参加这个志愿者计划。不过，因为我并不了解这个主办活动的团体，对三农问题也知之不深，所以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去参加一年。也因为那个时候我对事业单位的工作感觉积极无聊，有种想逃避的想法。就这样，我们两人一个修学，一个辞职，就去了这个团体。我没选择继续接受职场道路，仿佛和小

时候看过的武侠剧一样，率性而为，这种状态下感觉不好就逃离。领导很不理解，很生气，觉得我想法不成熟，太荒唐、狂妄了。我应付了家里人，说我去学习，第一年就这样应付过去了。这次辞职是我第一次试验了自己的决心。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我挥之不去的情结，不出去走一走是不会知道自己的无知的。我并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不知道前途和方向，只知道要出走。我从繁华城市到残破农村再到血汗工厂，从白领到农民再到工人，其间精神上的煎熬和痛苦，犹如三重炼狱一般。所有的出走都是没有答案的，而我却是那么偶然、那么幸运地闯入了乡建的场域。

那一年留给我的是异常丰富的记忆和感想，更甚于大学四年。感谢老天，我有幸加入到了这个非常有意义的下乡计划。进入乡建，这个地方给我提供了理想，尽管整个社会大环境是如此的庸俗和市侩，但是这里却营造了一个清新的、激情的理想主义氛围和英雄主义氛围。这也是我第一年结束下乡计划后留下的原因吧。我走入这个场域中时，我很快就忘记了以往所有的一切，在一张白纸上重新画着自己的理想，甚至来不及去想象返回农村的艰难困苦。尽管一切都还不那么清晰，但在一个共同体的氛围中，理想就是希望。作为个人，重要的是首先得从文化上、从思想上认识某种不同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新的理念，新的逻辑，在内心里打开一扇窗，看到美好图景。

这一年的学习和实践经历，使我对农村、农民、农业都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从农村、三农开始切入到了解这个社会的问题。这期间有几次培训，老师讲的那些理论也都是比较宏观视野、社会的分析。对于农村这个生我养我的地方，我早已习以为常，从不会想去多思考她。但第一年根本谈不上多深了解三农问题，更多的是直观的、感性的，吸引你的是这个团队的集体主义氛围，这种文化，还有这种生活方式等等吧，吃饭睡觉之外，大家那种讨论问题、学习。最后又落实到我们下乡驻点，要做一些具体的工作。当时帮着村民开农资店啊，组织村里学习，或者搞养殖项目之类的，推动农民合作是我们的主要工作。我们热切地帮助农民成立组织，只要组织起来就是好的，无论是公益服务型的协会，还是经济性的专业合作社。可是，在做具体的小事的过程中，会有很多困难，各种既有利益部门的阻碍，还有合作社农民自身组织的困难。这种社会经济结构性问题，其实你通过搞农业合作是不可能的解决的。比如说，你

组织起来你买产品买得便宜、卖得贵，但是你真正做起来，你竞争不过那些代理商、商贩之类的，就是这种商业资本结构，所以我们做的是蛮多失败的，成功的不多。过程中和我们学的那些理论的落差很明显，这让我很困惑嘛，本来是要去改造农村，发展农村，但是遇到很大的挫折。我为自己从理论上建构的理想是如此的脆弱不堪，我们到底要什么，对我这仍然是一个问题。我从城市出走，有很多理由，可是回到农村，梦碎合作经济的发展，那农村对于我还意味着什么呢？也许这一段农村实践，只不过是进一步强化了我对农村难以现代化的认识。

回看我自己的经历和那批同时代通过网络关注思潮、关注空谈的人就不太一样了，因为我来了乡建，去农村呆了一年之后，我没有继续选择空谈，而是开始行动，因为批判的武器终究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我选择了继续行动，就一直留在乡建做一些事情。

一个偶然的机遇我开始接触生态农业，让我重新认识了农业。以往，我仅仅只是在经济理性的逻辑圈里认识到农村的落后，以致将农业本身作为一种落后的代表排斥，而没有意识更深层次的问题。我对自己盲目要求农村现代化的信念产生反思，农村并不是落后的。我似乎找到了一种新的生活的可能性，认识到文化的多样性，建立起反思“现代化”生活方式理想和价值观的自信。于是我们在农村又进行了新的尝试，一边和合作社农民朋友做生态农业种植，一边做社区支持农业（CSA）的消费者运动。在逐步的实践之后，我也自己亲身尝试健康农业的生产。对健康农业生产的尝试，让我体验了一个真正的劳动者的角色。对于我这个来自农村的青年来说，最大的尴尬就是不能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做生态农业。尝试的健康农业，除了经济上的考虑，当地农民并不太理解。我们想象的某种基于生态农业的农村社区合作文化，看起来有点遥不可及。几乎所有的农村青年自愿或不自愿的外出务工，使得我们在农村里的任何实践都看起来没有意义。当自己又一次从理论上建构的理想受到质疑时，我已经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三农问题”。我已经不认为在农村范围内可以解决农村的问题，“三农问题”受制于整个市场经济的社会结构，不幸的是这种结构具有压迫和剥削性质。正是因为农民经济的穷困，所以青年不得不背井离乡，这使得农村更无希望。

这一次，我已经无法再为自己构建理论的理想。我以一种似乎逃避的状态去了农村青年的聚集地——“世界工厂”。在这里我成为了一名普通工人，不需要建构理论，来不及思考，不是找寻什么。在这里，一切都是多余的，一切都是流程。我看到了真正的现实，不加任何理论掩饰的现实。当我丢开所有的理念和理论时，一个不再通过理论思考与社会联系的个体，作为一个消费主义者而存在和生活。以往如此之多的理论思考显得很荒唐，它离现实生活是多么的遥远，无助于解决任何个体的生存问题。难道那些思考仅仅是个人的偏好，无关于社会的么？当我从自身的理论思考中找不到答案时，我怀疑自己的理论思考就是作茧以自缚，逃避现实。甚至，我怀疑自己为什么要去思考社会，一切不都是个体的事情么，与他者与社会何干？在南方沿海工业区血汗工厂的经历，促使我回到了现实充满斗争和矛盾的生活中，无可逃避。我不再选择出走，无论是城市、农村，还是工业区，哪儿都一样，我将会继续我的实践。

多年乡建生活让我更进一步了解了这个社会的运转逻辑。从事新乡村建设的人都自称为社会的非主流，我时常会想自己为什么不能如同学那样生活，为什么我一直是把自己与社会联系起来考虑个人的生活和出路？非主流就不正常吗？也许我需要的只是勇气而已。

回首往事，我一开始就是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这不仅仅是一个个体自身的问题，而是时代的社会问题在个体身上的烙印。不经反思的人是很难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他只是社会需要的工具。这个时代很神奇，社会给予了我占统治地位的主流价值观，命运却又让我来反省和解剖自己的思想。这是一种必然还是偶然，说不清楚，但却不重要。

也许我在乡建一路走来，伴随的是挣扎和苦恼，但最终还是让我坦然接受这反思的历程。现实社会的问题已经很清楚。社会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没有什么是个人的事情，在每一个人的参与下，社会终将变得美好，理想会变为现实，对此我充满信心。多年来的学习和成长，得益于三水这样一个团队，每个人都融入进去使它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共同体。没有这个共同体的支持，我想自己不可能走得那么远，也无法坚持下来。任何的理论建构都不可能解决现实社会的既有矛盾，社会的进步就必须更多如三水这样的共同体通过实践来回应。

钰晶

女，1982年初出生于华中小城，重点大学本科毕业，在NGO工作十年有余，期间去海外读取硕士学位。2000年代中的NGO圈子较小，我和她因缘际会地得以认识，后来在“大地”网络中有更多的交集。

我自认为出生在草根家庭。妈妈读完小学，外婆怕她上山下乡吃苦，于是没有继续读书，去工厂工作。爸爸则是由于家里太穷，为了供几个妹妹读书，初中没毕业就去拖板车赚钱了。大概因为这个原因，爸爸对赚钱很执着，任何赚钱的机会都不会放过。因为爸妈都没有读书，所以他们对我多读书的愿望很强烈。他们俩最主要的目的是赚钱，我的任务就是读书，弥补他们小时候没有完成的。很小的时候，我爸就是我考一个满分就奖励十块钱。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爸爸很早就离开了工厂，开始做生意，而且是什么赚钱就干什么。在我的记忆中，家里在物质方面从来都不愁，一般去商场买东西，妈妈都是挑贵的买，因为她相信便宜无好货。我的整个成长环境从没有为钱发过愁。这大概是我在经济和物质上从来没有缺乏感的重要原因。也因此我从未对“钱”产生过兴趣，并且，我甚至对它有种厌恶感。因为我目睹了这个家庭虽然财产在不断增加，幸福和快乐却在下降的过程。在这个家里，所有的事似乎都是“钱”的事，所有的烦恼和纠纷都因它而起。仿佛这世界上除了钱，就没有其它东西了。我一直都记得一句歌词“钱呐，你这杀人不见血的刀”，实在是太形象了。每次听妈妈提到这个字的时候，我都会怒火中烧，钱，又是钱，什么都是钱。这个字眼让我无比地反感。

除了上学，唯一的娱乐就是看电视和电影。后来家里又陆续买了录像机、影碟机、VCD机……爸妈忙着做生意基本顾不上我，我妈说得很直白“你想要钱还是要人，有钱就没有人，要人就没有钱”。搬进楼房以后，我唯一的娱乐就是看电视，以看港台电视剧为主。中学时代正好是港台流行文化在大陆兴起和流行的阶段。而我的最爱是武侠片。常常幻想自己就是那武功盖世的英雄豪杰，能够救人于水火之中。我常常觉得自己有太重的英雄主义情结，包括后来去支教

⁷⁸，也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种英雄主义。而对于很多女孩子喜欢的言情小说和爱情片，我则不太感冒，甚至有些鄙视那种儿女情长。甚至到现在，更能打动我的都是对国家民族的付出或者为兄弟两肋插刀那种的。

在性别身份方面，几年前因为参加了社会性别工作坊，发现我原来从来没有意识到社会对性别的塑造对我有这样的影响，我回忆起：从小我妈就不断跟我强调，因为生了我这个女儿，家人都很失望，婆婆更是在产后只给她吃茄子，也不愿意照顾我。家里除了她没有人喜欢我。我是一个不受欢迎，没有人疼爱的孩子。所以，我一定要为她争这口气，证明我不比任何人差。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在中学时期，我很厌恶自己是女生这个事实，恨不得能变成男生，还经常跟同学说如果有下辈子，我一定要做男生。所以我更喜欢表现得勇敢、坚强、硬朗、果断，而讨厌那种柔弱、爱撒娇、哭闹的小女生性格。甚至厌恶言情小说这种感觉特别女性化的东西，而更喜欢看武侠、科幻、侦探故事。

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我做了十年的班长。从一开始，我就变成了学校里权威的一部分，并且这一部分角色对我的影响，比学习更深远。那时，我相信书本里的每一句话，相信老师的每一个教导，相信“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我将学校对学生的要求当作金科玉律一般，约束自己，也用来衡量别人。因为我相信，这便是我们在学校应当做的事。在学校，唯一的角色就是“班长”，是责任，甚至学习也是为了履行对国家、社会的责任。为了履行各种责任，内心的那个小孩的需求和感受从来都是被忽视的。到了上大学的时候，我觉得心好累好累。但是这段经历使我自信、独立、愿意承担责任，使我从一开始就会关心自身以外的事物，比如团体和环境，并且希望和乐于为它们的发展有所贡献。

我非常幸运，拥有很多能够在学校表现出色的天赋，比较善于考试，所以学习很是轻松，没有什么压力，我很轻易地就能够符合学校的各种要求，成为学校和老师眼中优秀的学生，所有学生的榜样。我很幸运地遇到不少很好的老师，在学习方面，虽没有获得太多在独立思考方面的启发，但也没有受到太多压制。学校也不是那种高压式的，相反，从小学到中学，学校都有不少社会活动，中学更是每年有科技节、艺术节，暑假还有外国志愿者举办的夏令营等。

⁷⁸支教指从城市到乡村进行教育支援。

我考入一所重点大学，修读法学。第一天上法律专业课，我就很失望。老师不太认真，他们忙着在外面接案子，一开始就把我的兴趣打破了，本来我是很有兴趣要做一个律师的，但是那种上课的方式，让我喜欢不起来，给你讲一堆概念，枯燥、无趣！（当然一个系总有几个好老师的，我们系也有。）而且老师打破了我原先的理想，他们说，在中国，律师打官司不是靠本事，是靠陪客人喝酒，跟法官打关系。老师一般不建议我们去做律师，尤其不建议女性去做。一般女性做律师基本上很吃亏，你都没法陪人家去各种场子玩什么之类的，现在中国司法系统也可能慢慢的会好一点，但是这个现象，至少在十年前是很严重的。

大三时，我们也有法律实习课。我们学校有一个弱者权利保护中心，是一个 NGO。我在那接了一个案子：一个妇女说丈夫虐待她，要跟丈夫离婚。后来我觉得那个妇女看起来是弱者，其实不是。但是这对律师来说是一个大忌，我有太强的是非判断的心，律师其实只干一件事情，就在现有法律条例下，为你的当事人争取最大的权益。这种事情我简直接受不了。

我们宿舍三个人，有一个很爱学习，整天泡图书馆，还有一个人是特别不爱学习，不去上课，每天在宿舍，然后我就属于既不爱去图书馆也不太爱上课，我喜欢参与社会活动。一般进大学的第一个方式就是学生会，这是比较主流的方式，我们那时没有现在那么多社团活动。所以我去学生会生活部，在食堂里监督别人垃圾分类，搞各种事情啊，还干过上电线杆修电话线的事。

因为校长办学理念很强调学生的自由和尊重别人的自由，所以我们学校特别开放和自由，大学四年没有人管我们。课程、活动相对来说很丰富，所以有很多机会接触不同的东西。我上专业课不太勤奋，但是喜欢上一些在同学看来特别奇怪的课，比如钢笔画呀、交响乐呀、摄影呀、素质拓展课。我当时特别喜欢的课是美国社会，每隔一堂就放一部美国电影，看《阿甘正传》，《费城故事⁷⁹》，分析这个议题。大学时，看不出我和同学有什么不一样，因为大家还是按照标准动作去做（比如考试）。之后我就走上了被同学认为很奇葩的道路。

⁷⁹《费城故事》讲述了一个艾滋病患者用法律维护自己权利/利益的故事，它被称为“好莱坞面对艾滋病”的影片。它标志着好莱坞不再逃避社会现实，而正式向泛滥美国的艾滋病宣战。

该片于 1993 年在美国上映。来源：<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37783/5063963.htm> 浏览时间：2015-7-26

大学有暑期社会实践的活动，提供一笔资金，组队申请。我参加过两次，都是同系的同学组队，邀我参加。第一次是去北京的福建村调查流动人口权利保护状况；第二次是去四川某贫困县调查当地妇女、儿童权利保护情况。这两次提议的女生都属于视野比较开阔，可能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也都是打算出国。我对国家大事没有很多了解，一直比较远离政治，跟她们一起去参加这些活动，也是想了解一些。

其实对这个四川贫困县的调查来说，我们都没太认真，半玩半调查去的。但是这个过程对我是很深刻的经历，之前我从来没跟同龄人一起出过远门。我们坐了36个小时的火车硬座，腿都肿了。然后又转车，又坐了24小时长途汽车，那是我第一次坐长途卧铺车。因为从来没有过这些经历，所以就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们带了学校的介绍信，去乡团委办公室，办公室的人收了我们从学校带的几麻袋捐赠的物资，还请我们吃了一顿松茸火锅，我觉得好腐败啊。到了村里，我们每天带着两包砖茶，去人家家里做访谈。问一堆问题，其实挺傻。别人说的啥我不记得，问的啥我也不记得，到底调查了啥我也不记得（笑）。

唯一记得深刻就是遇到Q了。那天去完团委，我们包的车把我们送回村子的路上，大雨中，车子被一个人拦下来，想搭顺风车，四周黑漆漆的，他穿件大雨衣。上车之后就开始自我介绍，说他是从上海到这里的某助学组织的志愿者，现在在做扶贫。我觉得很神奇，当时从来没有听说过还有人可以不“工作”，专门调查别人谁家贫困，然后给钱。和他的相遇很短，就十几、二十分钟，但那一幕印象深刻。包车司机一路上跟我们介绍，说现在学校不缺硬件，但缺老师。这话印在脑子里面，我有一种愧疚感，刺痛了我这个一直以给山区小女孩捐钱为荣的人的自尊心。于是，一颗想去支教的种子就这么萌芽了。

说实话，我印象特别深刻，在我决定去乡村支教一年的那一天，就是那么一刻的决定。当时我正申请去英国读管理硕士，我有一个愿望是做娱乐业经理，因为我挺爱看娱乐八卦，看TVB。大四毕业前的一天，我坐在寝室抱怨，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去读这个专业，觉得未来很迷茫，好像就是为了出国而出国。就在大四毕业前那一刻，突然就想为什么要去做这个事儿。那天正好有个找我取经出国申请经验的师弟坐在那，说，“那你就去做志愿者吧！”我当时

一听，就觉得，“嗯？这个主意不错！”，所以就决定了去做一年志愿者。它相当于一个逗号，或者说是一个休止符，让你停下你并不清楚为什么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一个 gap year，（很兴奋的语气）其实我当年就需要一个 gap year，但当时没有那个词。当你不清楚为什么走这条路的时候，你需要停下来，但是你需要一个正当的理由。所以做志愿者突然成为一个合理的理由，并且还是一个（停顿）挺有意义的理由。其实说实话，不管去做什么，我不在乎。我最需要的是有一年停下来。但是虽然是那么一个时刻的拍脑袋出来的，但是前面有孕育过程：我大学时资助过农村小女孩，也有做家教，还去过贫困山区，听过“这个地方缺的其实不是钱，缺的是老师”的话。遇到过像 Q 这么一个人，志愿者在脑子里隐隐约约是有一个样子的。这些东西在很短时间全部冒出来，让我觉得，是的，我就去做这个事情，让我的人生重新来过。所以我之后的发展道路就跟其他人不一样了。

于是我参加了一个官方举办的支教项目，去西部贫困县开始了一年的全职支教经历。。这一年给我带来更多的是心灵层面的东西、做事情的最重要的原点。支教已经结束十年了，但那个经历和那段感受无数次地出现在我的心里，是我内心做事情的重要动力。它解释了我为什么现在做这些事情，是因为我真的在那个地方生活过，也接触过这样一些孩子。它改变了我跟人之间的联系。说实话，我的家庭和农民工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去，但是我看农民工子女，或者一些年轻人，我能感受跟他们是有一点联系的。因为我的学生现在可能就在做这些事情；支教回来之后，遇到打工的人，本来以前跟他可能是陌生的，但是因为支教之后，会想他可能就是学生的家长，顿时就跟他有联系了。

那次支教的经历让我看到支教活动本身对一个年轻志愿者的改变，让我对于这种青年人的工作的价值非常认同。过去那么久了，支教的场景都还在眼前，包括学生在田里烤红薯、唱歌，我教他们英文歌或者哪个同学偷了钱跑过来跟我认错，那个场景记得很清楚。记得清楚可能是因为那是一段很特别的经历。那是我第一次在农村生活。而且我真的在那个经历里面付出了非常多的心血。那时候生活很简单，就是去想怎么教好这些学生，每天都在想这个问题，花了很多心思。也可能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真正地接触社会的现实，然后去想社会问题，这是一个开始。

说实话中间也有很多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办。教小朋友也没有那么容易。我本来是带着英雄主义情节去帮助别人，结果发现其实你做不了什么，你能改变的非常少，你改变个孩子都已经这么困难。当你把理想付诸现实的时候，第一次开始看到现实和理想的差距，然后你开始了解到底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到底我是谁。那时候可能是一个开始挖掘自我身份的时候。你肯定会想这个问题，因为在那之前你很简单——大学生，有知识、有能力，未来就是报效社会之类的。但是去了之后发现，大学生，其实在农村什么用也没有。地也不会种，你要帮人发财致富，也不可能的。就光教学生你还把人教不明白，你跟他讲半天他不明白为什么 $2+2=4$ 。就是这个过程，开始重新让你去思考你是谁吧。你就会发现，你不是来改变他们的，你是来这被改变的。当你过了那个迷茫期，接受这个现实之后，你反倒开始有更多能量，做更多事情。然后我们才开始在教学之外尝试做很多别的事情，包括去做家访，热火朝天地干了一个学期。一年结束，其实我给那里的孩子带去的很有限，但她们带给我的财富却让我受用终身。是他们让我放下了那种高高在上的施予的心态。

这段支教经历让我认识了一个助学组织，我开始做助学，于是开始想更多的问题。当你做更多的事情，你就会想更多的问题。在支教的时候我们只想怎么把学生教好，结束了之后你就想怎么帮助他们更好地上学，包括给他们资助，给学生写信。渐渐地，我的位置开始变化，我开始思考这个组织怎么发展，这个组织怎样能更好地做事情，怎样的结构是更好，怎样可以帮助更多的孩子。开始思考这些问题，把我引向了不同的路，所以最后就把我领到了永绿——做 NGO 支持的团体——开始全职工作。

结束一年的乡村支教后，我到了北京，先后在 NGO 能力建设、青年培训的机构工作。我一直感激公益圈，提供另外一种可能性，大概是探讨人的成长最多的行业了。工作了十年，跟自己比的话，最明显的变化是比十年前成熟很多，但是跟同辈的同学比，却又单纯许多。这种“单纯”，便是公益领域给我的礼物。因为这个领域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有一些桃花源的意味，少了许多世俗利益、明争暗斗，人与人相处要简单一点，做事讲“心”的人还是多过讲“利”的人。不论这个领域是不是越来越纷繁复杂、鱼目混杂，但至少有一条是没有人敢否认的，那就是每个机构、每件事情，都是因其使命而存在的。真诚和善良在这个

领域仍然是非常被认可的价值观。所以在这样的环境里生存，让我保存了很多对人、对事的信任，以及一份安全感。

另外一点比较显著的变化是自我价值观的形成。人在小时候，主要还是依靠外在的规则和价值观来评价事情，尤其是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下，并不鼓励人形成自己的价值观。严重点说，实际上很多中国的青年人从来没有真正变成一个有自己价值判断的成年人。大多数人没有自己的价值评价体系，所以只能依靠社会主流的价值观来判断自己以及别人。然而，在这个价值观至上的公益领域（先不管这事儿是好是坏，也许有时候它因为太过看重价值观而缺乏了对效果的关注也不是件好事，但这仍然是这个领域的主流），我有更多的机会去反思自己，以及了解和接触种种不同的价值体系。这些机会开阔了我的眼界，让我有更多机会见到不同，也有更多的机会反思这个社会的运行机制，没有哪个行业比公益行业更关注这个社会的系统以及规则了。所有这些，让我有机会慢慢在过程中，形成和建立了自己的价值体系。在这个领域里你接触的很多事情，包括你看的书，你碰到的人，比如你碰到特别多穿棉麻和吃素的人，好像几率比较高一些，会让你重新去构建你的价值体系，所以表现出来可能是你的生活方式的不一样。在以前，我是否定以钱来衡量东西和人，但是却没有建立起对事情的价值判断。我觉得这些年在这个领域的熏陶，包括和莲花机构的合作，也包括相关的阅读和思考，已经逐步建立了我自己对于价值的理解和看法，因为你很确定，你就不会那么地纠结和看重别人对这个事情的看法。首先什么是有价值的，应该我自己来判断，我不认可别人给我的任何判断。比如我妈经常批评我，为什么穿得这么土的样子啊？变得不像以前那么爱打扮。但是我会认为，这因为我有自己的判断，一个是什么是美？首先我不认为变成她那样子是美。我不可能因为你认为那个美，我就要认为那个就是美，如果你觉得那个是美，但是对不起，我不觉得那个是美，所以现在说我有自己的一个价值判断的。（笑）这个是慢慢在这个过程里面去形成的。我有自己看待成功和美的标准，它们并不为别人眼里的美和成功的标准所影响，所以，我也会按照我自己看待成功和美的标准去生活，而心无焦虑。当我同辈的同学见到我的状态时，尽管他们的经济收入比我高，职业背景看起来更有 power，但他们会告诉我，我才是“精英”，是精神上的精英（但我自己并不喜欢精英这样的标签）。

我对什么东西是有价值的,有我的判断。如果我有有限的钱,首先我觉得最珍贵的是我的时间,所以我不会把我的时间用于去换成钱。我要用我的时间去做我认为有意思的事情。我认为更有价值的是,投资在出去玩、或者是去体验一些新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就是形成我自己的价值观,我觉得这个是NGO起到重要作用的。我对事物价值的判断的和很多人就会不一样,但是我接受冲突,因为我有自己的价值观,如果你没有自己的价值观,你就会别人不认同你或者你跟别人达不到那个期望,感到自卑、难受,但是我就觉得我没有、在这点上我很清楚。

比如说可能我同学、或者亲戚有豪宅之类的,我一点点自卑的感觉都没有,我不认为那个东西重要,所以坐劳斯莱斯和坐一个普通的车,我看不到它们之间的差异,因为那个对我来说不重要。

我主要是通过不断地自我寻找去确立价值观,当你越确定的时候,你越清楚你内心的规则,那你就不会有冲突。我认识很多在NGO工作的青年人,他们的痛苦就来源于他可能认可的是那种价值观,但是现实的条件让他达不到,他就会痛苦,可能会觉得自己比别人差,比别人弱了,但是如果当你真正的、确立了一个不一样价值观的时候,你就不会有那种比较了。

价值观上的影响,肯定是莲花给我带来更多,而且提高了思考、学习能力,比如和她们的合作让我对发展、消费主义有了很多反思,而且因为做青年人工作,也引发了我对人到底是什么、人存在的意义的思考。因为本身做的是人的工作,要不断地去想这个问题。比如我当时就开始思考,到底我们为什么做人的工作,希望青年人成长成什么样子。那两年的合作,让我从一个完全目标导向的人,开始关注过程、关注人、关注成长。因为和莲花的合作,我每年都有机会参加莲花提供的培训,有些在中国,有些在海外。2012年底,我参加了莲花邀请的泰国培训师的自我觉察和社会转型工作坊。这个培训让我意识到文化的重要性、关注内心发展的重要性。我反思到,我们除了要改变现在的制度,也许要改变的还有文化。培训的过程,我觉得自己在主动学习,整个过程是平等开放的,我从每一位同伴那里学习,协作者也跟我们一起学习,完全没有知识的权威的感觉。整个工作坊营造出一种对人和自然充满了尊重的氛围,使过程和目的保持了一致。后来也去泰国参加过学习活动,去了很多地方,见了很多人,有

很多新的体验，但是其中很多东西，用语言文字不能描述得清楚。其中也有个培训活动，让我对自己有了一些梳理，比如我在回顾过去一年的身体、心灵、头脑、社会等方面的发展情况，制定了一个身心灵和谐一致的发展目标。培训也帮助我对成长的“根”有了一些新的理解。记得以前我曾经用一朵云介绍自己，觉得四处漂泊、没有根。现在我似乎找到了自己该从何处寻找自己的根。另外学到一个新词“Kanlayanamit”——“心灵的朋友”，我很喜欢这个词。以前我特别在意独立自主，个人的自由，但渐渐的会发现，人和人之间，人和自然之间，那种千丝万缕的联系与互动，实在是非常美妙。甚至也幻想着能有一天，能和kanlayanamit们，组成一个共生的社区，在心灵的交流之外，也能互相照顾，有生活的交集。

第三点我想说的，是这个领域带给我一种无穷无尽的学习的动力，它们已经成为了我生命的动力。我们每天所面对的社会问题的挑战，我想是要大过如何让消费者掏钱的。所以在这个领域生存，你必须要有极强的学习能力，不断地学习新知识，这些不断出现的挑战，激发了人的生命动能，让你无法懈怠。十年来，我觉得几乎没有重复劳作的机会，所以有些时候，还挺希望能够干一点不动脑子重复劳动的事情休息一下大脑的。

最后一点想说的，是“使命感”。也许现在这个领域比十年前要纷繁复杂许多，不排除也有很多沽名钓誉的人和事。但是，这里大概仍然是这个社会上使命感最聚集的地方。至少我这十年来，遇到过让我尊敬和感动的人和事已经太多太多。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长久的浸泡，确实带给了我很大的激励，尤其是在觉得无力的时候。在这个社会上，大多数人都是有无力感的，我也有，每天面对那么多的社会问题，那永远也无解的贫困和不公、以及那双看不见的手，作为个人，我是如此的渺小和无力，我们想要的系统性变革，其实还遥遥无期。但是，看见有伙伴在行动，我会更坚定，无论这个世界是否真的在变得更加美好，我也要努力尝试一把，这样才不枉来这世界一遭。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在出国读书的时候，当时的几个好朋友都是政府官员，他们常在一起抱怨政府的黑暗和社会的问题。跟他们在一起，我会觉得充满了负能量和无力感。而一回到国内，见到在 NGO 的朋友，大家讨论社会问题之后，紧跟着就是想，我们可以怎么做。瞬间，我觉得人就正常起来了，感觉回到了我的圈子，又重新充满了能

量。我觉得这便是公益领域带给我的影响。

但是，如果我们说NGO有一个教育功能的话，那么首先它不一定是一个完全正向的。进入NGO之后，我学习了很多话语，但未必会使用，比如公民社会、参与式。去国外读书时，才有了一些系统学习。NGO有时候像一个温室，会让一些人在里面可能更加难以抵抗外部的一些困难。另外，2008年之后，“公益”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你就“真的”分不清里面的真真假假，我不知道这些东西是“真的”在为这个世界带来好的改变？当这些人看到干这个也可以赚钱，都来干这个的时候，我们的世界到底是变得更好了吗？我们拥有了更多的资源投向教育呢？还是让我们更分不清这个世界的真真假假了？所以我就也不知道了……很复杂。而且现在“公益”里面有很多企业里的那些价值观，效率、专业、分工、跨界等等。也不是说这些不好，只是觉得有时候搞不清楚。

子康

女，1981年出生于北方某大都市，中专毕业后开始工作，现正在攻读硕士学位。她在NGO中工作超过10年。我于2007年左右曾经在一次NGO研讨会里认识她，2009年之后我参加“大地”网络内活动较多，其中一些回顾个人历史的活动中，我和子康被分在一组，因此有更进一步的互相了解。之后有频繁的互动和交流，关系较为亲密。

我受原生家庭影响很大。我妈很善良，会照顾人。我爸暴躁、自我为中心，不负责任，但本性是好的。我觉得爸妈的关系是悲剧的。从小到大看父母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体验很多，他们吵架的时候我很恐惧。从小看着妈妈流泪，忍让、妥协、受很多委屈，也让我特别同情。这个经验让我长大后对关系里的弱者，有自觉的同情。因为家庭的经验，我没有安全感，在陌生环境中比较紧张，没办法真实表达自己。长大之后觉得我的童年，特别悲惨；提到家庭的时候，也觉得昏暗。

我的学习成绩属于中等。既不是特别聪明、一点就通的学生，也不是特别努力的学生。而且我们家也不是特别喜欢看书的家庭，没有书，所以作文也写得不好。父母对我的学习也没什么期待。我从来没觉得上学有意思。但我觉得在

学校里跟朋友一起玩挺有意思的。如果学习成绩好，可能比较能得到老师的认可。但是，学习成本也比较大，我也不是特喜欢学习，背那些东西也觉得挺烦的。而且也没人告诉我为什么要学习。上学时，我跟一些同龄人不太一样：那时一直都是有一点正义感的，在觉得自己有资源的时候可以对抗一下。上初中的时候就会替那些学习不好的、被老师不喜欢的同学打抱不平，会和一些同学直接找班主任，提出抗议。

我本来就不是特别爱学习，所以没上高中。当然这也和经济条件有关。我爸身体不好，做过心脏手术，那时医疗改革刚开始，个人负担的部分挺大的，一些进口药都是要自费。对一个工薪家庭来说是一笔很大的开支。而且我们家分配的房子好像在那几年也没有消息。总而言之，我隐隐约约觉得家里头经济压力挺大的，觉得要是能早一点工作，能够赚点钱也挺好的。当然现在想来有点不得已。但当时我觉得早点工作也不错，反正上大学也没有特别大的吸引力，大学是什么样的，我也没怎么想过。没有读高中，也是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教育改革，大学不再公费了，要自己花钱。我爸觉得如果上大学，学费的压力是特别大，因为上中专的费用都改成这样了，就觉得大学肯定更贵。但我觉得工人阶级的视野就是这样的，见识是有局限的。他没有意识到当时是一个社会剧烈转型的时期，他过去的很多的规则在这个时期已经都不管用了。他不是特别能够意识到这么多的孩子在未来就业的时候竞争压力会非常大的，而学历是很重要的一块。教育制度不断地在我的身上改，我上到中专三年级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个制度出来了，高考开放了，都可以考，或者可以考到高职⁸⁰去。但确实高职的学费也是挺高的，那个时候我妈琢磨了一下也觉得还是直接先工作吧，就工作了。

但觉得我的命还挺好的，如果我不按这么走，也不一定这些事情都是我的。因为我中专毕业后，工作比较早，然后很快就去 NGO 工作了，也去了很多地方学习。那时我才 21 岁。21 岁对于同龄的人来说还在大学没毕业呢，而且那时大学也不太有社会实践之类的，就更不用说到民间组织社会实践了。

上中专，我开始思考这个社会为什么会变得这么坏，这跟中专班主任也有关系。因为我们是中专，出去马上就要工作的，所以班主任有时候会给我们讲社

⁸⁰ 指专科层次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包括职业技术学院和高等专科学校。

会上的事。然后那个年纪，正好也开始看《读者》，喜欢听广播，或者看点小说。像《读者》有时候传递的那种正向的价值观、道德感对我还挺有影响的。所以那时候我也很苦恼，比如我回家的路上，看见一个家长带着孩子骑车，停在那等红灯的时候，吐了口痰，他小孩也紧跟着在后面吐口痰，这时我就觉得，唉，这简直就是教育的失败。

1999年，我19岁，中专毕业，去了一家物业公司工作。做很简单的工作，比较无聊。当时想，难道我就是要一直做这些事情吗？觉得年轻的时候浪费时间，没有意义，于是抱怨。那时候觉得同事们也挺悲剧的，那种生活的状态没有意义，好像人做事就是为了挣一个工资糊口，其实也没有什么事干，每天就看报纸、看电视、侃大山，是特别散的状态。上班有很多时间看各种报纸。印象很深的是《北京青年报》报道四川都江堰要修紫平铺水坝，是一个钓鱼工程⁸¹，官商勾结。看了这个报道，我对自己、对这个社会都产生了质疑。郁闷、没有心理出口。

2000年我买了电脑和猫⁸²，开始上网。有个同学在中关村工作，属于接触外面新的东西比较快的人，有一次看见他上QQ，觉得这个还挺好玩，挺新鲜嘛。自己有工资，赚了点钱，也找父母要了些钱买了电脑。有自己的收入和自己有多一点选择是有关系的。认识了些网友，关系特别好的打电话、写信。那时喜欢认识新鲜的人，你说现在让我去在QQ上加一个好友，我才不加呢。因为开始工作，可以赚钱，买一些书。我的父母不看书，也不给我买书。读和社会有关的书，是1999年之后。因为有了互联网，交了一些网友，他们多是大学生或大学毕业，会推荐书目给我，我就找来看，补充了应该在大学读的书。因为读了这些书，我对社会公平、公正有了一些坚持。

一个机缘巧合的机会，接触了绿水。我那时候在电视上好像看到绿色光环保组织M先生的访谈，因为能上网了，就去网上查了一下绿色光，网站上可以订电子通讯，通讯留的联系QQ就是绿水的创始人芝士的QQ，便加了他。芝士在QQ上和我谈，“既然你有这么多郁闷，你不应该做点什么吗？”。从来没有人提醒我或者我没有意识到，我是可以做点什么的。当时听到这句话时，一

⁸¹ 钓鱼工程指，在决策阶段，被描述成造价低、见效快，但在实际建设过程中，不断变更资金预算，最终不得不追加投资。这里的超出预算，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也包括工程对于环境、生态、历史等造成的损失也未在决策阶段被充分考虑。

⁸² 早期用电话线上网的工具。

方面觉得自己受到挑战，另一方面觉得她说的也对。所以绿水有活动的时候，我就很高兴地去了。遇到绿水真是一件很走运的事情。如果把接触 NGO、公益比喻成一个感情，我和绿水的关系就像初恋一样，很真诚，单纯。因为也是志愿者团体，大家的关系特别平等。和绿水的人在一起很有意思。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大家年龄差不多，又有关注环境这个相对共同的身份——这个身份不是为了挣钱赚工资。我没有上过大学，跟绿水这些小伙伴在一起虽然没干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儿，但是这个经历其实弥补了我没参加过大学社团的缺失，这个在相对更自由的空间里面去形成社群网络的功能。之所以说是一个社群，是大家想做事儿。大家也经常在网上论坛上发帖、讨论、聊天，既可以说跟环境有关的事，又可以写一些跟自己的生活、心情有关的事，是一个年轻人做的论坛，比较开放的、表达的空间。而且那个论坛上也有很多信息。我第一次去农村就是跟着绿水的人去了一个他们长期支持、种树的农民那。我那时没有接触过三农问题，觉得农村是一个特别童话、浪漫的地儿。但在那第一次上了农村的厕所，就被打击了，哎呀，那个厕所跟我想象的乡间田园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一个城市女孩慢慢地拓宽以前没有经历的过程。

大家一起做志愿者的时候，在真实的行动里面有很多认识。我比较欣赏的一点是，最开始做环保的志愿者都比较强调自己行为的变化。比如说很深地打动我的是第一次参加绿水的活动，中午吃饭时，十来个人坐满了一个圆桌，除了我之外所有的人都拿了一双自带的筷子，那个冲击力特别大。你想，所有人都齐刷刷地拿出一双筷子。我当时就觉得特别好，马上就搞上一双，很长时间都带着。我是挺受感召的，因为我们常说从自己做起呀。

当时对绿水的权力关系也有些不满，就和其他志愿者启动一些讨论，一起做策略规划，在这段关系中学习到了很多。虽然这个组织现在没了，但是我很感谢它。如果没有绿水，没有这些年轻人，特别开放，特别平等……包括创始人田野本人的特点也是特别主动的支持和陪伴年轻人更深入地走到群里里面，可能我的人生就完全是不一样的了。所以我特别感谢绿水，或者说我觉得自己特别走运，在那个时期能遇到这些特别可爱的人。他们一起陪我经历像学生社团的那个过程，搞出一点事儿，让我开始认识这个社会。虽然不是特别深，但是起码也是最初级的体验了。而且那个时候觉得像田野和芝士，年龄还是比

我要大一些，有社会经验，而且比较开放，不像后来的一些自治组织封闭性特别强。

我当时还参加过绿色光的会员大会，他们从德国考察回来做分享，我带着一个网友去参加。我坐在后面，听考察的那些老师讲德国的环境教育，德国的动物园是怎么设计的。然后结束之后我就把会费交了。去参加就因为好奇嘛，这跟好多年轻人要参加社团是一样的，就是在那个年龄段就想给自己找一个事儿干。我那个时候对环境还是有点感兴趣的。我有正义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我看到建水坝的事儿，就会觉得愤怒和不合理。

选择 NGO，其实有点误打误撞。在我那段特殊的自我成长很困惑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觉得和现在很多年轻人来比，我真的是特别走运。我不像他们，有很明确的目标，或者特别向往公民社会，因此积极主动的选择了这个行业。我那时候还是比较被动的（懵懵懂懂地、不是特别有意识地选择）。反正也是缘分吧。我觉得最后能进这家机构全职工作跟我在绿水做志愿者是有关系的。因为那时候真正有做志愿者经历的人其实特别少，不像现在很多人都有的。我反正总要想找一个事儿，那时早已经从物业公司辞职了，这个工作比再找一个物业公司更有趣吧。既有意思也有意义。它不是一个僵化的没事干的事。我不是为了拿工资才做事的，多多少少还是有想去看那个问题到底是什么，看看这么做到底是不是最有效的。其实那段生命阶段的状态是不满足、纠结和饥渴的，互联网是一个工具嘛，它帮助我获得更丰富的信息。包括后面遇到的这些人、团体就是在回应我自己苦难的生命啊。

公益对我的改变是什么？如果不做公益，去了小企业，对我也会有改变啊，会变得更加现实、无奈……一个人毕业后，开始工作，都会有一些成长，不管在哪个领域。公益对我来说是一个自我疗愈的过程。它对我的改变，主要集中在对我的自我意识、自我接纳和对社会的想象方面，一个是我和我，一个是我和社会这两方面的想象，特别有改变。

之前，我和我的关系，有一点幼稚。我会有很多自卑、不接纳的情况。因为在这个群里，大家都很开放，对年轻人有支持、包容，对弱势的人，是一个特别好的自我转化的过程。我开始知道自己是谁，看到自己的不足，自己的不安，看到、理解、甚至接纳自己。比不完全认识自己要好很多。

2003年开始我在环保组织绿色光工作了七年，之后在莲花组织工作三年半。人和自己的关系是因为在莲花工作，有很多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思考，接触泰国老师，接触自我觉察的学习、“生态之家”的学习，让我有了这样的变化。还有工作同事和合作伙伴网络对我的陪伴和支持，虽然这个网络的支持不是特别实在的，但是也确实促成很多伙伴之间打开心扉，帮助我进行了自我认识、自我接纳。

对社会想象，不同阶段有很多变化。进入绿色光到2004年之前，看到环境破坏的事件太多了，我坚持地认为，所有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人本身的自私和欲望的驱使。后来有段时间我相信，科技可能解决问题，但是觉得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实现这样的技术，最后还是死路一条。所有的事情，从最终的结果来看没有意义。后来能学到的东西越来越少。绿色光的目标、策略都不太清晰。当时觉得在耗着，生命中进入了很绝望的时期，当时来了一些新同事，他们穿着光鲜，于是我也开始靠买漂亮衣服给自己带来愉悦感，填补那种苦闷。

后来进了莲花，开了一扇窗，让我重新反思，那个结果不是重要的，而是当下，我们在做什么，在做的时候反思我们的做法是不是最聪明的办法。刚进入莲花的时候，参加团队活动，做了一些“我和自然在一起”的活动，摸一棵树什么的，觉得挺幼稚的，因为这些都是我20岁的时候都给小孩子带的活动。后来经历了一些过程，我才意识到这些活动的含义。公益对我的改变，在工作、实践中的改变还挺关键的。

在聆听、反复阅读对话人的生命故事时，我常常从每一个故事中看到部分的自己；这些故事于我反身自己的生命经历、找寻未来的人生路有着良多启发和力量。我看到生命的力量，不断地向上生长，各种生命的际遇——不管是正面的资源还是痛苦——都可能成为“自我”转变的沃土。生命之河，在今时今日回看，又是充满了各种偶然性的，因故事的“主角”与环境的不断互动而发生“自我”的不同发展走向。而这转变又是在既有不同又有相似的各种脉络下发生的：比如，他们共享着相似的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巨大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和教育的转变的脉络；他们也共享着1990年代以来开始迅速发展的NGO的脉络等，这令他们进入NGO这一形意世界成为可能；不同的NGO的组织文化和操作

也带来了不同的“自我”转变。进入 NGO 全职工作之后，这些工作者获得了自我认识，也增加了对社会的认识和参与，然而其中也经历着沮丧、挫折、自我怀疑、经济上的压力等等。希望通过这 5 个生命故事的展开，读者可以体会 NGO 工作者的“自我”转变过程中充满着各种生命经验、纠结、希望等复杂的情感。

下面的第五、六、七三章将聚焦于本研究的主要发现，其中的分析部分将经常参照、引用本章的叙事。希望这一章的 5 个叙事有助于读者理解下面三章的主要分析。希望美凤、文衷、水仙、钰晶和子康的生命故事有助于我们谨记本研究中的其他对话人也有他们的各自的生命故事，本研究的主要发现也是关于“真实”的人、“真实”的生活以及复杂的生活经验。

第五章

1980 和 1990 年代之脉络在 NGO 工作者的“自我”中的沉淀

正如第二章所言，形意世界充满着权力关系，人的位置影响其是否可能进入某一形意世界以及是否可能全然进入其中并学习（Holland 等，1998:41）。同时，在形意世界之中发生的人的“自我”的试验性发展并非随心所欲，而需在其过去的 H-I-P 的基础上进行改写，既以之为资源，同时亦受其限制。本研究发现，NGO 工作者是否可能进入 NGO 形意世界、以及多大程度上进入其中发生“自我”改变亦与其 H-I-P 有关。因此本章将主要描述和分析，在接触 NGO 形意世界之前，NGO 工作者在 1980 和 1990 年代的社会脉络下形成了怎样的“自我”，作为后文进一步讨论其如何进入 NGO 形意世界、如何在其中经历（不）转变以及经历了哪些（不）转变的基础。

需要留意的是，本章所提出的诸主题是根据对话人的回忆进行分析而得，他们特别选择叙述在他们看来与其参加 NGO 工作有关的儿时经历以及那些与其进入 NGO 后所逐渐形成的“自我”明显不同的价值观和行为部分，换言之，这是他们带着今时今日、进入 NGO 工作之后的视野回看的过往经历，而并非是儿时经历的“客观”和多面向的叙述。经过对 10 位对话人的访谈材料的分析，我看到这些“80 后”NGO 工作者的 H-I-P 带有较强的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改革开放后的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烙印：对金钱和权力的体验参与塑造着其压抑的感受及向往成功者的文化和城市生活的意识，中小学的应试教育参与形塑了其竞争主义、较弱的社会意识和参与，以及窄化的性别文化形塑的性别观念、行为和情感；另一方面，伴随着改革开放，社会空间的扩大和媒体的兴起，“80 后”也受到普及文化的影响，其中的善恶观、英雄主义结合中小学中的“社会主义”道德、责任感教育等也一定程度地沉淀于其 H-I-P。正是带着这样的 H-I-P，他们在未来有可能进入 NGO 形意世界并且以之与在这一世界中接触的新的文化资源进行即兴和互动，以进一步不断地改写着“自我”。这些 NGO 工作者的儿时经历和同龄人共享着相似的时代脉络，有着相似的“自我”，而之所以后来发生了“自我”的转变，与他们进入 NGO 的形意世界有关，这将在第六、七章展开。

透过分析发现，本研究中的对话人中多数来自社会基层家庭⁸³。2 位出身于教师、公务员、医生家庭，其他对话人的家庭出身多以农民、工人为主，但是随着市场改革，有 2 位对话人的父母开始经商使得家庭成为小康之家。对话人多数出身于乡村和县城（7 位），2 位出身于小城市，1 位出身于大城市。总的来看，在本研究的对话人中没有官二代和较为显赫的富二代。

对话人背景情况一览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代	出身乡镇/城市	父母阶层（双方，除非注明）	学历
文衷	男	80 年代中	村	农民，后打工	重点大学毕业，后硕士毕业
水仙	男	80 年代初	村	父：村官；母：农民	重点大学毕业
雪莲	女	80 年代中	村	本为小学老师，后国内移民，成为农民	重点大学毕业
乐晏	女	80 年代初	村	农民	一般大学毕业，后硕士毕业
美凤	女	80 年代初	镇	父：半国有企业工作，后创业；母：农民	一般大学毕业；现硕士在读
马田	男	80 年代初	镇	事业单位	一般大学毕业，硕士中途退学
火客	男	80 年代初	县	父：公务员；母：农民	重点大学毕业
童淼	女	80 年代初	中小城市	父：事业单位；母：中小学教师	一般大学毕业
钰晶	女	80 年代初	中小城市	工人，后创业	重点大学毕业；后海外硕士毕业
子康	女	80 年代初	大城市	工人	中专毕业；现硕士在读

⁸³ 这是本研究呈现出的出身阶层状况，未必代表整体的“80 后”NGO 工作者的阶层出身，鲜见这方面的研究，有待于日后研究的补充。

本章将结合第四章的五位对话人的生命故事,并结合引用另外五位对话人的故事,置于1980和1990年代的社会文化脉络下,尝试归纳和分析他们在1980和1990年代下成长故事和“自我”的共性之处。

一、 金钱、权力和离乡进城日益渗透进日常生活之中,成为组织生活和情感的主要力量之一

198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0年代之后,中国进入剧烈的社会转型期。以效率为中心的改革逐渐开展(汪晖,2000:11)。1980年初改革主要集中在农村,通过启动农村大包干,政府急于摆脱财政危机,甩去农村公共管理和农民福利保障的责任(温铁军,2013:94)。而同一时期在城市开始的企业改革带来了大量国有资产“合法的”和非法地转化为少数人的经济利益,中间发生大量的腐败(汪晖,2001:10-11)。经历89年社会运动后,中国进入了更加激进的市场化阶段(汪晖,2001)。1994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加快速度的市场深化和金融深化的经济改革等“全面改革”阶段。全面改革还包括两大政府退出:退出国企,直接推行“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的国有资产市场化改革;“退出”公共福利,直接推进职工住房市场化,教育、医疗产业化(温铁军2013:81)。而这些在城市进行的市场改革和私有化是在规则不平等的状况下的社会财富——特别是国有资产——的再分配,带来了社会不平等(汪晖,2000:12-13)。在这样的背景下,1990年代见证了工人失业下岗、工人群体的经济地位下降、雇工利益被动化、老弱病残孕等职工利益失去保障、社会贫富不均显著拉大、城乡不平等加剧、制度性的和日益国际化的腐败、人口大量流动、环境危机、消费主义逐渐盛行,政府官员形成新的资本阶级的时期(Rofel,2007;汪晖2001)。社会出现了“新富人”阶层,他们与官僚体制有着密切关系,在中小城市和乡村,“新富人”与官员毫不掩饰地互相支持、融合(王晓明,2000)。改革建立了以创造利润为准则的新的经济秩序,不考虑物质生活改善之外的事情——政治民主、环境保护、伦理建设和文化教育(王晓明,2000)。

因此这一时期,无论城市和乡村,无论政府还是市民、农民,都越来越进入

或者被卷入商品化、货币化、谋求经济发展的逻辑中；同时，贫富差距、城乡差距、阶层差距开始慢慢显现，出现了新富阶层。

然而，国家和企业精心创造的市场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事件，更是一个社会过程——最终要用市场法则规划整个社会生活（汪晖，2000：3）。“发展是硬道理”等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也在逐渐进入社会生活。政府通过宣传、教育体系推广“发展才是硬道理”、“一部分先富起来”等理念，这正是发展主义的文化。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认为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的信念”（许宝强，2001:1）。1990年代中期以来，将发展窄化地理解为经济增长，而忽略其与政治自由、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成为了强势的话语体系和意识形态，渗透在中国社会各个方面——包括国家政策、知识分子的思想实践和媒体的价值取向——并且具有强大的支配力量（汪晖，2001：3-4，44，49）。与汪晖提到的新自由主义文化所指相似，王晓明（2000）认为1990年代开始形成了“新意识形态”——填补了毛泽东式的官方意识形态——主导着社会的一般精神生活，具体包括：1)宣称中国重新走上“现代化”之路；2)眼前物质利益是最重要的，这是“发展”和“进步”，不需要被质疑；3)无论阶层、地区、政治、文化差异，所有人都正在一起奔向“小康”，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得“成功”；4)无视“精神自由”、“公民权利”、民众生活保障、国家对社会的责任、权力——资本集团对社会的掠夺（王晓明，2000）。“成功人士”形象就是这一新意识形态的代表，与社会阶层的“新富人”一起产生，互相建构，通过传媒和商业广告，从东南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向全国辐射。

在这样的发展主义、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统识操作下，不难理解对话人的成长背景中为什么对金钱和权力有如此深的记忆，穿透在情感之中——无论是为金钱、权力所困扰，还是享受相对富裕的物质生活。而对于来自乡村以及城市底层家庭的青年来说，对贫富分化的感受以及要逃离乡村的欲望、成为“成功人士”也成为了其青少年时期的“自我”的重要部分。

10位被访者中有8位较多地提到与金钱有关的叙述，其中7位的叙述带有负面、压抑、自卑、痛苦的情感，亦有1位对话人则提到因为家庭经济条件优越而享受物质丰富的童年和青少年。如果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因金钱而感到压

抑、痛苦的对话人，其家庭多处于阶级或城乡相对弱势的位置：一般来自乡村或移民外地的家庭背景以及城市工人阶级家庭（尤其是患病）背景等的对话人更容易感受到经济上的压力，比如文衷、美凤、水仙和子康，以及雪莲、乐晏等。然而，钰晶是例外，虽然其家庭因做生意而物质丰富，然而也因为父母忙于赚钱忽略了家庭生活，因而她将家庭不幸福归因于金钱，产生了憎恶金钱的态度。没有对金钱产生压抑、憎恶情感的三位对话人分别是童淼、火客和马田，他们的共性是，其父母或者一方从事在政府或者事业单位稳定的工作且没有患有重病的家庭成员。在政府或者事业单位工作，一般拥有较稳定的经济、文化资本等，既不需要面临低收入或者收入不稳定，也不需要为了赚钱花费多数精力而忽视家庭、子女教育等。这也显示了政府和事业单位的工作，有助于提供人的再生产以较稳定的物质和精神条件。

出身于经济条件较为弱势的家庭，通常会令对话人认为金钱非常重要，萌生长大之后要赚钱的愿望。然而，这种对金钱的负面感受，有不同的成因：比如，有一些情况下是其家庭绝对收入偏低且社会保障较少，比如父母要为子女的中小学甚至大学学费四处打工挣钱或借钱；因为亲人看病而需要付高昂费用等；另一些情况下是在日益贫富分化的背景下，经过与他人比较而产生的心理感受，比如和大家族中的其他家庭相比，和邻里相比，和同学相比等。

来自经济条件弱势的家庭背景的对话人通常来自乡村，放在中国的社会发展脉络中不难理解这一点。“改革开放”后，“三农”问题并没有消失。1978-1985的城乡收入差距是缩小的，但是从1985年开始扩大，自1989年开始城乡收入差距又恢复到了1978年之前的水平（汪晖，2000:12），1989年的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增长速度连续三年下降，迫使劳动力进城（温铁军，2013）。1994年的分税制实施后，各地政府将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医疗卫生、义务教育——的公共责任留给下一级政府，县乡基层政府陷入财政困境，农民成为改革中的农村公共物品的主要承担者，在这一时期教育集资一度在农民负担中占相当高的比例（温铁军，2013）。1997年群体性事件大幅度蹿升，其中约1/3为农民维权，可见当时的乡村矛盾之深。

文衷和雪莲来自乡村，父母收入较少且不稳定，因此他们都产生过长大后要赚钱以改善生活条件的想法。贫穷对他们来说是刻骨铭心的体验。第四章的生

命故事叙事中，文衷说起父母为了子女能够得到更加优质教育，从村子迁到县郊生活；失去土地，且学历低，因此不得不依靠出卖劳动力获取微薄的、不稳定的收入。这样的贫困经历让文衷产生强烈的希望出人头地、改善家庭经济状况的内心动力。雪莲的父母也在乡村务农，不稳定的低收入让她自小学开始就意识到钱的重要性，立下要离开乡土到城市工作的目标。她回忆道，

小时候家庭条件不好、很拮据。小学每年交学费的时候，我都感到十分的郁闷，因为别的同学都能按时交上，但是我总要晚几天。我觉得特别不舒服，似乎自己低人一等似的，觉得钱是多么的重要啊，觉得种地真是一件低人一等的事情啊，想着将来我一定不种地，一定要去城市里，住楼房，有稳定的工作每个月都可以有收入。还有小学的教育，我很深刻地记得一个语文老师讲“你以为你们的父母为什么吵架？还不是因为钱！所以你们必须好好学习”。那时回忆起父母吵架的情形，我觉得老师说的挺对的。

同样出身于乡村的乐晏和水仙，和文衷与雪莲有着相似的对金钱的经验，因为成长环境中都面临着 1980 年代中国乡村的费税负担重、农民主要靠种地因而现金收入微薄，这些都一定程度地反映在其家庭生活中。但是不同于文衷和雪莲的是，因为他们的家庭世代居住于此、没有移民到新的社区，因此有一定的社区支持体系，这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收入短缺带来的压力。水仙出生在鱼米之乡，而且父亲为了他读书，担任村长得以有更多的现金收入，缓和家庭的金钱压力。乐晏家里有三个孩子要读书，对于务农的父母来说压力不小。她回忆小时候父母的经济压力很大，种地也很辛苦，每次交学费也让父母压力有些大，尤其是到了初中学费突然就变成一百多。她和姐姐学习成绩都很好，但是因为家里要支持三个孩子读大学非常吃力，姐姐最终放弃继续上高中。乐晏从小也是希望通过教育改变生活、到城市工作，她说这是多数父母对于学习成绩好的子女的期待。

子康虽然成长于大都市，但因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且父亲身体不好，因此经济收入因素也在局限着她，例如没有继续读高中和大学也是考虑家庭收入的问题。如上文所指出的，在 1990 年代开始的城市改革中，工人阶层是利益受到损害最大的阶层，政府从曾经的医疗等社会保障提供者撤出。总之，出身乡村或者城市基层家庭的对话人在儿时的日常生活中面对金钱而带来的压力。

除了上述因为收入少且社会保障不足而令对话人产生对金钱的需要外，在贫

富日益分化的背景下，在对金钱、物质发展单一目标的追求中，与家族、社区中的其他家庭以及与同学的比较，也给对话人带来了压抑、自卑和痛苦。1980年代开始的市场经济改革，使得“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可能发生在一个家族内部的不同家庭、一个社区内的不同家庭、一个县乡内部。正如上文提到的发展主义文化和成功者文化的盛行，经济上的向上流动变成越来越多人的欲望(desire)。随之而来的影响之一是一部分家庭的孩子感受到家族内部、社区内部、乃至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城乡差异。文衷提到因为家境贫寒，被邻居中的小朋友和成人歧视和嘲笑。美凤的经历更说明了这一点。自1980年代开始，美凤的父亲开始经商，家庭经济条件开始上升。因此，她并没有感觉到因为缺衣少食而带来的经济拮据。然而，她感受到的是经济条件逐渐向上流动过程中，伴随而来的家族内部因为金钱而带来的复杂的权力关系，这让她产生了很大的困惑和无力感，她甚至认为世界就是这样的权力关系。美凤将她的家族描述成一个紧密、复杂的权力关系整体，由姥姥家的舅舅、阿姨及其子女组成。她说，

我从小就生活在充满着权力关系的家庭里。大舅非常有钱，是可以把握生杀大权的人。我哥哥要依附他才能发展自己的事业，所以他常常给舅妈买很多东西，为了让舅妈在舅舅面前说好话，多给他一些业务。舅舅在帮助家人时，也要区分亲疏关系，要先帮自己的孩子，然后是哥哥家的孩子，然后才是姐姐家的孩子。次序如果乱了，就会遭到家人的非议。我记得，我哥和我爸会因为中午和舅舅吃饭时舅舅说的一句话，而揣测一下午他的意思，那架势就像官员揣测习近平的一句话一样。

在她看来，这是一个互相利用的利益关系：没有资源的小家庭需要依靠有经济资本的其它小家庭以获得赚钱的机会，反过来也需要通过其它方式对这个大家庭进行牺牲和贡献。美凤高中时也亲眼目睹一个当地矿主家的女儿在把人差点捅死之后，用金钱摆平关系，最后没有受任何影响。这些都在颠覆美凤原来的价值观。在北京的大学毕业生涯更被她形容成充满着权钱交易和腐败。同学中很多都是官二代，不仅日常生活充满了高档商品，而且即便成绩不及格还是可以获得考取学位的考试资格，考试之前也能拿到机密试卷题目。这些事情让她感觉不公平，但是又无力改变，看似只能接受。

伴随着“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金钱记忆，部分对话人（3人）也提到和金钱有关的权力不公平的叙述，这让他们感到压迫和不公平，影响着他们对世界

的看法。他们的内在产生了很多疑惑、不理解、甚至厌恶，对一些人来说也有不得不接受这是生活的规则的想法。上文中美凤对于经历的金钱而带来的权力不平等的描述便是一例。在学校中，美凤发现有些老师会请父母做煤矿生意的学生给他们送煤。童淼提到中学时代发现，如果要想坐好座位要给老师送礼。火客的经历中没有感受到因为权钱交易带来的压迫感，但是作为有权力的一方的子女，当他从小目睹登门找他爸爸送礼求办事的人的态度，让他非常反感走关系的文化。

在所有来自乡村背景的对话人的故事中都听到一个相似的声音——从小就想离开乡村。这个声音反复出现在他们的父母、邻居、老师以及媒体的叙述中，城市是更好的，乡村是贫穷的、落后的、无知的、工作辛苦的，是需要逃离的。支撑这套叙述的基础有几方面的因素：1) 城乡二元结构下的收入和社会保障的差距。乡村家庭的经济负担很重，包括需要缴纳的税费、较高的学费、因为不遵从计划生育政策而导致的罚款。农业本身需要投入较大的劳动力，但是收入回报低和不稳定。2) 渐渐形成的对乡村的否定和对城市的肯定的文化和心理。来自乡村家庭的雪莲对此深有体会，她说，

从乡村到市里读高中，我非常自卑，总觉得城市里的每个人都比我们要优秀，要厉害，看不起我们这些从乡下去的穷人。回忆起来，高中同学以及老师们，对于我这个农村的孩子并没有想象中的瞧不起。但是读大学以后，依然很长一段时间，我还是羞于说我家在农村，我的父母是种地的。因为大家对于农村的看法始终是鄙夷的。我不知道这种感觉是从哪里来的，大概是从电视里；从周围人奋斗的目标里——小时候一起生活的小伙伴们梦想都是进城买房，他们多数很早就辍学打工，然后就很少再回来，偶尔回来时，已经完全不一样，带着城市人的装束，似乎更加干净和光鲜的衣着，缺少了一些朴实的语言。

雪莲的经验和上文提到的文衷、水仙和乐晏的经验是相似的，离开乡村、进入城市被认为是更荣耀的。可见，乡村危机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也是文化上的。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经济改革带来的城乡差距、贫富分化、权钱交易等，以及伴之慢慢形成的成功者文化、权钱交易文化，塑造了压抑、痛苦、觉得不公平、部分地接受这是世界的规则或者希望成功、希望离土进城的“自我”。

二、 应试教育之殇：塑造着缺乏自主性、知识面窄、批判思考能力弱以及被

竞争文化和成功文化浸染的“自我”

“80后”的中小学时期处于1980年代中后期到1990年代，正是“文革”之后重新恢复教育的时期，同时亦面对重新恢复的高考制度及大学招生人数规模较小，遭遇的是应试教育。在1999年大学扩大招生之前，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较低，高考被形容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新华网，2009）。本研究中的10位对话人中的9位在高中毕业后进入大学读书，属于同龄人中学习成绩较为优秀的群体，也是这一教育体制的胜出者⁸⁴。他们或自小表现出比较优秀的学习能力，或来自比较重视教育的家庭。家庭重视教育有不同的动机：有些因为父母的文化资本较高，对于子女教育的期望值高（3名对话人）。有些父母因为曾经的家庭贫困或者经历“文革”等政治因素失去读书机会，所以将读书希望寄托于子女之上（4名对话人）。有些来自乡村的父母则认为考大学进城是乡村青年唯一能摆脱乡村生活、农民身份的途径（3名对话人），在1980和1990年代的乡村，通过考学进城的文化尤其强盛⁸⁵。1990年代以前，中国大学生的学费、生活费和杂费全额免费而且就业上国家“包分配”（南都周刊，2009），因此考上大学等于在城市中有了稳定工作，这也是吸引很多家庭的重要原因。

应试教育是以考试得分为手段，以把少数人从多数人中选拔出来进入大学为唯一目的、片面追求升学的教育（王策三，2001：60）。1990年代虽然开始出现对应试教育的批判，提出应该实施“素质教育”——“以促进学生身心发展为目的的，以提高国民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劳动技术、身体心理素质为宗旨的基础教育”（同上，60），但是基本上实际实施的仍然是应试教育。应试教育使中小学成为高等教育的“预备教育”，升学成为唯一目的。应试教育带来诸多不良影响，包括：1）把社会上的腐败之风带到学校；2）偏重书本知识，偏重记忆，忽视实践乃至思考和理解，忽视思想教育、体育；加重学校、教师和学生的课业量，也加大学生和家人的精神压力；3）因参加各种补习班、补习材料等而加重学生和家庭的经济负担（同上，62）。

⁸⁴然而，1999年开始为了拉动国内经济增长，中国大学开始扩大招生，该政策从提出到执行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据统计，1980-1989年出生的人口的大学生入学率为23.8%，远高于1960-1969年出生人口的6.8%和1970-1979年出生人口的13.2%（李春玲、施云卿，2013:51）。

⁸⁵根据访谈材料，不少来自乡村的对话人认为，在2000年左右，乡村的文化开始转变，发现读大学不一定能改变家庭和个体的命运，外出打工成为更快致富的另外一种途径。

中学的学习体验是所有对话人都会提到的记忆，其中7人提到的经验中皆浮现出以考试为中心的文化和操作，甚至被形容成压抑和缺乏自主性的。缘于高考教育资源的不公平，越是乡村背景的学生、越是来自“高考大省⁸⁶”的学生感受到的应试教育越剧烈。

在多数对话人的回忆中，考试成绩、考取重点中学和大学的目标组织了中学的学校学习和管理：从早自习到晚自习的安排、一周只休息半天到一天等、不准读课外书、每次考试排名次（甚至名次下降要罚钱）、对学生的语言和心理上的训斥等等，这些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不少学生非常压抑，而且没有自主性——除了完成父母和学校期待的考学目标、似乎不知道生活中其它的人生目标等等。乐晏回忆起中学的经历

竞争挺激烈，像我们高考大省不是很多人都有机会考大学，好多人是陪读。我们学校一届六七十个学生里边只有十到十五个左右，能考上重点高中。只有考上县重点高中才有可能进大学的门槛。进入高中那个状态真的是像进到集中营的感觉，学习很紧张，大家的心理压力很大。我弟弟上普通高中更恐怖，吃饭是分拨吃，高一、高二、高三，省掉大家同时去排队的时间，都是跑步去，很恐怖的教育方式。我觉得你们挺难想象那种感觉，因为在大城市还好一点。那时基本上只有考大学这个理想和目标了，因为看不到别的途径可以改变个人。学校培养我们就是要考大学嘛，老师培养的是这个目的，这些人的所有的目标就是考大学。

马田回忆起自己从小学到高中的求学经历，从小学开始就要早晨五点钟到学校上早自习，一直到晚上八九点上完晚自习才能回家。他回忆起高考季节

教室都特别恐怖，书桌前面都堆满了书，堆那么高，各种辅导书，然后中午不回家休息，趴桌上睡觉，然后前面一摞书，就这样，很恐怖的。

雪莲有相似的经历，在她的记忆里，除了读书考试，什么都没有想过。在小城市读书成绩优异的童淼，虽然不是高考大省，但是学业压力依然非常大。她回忆道中学时代每周只有半天的休息时间；班级座位按照成绩高低排，学习成绩好的同学可以选择靠近讲台的位置，成绩差的学生只能坐在后排。

在选择科目方面，很多学生也没有自主性，为了高考成功率，即便喜欢学习文科，也不得不选择理科，因为理科的考中大学的比率高。乐晏和马田都有类

⁸⁶中国的高考根据各省分配招生指标，有些人口大省的高考人口较多，相对来说竞争更加激烈。

似的经历。我和马田讨论他为什么不喜欢理科，但是大学的专业却是理工科，造成学习的很大困难，他情绪有点激动地说：

但那时候，包括很多其他同学，其实没有任何自主性，都是家长、周围人告诉你学理科以后就择业会广一点嘛，学文科没有什么前途，工作不好找。所以学理科。

从对话人的回忆来看，多数的学校和老师仅仅以取得考试成绩为目标，培养知识灌输和死记硬背的学生，缺乏批判思考，而且课外知识的学习被压抑和限制，社会活动的参与不被重视或者被压缩。这些也都通过身体进行操练。更有甚者，这样的教育方式造成了学生追求成功者和竞争的心智，但这并非在所有人身上发生影响。有些对话人在访谈中没有提到受这方面影响，其中包括一些对话人并没有意识到竞争文化和唯考大学文化是如何在他们的成长中发生作用；有些对话人则对此有反思，比如文衷对应试教育的体会最深。他在 NGO 机构从事青年教育工作后开始反思这段经历给他带来的烙印：因为身处县城、学习成绩不错、且对自己有很高的期许——希望通过考学摆脱家庭的贫困状况，他顺应老师的“成功者文化”的教导，一定要考取更高的成绩，考入重点中学，考上北大清华，也因此不断地给自己施加压力，不敢谈恋爱，不敢看课外书，只为了完成单一目标。这样的身体操练压抑了他的情感和与目标无关的其它生活。

子康和美凤是例外，没有过多地谈及学校中的应试教育，从 10 位对话人来看，这大概和子康和美凤的学习成绩不属于优秀以及家庭没有对学习成绩的期待有关，也因此并未因应试教育而产生很强的压迫感和紧张感。子康的父母来自工人阶级，他们并没有通过教育改变出身阶层的视野和愿望（这也和他们的家庭没有足够的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有关），对教育并不重视，希望子女能够毕业后尽快工作赚取收入，而且子康的学习成绩一般，因此家庭决定不读高中，而是读中专，尽快工作。美凤的父母对于女儿没有特别的期待，是一种听之任之的状态。

以上多数对话人因应试教育而体验到的较为缺乏自主性、压抑、知识面窄的情境并非特殊，相反，这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我是这样考上大学的——70 位大学生自述》一书（陈映芳，2001）提供了珍贵的来自 70 位经历高考的大学

生⁸⁷的自我叙述，与本研究中的对话人的叙述有着较高的一致性。该书提出：1) 高考学生缺乏自主性，对于考大学的动机缺乏独立思考，而是高度认同父母和社会对其期待⁸⁸。2) 高中的学习和生活经历，被描述为充满压力、竞争和以应试训练为中心的教学模式⁸⁹（86-87）。3) 对于教育制度、高考制度以及给他们带来极大压力的家长、老师、整个社会表示种种不满⁹⁰。

虽然应试教育的压抑非常严重，但并非完全没有缝隙，仍有不少对话人会利用业余时间或躲避老师和家长的监督以做学习以外的事情。在青少年时期有机会接触课外书的对话人一般对社会时事、向外的信息更感兴趣，知识也更丰富一些。美凤、马田、乐晏都很喜欢看课外书。美凤和马田在中学时都喜欢看很多报纸、杂志，马田还特别喜欢收听电台、包括美国之音，他们觉得这些打开了看世界的窗户。乐晏会冒着被老师没收课外书的风险看课外书。童淼和雪莲也有躲着父母看课外书的经验。不过对于火客、文衷、水仙、子康来说，因家庭中没书、所在社区也没有图书馆资源，因而没有机会接触课外书资源，他们是到了上大学或者工作之后才有机会接触这些文化资源。

综上所述，应试教育给“80后”知识青年带来的诸多影响，包括缺乏自主性、知识面窄、批判思考能力弱、被竞争文化和成功文化所浸入等。

三、 性别文化的压抑塑造了在性别身份上的顺应、困惑、不满、束缚的“自我”

⁸⁷编者没有说明书写者的出生年龄，但是从文字中提出的年龄、发生事情的年份等猜测，应该是出生在1978年到1983年之间。可以归入“80后”群体，因此对本研究有参考价值。

⁸⁸《我是这样考上大学的——70位大学生自述》一书中提到关于读大学的动机（2001：42-43）。对于多数自述者来说这是一个毋庸置疑、不必思考的问题：几乎所有的自述者提到这是父母的期待，关系到能否“光宗耀祖”、“父母的脸面”。对于来自乡村的自述者更是提到，读书和考大学是他们唯一可以离开土地和改变农民的途径。当假设给他们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多数人仍旧愿意选择读大学。因为考大学是当代青年人谋求有利职业地位并得到社会认可的、较为公平的途径之一；在当前的中小学教育的选拔性被强化的背景下，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天然的被期待进入高中和大学，没有其它选择的可能。考大学也是为了满足做一个父母的好孩子的期望（164-165）。

⁸⁹《我是这样考上大学的——70位大学生自述》中一位书写者提到，每天早晨5:30起床，无论春夏，都很晚睡觉（2001：5）；题海战术让她做到“腰酸手麻头脑发胀”（2001：5）。另一位书写者回想起高考，“仍感到心中有一股窒息的感觉…刻骨铭心”。

⁹⁰《我是这样考上大学的——70位大学生自述》中一位书写者说，“【对父母】我说不出来埋怨的话，我接受这一切。我也想对社会说…如果一个人的性格被扭曲，头脑被束缚，这种教育就是失败。只是希望，以后的学生们可以不必这么‘痛苦’地经历这样一种成长，因为，代价真的太大了”（2001：206）。另一位书写者说，“给你的子女一片自己的天空吧，让他们有独立思考的空间…问问孩子，到底他们需要的是什么？不要拿太多的规范教条去束缚他们”（2001：206-207）。还有一位书写者说，“在我们最有创造力的时候，在我们最能培养兴趣的时候，却被挤在通一条道路上过早地走上了同伴间互相恶性竞争的阶段…教育体系吞噬了太多学生的创造力…”（2001：207）。

除了因金钱、权力和应试教育而带来的压抑、压迫感外，在对话人的叙事中也浮现出性别文化这一主题。在这一点上，女性和性少数群体感受尤其强烈。6位女对话人中提及这一经验的有2位，均是在NGO领域参加过社会性别培训或者从事性别工作的对话人。另外4位对话人或者看到社区里有重男轻女的家庭，但是认为自己所在的家庭不存在这种状况，或者作为独生女，在青少年时得到的也是父母完全的爱；或者虽然遭受过性别骚扰，但是在访谈中并未主动提及自己经验的不公平的性别文化。4位男对话人则较少谈及这方面的记忆，在水仙、马田的叙述中完全听不到儿时和性别不公平有关的叙述。参加过社会性别培训的文衷是个例外。参加社会性别培训后的文衷，回忆起小时候很看重女性的贞洁，因为受武侠电视剧传达的信息的影响，认为如果女性失去了贞洁，生活就会非常悲惨。另外，他在学校中因为是男性，反而得到了更多的优待：在小学五年级时，他的启蒙老师认为班长应该是男生当，于是把原来的女班长和他这位男班长进行了调换。他因为性别身份，反而成为“重男轻女”的文化的受益者。

感受到性别文化压抑的主要是美凤、钰晶和火客。美凤的故事在上文中已经提到，她觉得自己身上有很多来自家人的传统的性别期待和约束，比如因为是女孩，她觉得自己在家庭中不重要；因为是女孩，姥姥认为让她读书是浪费；她也看到姥姥家对于儿子及其家庭的重视要高于对于女儿及其家庭的重视；她的家庭希望她作为女性，不和其他人发生冲突，不可以婚前同居，结婚生子是女人必须完成的事情。

第四章也提到，作为独生女的钰晶也回忆到小时候因为是女孩，而被母亲抱怨因为生了女孩而被不公平对待，因此她要比所有男生都要强。这让她从小就想做一个男孩，而忽略了对自己的性别身份的认识并且压抑自己。

这些对话人在儿时生命经验中感受到的性别区别对待，并非仅仅是个人现象，如果放入其所处的1949年后的中国的性别平等发展的历史脉络中，会发现在文化上的性别平等远未实现。戴锦华（2015⁹¹）指出，1949年是中国女性发展的转折点，进入男性政权主导的妇女解放进程：一方面，在制度上确保了男女平等：

⁹¹ 2015年2月在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文化研究硕士课程之中国大陆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讲课笔记

1950年代一系列法律出台，包括1951年《婚姻法》的颁布废除包办婚姻、多妻制、妇女买卖、童养媳等（可参考Li, 1995），劳动法规定男女同酬、妇女享有带薪产假等（可参考Shu, 2004: 315）；但另一方面，女性的意识状况、主体力量无法与其法律和政治地位相应，自觉意识空前之低，因为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妇女平等运动，没有自发的、社会参与的过程⁹²。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在于人的精神深处，性别平等的社会改革不能彻底改变女性地位，文化在促进性别平等方面的作用不应忽视（张佳羽，2013:19）。儒家思想依然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性别观念上发挥着作用，比如男女长幼在家庭中的角色和责任等，女性对于家庭的照顾、生育等的责任（Li, 1995: 413）以及对于生男孩的重视（杜芳琴，1996: 135）。在1970年代末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背景下，从每年新出生人口的性别比例就可以发现，中国人对于男孩的偏好：1970年代的出生男女性别比为106.32，而到了1982年为108.5，1987年为110.9，1990年代之后连续攀升，1990年为111.14，1995年为115.6，2000年为119.92，而一般的正常比例为103-107之间（解振明，2006:249）。

性别社会化进程最早开始于家庭，随着年龄增加，朋辈、学校和其他社会化机构的作用开始增加（张佳羽，2013:23）。教育体系也在参与巩固着社会的性别不平等。杜芳琴、闵冬潮（1996: 176-186）针对1987版的中学历史教材进行性别分析，发现在中国历史课本中的男女人物记载比例为490:12，而其中男性政治人物占男性历史人物的76.3%，12位女性人物则多是政治人物，因此杜芳琴认为历史课本中的中国史是帝国将相和农民战争史。进入近代史部分，历史人物的主角一般都是民族斗争、阶级斗争和军阀代表，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出现39和24次。除此之外，在历史事件和活动中，也鲜少介绍和女性、女权有关的内容。

除此之外，同性恋群体在异性恋主导的文化中也倍感压抑。对话人火客是位“同志”，在青少年时期，因为性别认同而困惑、没有朋友，非常苦恼，希望寻求帮助而不可得，因为在他所处的八九十年代的县城，异性恋文化仍是主流，很少有关于同性恋的资讯和知识。他回忆道，

⁹²Li, Xiaorong (1995) 也提到这场妇女解放运动是工具性的、实用性的，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包括提高国家工业化发展，动员社会力量支持共产党等；因此没有鼓励女性的批判思考、获取不同渠道的信息等（411-412）。

中学每天下课我就只能在教室里坐着，因为我不踢足球之类的运动，同学都在外面玩，我也不敢和女生玩，担心忌讳，也担心被取笑，总之没有同伴，所以那是一个非常痛苦的阶段。从小到大都觉得有人在盯着我，从小就不是很自在。不认同嘛，没信心，自卑之类的人都会这样子。心里有一些觉得很奇怪的东西，不知道对谁说，没人可以说。所以我的理想是从那时开始的，想做一名老师。因为当时觉得很无助，想要有一个老师这种性质的人，我可以跟他诉说，他可以帮助我。我就想，以后我自己一定要成为这样的老师，有些同学的心里话不能跟别人说，可以跟我说，可以给他支持。

火客在中学时代对于同性性取向的困惑、苦恼、无人诉说以及因为被取笑而产生的种种心理自卑、不自信、社交障碍以及渴望心理支持等并不是个人问题。相反，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社会对于同性恋现象是一种忽视、不了解、误解甚至认为其不道德、病态、社会失常（李银河，1998）。李银河在1989到1997年期间，共访谈约120位中国男同志——从中学生到老年人，发现当代中国同性恋群体和相关的重要事实曾经被完全忽略，不少访谈人都有压抑、精神高度紧张、自我否定、自我厌恶等心理压力。一方面有来自自身的压力，包括认为同性恋倾向是不道德的、有病的、犯法的；另一方面，压力更来自社会，包括社会行为规范——比如正常的家庭、恋爱、性别角色、行为规范，周围人的误解、偏见、厌恶、仇恨，无法表现真实的自我因而要两面做人等（1998：331，397，432）。

四、 中小学教育体系和普及文化中的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价值观教育： 使得具有正义感、社会责任感的“自我”塑造成为可能

汪晖认为1990年代以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继续运作，但其效果已经不如1978年之前。这时的国家意识形态包含了，市场主义、发展主义的面向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双重面向，而后一面向已经蜕变为没有任何说服力的、极端僵硬的宣传（2001：16）。然而，从本研究的对话人的叙事而看，他们仍然通过中小学教育体系接受到一些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比如希望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并且受普及文化中的“爱国主义”思潮和善恶观的影响较深。

“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小学教育虽然开始逐渐转变为为经济发展服务，但仍存有为了社会主义政权的稳定而进行教育的面向。1980年代，配合邓小平提

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中小学的德育工作开始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卓晴君、李仲汉，2000:377-378)。1988年12月中共中央正式下发《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通知》，提出中小学思想品德政治教育(德育)“对坚持学校的社会主义性质，促进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现在的中小學生是21世纪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中小学德育工作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认真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要用共同理想教育全体学生，在共同理想的旗帜下振奋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培养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将来能够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卓晴君、李仲汉，2000:381-382)。可见，在官方论述中，仍然希望透过正规教育培养学生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共产主义者。1980年代，学校的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中，加强了爱国主义教育、国情教育、法制教育以及无神论教育等(卓晴君、李仲汉，2000:387)。李政亮(2012:45-78)通过检视1987年版的小学语文教材——正是不少“80后”在小学使用的课本——以理解政府是如何塑造中国青年的爱国主义、“革命”意识的。他发现教材中高频率地出现以下叙述：1)爱国主义的叙事，比如对领导人伟大形象的建构——周恩来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比如杰出音乐家、科学家的爱国情操。2)革命叙事：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革命精神；3)疆界想象。1987年版的语文书的革命叙事和伟人叙事相比2008年版的更多，介绍列宁、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有5、4、6课。1987年版小学一年级语文课本在介绍完汉语拼音之后，第一课和第二课的课文分别是“全国人民热爱共产党”和“我爱北京。我爱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有助于理解对话人叙述的在中小学中接受到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接班人和责任感教育的社会脉络的原因。

这类思想教育不仅通过正规学校影响青少年，198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兴起的普及文化(戴锦华，1999)，也在发挥着重要作用。王绍光⁹³(2002)指出，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的闲暇方式出现了较大变化，从由国家主导控制转变为私人空间显著增大，政治色彩越来越少、商业化程度越来越强：在“文革”中曾经有数年，八亿人民只允许看八部“革命样板戏”和几十部经过挑选的

⁹³虽然这篇文章主要分析了城市中的闲暇文化的变迁，无法解释这一时代中的乡村闲暇文化的变化，但其对闲暇时间的政治分析也可提供参考思路。

“革命”影片。进入邓时代，电视机⁹⁴、录音机等开始进入中国城市家庭。1980年代以来，书籍、报纸、杂志的发行量均大幅提高⁹⁵，在新增的出版物中，“通俗”读物占很大比例。在中国大陆缺少这类普及文化的情况下，这一时期的流行文化也出现了“西化”的特征，包括来自美国和港台的音乐、电视节目、书籍等。大量港台文学及电影、电视、流行歌曲录入大陆并迅速流行，其中的武侠小说最历久不衰（陈硕，2004:109）。这些正是“80后”青少年时期成长的媒介环境：普及文化的迅猛发展为他们接触各种文化资源提供了机会。不少对话人提到儿时受到武侠人物的影响，对其侠义精神、英雄主义精神的感应。1949年之后并定性为“毒草”或“精神鸦片”而被查禁的武侠小说，在“改革开放”之后开始通过盗版、报刊杂志连载以及后来的影视产品的改编在中国大陆重新流行起来，主要读者群是当时的大、中学生（宋伟杰，1999:34-41；吴晓黎，2000:131；陈硕，2004:4, 17, 103, 105）。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港台大众文化对于生长于这一时期的一代人产生了巨大而隐形的文化构造力量，喂养了人数众多的青少年读者群：金庸武侠小说，将阶级、集体还原为个人，将革命反抗热情转换为青春成长的烦恼，将在现实中产生的焦虑置换为江湖中的漂泊与寻觅（戴锦华⁹⁶，2000:135, 137）。然而，武侠小说也可能带来乌托邦冲动，比如金庸的小说对于善、恶、丑的命题的复杂深刻的处理、邪不压正的叙事策略，将社会不轨者、落魄者和失败者整合成行侠仗义者，将其生活空间描绘成理想化的乌托邦世界，为一代人提供了想象、憧憬另一个世界、另一种生活的幻想，潜在着将小说中的狂欢转化为批判不合理现实的力量；金庸小说中，人的自我力量无边强大，是一种英雄梦想，展现出个体超越现实的可能性；而侠被书写为改变江湖世界的力量，具有改变现实的可能（宋伟杰，1999:40, 89, 235-236）。然而，武侠小说中存在着传统道德伦理尤其是性别观念（陈硕，2004:139），如上一节所提，可能也在形塑着受众的传统性别观念⁹⁷，比如叙事中对于女性人物失去“贞洁”的描述。

⁹⁴ 1979年，全国的电视机数量为485万台，1987年这个数字激增到1.2亿台，拥有电视机的家庭占全国总户数的47.8%。1985年，全国有172家市、县电视台（张裕亮，2010:136）。

⁹⁵ 比如，书籍的发行量从1970年的不到5000种，到1979年的17,000种，到1991年的88,000种；报纸的发行也从1970年的42种（全国及地方党报）发展为852种；杂志由1970年的21份发展到1991年的6,500份（王绍光，2002）。

⁹⁶ 戴锦华作为编者在吴晓黎（2000）一文中的批注。

⁹⁷ 宋伟杰认为金庸小说已经对旧有的男权中心秩序做出了局部修正，比如强调从一而终、不离不弃，强调男女双方不可或缺（1999:136）。

1990年代也是以爱国主义为包装的民族主义崛起的时代（黄裕、李金铨，2004；戴锦华，1999；张裕亮，2010）。黄裕、李金铨（2004）认为，1989年天安门运动后，中共为了重建统治的合法性基础，除了大力推动经济自由化，更包括在文化上以“爱国主义”的媒介包装民族主义论述，其结果是将爱国主义的官方论述注入大众意识。戴锦华（1999:203, 208-209, 216-218）则认为民族主义的思潮之所以被接受，和1990年代的社会脉络有着重要关系，包括世界共产主义国家解体后，公众感受到的追赶美国的希冀的失落，以及因1990年代的激进市场化和卷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而带来的、民众普遍的对中国社会现实危机感、身份焦虑和潜在的阶级冲突，而迫切需要一个公敌、异己的形象，以承载社会转型期的伤痛、迷惘和仇恨，而民族主义成为了这样的旗帜。虽然他们对于民族主义产生的原因做出了不尽相同的解释，但是都指出了民族主义确实成为了1990年代的主要思潮。1990年代，中共和政府运用媒体发起声势浩大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向青少年进行国情教育，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指定一系列爱国主义宣传材料列入中学和大学的政治课程之中（黄裕、李金铨，2004:102）。国家教委也联合其它政府机关，维护创造社会教育环境，比如1991年国务院批准下发了国家教委、广播电影电视部、文化部、国家体委、新闻出版总署、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科协等9个单位《关于创造良好的社会教育环境保护中小学生健康成长的若干意见》要求政府各有关部门和社会各方面在促进中小学生健康成长（卓晴君、李仲汉，2000:386）。1989年后，官方再度赋予主旋律电影⁹⁸意识形态教化功能的责任（张裕亮，2010:72）。1994年，江泽民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文艺思想，要“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励人”，强调弘扬主旋律必须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72, 123）。这些主旋律电影或者有主旋律意识的电影，包括纪录革命建国的、宣传爱国主义的（如《鸦片战争》）、塑造典型人物（如《詹天佑》、《毛泽东的故事》、《周恩来》、《邓小平》、《焦裕禄》、《孔繁森》、《天狗》、《马背上的法庭》）的等不同类型。进入1990年代，流行电视剧也被官方要求强化主旋律题材⁹⁹（张

⁹⁸电影一直是官方宣传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1953年开始，中国电影出现革命战争题材的高峰（张裕亮，2010）。

⁹⁹1994年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广播电影电视部提出在电视剧制作上必须强化主旋律题材（张裕亮，2010:123）。

裕亮,2010:123)。1990年代市场化媒体在这场民族主义思潮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寻找政治上安全、经济上得利、又能吸引大众的话题,生产舆论,制造文化消费,其中包括发表大量与民族主义议题相关的文章,引发¹⁰⁰大众情绪,并以之谋取经济利益(同上,96)。1990年代之后,虽然中国传媒表面看仍置身于经典政治权力的掌控之中,但是因为资金来源的多样性、制媒者构成的日渐复杂,权力开始分散、相对出现多个权力中心,文化共用空间——已非能用“官方”/“民间”对立的权力结构进行概括,而是一处权力交换与重组中的变动的过程,其中包括国家、跨国资本、中央、地方、企业、个人,在极端不同而间或共同利益的驱动下,彼此剧烈冲突又或紧密合作的空间(戴锦华,1999:25,28,31)。以中央电视台1990年代引入体制外制作人、收视率较高的、与传统意识形态宣传不同的、新闻节目《东方时空》¹⁰¹为例,虽然一定程度上触及了官方新闻节目未能触及的社会内容,但是也同样担负着宣传和制造官方意识形态的任务¹⁰²(汪晖,2000:36)。

从对话人的故事中也看到这些媒介中的文化资源混杂着各种元素,既包括国家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包括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夹杂着中国“传统”故事等文化资源。

多数对话人均提到自己对公平、正义的重视与其在中小学教育体系或普及文化中接触的与善恶观、社会责任感有关的文章、故事以及活动有关,其中7位对话人主要通过中小学教育接触这些资源;5位对话人通过大众媒体接触到这些资源;没有提到这方面影响的对话人有2位——童淼和雪莲。中小学中的这方面的教育资源,实际上是面向所有同学,但是有些对话人可能相对更容易被召唤,或者在他们日后加入民间团体工作之后,这些影响得以被重新召唤出来

¹⁰³。

¹⁰⁰ 原文使用了“煽动”一词,这里改作“引发”。

¹⁰¹开播于1993年5月1日,强化了新闻报道的深度和舆论监督的力度,以平民化为叙述方式,标志着电视新闻杂志的时代的开始,也被认为是开创中国电视改革的先河。参见:牛鸿英张奇(2005)嬗变中的超越与困惑——从《东方时空》看电视新闻杂志节目的发展.《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5年第2期。王慧(2007).我国电视新闻杂志类节目的转型与走向.中国传媒大学.硕士论文

¹⁰²戴锦华在《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1999)一书中也分析了《东方时空》。该节目全部使用社会资金,制作团队也包括很多来自所谓的城市边缘人,包括来自中国地下电影中的“新纪录片运动”成员——被指认为当代中国的政治抗衡艺术工作者、中国本土的不轨者。《东方时空》节目中的记录老百姓的生活的单元,一方面确实改写了曾经的主流媒体的教化风格,将镜头指向普通老百姓的凡人琐事、日常家居,但不再如“新纪录片运动”的拍摄社会意义上的边缘或不轨者的初衷。戴锦华认为这也可以被视为“官方”对“民间”文化及抗衡的整合与收编(25-28)。

¹⁰³ 对于这些对话人而言,中小学德育教育对其影响的有效性,可能也和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一些地区

美凤、文衷、钰晶、乐晏、子康、马田和火客非常喜欢并且相信在学校里接受的爱国主义、社会责任感和理想教育。美凤和文衷都提到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影响，美凤特别提到喜欢鲁迅的文章等。钰晶在中学时代是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子康也有类似经历，她回忆到

因为我比较乖，老师讲的那些社会理想、公平公正的事情，我就信，特别打动我。比如雷锋、董存瑞之类的，我特别容易被他们打动、感召，觉得应该牺牲自己为他人服务。但好多同学都不信。

马田对于中小学教材和活动中的爱国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理想教育也有记忆，比如思想品德课中强调的要和人分享，强调集体、劳动、诚实，他觉得这些对他的塑造挺强的。20年过去了，他仍记得1989年首届全国十佳少先队员赖宁，可见，这类教育体系、少先队体系内的榜样评选和宣传的影响力。另外，学校组织的集体劳动，也让他印象深刻，比如打扫教室卫生、打扫厕所、在学校的农田拔草。他觉得这些价值观对于自己现在做乡建的工作都是有帮助的。火客的社会责任感似乎和他从小在学校接受的“红色教育”有关，包括他所在的中学是以当地著名的早期共产党员的名字命名的，学校旁边就是红墙——纪念革命烈士事迹。对于钰晶来说，做了六年的班长的经历也改造了她的思想和身体习惯。大学之后，反思这段经历，钰晶觉得作为班长更要按照标准要求自已，管理班级。

美凤、水仙、乐晏、马田、钰晶等提到通过乡村戏曲、说书人以及后来的电视、小儿书、小说等不同媒体接触传统的善恶观、侠义精神等价值观，包括惩恶扬善的故事类型，包括历史题材、战争题材、武侠题材等等。马田回忆到，

我现在能回忆起父母给我买的那些小人书，其中有一本连环画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是一本中国民间故事集，里面都是古代民间除暴安良和惩恶扬善的小故事和传说，我敢确定我的是非善恶观念就是启蒙于此，因为我那时会不停地翻看这本书，被里面那些小人物对权贵的反抗和斗智斗勇所感动。

乐晏也提到她所长大的地区对于国家大事非常关心，村民经常会聚在她家

和社区的日常生活中仍旧保留着社会主义时代的意识和文化有关——还没有迅速被1990年代之后的激进市场改革所影响，这一点需要另外进行研究，尤其是可以和2000年代之后的中小学生的学习经验进行对比研究。

议论，他们会一起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

正是通过 1980 年代以来中小学中的课程内、外的思想道德教育，通过涌现出的普及文化中的各种文化资源，善恶观、对社会主义的理想和社会责任感等在对话人的内心中埋下了种子。而这背后是和 1980 年以来、特别是 1990 年代以来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港台武侠小说的流行等脉络密切相关的。

五、 小结

在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的社会脉络下阅读对话人的叙事，他们的儿时“自我”显现出深刻的时代烙印。最显著的是，金钱和权力的意识很早地成为其生活的主要内容，也成为牵动其感受的重要因素。在多数人的意识里，金钱是重要的生活部分，也是需要奋斗的目标。另外，因为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安排，他们的家庭常常处于缺少金钱或者顺应金钱原则去赚钱而忽略生活其它面向的情况，金钱及其与权力的千丝万缕的关系也带来了压迫感和自卑。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下，乡村成为要逃离的地方，乡村的价值被负面评价、被贬低。上述烙印主要是经由对话人在家庭、社区和学校中的亲身经历以及家庭成员、社区里的人的叙述而产生的，也包括一些来自媒体的再现的影响。应试教育非常深刻地改变着他们，带来了压抑的、没有自主性的、知识面窄、批判思考能力低甚至充满竞争性的“自我”。对于一部分女性对话人或者同志身份的对话人而言，成长的经历中——家庭中、学校中——也经历着对性别身份的期待和束缚。除此之外，对话人也提到在中小学的课堂和课外活动中、在普及文化中接触到不少带有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等资源的价值观，在他们心中埋下了社会责任感、善恶观等种子¹⁰⁴。

他们的儿时“自我”中嵌入着因金钱、权力、城乡差异、应试教育、性别观而形成的种种经验带来的可能结果是：一方面，他们的文化和经济资本较少，这使得他们可能进入社会认可度高、经济回报高的行业的机会降低，因而有可能选择社会认可度和收入皆较低的 NGO 行业（将在下一章中展开分析）；同时，在选择 NGO 行业时，因为家庭的文化和经济资本少，而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其职业选择的干预（读者也会在第七章读到，这样的家庭背景出身也为他们日后

¹⁰⁴以上是从 10 名对话人的生命故事中对儿时的记忆中抽取的重要主题。另外没有列入的一个重要主题是约有约一半的对话人回忆到儿时经历，都会提到和自然的亲近、很多集体活动的社区记忆。

在 NGO 工作的生涯带来经济上的压力)。另一方面，这些压抑、痛苦、规训的经验，为他们未来改写“自我”提供了资源、也带来可能的限制。除此之外，对话人的经历中也沉淀了在中小学教育体系以及普及文化中接触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爱国主义”家孩子管和善恶观，这些社会意识、责任感和正义感的种子，可能在他们未来的某个时刻召唤他们进入 NGO 形意世界。

需要说明的是，每一个生命故事都是不同的，因此本文并非意图归纳出一般特点，而是尝试挖掘并理解叙事中的较为突出的儿时“自我”。他们在童年和青少年的这些经历和“自我”并不必然是影响他们选择 NGO 行业的主要因素，因为实际上在那个时代有很多同龄人也同样经历着这样的贫富、城乡逐渐分化，经历着性别压抑，经历着因为经济起飞而面临的家庭和亲情的缺失以及应试教育带来的情感和生活压抑，但是多数人没有选择从事 NGO 工作。下一章将进一步分析，带着这些 H-I-P 的对话人为什么能够进入 NGO 形意世界。因为多数人都是在大学中开始被招募进入这一形意世界，因此将特别分析大学这一空间对其的影响。

第六章

脉络下的偶然：

在 2000 年代通过志愿行动而进入 NGO 之形意世界

上一章聚焦于 NGO 工作者在青少年时期所形成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并提出“80 后”NGO 工作者被 1980 年代、特别是 1990 年代以来的发展主义的文化所影响，其生活经验和情感被金钱和权力所影响，不少对话人也在一定程度上顺应成功文化、离乡入城的价值观；经过中学应试教育的洗涤，其知识面较窄、自主性和批判思考能力较弱，并形成追求竞争和成功的心态，某些对话人也经历了性别文化的压抑。而带着这些 H-I-P、进入大学或者社会开始工作后，对话人为什么选择 NGO 作为职业，尤其考虑到这一行业的社会地位和物质回报与曾经的成功者文化似乎相差较远？2.2 亿的“80 后”青年人口中，在社会团体及自治组织工作的仅占 0.6%（范雷，2012:58）。为什么他们不同于其多数同龄人，在人生的职业起步阶段便选择进入 NGO 领域全职工作¹⁰⁵？本章试图回答上述问题，聚焦于“80 后”NGO 工作者被招募进入 NGO 行业这一转换时期，尝试理解哪些因素促使他们开始接触 NGO 领域，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经历怎样的转变——在他们的“自我”之上又增加了一层历史沉淀。

形意世界是具有历史性的；并且，人们的位置会影响其能够多大程度参与进去，有些人因其社会位置，可能永远无法进入（Holland 等，1998）。NGO 领域这一形意世界亦是如此。本章将以这两条线索展开分析：NGO 形意世界的历史和 NGO 工作者的 H-I-P。

10 位对话人的叙事显示，他们在 NGO 全职工作之前，都有一段或长或短的、在大学公益性社团或者校外 NGO 志愿行动的经历。这段经历让其中 6 人寻找到了有意义感的生活和工作方式，这是促使他们继续留在这一领域的原因。而另外 4 位对话人最终进入全职工作的原因各有不同，比如包括或是与专业发展方向一致的工作，希望自我成长，或是作为继续考取研究生或进入其它领域工作的过渡选择，或是因为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因此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等，但无论

¹⁰⁵ 正如王名（2008:28-29）的研究所指出，1990 年代到 2000 年初，第一代的中国“民间组织”创始人和工作者多来自在政治、经济、学术等领域已有一定的事业成就而转入 NGO 领域的人士，较少有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但 2000 年后，这一现象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投身这一行业。

如何，其共享的前提是比较喜欢 NGO 组织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氛围。可见，**志愿者经历**是其进入 NGO 全职工作的重要因素。

如果进一步挖掘，对话人为什么会进入志愿行动的世界，则和其所处的社会脉络及其 H-I-P 有关：第一，社会脉络上，1990 年代中后期是 NGO 逐渐发展的时期：1990 年代中后期 NGO 开始快速发展并**通过媒体、大学**进入城市知识青年的视野和生活空间之中，使得他们接触、进入 NGO 形意世界成为可能。很多对话人认为他们是因为偶然因素成为志愿者，透过与人的社会互动，与环境中的文化资源相遇，被招募进入这一形意世界之中的，比如包括透过大学同学、大学室友、学长（尤其是社团中的招募新团员的学长）、男/女朋友、电视或者网络等媒体的资讯得以接触。进入之时对 NGO、志愿者等的了解比较粗浅。第二，其携带的 H-I-P 的因素。10 位对话人均于大城市中开始接触和 NGO 有关的文化资源，其中 8 人于大学之中接触，2 人于工作后（其中 1 人未读大学，在工作中接触）通过电视、网络媒体、同学介绍等接触 NGO。总的来说，大学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过去的求学成绩优秀，因此能够进入位于大城市的大学甚至重点大学，而这一大学生尤其是重点大学学生的身份，使得其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接触不同的信息、知识与人，包括公益性社团、社会调查活动或有社会发展视野的老师、图书馆资源及互联网资源。另外，1990 年代末期开始，城市居民相对更易通过各种媒体渠道——电视、网络等——接触公益性资讯。比如，没有读大学的 1 位对话人因为居住在大城市，在 1990 年代末开始即可较为便利地接触媒体——电视和互联网，并且所在城市在志愿者服务方面发展较早，因此她也相对可能接触公益性资源。可见这些 H-I-P 也是和社会脉络密不可分的，和大学与城市的发展相关。而上一章提出的对话人在儿时所经历的成功人士等思想、应试教育、性别压抑等经验，也在其进入志愿服务之后，对其产生各不相同的影响，但不必然导致其是否最终全职进入这一领域工作。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他们决定全职进入 NGO 领域工作的描述中，家庭因素被较少提及，这或许说明，对话人选择这一社会能见度和认可度较低、经济收入较低的领域，没有受到来自家庭的强力反对，与其出身家庭的经济、文化资本有关，父母并没有较强的经济、文化资本干预子女的职业选择或者为其进行规划，给子女安排稳定、收入不错的工作机会，要求其继续维持或者提升家庭阶层。

因此，正是带着 H-I-P，这些对话人进入大学或者在社会工作，与接触到的新的环境中的文化资源产生即兴和互动，发生着价值观和行为的改变。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人是更加主动地寻找，有些人则是较为被动地被招募进入，但是最终都进入了这一形意世界。因此，我在本章提出，正是 1990 年代以来的 NGO 开始发展及其与大学、媒体的关联，对城市青年进入这一形意世界发挥了重要作用，带着各自的 H-I-P 的 NGO 工作者与之互动、发生着转变。

本章将首先提供 NGO 形意世界、大学作为一个青年空间的发展历史，在这一脉络下分析对话人是如何在大学学习或者通过媒体等渠道接触公益性社团，并且从事志愿参与以及在志愿参与过程中的转变，最后分析其决定进入 NGO 全职工作的原因。

对话人背景情况一览表

姓名	性别	出身 乡镇/ 城市	学历	是否参 加大学 公益性 社团（4 人）	其它经历 （10 人均有志愿者经 验）	是否 是第一 份受薪 工作（7 人）
文衷	男	村	重点大学 毕业，后 硕士毕业		参加大学文艺类社团； 参加校外 NGO 短期志愿 者（通过大学公益性社 团），后为该 NGO 的日常 行政工作志愿者，并和 其他志愿者发起新的志 愿组织	✓
水仙	男	村	重点大学 毕业		大学老师的影响；参与 互联网思潮争论；毕业 后，经大学同学介绍，进 入 NGO 做长期志愿者（一 年期）	

雪莲	女	村	重点大学毕业	✓	参加校外 NGO 做志愿者	✓
乐晏	女	村	一般大学毕业，后硕士毕业	✓	休学一年“支农”；参加 NGO 做志愿者	✓
美凤	女	镇	一般大学毕业；现硕士在读		参加大学社团，大四参加校外志愿团体	✓
马田	男	镇	一般大学毕业，硕士中途退学；现硕士在读		研究生期间参加暑期调研实践，并通过互联网了解相关资讯，后退学参加为期一年的乡村发展志愿者项目	✓
火客	男	县	重点大学毕业	✓	参加校外 NGO 做志愿者；休学一年“支教”	
童淼	女	中小城市	一般大学毕业	✓	参加校外 NGO 做志愿者	✓
钰晶	女	中小城市	重点大学毕业；后海外硕士毕业		大学参加暑期实践，选修各种选修课，参加学生会；毕业后参加官方社团的一年期“支教”项目	✓
子康	女	大城市	中专毕业；现硕士在读		没有读大学；通过电视、互联网接触 NGO，参加本市的 NGO 做志愿者	

一、 1980 年代以来的 NGO 形意世界的发展简史¹⁰⁶和大学空间的演变及特点

¹⁰⁶ 囿于研究目的和篇幅，本论文在第一章和本章只涉及了 1949 年之后社会组织的发展历史梳理。有关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的发展历史，可参考 Ma (2006)。王绍光、何建宇 (2009) 提到，传统中国中以家族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初级社团非常丰富。然而，具有现代性的民间社团开始于 1895 年 9 月康有为发起的“强学会”——由改良派人士组成的团体，5 个月后被取缔，但是由此掀起了在知识分子中的创建学会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历史概览

当代中国的社会组织是伴随着“改革开放”而产生，与发展主义共享着相似的历史起点和发展时期。

伴随着 1970 年末“文革”结束和改革伊始，社会组织重新开始发展(Ma, 2006: 1; 王名, 2008: 35; 林尚立, 2007:7; 康晓光, 2001:4)。本节将新时期社会的发展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之初到 1980 年代末，从无到有开始发展的阶段（王绍光、何建宇，2009）。1976-1988 年间，因为各级政府部门都有权审批和管理社团，而非民政部门垄断审批权，因而这十年被认为是社会组织自由自在、迅猛发展的 10 年（康晓光，2001:10）。据 1989 年民政部开始依法对社会组织进行登记时的估计，当年全国性社团大约有 1,600 个，地方级社团 20 万个（王绍光、何建宇，2009）。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出现了自上而下的、由体制推动形成的、以学术团体、研究会为主的结社活跃局面，社会经济领域内的社会组织¹⁰⁷、宗教团体成立的社会组织¹⁰⁸、大专院校的文艺社团等也纷纷或恢复或成立（王名，2008:11-35）。除此之外，基金会也在 1980 年代开始成立并发展，比如 1981 年成立的中国儿童和少年基金会等（同上：19-20）。这一阶段以 1989 年的天安门社会运动为界，89 运动后，为了消除社会运动带来的“自由化倾向”，社会组织进入清理整顿阶段¹⁰⁹（王绍光、何建宇，2009；王名，2008:22），注册社团减少到 1991 年的 11 万个（王绍光、何建宇，2009）。

第二个阶段是 1990 年代到 2007 年。这一阶段，一方面，社会组织发展受到政策法规极大压制，比如 1989 年对社会团体的双重管理体制、1998 年对《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修订提高注册资金门槛、2000 年国务院出台的有关取缔“非法组织”等政策（王名，2008:24-25；王绍光、何建宇，2009），但另一方面，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深入，社会组织的发展在 2000 年前

热潮。1919 年“五四”运动后，在大城市中迅速扩散了成百上千的青年团体、学术团体、文学俱乐部、互助合作社等，其中大学生和大学教授尤其活跃。

¹⁰⁷比如 1978 年 4 月，红十字会在北京、上海、天津等 10 个城市开始恢复工作（王名，2008:11-35）

¹⁰⁸比如基督教青年会（YMCA/YWCA）于 1980 年 1 月在 11 个城市恢复工作（王名，2008:11-35）。

¹⁰⁹ 1989 年下半年，民政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对基金会和社会团体进行复查（王名，2008:22），大量社团无法找到业务主管单位，被清理取消（王绍光、何建宇，2009）。

后进入发展高潮¹¹⁰（王名，2008：25-32），在“质量”上有所提高，比如规模的发展、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康晓光，2001：18）。1999年到2007年期间，每年社会组织的新增数量约为30%¹¹¹（同上：25-26）。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投身于公益创业¹¹²（王名，2008：28-29；邓国胜，2004：93）。然而，社会组织的空间分布呈现高度的不平衡性，城市的发展水平远远高于乡村，经济发达地区高于经济落后地区，沿海地区高于内陆地区（康晓光，2001：4）。

那么，为什么社会组织会在“改革开放”之后开始迅猛发展？这背后是有着诸多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际条件：1）**政治环境**：文革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合法性出现危机，因此谋求通过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来提高合法性，通过主动组建和主导 NGO（主要是官方 NGO）提供关键的社会和专业服务，并且为经济和社会转型提供中介（Ma，2006：5-8；康晓光，2001：17-20；贾西津，2008）。这一时期，政府也有意识地开展思想解放运动、宣扬恢复公民的个人权利；为了推动学术研究以及赢得知识分子的支持，开放了对学术团体的限制（康晓光，2001：17）。发展社会组织也是政府减轻财税负担的途径（邓国胜，2004：87-89）。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不同部委、不同地方的政策，不尽相同，这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了空间。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改革的压力，也使得政府开始发展社会组织。比如一些国际活动需要有来自社会组织的代表出席；来自国际对中国的援助也使得政府需要创办社会组织以吸引国际援助（邓国胜，2004：87-89）。尽管政府一定程度推动一些社会组织的创办，但是也以国家利益和安全为重要考量因素，限制一部分社会组织的活动；作为共产党专政国家，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依然是影响中国 NGO 的决定性因素（Ma，2006：5-8）。政府对社会组织实施控制和发展的双重策略（贾西津，2008；康晓光、卢宪英、韩恒，2008）。控制包括：对于不同的社会组织采取分类控制（比如登记机关不同，业务主管单位

¹¹⁰这一时期发生的另外两个事件也是推动民间团体发展的重要事件：1990年代末的官方组织推动的“希望工程”让社会看到民间组织在公共服务和倡导方面的巨大引导作用，随后的青基会事件开始引发对民间组织内部治理及行业自律的意识、2004年的怒江水坝事件则显示了民间组织从初始阶段作为缓解财政危机的功能、到中期作为转移政府职能向的功能再到后期向参与公共治理的转变（刘培峰，2008：62）。

¹¹¹不过因为这部分草根机构常常采用在工商部门注册，甚至不注册，因此其总体规模很难准确把握（王名，2008：28-29）。所谓草根组织指“根植于社区基层并主要服务社区居民、具有较强民间性的组织”（王名，2008：28）。草根机构采取工商注册是因为正式注册为社会组织的门槛较高。

¹¹²另外，就业形势严峻也是年轻人选择 NGO 工作的原因之一（邓国胜，2004：93）。

的性质多元化；主管单位对于社会组织的具体控制多元化)¹¹³；政府安全部门对所有组织和个人都有所控制，不能做出“出格”的事情，不能公开挑战政府的权威，否则，安全部门会采取相应的管理行动（康晓光、卢宪英、韩恒，2008：316-318）。但是如何定义“出格”，康晓光等并没有提及。除了控制，政府通过培育“可控的”社会组织体系，以满足社会需要，消除“自治的”社会组织存在的必要（康晓光、卢宪英、韩恒，2008:333）；政府选择性培育行业组织、社区组织、慈善服务等（贾西津，2008：222）。在政府的控制和重点培育下，社会组织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和政府的权威（康晓光、卢宪英、韩恒，2008:337）。政府的社会组织管理政策，为草根 NGO 的发展带来了制度困境：首先，部分草根 NGO 无法在双重管理体制下完成合法注册，失去合法身份，带来了资金、规范性、公信力建设等问题；其次，很多类型的组织受到法律限制，比如农民、工人、外来工等特定群体的组织，同时，一些草根组织的影响力增加时，被干涉的可能性也会增加；在获得政策优惠和政府支持方面，也常常处于被忽视的地位（贾西津，2008：197）。草根 NGO 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呈现为具有不平等权力关系的、脆弱的偶然性共生关系(contingent symbiosis)，面临持续的被打压的风险和现实，这使得中国的草根组织具有自我限制的性格，并且为了生存，需要协助政府提供社会服务的目标，并避免涉及争取民主的主张，后者可能会带来政府的惩罚甚至勒令关闭，而政治底线却常常变化和模糊不清的，主动权掌握在政府一方（Spires, 2011）。2) **社会矛盾加剧、社会问题突出**：伴随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政府从原有的社会保障体制退出，出现了大量的社会问题，政府希望依靠民间社会来提供回应(Ma, 2006：5-8；康晓光，2001:20)。3) **民间社会的扩大**：由于政府从社会服务和保障中渐渐退出，社会组织开始发展壮大以回应各种社会需要、经济和社会不公平、弱势群体和环境退化等问题(同上)。市场经济的发展催生了中产阶级的成长——尤其是在城市和沿海地区，他们尝试通过社会组织来表达其经济、政治诉求。同时，民众增加的私人时间、空间和经济资本也使得民间团体大量发展(同上；王绍光，1995)。中国社会在过去 30 多年经历的“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过程，也是社会组织兴起的原因之一：社会组织使得个体开始重新嵌入不同于传统的新集体，面对因为个体化而产生

¹¹³由于注册和管理的双重体制使得一些草根组织很难找到主管单位，因而选择以企业身份注册甚至不注册，导致了一部分组织没有纳入合法的控制范围（康晓光、卢宪英、韩恒，2008：317-318）。

的诸多社会问题 (Rolandson, 2010; 阎云翔, 2010)。4) **国际力量——包括国际“公民社会”、全球化、技术等——对 NGO 的深刻影响**, 尤其是 1980 年代末以来的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了中国的结社活动和政治参与 (可以参考王名, 2008: 49-50; 王绍光、何建宇, 2009; Yang, 2003; 杨国斌, 2009), 国际“公民社会”通过引进方法、技术、资金和人员支持等渠道影响着 NGO 的发展 (可参考邓国胜, 2004:87)。2002-2009 年间, 美国的基金会共向中国提供 4.42 亿美金的捐款, 其中不到 6% 直接捐赠给草根 NGO, 85% 捐赠给官方 NGO、学术机构和政府部门 (Spires, 2012; Spires 等, 2014)。“改革开放”之后, 党政机构为了绕开不能直接与境外组织发生关系的障碍, 创建了一批“新”社团, 以与国际进行交流 (康晓光, 2001:17)。

在上述整体社会组织发展的背景下,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这正为那些自下而上形成的草根组织 (也即本研究所指的草根 NGO) 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根据《中国民间公益组织基础数据库数据分析报告》¹¹⁴ (2014) 指出: 1990 年代开始, 草根组织数量呈上升趋势, 2000-2001 年是增长的转折点。截止到 2013 年, 广东和北京是拥有草根组织最多的省市。促进这些草根组织发展的诸多直接因素包括¹¹⁵: **第一**, 1995 年的世界妇女大会的 NGO 平行会议在中国北京召开, 在中国首次推广了有关 NGO 的知识, 令不少知识精英开始了解 NGO 的独特价值和影响力及其对诸多议题发表看法和影响的能力, 同时推动了一大批从事妇女议题的民间组织¹¹⁶对妇女发展的参与¹¹⁷ (邓国胜, 2004:85; Ma, 2006; 王名, 2008; 刘培峰, 2008: 61-62)。**第二**, 自 1980 年代开始进入中国的境外机构在资金和理念方面的影响, 比如福特基金会、世界宣明会、救助儿童会、香港乐施会、美

¹¹⁴ 该研究报告由“中国公益 2.0”和“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撰写, 根据这两家机构和南都公益基金会已有的 NGO 名录, 并且通过邀请各自网络内的 NGO 以及通过这些 NGO 继续邀请其他 NGO 进行填写, 同时通过在各种重要的 NGO 大会上推广收集更多的机构进入数据库。最后一共有 3000 多个组织填写, 经过复核的机构共有 788 家。该报告是根据这 788 家的信息进行的整理分析。对于民间公益组织的定义是, 在大陆境内发起的、民间自发成立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不含基金会的一切注册或者未注册的组织。报告网址: <http://www.naradafoundation.org/html/2013-09/16417.html> 浏览日期: 2016-5-10

¹¹⁵ Spires 等(2014)也指出, 草根组织的发展主要开始于 2000 年代初, 两个重要的可能原因被认为是, 互联网的发展以及 2000 年代初开始的 NGO 支持组织和培训项目的普及, 让更多的人了解到 NGO 这一形式 (73)。

¹¹⁶ 人民团体“妇联”也是重要的推动者和参与者 (邓国胜, 2004:85; 马秋莎, 2006; 王名, 2008; 刘培峰, 2008: 61-62)。

¹¹⁷ 比如全国妇联为了准备世妇会的召开, 组织了一个全国范围的妇女骨干培训, 举办了超过 8,000 个工作坊和研讨会, 有超过 200 万的参加者, 其中多数都是第一次知道“NGO”, 由此“NGO”开始进入中国政治词汇之中 (马秋莎, 2006)。

国国籍小母牛项目组织等（王名，2008）。1995 世妇会之后，境外 NGO、联合国体系、发达国家的海外开发援助机构、国际金融机构都开始关注中国 NGO，提供资金支持；早期的活跃地域是北京和云南，之后向其他城市和地区散开（邓国胜，2004:85-87）。以福特基金会为例，2000 年，北京著名的两家本土环保组织地球村和自然之友的资金很大部分来自福特基金会，分别占其筹款来源的 85% 和 52%（Ma，2006：195）。**第三**，1995 年之后，媒体对于 NGO 的社会知晓度的提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媒体在 1995 后，对 NGO 的报道从少到多，比如发行量大、有影响力的《三联生活周刊》、《南方周末》频频报道 NGO，《人民日报》也曾在头版头条对民间环保组织进行报道；通过媒体的报道，NGO 的知识得到了普及，也为这些团体争取了志愿者、物资等资源（邓国胜，2004:94）。为什么媒体在 1990 年代开始加大了对 NGO 的报道？以下以环境议题为例进行说明。第一，首先来自于政府对于一些社会议题的重视，并且允许甚至鼓励媒体的参与报道。对环境议题而言，中国政府自 1970 年代在联合国会议上开始接触、讨论环境议题，环境议题被列入国家议事日程，并且制定法律，与之相配合的，在 1970 年代的报纸上也第一次出现题目包含“环境保护”的报道，对环境议题的报道从《人民日报》等党报开始散布到专门的环境类报纸；1993 年时任中国人大环境与资源委员会主席发起“中华环保世纪行”，要求新闻媒体记者以新闻和舆论监督环境保护，在 1993 年到 2005 年间，累计有 5 万余名记者参与、共发表 15 万篇关于环境保护的稿件（陈阳，2014:13）。第二，另外一个重要的脉络是，从 1980 年代开始、1989 中断到 1992 年南巡讲话之后再度启动的媒体市场化改革（参考钱刚，2006）。曾繁旭（2009）通过对媒体报道的公共议题的分析发现，媒体市场化改革、媒体的专业主义发展以及公民社会的发展这诸因素之间的互动产生了非政府意图的结果：媒体市场化改革改变了之前的媒体作为党的喉舌、完全承担宣传党的意识形态的角色，政府不再是媒体的主要行政资源来源，并且退出一定空间，令媒体可以有一定的空间按照市场需要进行媒体生产¹¹⁸，在经济上创收。因此媒体需要积极地选择那些既在意识形态上被允许、又能争取中产阶级读者的议题，甚至以此作为市场化竞争中建立自身品牌的途径。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媒体人员的能动性，其较强的“民间/社会立场”（换言之，是正

¹¹⁸ 虽然这一时期媒体开始市场化，但是中共和政府依然对媒体进行管治，强调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钱刚，2006：5-9；周永明，2006）。

在形成的新闻专业主义文化)、采用非官方的消息来源(李艳红, 2006)。比如, 环保运动中的重要事件——1995年的滇金丝猴保护运动——的开始, 便和一位媒体人奚志农对滇金丝猴的影像记录和四处呼吁有关, 这其中是带着他作为媒体人对野生动物遭到猎杀的愤怒感情有关的(可参考陈阳, 2014:8-13)。第三, 除了上述原因外, NGO在媒体策略上的主动性, 主动提供消息来源给媒体(李艳红, 2006)。对于一些草根NGO来说, 他们拥有一定的网络媒体资源, 比如有些组织的创立人曾经是媒体从业者, 或者其会员、志愿者中有一些媒体从业者(曾繁旭, 2006; 陈阳, 2014:13)。除了环境议题以外, 性别议题也获得媒体工作者的广泛报道。1990年代以来, 民间妇女组织较为重视对大众媒体的作用: 2001年对于北京的22家民间妇女组织的调研显示, 多数组织与媒体保持良好关系, 积极利用媒体进行传播; 1996年妇女传媒监测网络成立, 以《中国妇女报》为基地, 聚集50-100名大众媒体的记者、编辑, 通过双月信息交流会、组织报道、社会性别媒体培训等方式, 促进大众媒体关注性别平等问题; 一些记者本身也是妇女组织负责人, 加大了妇女组织和媒体的合作(卜卫、米晓琳, 2004)。然而, 第一代的妇女组织较少使用市场化媒体¹¹⁹。

通过以上的脉络梳理, 不难发现, NGO工作者所进入的NGO形意世界, 重新开始发展于1980年代, 在2000年前后形成了第一次高潮的发展时期, 而本研究中的对话人也正是在1990年代末到2000年中后期开始, 或在大学、或通过媒体、或通过所在城市的社团组织, 开始被招募进入这一形意世界进行志愿行动。

志愿服务¹²⁰在中国的变迁

不少NGO工作者在全职工作之前都曾经有志愿者服务经验。本研究中的10位对话人皆有志愿服务的经历: 或于大学中或于大学校外的公益性团体服务, 或于草根NGO或于官方组织¹²¹参与志愿者活动, 或几者兼而有之。因此本节将回

¹¹⁹参考李军(2016)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举办的第十二届国际研究生“当代中国”研讨班会议的报告,《青年女权运动:媒介作为核心政治资源》。

¹²⁰ 本研究中对志愿服务的历史梳理, 起始于“改革开放”之后。对于之前的历史, 可以参考朱健刚(2008)等。1960年代中期中国对亚洲和非洲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大量援助的过程中派出大批志愿人员(朱健刚, 2008:6)。也有研究认为中国的志愿者可以追溯到雷锋精神(Lu, 2010)。

¹²¹ 例如共青团开展的志愿者活动。

顾志愿服务在中国的发展特征和动力。

中国政府是志愿者运动的关键推动者，志愿者运动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动员过程（朱健刚，2008:6-7）。“改革开放”后，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向中国派出志愿者，随后其他国际组织也相继派遣志愿者到中国或者在本地开始发展志愿者小组（同上；谭建光、王媛媛&朱莉玲，2011：380）。志愿者组织的出现，和“改革开放”之后所出现的新的社会问题有关。比如，深圳义工联的出现是为了回应深圳出现的大量外来务工青年对于权益问题的需要（谭建光，2001：311，313-314）。1980年代时，广东、天津、上海等地区开始探索和尝试，并逐渐推向全国各省市（谭建光、朱莉玲，2007:29）。深圳和广州因为毗邻香港，在1989年已经开始开展志愿活动¹²²（Lu，2010:31；谭建光，2001:311-316）。以中国第一个正式成立的志愿者组织——深圳市义务工作者联合会（深圳义工联）——为例，在1989年的创立原因便是来自于深圳共青团市委的干部的提出、并且在其初期发展中得到了深圳共青团、深圳中共市委以及政府的支持以及媒体的广泛报道；而深圳的经验被中国共青团所吸取，在其基础上于1994年成立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谭建光，2001:306-316）。1990年代，各地的志愿者工作探索，很快引起政府重视，民政部门将志愿者纳入社区服务范畴进行推广，文明办将其纳入公民道德服务的范畴，共青团推动青年志愿者行动：政府的推动，一方面推动了志愿者运动的发展，但是也因共青团的行政干预，制约了志愿者团体的发展（谭建光、朱莉玲，2007:30）。在中国最为活跃、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大的两支志愿者队伍分别是：1）1980年代后期，民政系统推广社区服务的过程中，引入的社区志愿者（朱健刚，2008：7-8）；2）1993年由共青团发起的青年志愿者行动以及于1994年成立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Lu，2010:32；朱健刚，2008：7-8）。这两个志愿者体系都是自上而下推动发展的（朱健刚，2008：7-8）。媒体在“志愿者”这一新名词进入公众视野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89-1993年，深圳本地报纸对于义工联的大量报道，使得该团体和义工的知名度大大提高（谭建光，2001：314-315）。1997年上海第八届全国运动会由于人力缺乏，借鉴国际经验，提倡志愿服务，因此成立了宣传部领导的全市性的志愿者协会，政府各个部门、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宣传部门也相继成立志愿者协会，这一创新

¹²²第一个带有“志愿者”字眼的青年志愿者服务电话热线开始于1987年的广州（Lu，2010:31）。

引起了媒体的广泛报道；媒体的广泛报道促进了“志愿者”变成了流行词，成为参与公共生活的时尚（同上：8）。然而，对于自上而下推动的志愿者活动，参加者较没有主动性，对服务社区民众和志愿者本身的日常生活产生影响较少，但是自上而下的志愿者动员的间接结果是，为许多民间志愿者组织的出现创造了机会（朱健刚，2008:7, 9）。

进入 2000 年代之后，2001 年中国配合联合国举办“国际志愿者年”系列活动成为重要转折点，民众开始了解到志愿者不仅是党政部门推动的青年或者社区活动，涉及社会各部门和团体；而且在国际上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以共青团等官方群众组织为主要推动的志愿者团体受到国际上的志愿者经验的影响，也开始产生转型的内部动力，与国际的志愿者团体、本国的民间团体进行合作（谭建光、王媛媛&朱莉玲，2011）。以广东为例，兴起了自下而上的、以民间为主体推动的志愿者组织的发展，包括境外组织的参与（谭建光、朱莉玲，2007:30）。2000 年代以来，以互联网为依托、以网民为主体的志愿者团体，开始出现并非常活跃（谭建光、王媛媛&朱莉玲，2011：381）。

大学生是志愿者服务中的重要力量，参与的志愿服务包括参与“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大学生志愿服务三下乡”、青年志愿者协会或大学志愿者团体、社会公益组织的活动，包括在敬老院、孤儿院服务，也包括大型活动上的志愿服务，涉及领域包括扶贫建设、社区建设、环境保护、大型活动领域、国际交流和海外服务（祝小迁、窦贤琨，2012：109）。

对于所有对话人来说，最初接触公益并开始做志愿者，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并非是主动地、有意识地寻找 NGO 的结果。所有对话人在参与校内或校外社团之前，对环境保护、乡村发展、志愿服务等并没有太多了解、甚至完全不了解；相反，他们是在参与的过程中，慢慢认识和了解。他们主要是在大学中或者通过媒体开始接触、了解 NGO、志愿服务。10 位对话人中有 8 位是在大学中开始接触和志愿服务、初步知道“志愿者”等语词，另外 2 位分别是没有读大学的子康和工作之后才通过同学介绍知道有 NGO 的水仙，他们接触有关 NGO 的资讯则和互联网有较紧密的关系。以下将重点分析不同的接触志愿者经历的途径——大学和媒体。

在大学：邂逅“公益”

20世纪以来，中国的大学一直是思想较为活跃、激进的机构（Wasserstrom & Liu, 1994；赵鼎新，2007：65-68）。1949年后，政府加强了对大学的管理和干预。文革结束之后的1980年代的大学校园里不断涌现对西方哲学和政治理论的热情，大学生通过阅读书籍、参加学校的各种讲座以及参加沙龙、同学之间的交流以接受、思考这些不同思潮（苗素莲，2004:99；赵鼎新，2007：83）。受1989年学生运动、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国家崩溃的影响，1990年代初的中国大学进入整顿阶段，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抵制西方“和平演变”（苗素莲，2004:103）。为保证大学的社会主义办学方向，1990年的大学领导制改为“党委领导”（苗素莲，2004:115-116）。换言之，一方面，大学聚集知识分子，具有关心、参与社会的传统，但另一方面也一直生活在政府的管治压力之下。1990年代，市场经济也开始影响大学，包括对教学质量的影响，同时校园文化开始受金钱文化的影响。1990年代初的“全民经商”大潮，冲击着当时的大学，大学老师纷纷下海经商或者一边教书，一边在外兼职，优秀教师流失和教学质量下降（苗素莲，2004:112）。这一时期不仅校园里充斥着经商炒股的风气，“市场经济改革”也影响了大学生的专业选择，金融、财务、计算机成为热门专业，而文史哲、农林牧则成为冷门专业（苗素莲，2004:113）。1999年开始的大学扩招和产业化的过程中，大学教育的目的被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所影响，公民教育和人文教育缺失（白亚丽，2012：21）。扩招的另外影响是，大学生群体数量显著增加，并且开始贫富严重分化（温铁军，2005）。除此之外，大学中的“出国热”持续升温，尤其是在名校中的大学生，流行在大二之后开始准备通过托福和GRE考试（苗素莲，2004:115）。1990年代末期以来，大学公益性社团开始发展，尤其是在一线城市的大学，这一点将在下文中展开分析。

正是在这样的充满各种张力的大学校园里，一方面物质主义、实用主义、“出国”文化大行其道；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社团——尤其是公益性社团开始萌芽并发展的背景下，一些大学生开始了解甚至加入志愿者之列。

大学中的青年工作和结社：简述大学生社团和大学公益性社团发展的历史与特

点

共青团和大学生社团

1949年后，大学中的青年工作主要是通过中国共青团和学生会¹²³——均是政府管理的群众性组织——开展。1983年10月，共青团中央和全国学联发出关于开展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周的通知，大学生社会实践开始发展，在之后的二十多年中，内涵不断丰富（王愉，2013:87；陈扬，2010:69）。

需要注意的是，自1980年代，共青团对青年人的吸引力日趋下降（Wasserstrom & Liu, 1994: 368-369；王绍光、何建宇，2009）；1992年以来，伴随着深入的市场经济改革，社会政治环境逐渐宽松，学生会、共青团组织的控制力普遍弱化或趋向间接性以及无法满足所有学生的需求（王振卯，2004:381¹²⁴）。1990年代初期，鉴于形势变化，共青团为了保持对新一代青年的吸引力，试图通过推动青年志愿者活动来开拓新领域，推动建立了全国性志愿者组织¹²⁵（朱建刚，2008:8）。1993年12月共青团中央启动“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到1999年年底为止，累计8000多万人次向社会提供了超过40亿小时的志愿服务，而这也是大学生志愿者组织发展的背景之一（王占军，2008:26）。从1999年开始，共青团和青年志愿者协会开始在一线高校招募大学生去乡村支教、扶贫的一年计划（Lu，2010:12）。

除了共青团直接组织青年工作，大学中在不同时期还活跃着自发的学生社团。这些大学社团主要指，以共同兴趣、爱好而自愿组成的、有共同理想目标的大学生组织（代妮，2010:8），作为学校内的基层组织，根据法例，无需在民政部门登记（王绍光、何建宇，2009）。1949-1956年，大学社团以极强的政治性和专业性为特点；1956年之后、尤其“文革”阶段，大学生社团受到极大影响，基本处于停止运行的状态（代妮，2010:10）。1980年代的大学生社团发展迅速（苗素莲，2004:99），除了专业性和学术性社团，还出现了艺术类、体育类¹²⁶以

¹²³学生会是中共领导下的全国大中学生的群众性组织，大中学校必设的组织结构，是中共联系学生的桥梁，在大学中一般由共青团组织领导，本质上是政治组织（代妮，2010:8-9）。

¹²⁴ 收录于王名（2004）。

¹²⁵ 1993年12月，共青团中央在十三届二中全会上第一次提出“青年志愿者”，作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中国青年工作战略计划的一部分，次年，全国性志愿者组织“中国志愿者协会”成立（袁亚婕，2014: 1）。

¹²⁶ 有研究认为，大规模的89社会运动的产生，与当时城市中的大学校园的日常生活和学生间互动有着密切关系；大学中的非正式团体或非政治性团体为学生运动家提供了组织技能的培训和人际网络的积累；共青团这类正式的政治性团体也为学生运动家提供了组织技能和意识形态的准备（Wasserstrom & Liu,

及社会性、政治性社团（代妮，2010:11）。89 社会运动结束后，高校社团遭受沉重打击（同上；杨晓辉，2004:352）。

然而，1990 年代之后大学社团又进入恢复发展时期（王振卯，2004:381）。2003 年底随机抽取 108 所大学进行调查，发现平均每所大学有 14.06 个学生社团，但是各大学的学生社团活跃程度不一¹²⁷；该研究和一项 2000 年在上海进行的定量调查数据结果相似（王绍光、何建宇，2009）。考虑到学生社团包括学术类、兴趣爱好类等不同种类，据此估计，在这一时期，大学生能够通过参加社团而参与公益志愿者活动而被招募进入志愿者形意世界的概率并不高。然而，在北京、广州这些志愿者组织发展历史较早的地区、并且在重点大学读书的大学生，相比其他城市以及非重点大学的大学生，进入这一形意世界的概率更高。下面将重点讨论含有公益志愿活动因素的大学生社团的发展历史。含有公益志愿活动因素的大学生社团，在本节中概称之为大学生公益性社团，主要指那些关注、研究或行动参与和环境、乡村发展、弱势群体、志愿参与、性别平等有关的、自发形成的组织。在本研究的 10 位对话人中，有 4 位是通过参加大学公益性社团而进入志愿形意世界的，其中 2 位为参加环保类公益性社团，1 位参加三农类公益性社团，1 位参加志愿服务类公益性社团。

大学生公益性社团

伴随着大学中的社团的蓬勃发展、经济改革带来的一系列环境、城乡、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自 1990 年代开始，大学中开始出现公益性社团，并自 1990 年代中期开始活跃起来，这一发展历史与社会上的社会组织发展的历史脉络相似¹²⁸。这一时期开始出现的公益社团，主要包括环境保护（环保）社团、乡村教育支持（支教）社团、“三农”或者乡村建设社团（三农社团）、和性别议题有关的社团、以及跨议题的志愿者或者爱心社团（志愿者社团）。然而，因为专门研究中国大学公益性社团发展历史的研究较少，本节将通过整理分析已有的关于

1994)

¹²⁷另据一项发布于 2004 年的统计，北京高校共有学生民间组织 2235 个，覆盖学生人数近 17 万人，占北京普通高校学生总数的 30.9%，具体参见刘培峰（2008）《扩展中的公民结社权》，页 63。

¹²⁸可参考王振卯（2004），杨晓辉（2004）分别就 2 所大学公益性社团的调研报告。收录于王名（2004）。

环保类公益性社团和三农类公益性社团的发展历史，来初步绘制大学公益性社团的发展过程和主要动力因素¹²⁹。之所以选取这两类社团进行分析，一方面是因为这两类社团的发展历史较长、有一定的经验整理，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这是本研究中的对话人主要接触的社团类型。

大学生环保社团

Lu Hongyan (卢红雁)的《雨后春笋般的发展：中国的大学生环保社团的历史》¹³⁰(2003)一文通过调研和参与式观察，对中国2000年初之前的大学生环保社团的历史进行了梳理，是珍贵的历史材料，也是本文所采用的重要的二手材料。大学生环保社团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1990-1995年，北京、上海、天津、成都等地共有12家环保社团成立，其中有6家在环保社团位于北京，数目最多。12家中有6家是由大学学生活动管理部门或者院系老师推动发起，以加强环境和科学专业的学习与交流的目的；4家由学生主导成立，以提高学生环境意识(Lu, 2003:55)。第二阶段是1996-2002年间，环保社团开始迅速发展，尤其是1998年之后开始爆炸性发展，从1996-97年的22个，到2002年的150个。比如在1990年代末，自然之友的16家团体会员中，有14家是学生环保组织，大学生在这些社团中得到了锻炼和熏陶(邓国胜, 2004:93)。2003年，26个省、市、区的176所大学都有环保社团，每个重点高校至少有一个环保社团。环保社团在1990年代中期开展各种社会活动，因此获得了媒体的注意，而媒体的报道又使得其在学校管理层、环保政府部门的能见度提高。自1998年后，环保社团开始跨校联结。

这一时期的井喷式的大学环保社团的发展，是在一定的社会脉络下发生的：1) 与上文脉络化中国NGO发展的动因相同的是，“**改革开放**”之后产生的**严重的环境问题，是环保社团发展的直接原因**(Lu, 2003:57)，并且如上文所述，这些环境问题经过媒体的报道，为社会成员所知晓，以及社会上的环保运动家的出现催生了这些环保社团。1994年第一个环保NGO——自然之友——的成立推

¹²⁹就研究方法而言，仅仅通过分析部分类型的公益性社团的历史，以概括整体地公益性社团发展动力，并不合适。但是囿于本研究的研究重点和现有二手资料的不足，本研究仅能通过这两类公益性社团的历史描述，提供一幅并不完整的图像。

¹³⁰ 原标题为英文，为了行文顺畅，我将其翻译成中文。

动公众对于环境问题的参与，推动了大学生环保社团的发展（Lu, 2003:57）。1995年，环境摄影师奚志农报道了云南滇金丝猴栖息地遭到破坏的新闻，引发环境运动家兼作家唐锡阳、自然之友、以及北京和昆明的大学生环保社团等，开展了大型保护滇金丝猴的倡导活动，被媒体广泛报道，在社会上引发了一场保护金丝猴的舆论。这场保护滇金丝猴运动为大学生环保社团带来了两个重大影响：第一，第一届的跨地区的大学生绿色营于1996年在滇金丝猴栖地保护区举办；第二，掀起了大学生环保社团的扩张以及大学生环保社团与政府、NGO和个人的合作，比如北京成立的绿色大学生论坛，目的就是通过出版简讯和联席会议保持和扩展北京的学生环保分子的工作联结（同上：57-58）。另外激发青年学生参与环保社团的事件包括，①1998年长江洪水灾害，该事件激起全国和地方媒体对环境问题的广泛报道（同上：58）；②2000年的保护藏羚羊运动，使得环保社团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同上）。

2) 来自**政府、媒体、国际NGO和基金会以及跨国公司的认可、资金推动也是重要原因**。如上文所述，环境保护的宣传在中国是自上而下地由政府推动的，环保部门注重大中学生在环境教育中的角色，从2000年左右开始，政府部门、国际机构参与的环保评比，纷纷颁奖予大学生¹³¹，国际机构和基金会也向大学生提供小额基金（Lu, 2003:58）。大学环保活动得到了社会认可，而且获得校外的资金、知识等资源（可能也是管制和规范）。自从1999年开始，越来越多的大学社团接受来自基金会和NGO的资金，其中很大部分来自国际的基金，比如全球绿色基金（Global Greengrants Fund）在2001年和2002年分别提供给13个和22个大学环保社团小额基金等（Lu, 2003:60）。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国际机构和基金会扮演了重要角色，参与重要的环境保护类的颁奖和带有资金支持的各种活动。

大学生“三农”/乡村建设（乡建）社团

三农类大学生社团的发展历史较环保类社团更短、获得社会广泛认识和支

¹³¹ 2001年由中国环境保护部和香港地球之友联合开展的民间环境保护奖项“地球奖”第一次颁给了3个大学生环保社团。这一年，福特环保奖也颁予了大学生环保团体。同样这一年，《中国青年报》和世界自然基金会联合举办保护长江的“湿地使者”计划，邀请大学环保社团提交活动建议书，入围项目获得奖金支持（Lu, 2003:58-59）。

持程度也较后者更少。但是这一领域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也积累了一定的文献材料。与环保社团的发展动因相似，三农社团的发展也是处于社会矛盾更加加剧和明显化的 1990 年代。正如上一章所指出，中国乡村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一直是处于被剥夺的位置，无论是土地资源、人才资源还是经济资源，这种状况伴随着“改革开放”、在 1980 年代达到了矛盾激化的状态。另一方面，的 1990 年代末，大学开始扩大招生，更多的青年人进入大学，但是这一群体也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贫困大学生面临着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等等欠缺的挑战（温铁军，2005）。在这个背景下，一些关注乡村发展的学者、官员以及大学生开始在 1990 年代末自发组织乡村调查的社团活动，该支农运动得到了国际基金会的支持后，进一步地发展起来。

白亚丽的《主体教育型青年下乡实践——以当代乡村建设中的大学生支农调研活动和农村发展人才计划为例》（2012）、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大学生支农与乡村建设十年历程》（2012）等文对大学生“三农”社团和实践的背景和历史进行了梳理。**第一个阶段：**1990 年代末到 2002 年，北京、天津出现关注“三农”问题的大学生社团，比如北京师范大学的“农民之子”，北京大学“乡土中国”、中国农业大学“农村发展促进会”¹³²、天津科技大学的“新希望农村发展促进会”等，这些社团自发组织大学生去农村的“下乡”活动（白亚丽，2012）。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社团的发起过程中常常是大学老师或者研究者的启发、建议并结合一些有兴趣的大学生的勇于尝试。以“农民之子”的成立过程为例，其创立者曾经参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的对北京的农民工的问卷调查，该研究中心老师建议这些大学生可以组建社团以组织更多的大学生关心三农问题¹³³。2002 年 3 月，《中国改革·农村版》杂志社创刊，主编为“三农”专家温铁军，农村版聚集了一批上访农民，彼时温铁军自费支持一些乡村大学生利用寒暑假返乡调查（梁漱溟中心网站，2012；白亚丽，2012）。该杂志也聚集了一批关注农村问题的知识分子，他们通过写作和媒体再现农村困境¹³⁴。**第二个阶段**是自 2002 年的快速发展阶段。2002 年中，某国际基金会主动找到温铁军，

¹³² 该社团是由中国农业大学学生于 1993 年 12 月 6 日自发组织成立的学术团体，以“崇尚科学、献身农业”为指导方针，以提高会员对“农业、农村、农民”的认识水平、促进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普及为目的，围绕“服务三农、锻炼自我”中心开展工作。但在成立之初，主要着力于农技推广方面的服务。摘自 孟登迎、何志雄（2015）。

¹³³ 参考 孟登迎、何志雄（2015）。

¹³⁴ 参考 孟登迎、何志雄（2015）。

希望提供 5 万美金用于支持大学生参与乡村建设运动。有了固定的资金支持，大学生参与支农运动迅速扩展开来，举办了跨地区的大学生支农骨干培训，推动二十多所高校加入支农队伍；2003 年 1 月的寒假大学生支农调研培训班，有来自全国各地的 100 多名同学参加，是第一次全国规模的培训，许多参加者成为了各地支农骨干，也引发了全国性支农热潮（梁漱溟中心网站，2012）。到 2004 年 5 月，全国已经有 120 多支支农社团，北京一地就有 30 多个支农社团（同上）。2004 年，梁漱溟乡建中心的成立，持续地支持三农社团和大学生骨干的培养。在三农运动中，大学生支农社团在校外的三农团体成立之前便开始发展了。

经过历史梳理，不难发现三农社团的发展的关键因素包括：1) 1990 年代以来的越来越尖锐的乡村、农民困境，引发对这一社会矛盾的调研和行动参与。2) 研究者/老师（或者说是知识分子）在其中的思想引领和推动。3) 数量扩大以及贫富分化的大学生群体对这一议题的关心和行动力。4) 三农类社会组织的发展以及国际基金会的支持，面对大学生社团的培训、网络支持等。5) 媒体对于三农问题的报道，使得这一议题为更多民众所了解。

小结：

通过上述两种不同类型的大学生公益性社团历史的分析，其在 1990 年代中后期产生并发展具有一些相似的因素，是在 1990 年代以来的社会和大学空间转变的脉络下出现的现象：1) 这类公益性社团的产生，直接回应了 1990 年代已经开始显现的城乡差距、贫困问题、环境恶化等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引起媒体、知识分子、民众的关注，形成一定的社会关注气氛。2) 政府、学校中的知识分子对于这类社会问题的关注、开展调研和推动学生参与调查和志愿行动，对学生起到了思想上的影响。3) 社会上兴起的社会团体、外国 NGO 和基金会对于大学生公益性社团的思想、资金等支持。4) 大学生群体数量的扩大以及大学内社团发展的空间，为公益性社团的发展提供了条件。5) 互联网的出现和使用，使得各类公益性社团更容易和校外资源互动等。

正是在上述的 1980 年代以来伴随“改革开放”而加速产生的各类社会问题的爆发、社会团体和草根组织迅速发展、大学空间的青年活动和社团越来越

活跃、媒体市场化使得诸多社会问题得以呈现于公共讨论等背景下，志愿参与成为一个逐渐发展中的新的形意世界，使得本研究中的“80后”NGO工作者进入的机会增加。下一节将集中描述和分析他们的具体进入过程。

二、 进入志愿参与的形意世界的空间和途径

1) 透过大学公益性社团进入志愿参与的世界

在大学时期曾参加过公益性社团的4位对话人，全部就读于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初的北京、广州等一线城市的大学，他们多数是在大学的学生社团招新的过程中，恰巧与公益性社团相遇而报名成为会员，相遇的原因包括，或因宿舍同学的带动，或因社团招新¹³⁵负责人的介绍，或因社团的广告新颖等。火客回忆与公益性社团相遇的时刻：

大学不是有社团招新么？经过社团招新的展台时，遇到了一个综合性社团，里面有各种部门，其中刚好被我遇到的是做志愿服务小组的招新师姐，然后就开始了了解她做义工……因为小时候看TVB，听过义工，所以我觉得我很想要参加，感觉做义工是一个伟大的、帮助别人的事情，这也是缘分吧，刚好被我碰上。

在火客的描述中，参与义工社团是因为偶然遇到社团招新的师姐，“义工”两个字唤起他童年时¹³⁶看香港TVB电视的经验以及希望助人的情结。正如上文所综述的，广东地区因毗邻香港，义工文化因此通过人员往来、电视媒体等散播开来。不过，对于火客来说，之所以加入这个社团，也和他的H-I-P有关。他在青少年时期，性别倾向上有很强的压抑，而且以前的生活是窄的、只有学习，所以到了新的地方、特别是大学这个位于大城市的、以青年人作为主要群体的、信息较为丰富多元的空间之中，想要去尝试、主动的去抓住一些东西，扩展曾经较窄的生活。他回忆道

进入大学仿佛打开了一片新天地，我不想继续在老家县城生活，不能做自己，太多的人际关系。到了大学做义工有偶然原因，但是，如果我以前的生活很顺

¹³⁵ 招新是“招募新会员”的简称。

¹³⁶ 火客成在广东出生、长大，从小看香港电视长大，受香港文化影响较多。

利、有更多特权，那么遇到义工团体，我不知道还会不会有那么多动力。我不确定哈。想加入一个团体跟我到了一个新的世界、我想要做很多的尝试是有关系的，你才会在遇到的时候，想要去加入。因为你不断地想要触觉，你会主动地想要抓一些东西，去试一些东西。不然有些同学为什么不参加社团呢，他们也会走过招新那里，他们也会遇到，对吧？我觉得主要是以前的压抑，那种比较窄的生活，让我想要到新的环境扩展、去尝试。

火客的故事展示出了为什么同样身处于具有公益性社团的高校（当然，这一时期主要集中在大城市），一些大学生会特别被吸引进入，这和他们曾经的 H-I-P 确实存在着关联。过去的生活经验中的切身困境和因之引发的思考使得他们有意地在进入一个新的环境中，主动寻找、尝试新的成长空间。同样的叙事也曾出现在其他“80 后”NGO 工作者的回忆中。比如在寇延丁所著的《一切从改变自己开始》（2007）一书，访谈了 26 位 NGO 工作者，其中有 5 位“80 后”工作者，在这 5 位中，有 3 位的故事中涉及其进入大学后会参与公益性社团的原因，均和其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成长背景有关：在乡镇长大，对农村、农业有着较深的感情、对于乡村的贫困有着切身的感受、对乡村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喜爱，促使他们主动选择农业类大学或专业、进入大学主动寻找或者被吸引加入三农或者环境类社团。比照我在 1999 年末进入大学读书的经历，未被环境类或者三农类社团招募其中的原因：一方面，确实彼时我所在的学校没有三农类社团，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当时的经验中，对于乡村没有足够的体认和兴趣，因而并未主动地寻找类似的社团或者老师。而那时虽然因为媒体对于藏羚羊保护的频繁和煽情的报道，使我对这个议题有一定的关心因而报名参加所在大学的藏羚羊保护协会，但是因为第一次的会员活动是去我从小长大的街区附近的小河捡垃圾，媒体报道而燃起的对于动物保护的热情不足以支持在我看来参加环保活动的索然无味，因此没有再参与环保社团的活动。而因中学时代对媒体的频繁接触让我对于记者这个职业非常感兴趣，于是把精力更多地投入于学校的记者团活动。

和火客一样，乐晏也是带着对大学的人文气氛的憧憬而进入大学的，但是到了就读的大学发现这是一所工科学校，没有人文气氛，非常失望。但是，她在大一社团招新时碰到了学校的三农社团，被招新团队的风采和广告所吸引。她提到三农社团招新的宣传，不像其它社团那么死气沉沉，他们特别主动地介绍，还配有活动照片，把去农村形容得特别好玩。所以对社会很好奇的乐晏便在舍

友的建议下报了名。另外的原因是，她觉得自己在农村长大，对农村有感情，而这个感情被三农学社的宣传活动和后续的下乡活动召唤起来。这些外在环境的因素结合主体自身的 H-I-P，使得乐晏加入了三农社团。

童淼的经历是从参加官方学生组织到参加自发的学生社团。刚刚进入大学的她，便参加了学生会。参加学生会是她中学时就有的想法，这缘于她在中学时曾经参加过官方青年团体组织的代表大会——省少年儿童代表大会和省共青团代表大会。她回忆中学参加代表大会的经历，

先跟我们市的其它学校的代表集中一起，本来都不认识，然后开始认识，然后去省会，跟更多的人在一起，住在一起，白天开会，很像后来的 NGO。我后来就觉得，刚参加 NGO 我就很喜欢参与这种会，是不是跟我那中学时有关系？那种感觉特别好，好像是国家主人，有种参与感。虽然只能举手投票，也不能说太多反对意见，但好像就进入某一个氛围，去讨论一些公共事务，他们要选代表啊。那时候特喜欢出去开会，觉得很新奇，挺开阔视野。平时在学校只有学习，但是出去之后还发一大堆资料，讨论这个、那个，还跟别的学校的同学交流，了解别的学校的生活，有的学校还有兴趣社团什么的；也认识了大学生，知道了大学有更多这样的活动。所以上了大学我先参加了学生会。

少先队和共青团这类官方的青年团体对于参加者可能也会产生某些影响，比如提供一定的参与公共生活的体验¹³⁷。从她的叙述中可以感受到她对于这种参与公共事务的渴望和满足感。但是只有比较少中学生可以参加类似活动。虽然，中学时便希望在大学加入学生，但是在大学加入其中之后，发现学生会和一些社团的活动的单调、少量的活动几乎没有能够吸引童淼的兴趣。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参加了学校某环保社团举办的公开讲座——考察西部高原水资源的会员分享会。之所以被这个讲座所吸引，缘于童淼的童年是在西部高原上度过的，对那里有很深的感情。因为参加这次讲座，她认识了创会社长，第一次知道了校外的环保组织，便通过互联网搜索到这家环保团体——一家基于互联网的公益社团的线上活动，希望参加他们的活动。这家环保团体与童淼所在大学的环保社团有联系，因此建议童淼参与其学校本地的环保社团。那时的童淼并不知道环保社团是做什么的，以为就是捡垃圾，但是为了继续维持和校外团体的联系，她还是继续参加校环保社团，于是越卷越深，成为了社团骨干。

¹³⁷ 比如 Wasserstrom & Liu(1994)研究 80 年代的大学，认为共青团的组织生活培养了一批后来参与学生运动的青年的组织能力和活动能力。

和火客、乐晏、童淼不同的是，雪莲进入环保社团的被动成分更多。来自西部乡村的雪莲，在大学之前主要经历的是应试教育，对于大学、社团都不曾了解。她回忆道：

接触公益是在大学，真的是误打误撞。高中以前，单纯的我没有长期离开过生活的乡村，没有坐过火车，我一个人到北京来大学报道，坐公交车都觉得好高级，不会用饭卡，没见过那么多人，没听说过社团。所有的都是新奇的，这种新奇让我有点蒙。

如果说火客、乐晏、童淼的 H-I-P 使得他们在进入大学之后较为积极主动地被公益性社团所吸引，那么雪莲过去的 H-I-P 使得她对于大学、大学社团所知甚少，并没有主动地希望加入。换言之，过去的 H-I-P 阻碍了她主动在大学中有意识地寻找新的文化资源。然而，因为她是在北京这个大学文化较为丰富的城市就读，所在大学的社团文化丰富，同学之中有参加社团的文化氛围，因此她被卷入了公益性社团。她回忆道：

大家在讨论想要加入什么社团，为什么要加入社团，都说加入社团可以锻炼一下自己，最好是加入学生会，因为据说学生会是最能够锻炼人的。我当时觉得他们好有想法啊，我怎么都没有想过要加入社团锻炼一下自己呢？于是我就和他们一起去看校园的百团大战，各种社团招新。我对民族、传统文化感兴趣，想加入书法社什么的，但是因为害羞，也没有去。然后跟着室友一起报名了学生会，我会写一点毛笔字，就报名宣传部，但人家不要我。我突然发现，会写毛笔字的人很多呢。同行的室友突然对我说，我们加入这个环保社团吧。我觉得挺好，于是就和她一起填了报名表。

综上所述，4 位参加过大学公益性社团的对话人之所以能够被招募进入公益性社团，主要原因是其所在大学多数是在一线城市、有较为丰富的社团文化和活动，透过公益性社团的参加者——学长或者舍友——的宣传和介绍，同学一起参加的推动力，以及这些社团所组织的活动，他们得以被吸入社团。正是这些社团的在场、透过其成员和活动，一些大学生才有可能被招募其间。因此，这些社团的存在和不断地活动、招募更多的大学生会员的这个过程本身，提供给大学生进入这一形意世界的可能性。

2) 在大学中通过其他途径进入志愿参与的世界

在 1990 年代末和 2000 年初，除了北京、广州等一线城市，很多城市中的大学公益性社团仍处于没有或者能见度较低的状况。本研究中的 4 位对话人——水仙、马田、钰晶和美凤——就读的大学没有丰富的公益性社团的外部环境，他们接触公益资讯的途径**多和互联网媒体**，以及在大学中接触到的**各种选修课、暑期社会实践、图书馆阅读**等有关。一方面，透过暑期社会实践、电视、报纸杂志等接触公益资讯，另一方面，阅读、参与互联网的思想争辩也让他们对社会有更多的了解和思考，为后面进入 NGO 领域奠定了思想基础。可见，正是大学作为一个思想、文化、社会实践活动丰富的空间，为他们的自我找寻提供了一定的机会。而 1990 年代和 2000 年的传统媒体的丰富资讯以及这一时期互联网的兴起以及在知识人群中的普及，使得他们接触各种资讯成为可能。

这 4 位对话人中，有 3 位在大学时便开始不断的寻找意义感或者渴望充实、新鲜的知识。水仙、马田和钰晶所就读的大学的公益性社团资源均较为贫乏，但他们通过其它途径，不断地主动“抓取”学习资源。

如本章开篇的个人故事叙述所言，水仙的人生转折点源自他在大学中选修了哲学系老师王珏的选修课，该课对大学的世俗化和功利化进行批判，介绍毛泽东思想，打开了水仙对哲学、历史的兴趣，而这些对于从小只有应试学习、很少看人文类课外书的他说来，无异于打开了一扇新的窗。这些批判也契合了他自身经历的大学教育的世俗化以及并不提供有说服力的人生意义的学习体验。这堂课开启了他继续学习历史、哲学和左翼思想的探索之旅，之后主要通过课堂之外的图书馆阅读和上网搜集信息进行进一步地自主学习。在 1990 年代末、2000 年初，正值中国互联网兴起的时期，大学中流行上 BBS，其中有关于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左翼思想的讨论，水仙参与了这些互联网上的思想论战。

和水仙有类似的经验，马田就读的大学和研究生院并不在一线城市，社团和公益性社团的资源较为贫乏。离开应试教育的中学、进入大学之后，他就开始逃课，因为高中时为了提高考大学的几率，他不得不顺从地选择了理科，但是理科成绩不好的他，大学中所读的工科专业让他完全没有兴趣，于是他逃课、泡图书馆看自己喜欢的书，买报纸杂志，进行自主学习。他的阅读习惯可以追溯到其青少年阶段，那时已经养成阅读课外资讯的习惯，喜欢看报纸杂志、听

新闻，包括美国之音，看中央电视台的财经新闻。大学时偶然间在报刊亭遇到了《读书》杂志，激发了他进一步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这样的兴趣一直持续到研究生阶段。之后他报名参加学校的暑期社会研究课题，按照课题要求做农村调研。在互联网上搜集资料时，查阅到某乡建组织的网站和乡建领域重要学者温铁军的文章，开始关注该网站的下乡活动的资讯，被这样的学习方式所吸引，也就有了后来决定退学、加入该组织的长期乡村志愿者计划。

钰晶在大学中选修了各种门类的选修课，拓展视野，也参加过学生会等。但是对她影响最大的经历是参与暑期社会实践，去西部贫困村做调研的经历。正是那次经历，让她对乡村教育有了亲身体会，并且在村子中偶遇当地一家民间 NGO 的工作人员。这让她第一次知道，原来还有志愿者这样的职业。在经历了“出国”读书的一系列准备之后，她开始怀疑自己出国的目的和意义，于是决定去乡村支教一年，让自己停下来，思考未来的人生走向。

美凤和文衷进入志愿形意世界的直接原因是较为被动的。美凤进入大学后，并没有参加大学公益性社团的意识。但是因为她的男朋友，在北京读大学时曾经接待过环保组织创办人的大学演讲活动、成为了会员，当男朋友觉得美凤的大学生活太空虚时，便建议她去做志愿者，于是她开始在一家以互联网为基础的跨地助学组织做志愿者。

带着要成功和赚钱的人生规划的文衷，虽然他的大学地处北京，拥有 1994 年便成立的三农类社团，但他没有想过参加公益性社团，尤其是拒绝参加三农类社团。他的舍友大一便报名了这个社团。但是文衷没有，因为他认为自己本来就来自农村，现在到了城市，没必要再参加关注农村的社团；而是继续参加自己从小爱好的文艺类社团。到了大二，他们学校的三农社团联合校外乡村教育组织一起在大学招募暑期下乡志愿者，舍友负责这个工作，再次说服他。文衷出于各种实际的考虑，决定报名，但是并没有所谓的“社会理想”这个动力，而是觉得这是一个公费旅游的机会；报名人数多，录取人数有限，有挑战性，是一个可以证明自己能力的机会；也想通过多认识一些女生，交个女朋友。最终文衷成功的入选，成为了一名志愿者。

美凤和文衷的故事显示了，进入志愿者世界是有着各种不同的因素，未必源于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而加入，而是有着很多其它因素的考虑，比如对于美凤

而言，志愿者生活有助于填补其空虚的大学生活，对于文衷而言，可以证明自己的能力、认识更多的人甚至交女朋友。而正是进入志愿者团体之后，他们才开始了解社会问题，而非因为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而加入志愿者团体。另外，身处北京的这些对话人，虽然起初对志愿者活动不了解，但是透过身边的亲密朋友，她们更容易知道志愿者团体的存在而使得加入其中成为可能。

3) 通过接触媒体信息进入志愿者世界

子康是唯一没有读大学，中专毕业后直接进入工作的对话人。因为居住在 NGO 发展较早的城市，她通过传统媒体打开了解社会的窗口，包括电视节目、报纸、书籍。一次在电视上看到访谈某著名环保组织创始人的节目，她记下了这位创始人的名字，通过互联网查找和这家组织有关的信息，并且通过网站上留下的志愿者联络人的 QQ 号码与其联系，因而通过接触其中的志愿者、最后自己也加入其中，成为了一名志愿者。

之所以会留心环保组织的信息，和她那段时间的人生阶段有关：子康 19 岁开始工作，第一份工作是她的苦闷期，简单、无聊的工作，让年轻的她觉得异常的郁闷和痛苦。这种苦闷驱动她去寻找意义感。她在有限的生活空间中寻找新的可能性、进行即兴行动。子康叙述中的这种在工作以及同事氛围中找不到意义感的情况，水仙和火客也都经历过。

不仅仅媒体是子康接触 NGO 形意世界的途径，对于火客、美凤、童淼、马田、水仙等（共计 7 位），互联网也成为其接触 NGO、参与 NGO 的媒介。正如上文谈及，在 1990 年代中后期的 NGO 行业发展中，媒体扮演了较为重要的角色，透过媒体，志愿者、环境问题、环保团体等开始为公众所了解。同时，1990 年代中后期开始发展的互联网也为 NGO 的宣传、公众动员等提供了成本低、效果广的渠道，一批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等受过一定教育的都市青年成为第一代互联网使用者。1990 年代中期到 2003 年被认为是中国互联网公民社会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杨国斌，2009：17）。中国的互联网于 1994 年正式接入世界互联网之中，中国网民人数发展迅猛¹³⁸（同上：17-18）。1990 年代中后期伴随着

¹³⁸ 从 1997 年的 67 万上升到 2002 年的 5,900 万（杨国斌，2009：17）

个人电脑和上网的逐渐普及，互联网为个人提供了形成、参与正式和非正式团体的平台，大大扩展了社团活动的社会空间（王绍光、何建宇，2009）。1990年中后期，伴随着民间结社的发展，不少民间社团开始利用便利、低成本的互联网进行信息传播和组织动员，尤其是草根组织在政治空间狭窄、各种资源不足的背景更倾向使用互联网（杨国斌，2009：18）。根据2003年12月的一项针对129个样本的调查中发现，66%的民间社会团体拥有机构网站，互联网被认为在组织发展中、与国内外社团的沟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角色（Yang，2007）。这正是较多的对话人通过互联网了解和加入NGO从事志愿者工作的背景。

10位对话人的叙述中，有2位对话人水仙和子康重点提到，他们是通过互联网的电子公告牌（BBS）接触了大量的和社会议题和思潮有关的资讯。子康和水仙属于第一批开始使用互联网的网民，他们或如子康在大城市长大，因此相对容易接触到互联网；或如水仙是从乡镇来到城市读大学而开始接触互联网。在1990年代中期到2003年这一阶段，网民主要通过互联网进行信息交流，初步形成了以BBS论坛和聊天室为核心的网络社区（杨国斌，2009：17-18）。早期的网民主要集中在城市、受教育人群，而且政府管制宽松，这样的背景下，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网民对公共议题的参与度较高（Yang，2003：463）。以人民网下创立的“强国论坛”BBS为例，虽然一定程度受官方管制严格，但是其公共议题的讨论仍是主要的内容¹³⁹（同上：462-463）。2000年底之前，政府对网络的管制较为宽松，之后开始对互联网的内容进行管理¹⁴⁰（杨国斌，2009：19）。

小结：

对于本研究的10位对话人而言，大学和媒体是其进入志愿行动形意世界的关键途径，尤其是大学这一空间，8位对话人均在在大学中开始接触和志愿行动有关的文化资源。不同于中学的应试教育，大学有一定的自由度和空余时间，因而大学生较有机会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安排生活。不仅如此，1990年代末以

¹³⁹比如，网友也曾经热烈的讨论BBS对于民主管治的意义。2000年12月，“强国论坛”BBS的主要话题包括，中日关系、布什访华的意义、婚姻法修订案、荷兰通过同性恋婚姻法、中国政府官员腐败、下岗职工生活困难、中国股市年终分析、有关“人治”和“法治”的辩论，抱怨中国高校学费连年攀升、文革历史等（杨国斌，2003：462）。

¹⁴⁰2004年开始，政府对网络管制加强，比如在2004-2005年先后关闭了北京大学BBS“一塌糊涂”等，从此大学的BBS文化开始衰退，互联网对于公共议题的讨论及对网民的影响发生了变化。

来的大学中，公益性社团已开始萌芽并发展，校外 NGO 通过举办讲座、各种活动、资金资助等促进公益性社团的发展，这为 1990 年代末进入大学的“80 后”与 NGO 的相遇创造了可能性。然而，大学公益性社团的分布存在着地域的不平衡，首先在北京、广州、成都等大城市开始发展；而且重点大学相对于非重点大学有更加丰富的社团。除了公益性社团，大学中的一些老师、暑期社会实践和调研等课外活动以及图书馆等图书资源，对于不少对话人来说也是打开视野的途径，尤其是对于那些身处非一线城市、在 2000 年代初期较难接触公益性社团的大学生而言。1990 年代末到 2000 年代，大学生也是最早的互联网使用者之一，互联网成为他们社交和接触资讯的重要渠道之一，为其接触 NGO 提供了条件。除了上述的大学中的文化资源以及互联网以外，传统媒体，电视、报纸、杂志在传递资讯方面依然发挥着作用。

诚然，1990 年代末以来的大学空间和媒体的发展，为不少“80 后”进入 NGO 形意世界创造了脉络上的重要条件，但是，是否能够进入其间也和他们各自的 H-I-P 有关，比如他们在青少年时代的学业成绩较为优秀，因此有机会进入大学。除此之外，有 6 位对话人对当下或者过往生活经验的不满足、或因性倾向感到压抑、或找不到人生意义的苦闷，都推动了他们去找寻新的文化资源。然而，有些对话人进入志愿行动的世界时是懵懵懂懂的选择或者被身边的同学较强烈的推动而进入的，但是进入其中后亦慢慢地深入学习这一世界的文化资源。不同的进入动机未必带来不同的自我转变。

三、 志愿经历对参加者的影响

不同对话人最初踏入志愿参与的形意世界的起点不一，有 4 位对话人从参与大学公益性社团开始、且这 4 位对话人均在大学期间逐渐开始志愿参与校外 NGO；其他 6 位对话人则是从校外 NGO 开始志愿经历；10 位对话人中有 5 位曾经参与过为期一年的乡村/县城驻点志愿者项目。

对话人的大学和媒体经历以及志愿参与经历一览表

对话人	大学中				毕业后
	和社会认识有关的、非公益性社团类的经历	校内公益性社团 (4)	校外 NGO 等		长期蹲点志愿者 (3)
			短期或者所在城市的志愿工作 (6)	长期蹲点志愿者 (2)	
雪莲	无	环保类	环保类	无	无
童淼	参加学生会	环保类	环保类	无	无
乐晏	班长	三农类	乡建类	休学一年支农(民间组织)	无
火客	无	志愿服务类	支教类	休学一年支教(半官方组织)	无
文衷	文艺类社团	无	支教类	无	无
美凤	媒体类社团	无	支教类	无	无
钰晶	选修课、社会实践、参加学生会	无	无	无	毕业后一年支教(官方组织)
马田	阅读、社会实践	无	无	无	退学后一年支农(民间组织)
水仙	选修课、参与互联网上的思潮辩论、阅读	无	无	无	毕业后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开始了一年支农(民间组织)
子康	不适用				通过媒体接触环保类“公益”团体,做志愿者

(一) 以大学公益性社团为起点

以参与大学公益性社团为起点而进入志愿参与形意世界的 4 位对话人中,

有2位参与环保类社团,1位参与三农类社团,1位参与跨议题的志愿服务社团。

参与大学公益性社团的经历,各有不同。有些对话人参与的公益性社团,活动形式单调,令参加者觉得无聊,因此想退出。也有对话人参加的社团因其指导老师经验丰富、用心投入,并且有外部 NGO 支持,因而团队和活动质量很高,吸引对话人不断地参加和深入介入。但是无论哪种情况,参与大学公益性社团为对话人提供了最初的实地参与社会服务、从而开始了解相关议题的可能性。这一阶段主要是物质性层面上(materially)的对志愿服务和 NGO 的感知,还没有形成理念性(conceptually)的深入认识和反思。除此之外,这个经验也使得他们有机会与校外 NGO 建立关系。4位对话人均因此为起点,逐渐更多地参与、甚至重点转移重心于校外团体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积累了 NGO 领域的人际网络,初步感受 NGO 的团队文化——比如包括“平等”、“简单”、“有共同理想和话题”、“温暖”等文化氛围及价值观念。

火客所在的公益性社团是志愿者社团,“基本上做的都是简单的事情,比如去养老院、智障学校等”,但他觉得这些活动挺有意义,帮助别人,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也帮助自己从性倾向的困惑和压抑中分散精力。他回忆道

我的大学生活有两条线,一条是开始义工的生活;一条是仍然在性倾向里面纠结,去图书馆里找心理学相关的书,但全部都翻了,却找不到什么。我还是在那种比较痛苦的状态。但是做义工有点拯救了我的感觉,分散了我的焦点。

随着参与越来越多,他也开始反思活动的意义和有效性,比如,很多学校的志愿社团都去服务同一个养老院,对老人也是一种干扰,如何志愿服务才是有价值的?正是因为在该社团的参与,他开始认识一些一起做志愿者的伙伴,其中一位师兄介绍了一家做支教的校外团体火炬,于是火客邀请火炬来大学招募志愿者,他自己也成为火炬团体的义工,这个经验被他形容成“就更不一样了”,学习了很多开展乡村支教的具体教学手法。

童淼因为担任环保社团社长,提高了领导力,尤其是公开发表演讲的能力;同时,因为经常有机会代表学校社团参与社会上的环保 NGO 会议,因此进一步认识 NGO 这一形意世界中的人和机构,于是才知道原来存在以从事 NGO 为职业的人。正是因为接触 NGO 这一形意世界,与其中的人的互动,她才看到全职从

事 NGO 工作的可能性。在互动中，这些 NGO 工作者给童淼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觉得她们善良、纯净、做为社会好的事情；穿着也是干净、利落、朴实；特别鼓动年轻人做志愿者，而她也在这个过程中被激励。对于从没有接触过 NGO 的童淼来说，NGO 工作者所从事的工作的公益性、团队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常穿着的朴实等，对她来说是印象深刻的。从她的描述可以想象，这些经验与她之前的生命经验中接触的职业人士非常不一样。而这些特点又呼应了童淼的内在的某些需要和渴望——从事善良、“公益”的工作。

雪莲参与的大学环保社团的经历比较负面，因为社团的活动设计和组织能力较低，活动缺乏吸引力。她回忆道

我只待了一个学期就想离开了，因为觉得自己没有做什么事情，只去考察过一次河流，但真不是一个很好的历程。北京的排污河，味道不好闻，我们一行人又只是在沿着河流走啊走啊，我觉得特没有意义。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花了一个晚上，开会为项目起名字，大家都没有想出来，第二天早上，我想了一个名字，成为了那一年项目名称，但后来我很少参与了。

可见大学生公益性社团的活动策划能力、团队组织能力不足的情况常常无法保持参与者的持续参与，造成人的流失。

但乐晏的经验正相反，她参加的三农社团的活动设计以及团队文化对她来说非常有吸引力，她觉得自己很深刻地被三农社团以及其带队老师所塑造，从乖乖女，变得比较有反叛性。个中原因是，带队老师的丰富经验和全心投入，而且大学三农社团背后也有跨校的、来自社会支持的网络，提供培训、串联等支持——并不是很多大学公益性社团有这样的条件。乐晏每周最盼望的时间就是例会时间。例会特别重视每个人，每个人都有上讲台发言的机会，同时也是锻炼表达能力的机会——而这在平时的上课中很少有机会。例会除了讨论之外，还有游戏环节，增加彼此的认识和调节团队气氛。不仅如此，社团在假期组织下乡活动，走出教室，走出校园，在社会中学习。从离开校园，开始坐火车、转乘汽车开始，带队老师挑战大家，比如鼓励他们在火车上向陌生乘客做自我介绍、唱支农歌曲，以锻炼能力。在乡村中也有很多学习机会，那时的乡村政府和村民之间的矛盾剧烈，“去到乡村才能接触这些，很真实的社会”；但是同时也产生了无力感，觉得做不了什么。这样的经历让不少支农大学生发现，其实下

乡的过程更是自我改造，同时尽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虽然下乡在物质上很艰苦，但是乐晏觉得特别好玩，每天晚上大家都会开会，畅所欲言，可以说各种话题，包括个人成长的，特别兴奋，彻夜不眠。因为这样的下乡经验，而且和其他省市的高校以及更大的乡村建设的运动的结合，乐晏最后选择了休学一年在乡村蹲点，毕业之后继续全职从事乡建。这是一个越卷越深的过程。

（二） 在校外社会团体的志愿参与

10 位对话人在全职从事 NGO 工作之前，都有参与过校外社会团体的志愿工作经历；除了上节谈到的雪莲、火客、乐晏和童淼是从大学公益性社团进入校外社团以外，对于其他 6 人来说，这都是他们最初接触 NGO 形意世界的起点。10 位对话人中有 2 位参与过短期下乡活动，3 位在所在城市参与社会团体的日常工作，包括办公室管理、志愿者活动，也有 3 位对话人主要通过参与互联网为基础的志愿者团体，在论坛上发帖、参与线上线下的志愿工作。其中 5 位对话人参加了由 NGO 或者官方组织举办的为期一年的志愿者项目，到农村进行“支农”和“支教”服务。这 5 位对话人中的 3 位在大学中没有参加公益性社团的机会。

参与过长期志愿者的对话人相比较于没有参加过长期志愿者的对话人，其对乡村或工作团体的经历更加深刻。这似乎说明，卷入的越深，投入的时间越多，则经历和思考得越深。

1. 参与非长期志愿者项目的经验

对于 6 位参与社会团体（非长期蹲点）的志愿服务的对话人来说，他们通过实地参与的过程，增加了对 NGO 领域的初步了解，但是和大学公益性社团的参与者一样，仍处于物质层面的接触，较少理念性层面的认识和理解。同样的，这样的经历让他们积累了 NGO 领域的人脉、感受 NGO 团队氛围，增加了他们进一步进入这个领域全职工作的兴趣。

对他们来说，参与过程中印象最深刻的是：1) 氛围和人：几乎所有对话人

提及，志愿者团体的氛围让他们印象深刻，是平等的、温暖的、有支持的、身体力行的氛围，也有部分被访者提到其共同理想的氛围。他们在做志愿者过程中认识的人，包括带队负责人、志愿者骨干等，也是让他们印象深刻的重要因素。

在个人故事叙事部分，我们已经看到文衷和子康对他们所在的志愿者团队的文化氛围的叙述，包括特别温暖的办公室氛围，感觉到被尊重；团队年轻、开放、有共同的环境保护的身份，以及身体力行所坚持的理念等。雪莲也特别提到她志愿工作的环境联盟的氛围与其所在大学的学生氛围很不一样，她回忆道

那时候各个学校的环境保护的骨干常常会来联盟的办公室。大学里的学生一般都在学校里待着学习自己的专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或者享受生活，这些人成天跑到这。那时候办公室真是不咋样，特别黑，尤其下午时很昏暗，跑到这昏暗的小房间讨论这个我还不太听得懂的、好像跟自己也没什么关系的环境保护，还讨论得兴高采烈。就觉得，哎呀，这些人还挺奇怪的、挺好玩的。通常这种机构的人很接纳嘛，不把你当外人，忽然之间就很熟悉。他们反正什么都说，也毫无掩饰，我觉得这些人还挺亲切的，也挺奇特的。跟学校里面说的也不一样，宿舍里成天只卧谈，班里的男生怎么样，谁跟谁又在一块了，哪个专业多么不靠谱，哪个专业多么难找工作，谁谁谁还挤破脑袋要转专业。但是在环境联盟谈的是完全是另外一些事情了，就觉得挺不一样，挺新奇的。

火客描述他在参加火炬支教团体时，这个团体一直强调开放、互相反馈，很注重义工之间的平等关系。他觉得这种志愿者文化是，

人与人的关系，大家可以在一起、有同样的想法去做一件事情，而且大家相互之间就是朋友，不需复杂的人情关系啊，这里是比较纯粹，没有利益的，而且是有共同理想的，有同伴的感觉。

氛围也是由人组成的，氛围也体现在人身上。就像文衷所言，在 NGO 中的人都非常热情、亲和，他很喜欢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氛围。雪莲的描述中也提到团队中有很多很有想法、亲切的环保骨干，从他们的讨论中学到很多东西。美凤通过参与乡村教育团体，认识了很多其他高校、其他省份的年轻人，他们很有想法，也指导美凤怎么做事情。子康非常欣赏的是环保团体的身体力行，比如这些志愿者为了减少一次性筷子的消耗，出门都会随身带筷子袋。

对话人对于志愿者团体中的温暖、平等、尊重、坚持环保/公益理念等的印

象深刻，向我们再现了他们在日常生活环境中常常感到的冷漠、不平等的、没有足够尊重的、缺少理想主义信仰的氛围。换言之，如果他们日常生活的环境就是温暖、平等、尊重、坚持环保/公益理念的，他们在接触志愿者团体时，不会格外感受到这一点。在志愿活动中，他们得以进入了另外一个文化世界；这个世界对其有很深的吸引力。但是，同样需要留意的是，这样的温暖、尊重的环境，也可能失去成长所需要的彼此批判、充满挑战和困境的环境，这一点并未在访谈中被对话人所提及。

2) 行动的平台和空间：在实地参与志愿行动的过程中，对话人增加了社会经验，对社会有了更多的了解。但是多数人在进入全职工作之前，对志愿者能力建设、NGO、“公民社会”等都没有了解，更多的是在具体的层面的接触和感受，而不是理念上。6位对话人中的4位提到，在社会团体中做事情对社会的了解更多，而且提高了自己的能力，比如如何与他人合作的能力，如何开展团队策略规划的能力。雪莲在联盟中负责一个和基金会合作的跨高校联动的环保活动，需要在北京的公开场地举办活动。因为没有社会经验，她选择了购物广场——而不是公园等管理更少的场地——作为活动举办场地，而且她准备不足，没有预备足够的时间完成向广场管理部门的手续申请，因此活动只做了15分钟，便被城管驱赶。她急得哭，愧疚、自责、生自己的气、郁闷，但这件事情对她而言，印象深刻，也是认识自己做事情习惯的机会，对于做公开活动的准备工作有了更多了解。

2. 参与长期志愿者计划

参与过长期志愿者经验的对话人的感触，相比较上一节中的对话人来说更加深刻。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长期、在具体的社会和生活场景中的行动和磨练。

1) 在长期的、具体的社会和生活场景中获得了很强的内心动力，支持着他们之后的工作，比如钰晶和火客。水仙和马田参加长期志愿者实践计划中有多次集中培训，但是马田特别提到这些培训对他的帮助不大，很多内容都已经忘记，但是在乡村的实地经历却在脑海和身体里留下很深的印记。

2) 几乎所有对话人都提到了, 在具体的乡村实践的过程中遇到了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的困难。但是也正是这样的困难让他们有了更多的思考, 并且指向自我认识, 就像前文中钰晶所说的, 透过支教打掉了自己高高在上的“志愿者”的姿态, 开始面对自己的弱点, 在接纳了自己的无力之后, 反而改变才可能发生。马田也有类似的经历, 他从开始就将改造自我作为目的之一, 他提到

在农村的那一年时间对我影响挺大的。因为之前读过很多书, 觉得自己比较飘、躁。在农村和农民打交道, 又做了一些农活, 觉得稍微踏实一点。

3) 所有对话人都提到在具体的社会空间中的实践, 让他们开始认识和思考社会问题, 包括乡村发展、农民组织化、乡村教育。钰晶觉得开始和底层社会产生联结, 第一次开始思考社会问题。火客也开始反思教育体制对于学生的评价的片面性。他回忆了自己在家访中的一段经历:

我去一个被称为很调皮的学生家里家访。他早早就在某个地方等我, 学校有个距离, 我走路沟渠, 他在那等了很久, 他也没有电话。我们约好了一个时间。他在那里等我, 骑自行车载我去他家, 他真的很有礼貌, 真的不是坏孩子, 你知道吗。我就很愤愤不平的是, 老师对这种孩子有很多看法。然后, 什么倒茶啊, 带我去爬山啊, 还一直拉着我,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会照顾人的人。这些优点是非常宝贵但是无法在学校里体现的。然后我就想这种教育怎么是这样的, 在这种教育里这么宝贵的东西为什么无法独立发挥。比如那个学校发生学生打架之类的, 校长动不动就想开除。

马田说

那段期间经常会和同学一起讨论合作社怎么发展, 怎么走, 能不能发展, 讨论这些问题。但其实大家, 像我刚去, 没有这方面经验、认识, 很多说的都是空话, 但是大家确实有这种意识, 每次见了面都要讨论这些事情。

总的来说, 志愿参与的经历让对话人对于 NGO 团体、NGO 工作者等有了初步接触和了解, 对于社会服务的相关议题也有了初步的体认, 但多数都还停留在物质层面的转变, 而非理念性层面的转变。除此之外, 被志愿参与卷入得越深, 对社会问题的了解也越多。比如参加长期蹲点计划的志愿者比短期参加的志愿者对于自我的认识、对于基层社会的了解更深。

四、 最终选择进入 NGO 全职工作的原因

带着曾经的志愿经历，这 10 位对话人均选择了继续在 NGO 领域全职工作，但是选择的动机和机缘各有不同，本节将其分成 3 类¹⁴¹。

1. 比较认同 NGO 的理念和愿景，因此选择全职工作。

水仙、火客和子康都曾经在商业公司或者学校工作过，他们将这些工作中的体会和在志愿服务中所形成的经验进行对比，认为 NGO 组织的工作更能给他们带来意义感、也更加认同这一方向，因此选择 NGO 领域。乐晏和马田虽然没有在商业公司工作过，但是他们也比较看重 NGO——对他们而言是乡村建设或者底层社群的发展——工作的价值，因此做出这个选择。乐晏因为较深地卷入乡建工作，从参加大学的支农社团到去乡村蹲点一年、再到参与乡建团体的志愿工作，一步一步地完全投入这个事业。

2. 将 NGO 工作视为一种和其它工作类似的工作机会。

美凤、文衷的选择属于此类。他们在做志愿者的过程中，有一些触动，但是也并不似一些曾经长期蹲点的对话人那般深刻。而 NGO 工作本身在他们看来也是可以选择的求职方向或者作为职业的过渡。美凤进入 NGO 全职主要是从找工作的角度考虑。大学毕业后，美凤没有回家乡的机关事业单位工作，而是留在了北京。其中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是，她意识到进入机关事业单位的成本太高而且需要一定的“关系”——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而当时的美凤并没有特别好的“关系”进入到机关单位，而且，因为家庭条件所限，并不愿意花费几十万元去找这类工作。而且美凤内心里也不愿意回到老家工作，因为那意味着要重新回到充满着互相攀比的气氛和压力的家族关系里，这些让美凤感觉到压力和心理负担。她坦诚，那时的自己“挺迷茫的，不知道要干啥”。因此当看到某

¹⁴¹ 需要说明的是，做志愿者的经历不必然导致参加全职工作。

NGO 机构招聘媒体干事时，正是她喜欢的求职方向，于是就去应聘了。她坦言，“我当时就是因为想找一份工作，才到了 NGO”。所以可以说，美凤应聘这份工作，并无关宏大的社会理想。

文衷选择全职 NGO 工作有一些“理想主义”之外的考虑。他坦言参加志愿服务后，虽然有一些冲击和转变，但是仍是比较浅。虽然感受到“公益组织”氛围是温暖、热情、有爱，但是那时对社会的感知还是麻木的。他的职业规划没有变化，依然希望赚钱、去银行、证券领域工作，因此想先有一个研究生学历。公务员并不在他的选项里，因为到北京之后，他发现没有家庭背景想在这条路上走上去很难。但是考研失败，他选择先在这家 NGO 工作，有暂时过渡的味道，一边工作一边继续考研，因此那时并没有长期要从事这个工作的打算。

雪莲选择加入其志愿服务的环保联盟的原因是较为复杂、矛盾的：既有实际因素的考虑，也有希望和组织一起成长的考虑。一方面，她认为自己喜欢安逸而非竞争的生活，而她毕业的年代，中国连续多年的高校扩招的结果造成了就业竞争压力较大。专业对口的工作并不好找，简历石沉大海。考公务员是父母的想法，但是她觉得那样的生活没有意思，所以不想考，而且录取率非常之低。而至于考研，学长的意见是建议她想清楚为什么要读再读。虽然雪莲也有商业公司以及其它 NGO 的工作机会，但是她觉得她对这家组织比较了解，如果去其它公司存在着工作内容、工作环境等的不确定性。她留下来的原因并非环保意识强，而是觉得这是自己和组织一起成长的机会。她看到联盟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但是发展缓慢，而自己的责任感较强，希望能够协助机构发展。另外，作为刚毕业的学生，她认为自己也没有什么经验，需要成长与锻炼，而独立完成项目的机会可以帮助到她的成长。在她看来这个领域未来是有发展的，需要人，因此选择留下来。另外实际的考虑是，这个组织的办公室可以住宿，省却了在北京找房子的问题。看似充满矛盾的是，虽然雪莲在考大学之前的想法是找一份可以让家庭摆脱贫困的工作，但是当这份工作摆在面前的时候，她没有问工资就同意加入了。从雪莲的故事中，我似乎看到她之前的 H-I-P 中虽然有成为成功人士、以赚钱为目标的价值观，但是当她在现实生活中接触到真实的人、团体并且与之互动之后，之前透过家庭、教育、媒体等内化的价值观却暂时消融、让位于后者：这大概就是人在活动中发生转变的即兴性和过程性。

3. 对于职业选择存有一种试试看的心态。

在有些人的求职中，试试看也是一种心态，并非有较深沉的思考。童淼便属于此。她在大学是参加过校内外的 NGO 社团，在这个过程中也认识了很多 NGO 领域的人。她喜欢 NGO 的那种像家人的气氛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互助的情感，这让她对比曾经在民营企业实习一个月的经历，上下级关系明显，上级对下级的发号施令的态度。虽然她知道 NGO 收入低，但是觉得刚毕业工作的工资低一点也没关系，权衡之后，做出了这个选择。

五、 小结

对话人被招募进入 NGO 形意世界全职工作，是有着各种原因的，并非全因理想主义；其中有着复杂的社会脉络和各自的 H-I-P。正是在 1990 年代以来社会问题不断产生、民间组织飞速发展的背景下，这些在大城市读大学或者工作的“80 后”青年开始有机会通过大学中的一系列文化资源或者通过因媒体市场化而逐渐活跃的媒体，开始接触初步发展中的 NGO 形意世界，因而增加了被招募进入的可能性，这背后有着社会脉络变化的原因，也存在着一些偶然性。

另一方面，他们曾经的 H-I-P 也是能够被招募进入这一形意世界的因素之一，尤其是其大学生或者城市居民的身份，使得其有机会进入志愿行动的世界。正是进入志愿世界之后，通过参与社会实践，与社会问题、其他志愿者和组织工作者等接触，开始增加了对社会的认识和社会交往网络，对这个领域的氛围和人有一定的了解甚至欣赏，NGO 作为一种职业渐渐成为他们的职业选择之一。除此之外，多数对话人来自社会中低阶层家庭，几乎所有对话人有关职业选择的叙述中，父母的声音都缺席了，这似乎说明其家庭的文化、社会资本方面并未支撑父母在子女的就业方向方面的规划、干预。在就业压力越来越大的背景下，收入高、稳定的工作的找寻背后也需要一定的经济和社会资本的情况下，一些青年也将 NGO 的工作作为选择之一。虽然这份工作的工资较低，但是对于不少对话人来说，因为是第一份工作，并不期望有一份较高的收入。在 2000 年

代，似乎“新自由主义”的共识还没有非常强，而且 NGO 也是新兴行业，很多人并不了解其收入长期低于其他行业。然而无论他们因为怎样的原因进入 NGO 全职工作，在进入之后，他们都经历着比志愿服务时期——对 NGO、社会问题的认识和接触主要在物质层面，理念层面的认识并不多——更加深刻的变化，下一章将就此展开分析。

第七章

进入 NGO 形意世界后的“自我”转变与协商

第五章描述并分析了对话人在 1980 和 1990 年代的社会脉络下的童年、青少年的“自我”形成过程，而第六章进一步分析其在 2000 年代中期于大学或者媒体空间之中，如何进入志愿者的形意世界。本章则将进入对话人进入 NGO 形意世界全职工作之后的人生经历，他们带着曾经的 H-I-P，经由与不同力量的互动与协商，其价值观和行为转变复杂且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NGO 工作者的思想状态和日常生活是怎样的？与同龄的“80 后”有哪些异同？他们是怎样形成这样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NGO 是如何参与塑造这些工作者的？NGO 工作者又是如何与自身的 H-I-P、与 NGO 的形意世界乃至更广大的社会文化进行协商的？这一章将尝试回应这一系列问题。

本章将首先概述 10 位对话人所工作的团体的性质，然后以他们浸入 NGO 的形意世界之后发生的“自我”转变和协商作为主线，通过对此的描述和分析，展示 NGO 形意世界对参与者的影响过程。

本章认为对话人透过参与 NGO 的工作，NGO 形意世界的论述、操演、人物、人造物等不同元素综合地与进入其中的对话人进行即兴互动。对话人开始扩展对社会发展议题的接触、认识和分析，并且以行动参与其中，既包括理念维度上的转变也包括物质维度上的参与过程，呈现出与“小时代”的“80 后”青年较为不同的社会公共意识和参与度。对话人的转变不仅仅发生在工作领域，更是渗透进他们的自身和日常生活之中，包括对自我的认识、自我力量的增强，在社区参与中的改变、日常消费行为的改变，与性别相关的日常生活实践。然而，这个过程并非完全是增力的，也常常塑造着无力的、“缺学无思¹⁴²”（thoughtless）（许宝强，2015:3）的“自我”，包括 NGO 操作中的窄化批判思考和学习空间，对社会问题的简单化分析、论述乃在操作，“主流”/“另类”二元分割的思考、论述和操演方式。而在 NGO 工作者的 H-I-P 中沉淀的缺乏批判思考的习惯、深受成功者文化、发展主义文化影响的习惯等，也令他们

¹⁴² 许宝强（2015：3）引用了阿伦特有关缺学无思的讨论，指“没头没脑的鲁莽、无可救药的迷惘，或是自鸣得意地背诵已变得琐碎空洞的真理”，无法听到不同意见的声音，不听取对于可能产生错误行为的质疑声音。在我看来，缺学无思意指，不开展批判性的思考、不愿开放的学习不同的思想资源，缺学无思的原因，既可能源于意愿上的缺失，也可能因实际能力上的缺失。

的“自我”转变充满不确定的协商。

一、 对话人的工作领域：青年工作概述

正如第三章对于本研究的田野简介所提到的，本研究中的 10 位对话人都长期在青年工作领域工作。1949 年之后的中国，青年工作主要由中国共青团开展，但是这一状况伴随着 1990 年代社会问题越来越显著化、NGO 的发展以及共青团和政府对于志愿者运动的广泛推动而发生了转变。在 2000 年代，越来越多的自下而上的、由 NGO 参与的志愿者工作渐渐开展。这一社会背景的转变，曾经在第六章进行了介绍。本研究中的对话人在 2000 年代便以志愿者身份参与这些志愿者活动，最后自身转变为 NGO 全职工作者，开展志愿者活动。他们工作的团体主要以民间草根 NGO 为主，有 2 人曾期间于国际 NGO 工作 1-4 年不等（但是她们更多的职业期间是于本地草根 NGO 工作）。对话人具体参与的不同的 NGO 的介绍，请参见下表。

对话人参与的 NGO 形意世界一览表

姓名	性别	NGO 工作是否是第一份受薪工作 (7 人)	参与的 NGO 形意世界	工作机构类型
文衷	男	✓	教育助学、青年教育	草根组织
水仙	男		乡建、劳工、青年教育	草根组织
雪莲	女	✓	环境保护、青年教育	草根组织
乐晏	女	✓	乡建、青年教育	草根组织
美凤	女	✓	青年教育、女性主义社区工作	草根组织
马田	男	✓	乡建、劳工、青年教育	草根组织
火客	男		NGO 工作者培训、青年教育、同性恋权益运动	草根组织
童淼	女	✓	环保、青年教育	草根组织

钰晶	女	✓	NGO 网络支持、青年教育	多数时间为草根组织，曾在国际 NGO 工作一年余。
子康	女		环保、青年教育	多数时间为草根组织，曾在国际 NGO 工作四年余。

二、“自我”之转变与协商：工作场域中的社会介入

对话人进入 NGO 全职工作之后，逐渐接触和社会公正、公平等社会发展议题，并且形成了特定取向的对社会的理解，这与他们在青少年时期形成的狭窄的知识结构和缺乏社会实践形成了较大的不同，也与越来越浓厚的“小时代”的青年文化（去政治化的青年文化）不同。诚如第六章所论述的，他们在做志愿者时，便已经开始了这样的历程，但那一时期更多的是对这些社会发展议题的体验，并未形成较为清晰、系统的理念维度上的认识。而之所以出现这一转变，与对话人进入 NGO 形意世界有关。他们所工作的草根组织，是为了回应一定的社会问题而成立并运作的。其组织使命，组织文化，工作内容，工作中的同事、合作伙伴等这些元素都在共同形塑着这一特定的形意世界，而 NGO 工作者正是通过与这一形意世界进行即兴的互动，参与该形意世界的运作。以下将分为三个主题分别描述并且批判性分析 NGO 形意世界有关社会发展议题的分析与实践对于对话人的影响。

1. 社会公平、公正的“唤醒”与“灌输”

本节主要以火客和美凤的经历展开讨论。火客自从 2007 年全职在 NGO 领域工作，对他来说，第一份全职 NGO 工作——I 机构——中所习得的理念——“公民社会”，一直是他之后工作和日常生活的重要理念基础。在此之前，火客虽然在大学时代从事过多年的志愿者活动，也曾在乡村支教一年；然而，真正开始知道“NGO”、“公民社会”、社会问题分析等语词，都是自加入 I 机构开始。这一阶段习得的有关“公民社会”的视野和行动带来改变的理念，实际上奠定了火客的最根本的价值观、知识基础。在火客看来，“公民社会”理念，绘制了新型的社会关系愿景，在这个愿景中，公民通过自下而上的参与和组织，争取

自身的权力，推进社会发展。

I 机构在当时是少数的、明确以推动“公民社会”为目标，以培育“公民社会”团体为策略，开展针对“公民社会”团体的培训和网络支持，培训中充满着有关“公民社会”的价值和工作策略的论述和工作。火客的工作是支持机构的培训活动，因此有机会参加了不少培训，其中很多涉及“公民社会”的理念、项目管理、策略规划、组织管理，并且接触来自各草根组织的学员、培训师和较为资深的 NGO 工作者或者学者。他回忆道

2007 年，进入 NGO 以后对社会的认识突然一下子多了很多，因为要接触社会、接触不同的 NGO，大开眼界！这份工作让我开始慢慢地了解社会议题，了解社会原来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些以前都不知道。有很多人正在做事情，比如我去拜访过因为工伤开始维权、创立的劳工组织，跟着他们做工伤工友探访，很佩服他们。慢慢地，我的世界才进入了跟公民社会相关的东西。刚开始工作时，我看了胡佳和金燕的纪录片《自由城的囚徒》，对我影响很大。那部片讲他俩被“国宝¹⁴³”一直跟踪、和他们之间的博弈。我才开始知道，噢，原来还有这种事情。那是我的启蒙（笑）。所以 07 年有好多新的东西进来，突然发现世界真的开阔了好多。

I 机构不仅提供培训，还向“公民社会”团体提供研究和信息支持，比如图书室、公共空间等。他所提及的，了解了劳工团体向受工伤的工友提供的服务，也正是因为他的工作内容中涉及对这些团体的支持，所以他才有机会进入。

在这段自述中，火客认为进入 I 机构后，因接触社会和 NGO 而对社会的了解增多，言外之意是，之前很少接触社会。火客这里所指的“社会”实际上指弱势群体、社会公平、公正等公共议题，正如第五章所提及，这些在媒体和学校体制中是比较少能够接触的。文衷、雪莲的生命故事也有类似的叙述，认为在进入大学、公益社团之前，对“社会”是不了解的。比如文衷坦言进入 NGO 工作之后，发现自己“对社会完全不了解，之前从来没有关心过社会上很多问题”。这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媒体、学校教育在这方面的缺失，而进入 NGO，令参加者重新开始接触和学习这些狭义上的“社会”知识：他们在 NGO 形意世界学习到的新的论述、实践成为和与之 HIP 进行协商的新的文化资源。然而，这里指的狭义意义上的“社会”、“世界”，只是宽泛意义上“社会”、“世界”的一部分，比如商业社会的运作等，是当时的 NGO 形意世界较少处理的，比较少出

¹⁴³ 国家安全局工作人员简称。

现在火客等 NGO 工作者的世界中。因此，进入这一形意世界只是装备了工作者以特定取向的特定议题——和社会不公、弱势群体有关的议题。

然而火客之所以能够接受这套理念和论述，除了所在机构的各种培训资源、接触的人、工作项目的要求以外，不可忽视的一点是火客的 H-I-P——曾经的志愿经历，让他接触了中国乡村的贫困、教育资源短缺、教育过程的粗暴和学习成绩为中心等，在 I 机构学习到的理念和他之前的这些乡村教育的体验，在他看来可以解释他曾经的困惑和实践，因此他很容易吸收这些理念。

然而，火客也提到这套影响他的“公民社会”视野可能也是社会建构的。钰晶对此有过反思。她进入 NGO 领域全职工作也开始于“公民社会”组织支持以及青年培养有关的工作，工作五年后去海外学习和 NGO 有关的硕士课程中，她才意识到，原来之前工作中常常时用的“公民社会”到底是什么，背后的历史脉络等，之前并不清楚的，只是会用这些词而已。这种状况并非特例，不知道“公民社会”、“公平”等词的意思，但仍然使用的不仅仅是钰晶，文袁和美凤在叙事中都有提及这一点。

这也让我回想起，在工作多年后去英国读书的发现：之前在自己所在的工作团体和相关的网络伙伴的氛围中，似乎大家对于“民主”持有天然正确的相信，认为中国应该走“民主化”的道路，但是当在英国遇到来自非洲、拉美国家的同学，听他们分享各自祖国的“民主”操作时，我才意识到之前对于“民主”为何并不十分清楚，没有深入的学习、批判性地思考和讨论一些关键问题，包括什么是“民主”以及本国和社区的具体问题是什么，而简单化地相信“民主”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而实际上造成了“缺学无思”的“自我”。正如在第二章所指出的，NGO 发展领域普遍缺乏协助成员反思的环境及条件，而我亦因而不愿进行深度的思考，思考一些根本问题，而且对自身缺乏反思难以觉察（参考刘韬：2014）。然而，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缺学无思”的状况是如何形成的？我认为，既包括 NGO 工作者自身的思考习惯所限，也和 NGO 团体的氛围有关。思考的习惯需要一定的环境的培养和激发，正如第五章所指出的，中学应试教育，并不培养批判思考，从对话人所提及的大学经验，也比较少听到培养批判思考的内容，而带着这些惯习的 NGO 工作者，在面对 NGO 的一套论述时，较难提出不同的意见。此外，从 NGO 团体的文化、氛围而言，在 10 位对话人

的生命叙事中,7位非乡建体系中的对话人,较少提到参加思辨性的学习小组。虽然他们普遍提到参加培训,但是较多提到的是在培训中接收到了某些思想、观念,但是没有提到批判性的、多种观点的对话。而来自乡建领域的对话人是例外,他们特别提到其所在团体注重思想和理论的学习,尤其强调特别学习不同的观点,进行辩论。很多团体在日常工作和培训中缺乏这类学习、思考的原因值得认真分析和进一步探索。而我在此只能尝试提出可能的猜想,需要后续研究的进一步探索:虽然不少NGO强调参与式的、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解放式的教学方法,但是其效果与团队领导人和培训协作者的自身视野、能力关系密切。如果团队领导人和培训协作者没有思考的意识和习惯,是无法真正创造这样的思考的氛围的。带着在NGO工作多年积累的惯习而进入学术机构——新的形意世界——的我,尝试否学(unlearn)“无思”的习惯,经历了痛苦的阶段,这一经历可作为对比,说明团体氛围对其中人的影响。在学院里被导师要求对使用的关键概念和语词进行深入的思考,对每个论断的前提假设的充分觉察,并且寻找、倾听与自己持有的观点的相反的观点,在这个过程中重新理解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仅仅与和自己观点相似的人交流,虽然愉悦,但是更易使人走向极端价值和立场¹⁴⁴。而就我的粗浅接触,NGO形意世界常常弥漫着社会改造的使命、友好、宽容的气氛,常常较难有动力去接触不同观点以及就此发生激烈的互相质疑和讨论。正如刘韬(2014)所提出的,中国的NGO团体缺乏思辨的文化,不能简单地归因于个人和团体,而是有着复杂的社会脉络原因:中国的社会研究与人们的社会生活的分离,高等教育资源和学术资源为国家所垄断、控制,研究质量落后,无法为社会行动者提供反思性知识和反思能力的促进;而社会行动者没有社会研究的能力,因而没有生产话语的能力。

美凤的经历进一步呈现了NGO形意世界如何塑造着NGO工作者关注社会、参与改造社会的价值观和行为,但同时又可能呈现“无思”倾向的习惯。

美凤最先通过工作、参加培训接触新的社会分析的理念与论述。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在“绿水”公益机构做世界公民教育——对她的影响是“唤醒”了她,她回忆道:“这个世界还有另外一个声音告诉你,你不能这样忍受不公平和不公正”。她用“唤醒”这个词,说明在她看来,这一套理念是

¹⁴⁴ 导师许宝强还特别推荐我阅读 *Going to Extremes: How Like Minds Unite and Divide* 一书(作者 Cass R. Sunstein, 200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该书表达了这一观点。

具有一定的解放性的，让她从不自觉转变为自觉。她开始意识到通过行动去创造公平、公正的世界的可能性。这个另外的声音正是她进入到 NGO 形意世界之后的学习到的新的价值观（意识形态）。这份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在北京的大学生和在职青年中开展世界公民教育活动，通过体验式培训和各种活动，推动青年人认识社会问题，批判思考，并且通过志愿参与改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

世界公民教育作为一种在公益领域视野下的青年人社会责任感和行动力的教育，自 1970 年代在英国等地开始发展，产生了不少论述。这些论述在 2000 年以后经由国际机构 Z 带入中国大陆，通过与当地机构的合作，影响着合作伙伴及其工作人员，美凤便是其中之一。这些论述和操作存在于项目材料、期间参加的培训。世界公民教育主要强调的理念包括：1) 关注社会公平、公正；2) 采取行动带来改变，履行公民的责任；3) 批判思考的培养。

世界公民教育对美凤的影响主要来自论述资源的影响和她亲身从事项目执行工作这两方面。为什么这样的论述能够影响美凤的“自我”？我认为包括几个因素：1) 她的 H-I-P。美凤认为自己曾经“被欺负太久了”。Urrieta 对美国墨西哥裔社会运动家的身份形成的研究也指出曾经的被压迫的经历对于社会运动家的身份形成具有较重要的重要（2009）。2) 她有机会接触到这一论述。3) 不断的操演。最终影响美凤的还是在做这个项目、给青年人做培训的过程中——一个实践和操练的过程。美凤正是从形意世界中利用一些已有的论述，经过自己的加工，用于青年培训的设计和执。不断的从事青年培训，要求她在短时间内不断吸收，而且不断重复这些论述，这让她久而久之也开始“相信”这些论述。她坦陈，培训工作要带出的理念——“公平”、“公正”、“行动带来改变”——对当时的她而言，都是一些词，来自作为资助方的国际机构并被空降到北京，到底其内涵是什么，美凤等工作人员并不十分清楚，而且也没有应用到工作和生活中去检验。然而，她觉得影响是“日常的潜移默化”。虽然并不理解其真正内涵，但是因为这是她的工作，她不得不用接收到的这一套理论，在自己还不自信这套理论在现实中到底行不行的时候，通过组织各种体验式活动，不断地讲给参加活动的青年人。而这个做培训工作的过程本身，让她把世界公民教育的理念内化在自己之中。她回忆道，

因为你身处在推进社会改变的过程中，世界公民教育的理念不断地灌输到你的大

脑子里，给你洗脑，要置换掉你以前的东西，这里面肯定有一个非常激烈的斗争。一开始也质疑这套理论到底行不行，但是你的工作就是让你每天告诉别人“这样的不公平的世界是不行的”，虽然你当时没有那么自信，但是无意识地“贩卖”这种思想的同时，把这种东西内化了……所以后来它变成了每个人头脑中的思考。在绿水的同事中有好多人思考这些问题。

这个过程，在我看来是一个社会言说到内在言说的过程，透过不断地向社会中的青年人言说这些理念，慢慢的，成为了言说者的内在言说。团体似乎并未向工作者提供足够的思考能力与思考空间的协助以对其理念进行反思，而是“灌输”这些理念，甚至带来压制其思考的结果，塑造了臣服的、没有自主性、难以自主思考的 NGO 工作者。美凤回忆道，“NGO 对我来说是颠覆性的，原来过往的经验，全都不能支持这个工作，挺痛苦”。她进一步说，

做世界公民教育，不是一个慢慢的过程。我是一个工作人员，肯定是用很强大的方式去推进，我的同事其实跟我一样，经验不见得比我多多少……我当时花了好多时间去理解公平、公正。因为你得落实到具体的案例里面。我觉得现在来看，那个时候我的工作不太适合做这个事情。世界公民教育是非常深的东西，教育是关于人的，关于对社会理解的。它不是一个小白鼠或者不是一个无知的人可以去做这个事。

在 2000 年代的草根机构中，团体刚刚起步，历史较短，缺乏经验，对员工支持不足并不少见，在其他的对话人的故事中也有看到。甚至 2010 年代，这样的状况依然存在。

世界公民教育的理念在短时间内、较为粗暴的、强行地被放入到美凤的头脑中，所以她用了“洗脑”这个词来形容这个过程。不过在她看来，“洗脑”不是一个贬义词，她觉得“所有意识形态的东西都是需要清洗的。有人可能用慢慢的‘影响’、‘渗透’，但是当时对我来说就是彻底性的置换，原来的东西跟现在的是拧的¹⁴⁵”。关于这个强行灌输的过程，我们有如下讨论：

国嫒：你怎么评价这个结果？这个过程看上去比较激烈，比较没有主体性的。
美凤：我那时是这样的感觉。但是你知道这套东西后来是渗透到我的生活里的，因为它用了十年时间。我为什么用那个词来形容，因为它跟我传统的那个东西、内在的东西冲撞了，很硬的切入我们的生命里。但是当时是我的工作，我必须那么做。我不是一个对新事物拥抱得很快的人，我用了很长的时间，最后这个东西就变成了我人生的价值观、我的理念，我所有的价值观理念都是来自于这些，对

¹⁴⁵拧一词指，完全相反的意思。

于社会认识，还有对社会改变的一些理想，都是从这里出发的，它用了很长的时间进入到我生命里。

国嫒：这个过程会不会有点粗暴？

美凤：有点粗暴，最早的时候很痛苦，因为你根本不理解这背后到底是怎么来的，我好像不太能马上接受一个名词。我有很多质疑的，我这个人就是这样，质疑不是不接受，而是不断的通过提问来去了解这到底是啥？这是个思辨的、对话的过程。

之所以如此简单粗暴地快速进入到工作人员的头脑和操练中，经过对话，有海外资助方的原因，也有工作机构团队的原因。海外资助方将外来理念和方方法带入中国，没有给合作机构足够的时间去理解，没有尊重文化差异和合作伙伴的理解程度。NGO 在推动不少理念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形意世界是存在着权力关系的：国际机构在其中扮演着主导位置，草根机构作为合作方常常“被动地”跟从，而失去了足够的时间和公共空间去辩论、思考。Spires(2012)对 2000 年代的两家北美基金会在华开展的、较有影响力的培训的内容和接受程度的分析显示，虽然这些基金会的机构陈述和公共文献中提到其使命是促进人权、基本自由和民主，但在实际展开培训中，重点并非如此，相反，其目的和操作是为了培养“专业化”的 NGO，以满足资助方的需要；而培训在修辞上强调推广“参与式”，但培训过程却大都没有参加者/学员的参与。而美凤所在的草根机构在 2000 年中，成立历史并不长，缺乏社会视野分析及论述能力，因而无法和国际机构进行充分的讨论、辩论、协商，也较难进行新项目的设计和执行，包括支持员工理解、设计和执行项目。美凤回忆，那时候团队很少谈为什么做世界公民教育，谈的更多的是如何设计培训活动。因而，机构更多地“做”项目，而并不清楚愿景和目标——即为何而做。

火客、钰晶、文衷、美凤的叙述都缺失了来自团体、行业内部对于“公民社会”、公民教育的历史脉络、所指内涵等的反思。而这些理念对工作者的影响过程，表现出比较强的一种“灌输”性。就像齐泽克(2001)所言，意识形态是具有客观性的，正存在于日常工作中不断的操演之中。而这个过程，恰恰与不少 NGO 所主张的批判独立思考是背道而驰的。NGO 团体又常常面临着事多、人力不足（既包括数量也包括能力上）的状况，而机构使命又常常比较宏大，工作强度很大，这些挤压思考和学习的空间，只能较为“高效”地去接受和执行，思考和学习较难发生。

2. 难于对社会问题进行复杂化、深刻的分析，而陷入工作者的无力

本节以长期在环保 NGO 做志愿者和全职工作的子康的工作经验为例，尝试分析 NGO 对于社会问题的分析和介入虽然一方面激励了工作者为无法发声的弱势群体发声、维护其权益，但是常常因较难对社会问题进行复杂化、深入性的分析以及愿景的缺乏，可能带来的工作者的无力感。

中国的群众性环境教育比西方国家推后了 20 多年，自 1990 年代开始发展，一批环保 NGO 发展起来¹⁴⁶（梁从诫，2012；Stalley & Yang, 2006），在环境教育、自然保育、物种保护、政策倡导等领域工作（Yang, 2005）。环保组织举办的各种环保活动和媒体对环保活动的报道将环保论述带入公共空间，而这些环保论述包含着公共参与、互相尊重和个人责任等民主价值；也在推动并丰富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Yang, 2005）。环保组织的第一代创始人中不少带有这些所谓的民主价值，比如著名的第一代环保运动家、自然之友理事唐锡阳曾经写道“没有真正的民主生活，就不会有绿河青山常在”（同上）。

子康曾于 2000 年初开始在一家历史悠久、影响力较大的环保组织“绿色光”工作了 7 年，之后到国际组织“莲花”任职 3 年左右后，她重新回看“绿色光”在她的转变中的角色。她认为在“绿色光”工作的 7 年是充满困惑、无力感的。

“绿色光”的论述正如前文对环保组织的归纳，非常强调公众教育、公众参与和公民责任。根据一份对“绿色光”创始人马先生的访谈¹⁴⁷，“绿色光”的理念是支持政府的一切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政策措施和行动，但是也有责任、权利对政府进行监督和批评，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参与解决。但是因为认为中国的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社会问题，涉及贫困、社区居民生计等复杂议题，同时为了避免和政府发生冲突被取缔以及认为中国的人口和环境资源的现实性和不可改变性，该机构的主要工作集中在环境教育方面，尤其是针对青少年的环境教

¹⁴⁶根据 Peter Wanacott, “Growing Pains, green groups bloom in China” Wall Street Journal, 2004 年 6 月 15 日，转引自 Stalley, Philip & Yang, Dongning (2006). An Emerging Environmental Movement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p333-356，注册的环保团体就有超过 2000 家，更不必说存在着大量的未注册的环保团体。另外一个供参考的数据：Yang, Guobin (2005)提到，1994 年，只有 9 家环保组织，其中 4 家为学生团体；1996 年，数字是 28 家（学生团体 10 家）；1997-1999 年间，新增环保团体超过 69 家（学生团体新增 43 家）；2002 年，非学生类的环保团体已有 73 家。

¹⁴⁷ 这是引用自一份公开出版物，访谈时间在 2000 年代中前期，与子康在该机构工作的时期交叉。为了保持前后匿名行文规范，此处不公开该出版物的详细出版信息和创始人姓名。

育，希望通过教育下一代的公众，为未来播种希望的种子——认为这未必有效，但如果不做，是肯定不会出现效果。但是，该机构也适当的开展解决实际环境问题，否则会造成空谈家形象、使公众失望，也是的环境教育与实践脱节。当被问及普通公众如何参与环保，马先生说，“我们每个人都应担负起环境保护的公民责任……从每个人自己做起……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只能从小事做起，从节约一盏灯、一盆水、一度电、一张纸做起”。马先生在访谈中对环境问题的分析比较集中于如何监督政府的政策和执行，以及认识环境保护涉及当地的居民的生计等；但是对于环境问题的分析仍流于表面，比如访谈中较少谈及企业在其中的角色。将“绿色光”放回 1990 年代中期以来的社会脉络之中，无疑推进了环境议题被认为仅仅是政府责任的公众想象，而激发公众看到其与自身的关联。然而，这样的论述，因为较少将涉及环境问题的成因的政治经济分析进行公开讨论——比如和企业的生产模式的关系、和政府的政策与责任的关系等，将焦点置于个体责任，无法解决因种种政治经济原因而造成的环境问题，而这产生的不经意结果是，面对环境问题的无法解决而令 NGO 工作者产生较强的无力感。子康在“绿色光”的 7 年经历似乎正是对此的注释。

子康是进入环境 NGO 之后，逐渐明确地以环境问题作为自身关注并参与的社会议题。在 2000 年代初进入“绿色光”时，因为阅读其会员杂志、参与会员活动（比如讲座等），接触团队同事和创始人，这让她比较认同环境问题的改变不仅仅是制度的问题，也和每个人的生活习惯有关。她认为这样的论述和实践之所以能影响她，也缘于那个年代里，环保组织才刚开始发展，所谓“专业性”的团体不多，很多团体都是通过环境教育和宣传，以回应环境问题。而且，环保组织形意世界的工作者非常重视身体力行，注重环保，这也影响着 NGO 工作者。比如马先生提倡在日常生活中的环保行为，骑自行车上下班，用水桶接洗手、洗澡水冲马桶等，员工名片用废纸做成，自带筷子等。

最初子康的工作是负责中小学学生的环境教育，并认为这是很有价值的工作。但是态度渐渐地发生了转变，怀疑环境教育的效果，最终决定不再继续做青少年环境教育，其中包括两个原因：第一，虽然看到参与的中小學生有一些变化，但是怀疑他们长大后，会受到很多社会外在的影响、媒体的影响、商品的诱惑。第二，在和中小学合作的过程中，发现很多老师非常世故，为了能够将这

些课外活动作为自己资历的增加，在活动中主导，令学生在其中的体验、参与和学习都较受限。

每个人从我做起参与和改变的论述和实践，在开展项目工作时，遭遇了青少年所处的社会脉络——充满了消费主义等——的困境以及学校环境中的指导老师希望利用这个项目增加资历的目的实用主义。这让子康开始怀疑工作的意义。由此看来，缺乏对于环境问题和成为环境改变者的复杂的政治与经济结构的公开讨论，有可能让 NGO 工作者产生更强的无力感。同一时期，在“绿色光”的环境教育的工作中，子康接触了大量关于环境污染方面的信息，包括给社区居民带来的健康影响等，因为将环境保护的责任主要寄希望于人的教育与责任，她认为环境问题源于人的欲望的不可控制，于是她对自己的工作觉得绝望和无力。她回忆当时在“绿色光”工作初期形成的判断：

出现那么多污染、环境恶化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本身的欲望太多了。我们想要过的日子，必然带来更多的生产，更多的生产就必然会消耗更多的能源和造成更多的污染。

在子康看来，公众参与无法回应人的欲望的问题，因为

公众参与只谈渠道和权利本身，但如果我是既得利益者，就算把权利给我，我也不一定要用啊，或者我只不过把污染转移到其他人那儿去而已，我照样过我的生活，这个没有跟我对那个问题的理解对上。当所有内部的讨论最终都去到公众参与，好像假设只要公众参与了，这些问题都没有了，我觉得这是放屁！

所以她觉得这套对环境问题的分析和工作，不能完全解决她的疑惑，没有涉及到欲望本身的问题。在我看来，子康在这段期间的工作，对于环境问题的理解是缺乏复杂性分析的。她受“绿色光”的分析的影响，看到环境问题与公众的欲望、生活方式之见的密切关系，而忽略了人的欲望、生活方式与其身之处政治经济社会脉络之见的关系。“绿色光”的论述和操作无法为她持续的从事环境问题的改善提供愿景、问题成因分析，因而让她在做的过程中越来越无力，她觉得“自己全无价值、非常差劲”。面对无力感，她选择了通过消费来带来满足感，从曾经不重视穿着转而注重穿衣打扮，这又强化了她认为人的欲望的不可控性。

3. 乡建塑造着理论结合实践、集体主义的有社会责任感的乡建人

本节以三水三农发展平台（简称“三水”）为案例，以分析乡建的形意世界对参与者的影响。之所以选择该平台为案例，缘于本研究中的三位来自乡建领域的对话人水仙、乐晏和马田均在三水任职¹⁴⁸。

乡建运动在中国有着百年历史，1990年代再度兴起，其背景是在1980年代以来，伴随着进一步的现代化、城市化发展，农村问题矛盾日益突入（温铁军，2005）。1990年代末在一批大学中的关注乡建的小组和社团开始兴起（白亚丽，2012）。从事广义的乡村和农村发展的民间团体在理念、工作策略上存在着不同的取向，而本文书写的乡建是指使用“乡建”一词自我指认的、以温铁军等为代表的从事乡村建设的社会运动。

三水正是在这一脉络下成立并发展，自2001年开始组织下乡活动，正式注册于2004年，主要从事乡建理论研习、农村合作社发展以及人才培养。其核心理念和论述包括理想主义、革命性、底层视野、强调平等和集体主义等。创始人黄老师，对三水所从事的事业的理念和策略写过很多文章。他在一篇文章中梳理三水的人才培养项目的理念和特点¹⁴⁹，透过阅读他对人才培养项目的理解，也可以一定程度上认识三水这一形意世界对于事业和人的理解。黄老师认为青年人才的养成需要四个因素：1）以实践培养为主，在乡村、工厂等基层进行蹲点实践，一年至少有8个月的基层蹲点；2）实践与理论学习互相促进，一年配合2-3次的集中的理论学习；3）以团队为单位培养，注重集体意识；4）以责任为导向。他认为这种人才成长，

是有指向的…是对整个人生，尤其是对整个民族的事业的承担，在关注社会和社会改造中成长…这种成长不是个人奋斗和个人价值的实现，更不是为了自己的幸福和安逸，而是把自己融化在整个群体中，作为群体中的一员，共同努力共同承担起社会责任。

我从中读出了，1990年代开始已经瓦解的、对“中国青年”的“神圣使命”

¹⁴⁸ 之所以选择这三位对话人是因为她们是在大地协作者网络之中，该网络中没有来自其他乡建团体的参加者。

¹⁴⁹ 为了保持匿名，虽然这篇文章载于公开出版物，但是这里隐去其出版信息。

的呼唤（陈映芳，2007）。而黄老师之所以有这样的思想，也是在 2000 年代以来的社会脉络之中产生的。他认为 1980 年代以来的教育体制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培养了为了个人财富、幸福生活而奋斗的人，知识精英也几乎完全原子化、个人主义，演变成自私自利。在他看来，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的实施的后果已经说明，依靠个人力量的自我奋斗无法解决人的问题。因此他认为青年人需要“在群体生活中成长，为群体而存在，寻找个人和群体之间的最好的、合适的结合点”。从黄老师的论述中，可以窥见三水对于社会责任、理想主义、集体主义和实践为基础并且与理论思考结合的人的培养的特点。和很多 NGO 或者社运工作者相似，他的论述中提到“关注社会”、“社会改造”等，这里的“社会”一词是有特定指向的，并非一种宽泛意义上的“社会”，比如作为“社会”的商业运行规则等，不在三水等团体的视野范围之内。这里的“社会”是指的那些有关社会底层群体的、关于公正公平等议题。诚然，三水为青年人提供了了解这一狭义的社会空间，但其不经意的结果是，宽泛意义上的“社会”的了解和分析不在青年工作的议程之中。

黄老师提到的这些理念在三水的青年培训、日常工作、共同生活的社区中都有体现，对参与者产生影响。马田回忆道，三水的文化强调吃苦，真的扎到农村中去，强调同吃同住同劳动，有点延续毛泽东的红军的下乡方式。三水非常强调理论学习和认识，组织集中培训、读书会、辩论会等。培训中既包括左翼思想的学习，也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学习，希望学员通过学习不同的思想进行批判思考。

水仙、乐晏和马田都认为，他们加入三水让他们开始了解社会运行的逻辑。水仙说：“多年乡建生活让我更进一步了解了这个社会的运转逻辑”。他对比那些毕业后找一份稳定工作成家、生小孩的老同学的生活状态，

他们和我们对问题都一样的抱怨，只不过他们还会在原来的游戏规则里打拼，我们没有而已，（停顿），这其实也说不上你是有理想的、高尚的而人家是现实的、庸俗的，我从来不这样看。（停顿）可能是他们意识到问题，但是没有意识到问题的来龙去脉，甚至何去何从，因此只是抱怨问题。我们跟他们不一样的可能就是我们不仅是抱怨和批判，也试图弄清楚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

水仙认为和同龄人不同的地方在于，对问题有更清楚的认识，并且思索和

尝试如何解决。而这正来自于，进入 NGO 形意世界后、在行动中的思考。这在马田的经历中也得到了印证。进入乡建，对他来说，得以进入接触社会底层的工作场域。在这个场域接触的活生生的乡村、农民、城市外来工的生活境遇，让他认识社会问题，同时获得深深的体验，而这些推动他思考如何解释这些社会现象、并且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案。马田在三水的一年实习生项目结束之后，进入到乡建的伙伴团体——左翼劳工团体工作。这段在社会底层的亲身体验和经历让他获得了继续从事这份工作的情感动力，并且激发他通过读书获得更多的思想资源，以理解现实中的问题。他回忆道

在南方劳工团体工作的两年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所接触到的劳工群体中的个体命运，活生生的出现在我面前，让我触动非常大。我自己也在工厂里扮作打工仔去体验和调查。在某国际品牌的代工厂里，我第一次深刻理解了为什么有些工人希望机器停转，这种感觉不是理论分析得来的。我有时想，在命运中无可奈何却没有退路的工人选择孤注一掷其实并不奇怪，但是主流媒体却始终喜欢将所谓的“极端做法”指向个体原因。曾经引起关注的刘汉黄一案，我参加了一审。在法庭辩论中，台商律师坚持要判刘汉黄死刑，理由是“影响东莞投资环境”，而私下里则听说东莞的台商意欲花 30 万买刘汉黄的命。赤裸裸的阶级之战就这样上演，真实的发生在你的周围。书本上都是抽象的概念，这是第一次近距离地能够感受得到，非常真实，太真实了。马克思主义老是讲阶级斗争，我觉得那东西离我很遥远，但是通过这些个案，我觉得非常近距离地接触。除了刘汉黄案，在和劳工组织一起去做工伤探访中，看到年轻工友的断指和残疾，震撼就更大，对自己的疑问也就越多。面对着如此多的不平等和不公正，无论从知识上还是行动上都无法去改变，只能尽力而为。当理性和理论分析不能解决疑惑时，是情感激励自己一直走下去。参与劳工的工作让我更加重视经验和行动，但是内心里一直想要弄明白为什么的那股力量一直无法被压抑下去，因此同时继续不断地看书。

参加者的改变和三水强调长期在基层蹲点实践的关系非常密切，实践让他们对问题有更深的情感联结和理解。水仙形容三水的团队氛围是，

理想、集体、辩论、反思……一切都让人感到希望和兴奋，这里与当初体验的那个大学与社会是多么的不一样啊。一个人在悲观、失望、焦虑甚至绝望中，没有什么比这种生命意志更能拯救他，三水青年团队的理想氛围激发了这种生命意志……

除此之外，形意世界中的人也对工作者产生重要影响。对话人普遍提到黄老师对他们的影响。三水的理想主义、集体主义、新文化运动、理论结合实践的培养人的方法等都是受黄老师老师的较强的影响下形成的。香晏回忆到，

在乡建中，我是很强烈地被塑造的。接触黄老师老师后，我觉得受他的塑造太强了……我说‘塑造’，觉得有一种机会和机遇的感觉，如果当初选择另外一个环境，可能未必会遇上这样一群人、做这样的事。

水仙回忆，“父母和曾经的老师都没有教过我怎么做人怎么做事，而只有黄老师老师在我来到乡建的五年中，给了我灵魂”，他回忆道

中心吸引大家的是理想主义，而这又是因为黄老师老师的缘故。关于理想，黄老师从来不是说教忽悠人，而是启发大家思考，通过反思来找回自己的理想。他最强调的是理论学习。他一再强调让我们学习了解各种思想流派，对我们的种种偏激小心地矫正……他没有轻信那些意识形态，因此也不会让我们迷信那些所谓的思想。他强调实践，为了理想而实践，不是为私利去蝇营狗苟。他相信我们能够在实践中找到真理，能够成长，即使探索的道路曲折，他都坚持带着我们走下去。他把我们当作共同成长的伙伴，向着理想的未来一起探索。

在三水里，青年人的有些成长是在冲突中发生的。乐晏觉得黄、老师承担了很多年轻人成长的代价，她回忆到

黄老师老师说，我们成长的过程像刺猬一样，不停地要扎，但是扎到谁身上的问题，你的成长大家总得有人去承担。很多老师是不愿意承担这个成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对比黄老师老师的时候就觉得，他真的是在让年轻人不停地在扎他，换来年轻人的成长。

正是黄老师对于理论学习的强调，他的理想主义、愿意支持年轻人，让对话人在与他的共同工作中，受到塑造。

虽然三水强调批判理论的学习和实践结合，但是很多成员面对具体的社会问题时，不知道该如何做，尤其是如何扣联社会批判分析，所以常常又带来很深的无力感。水仙在 2008 年，参与乡建三年多之后，感觉到迷茫。他说

可能是自己做的事和宏达的目标挂不上钩吧。我觉得很奇怪，现在很多人把社会问题最后都归结到人心上。我宁愿想着“三农”问题是归结于社会制度问题啊，甚至是马克思经济学所说的剩余价值的博弈，否则，我就不知道应该做什么、怎么做。我觉得真的是绝望了。我有很大的社会目标，希望能够解决很多社会问题。但是，在这个宏达的目标之前，我不知道做什么、怎么做，就会给自己很大压力，然后急着投入行动。

三水提供给参加者很多不同的社会批判和分析理论，但是参加者基层蹲点实践中，面对的更是具体的问题，似乎理论与基层的经验之间存在着差距，并不能协助他们的基层工作，常常产生无力感和不知道如何做的困惑。一方面，学习了一套社会改造的观念，但是另一方面，面临着如何做出来。这之间常常存在着较大的落差，这是 NGO 工作者面对的困境，如何在具体的情境中进行社区改造，这只能在 NGO 工作者在与情境的每一次即兴互动中，不断地摸索和调整。

小结

对话人正是在进入 NGO 形意世界之后，受 NGO 团体所从事的实践及背后的对社会改变的观念的影响，开始投身到社会服务、改造、教育的过程中，在与这个形意世界的互动中，在不断地工作实践中，在培训、组织日常工作中接触相关论述的过程中，在与其中的人的互动中，开始从对社会的不了解、较少接触的状态渐渐转变为社会介入的“自我”。在这个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困境，包括这一形意世界中存在着较窄化的批判思考的空间、较少的学习不同思想资源的空间、工作理念存在着向工作者“灌输”的情况。不仅如此，因为 NGO 历史短，缺乏对于社会改造愿景的深入分析和绘制，又或者是理论分析与社区现实情境之间存在着不一致，使得工作者面对社会情境行动时易出现无力感。

三、“自我”之转变：自我认识、疗愈、增强内在力量 vs 无力、运动创伤

受社会介入的理念的影响并且不断地在工作中与日常生活中做出或大或小的行动中，作为行动者自身也在这个过程中发生转变；换言之，行动者不仅改变着其身处的社会情境，也在改变着自身；NGO 形意世界不仅在塑造着社会，也在塑造着身处其中的人对自己的认识。所有的对话人均认为，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对自己有了更深入和清晰的认识，增强了内在力量。透过与其过往的“自我”进行对比，以及参照对“80 后”青年的价值观和行为的相关研究，这一变化依稀可见。然而，有力感并非绝对，无力感也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社会介入的工作使得行动者感到自我增能

以曾经一直无法面对自身同性恋取向的火客为例，他未曾想到，正是在从事 NGO 工作、参与社会运动的过程中，他越来越感受到自己的价值，更加自信，获得了接纳自己、认同自己的力量。他觉得在 NGO 工作，在服务他人的过程中，陪伴伙伴的过程中，自己的力量逐步积累，让他获得了直面性取向的内心动力。而且他认为，NGO 是一个少数人选择的职业，NGO 服务的对象在这个社会中也处于边缘的位置，而这两个边缘的位置，让他在面对性取向这个边缘位置的时候，获得了经验的转移的可能性。Urrieta (2009) 对墨西哥裔社会运动家的研究也有类似发现，通过参与社会团体、社会运动，社会运动者的内在力量得以加强。

而在接纳性取向认同并出柜后，火客感觉到内在力量更加增强，于是开始更加积极地投入社会运动。火客参与发起了多次挑战政府政策的的倡导活动以及性别权利争取运动（这并非其工作职责内容）。2011 年发起要求 G 市政府停止耗资上亿的光亮工程的“光头行动”——通过网络社交媒体，发起公民剪光头行动，征集光头照片配合文字，拦下光亮工程。该光亮项目最终在市民反对、媒体跟进曝光的情况下，被政府取消。该行动缘起于火客和同事吃饭的时候看到报纸的报道，觉得很荒谬，同事说，“每次这种事情发生时，我们都是拍拍桌子、骂几句就过去了”，所以当时他们想能不能做一点事情，带来一些改变，传递这样的讯息——除了骂几句、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在同事和 NGO 圈子的社会运动者的集体讨论和推动下，这件事情做成了。火客觉得，在 I 机构学习的“公民社会”的知识和方法论是构成这个行动的主要内容。而行动的成功以及其后续 G 市的各种直接行动此起彼伏，给了火客很大的力量，也更加加强了的自我认同、信心，是他的转变的重要时期。

NGO 通过培训等学习活动进入工作者的 H-I-P, 团体文化的包容、温暖疗愈了在发展主义文化和成功者文化下形成的“自我”

NGO 在对社会的改造中，特别强调对于工作者本身的改变，因为对社会的改

造需要通过工作者的实践。但是这种改造有不同的目的：既有功利主义——即为了社会改造这个目的——的取向，而影响工作者的价值观和工作手法；也有以人和文化的改变本身为目的取向。本研究中的对话人因为从事青年工作，作为教育者（或者说协作者），进入青年工作的场域，相对其他领域而言，更容易接触将人和文化的改变作为重要工作目标的取向。他们均参加过协作者培训，而这些培训往往带有个人成长、自我认识的环节，直接处理工作者的 H-I-P 中曾经的生命历史、价值观、行为取向等。

NGO 形意世界中的培训活动，比如应用戏剧培训、个人成长培训、自我觉察培训等，令对话人开始认识了社会化过程中、加诸于身的各种束缚，比如压抑内心感受，跟随“成功文化”等等，在这样的自我认识的基础上，内在力量得到了增加。

文衷有着这样的深刻经验，接触个人成长的培训环节、在培训中与同伴的互动以及日常工作中的团队的支持，让他开始认识到自己曾经被社会构建的自我，伤痛的记忆，并且有勇气不断地改写“自我”。在本章开篇的文衷的生命故事叙事中，他提到在入行之初参加的针对 NGO 协作者的、关于社会发展议题分析的培训，涉及城乡发展不平衡、性别议题、环境议题等，并且以戏剧、纪录片讨论、学者讲座、有机农场劳动体验等体验性活动为途径，穿插个人成长环节，达到深入的培训效果。对发展议题的分析结合参加者的 H-I-P 以及分析视角，这些让文衷不仅仅吸收了社会议题分析的视角，更有机会回看自己的经历，于是开始经历自我认识的转变，重看成长过程中，社会脉络参与“自我”的构建。他在其中的个人成长环节中，回忆起小时候弟弟为了减轻家庭负担而放弃读高中、外出打工的经历，在培训中“哭得很厉害，但不知道为什么哭”。透过拾起“忘记”了的记忆，内心和身体得以打开，感受世界，而不仅仅是用大脑去思考。这个过程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宣泄的过程。他发现“有些事已经过去那么久，以至于不觉得对我影响那么重，正是在这个培训里开始对自己有些了解”。文衷觉得自己成长的过程就是不断的被包裹、在自我外面长出一个壳的过程，他说

就像一生长下来有太多东西把我包裹住了，我内在的不一致性往往是我认同那些包裹我的壳，参加那次工作坊让我开始尝试捅那个壳，这个过程我觉得挺挣扎的，

因为工作坊里讲的很多内容有点触及我的个人认同了。

正是通过带有戏剧要素的个人成长环节，让文衷开始了解和觉察深藏在自己记忆和情感深处的经验，而这样经验的挖掘，让他觉得自己开始重生了。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转变，也和参与这次培训的来自各 NGO 的参加者有关。文衷觉得这些参加者说话的语言，明显有一种尊重的感觉，表达柔和，观点明确。他回忆起

这些参加者的互动方式，让我觉得如果世界是这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多美好啊。这些参加者也让我足够信任，于是我敢于撕掉这个壳。我一开始感觉他们在嘲笑这个壳，后来我慢慢理解到，工作坊只是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去看这个观点，这个工作坊就是那个外在的刺激，旗帜鲜明的捅你的壳、挑战你。

这个工作坊的内容和团体氛围营造了一个不同于成功者文化主导的社会的情境，文衷觉得自己曾经的那个壳开始融化，比如他开始反思自己曾经对“成功”的理解，认为薪水、家庭背景、学历、名牌大学等是评价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准，其实是内化了外部社会的理解。除了参加培训，工作对其影响也非常重要，他把其所在的团队比作他的第二大学，让他

在一个熔炉中重新锻造自己，重新寻找那个真正的我，就像孙悟空在炼丹炉里炼得火眼金睛一样，在这个过程中，我才成为我真正的自己，外面的壳才锻掉了。

他透过同事中的一个个体去认识这个世界。另外，也是因为在工作中对于教育的密集的重新学习。于是他慢慢地开始寻找自己定义的成功。在这个过程中，“对自我的认知很多，对自己越来越了解了，对自己也开始有很多包容、悦纳，接受和喜欢自己了”。

从事 NGO，对于不少对话人来说，是一个自我成长和疗愈的过程。团体比较温暖、包容、开放的氛围，对于很多人来说感受到一种被接纳、包容、支持的感觉。这个氛围对于很多弱势的青年人来说是一个特别难得的、自我转化的机会。当然，也可能让他们更难以适应“现实”生活。

有不少对话人提到通过“莲花”组织开始接触自我觉察，对他们的自我认识、自我增能产生较大的影响。“莲花”在推动对现代发展观的分析和推动另

类文化实践的过程中，带入了协作者自我觉察的培训和相关的项目合作支持，而自我觉察是在协作者的“自我”之上进行运作的。

2000年代初，总部位于香港的莲花开始在中国通过培训和 NGO 合作项目、出版等发展并推广其社会分析和行动，其理念和论述主要如下：1)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观的反思；2)强调人的转变、人心的转变、文化的转变、生活方式层面的改变；3)看重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不同于众多来自北美和西欧的基金会和 NGO，莲花调动了很多来自泰国和台湾的经验，尤其是泰国的青年行动者培养经验、将自我觉察引入社会发展的经验，这些经验反思现代的发展观，并且将人心、价值观、文化的改变作为重要的改变途径和目标，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的关系，而非仅仅“独立”、“自主”、“权利”等现代“自我”观念。在这样的背景下，莲花促成了中国 NGO 工作者到泰国、台湾等地进行访问、学习，借鉴泰国 20 多年的青年行动者培养项目经验、在大陆推动类似项目，邀请泰国培训师到中国举办针对 NGO 工作者培训等、推动跨地域的学习网络等。这些培训给参加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曾经在莲花任职的子康，坦陈自己受其影响非常之大。莲花机构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子康产生影响：第一，理念层面，主要是有关现代发展的历史和发展观的反思，文化和价值观的改变作为愿景，通过选择可持续的生活去重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的关系。第二，由工作同事、工作伙伴网络组成的一起工作的团体氛围，对她产生影响。

子康曾经多次去泰国学习并且参加泰国培训师在中国开展的“生态之家”培训、“自我觉察与社会发展”等培训。这些培训启发了参加者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和分析，比如对消费主义的深刻反思、对什么是“幸福”的生活的讨论，以及将“正念”练习带入工作者的自我成长等，也常常使参加者找到了内在力量和对社会工作的信心。

曾经的子康是苦闷的、通过消费去带来满足感。然而，当她接触莲花组织的培训之后，开始逐渐转变这种消费观。她认识到，消费虽然一时令人感觉愉悦和满足，但是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幸福和价值。子康在接触泰国老师的培训、去泰国学习和接触泰国老师的时候，深深体会了这种不因物质而带来的幸福感。比如她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在泰国访问当地社区时候的画面和那种内心的触动：

去泰国学习的那些感动，是在身体和记忆里面的。每次去泰国，都看到一种真实的生活状态。看到人们在社区里的幸福感，不在于获得多少物质上的东西。去了一个社区里的图书馆，慢慢发展成村子里青少年活动中心似的平台，那些青少年，有学草药的，有编传统的玩具，有用本土的方法检测当地不远处的国家森林公园的水的质量。心里最柔软的记忆是那时候看到几个高中生弹着吉他一起唱歌，觉得这些小年轻人有那种向上升的年轻力量，还是跟他们生活的社区有关系的，不像我小时候也有小伙伴但是更多的是同学，是在学校里的社会关系，不是这种社区的，就很不一样。唱歌很好听，他们也都特开心啊。我们就靠过去，听他唱歌，然后一起唱。那个气氛特别受触动。那一幕，到现在那个形象还是可以出来的。

泰国的培训十分关注个人成长，这让子康等更加认识自己、反思“主流”价值观对自己的影响，开始更加有内在力量。比如“生态之家”培训在每一周的培训中都贯穿个人成长的环节，“自我觉察和社会发展”工作坊引入大量的正念练习，让社会运动参加者回到内在、自我关照。“自我觉察”不仅仅是对自己的反思，它也是一个个人与社会关系的重新反思，并且找到内在的力量。这些让子康认识到“主流价值观”是什么、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她也有机会回看，自己的自卑、不自信也正和这个“主流价值观”有关。她回忆自己

很长时间以来都是强迫自己成为别人期待我的那个样子，你就要装成那个样子，别人基本接受了，但是自己感到很痛苦。

而这些自我成长的培训让子康去认识自己是怎样的人，

在这些学习过程中，开始让参加者去看自己真实是什么样的。在一个团队的工作里面，并不一定能力特别强的人在一块是最好的。所谓的团队合作是展示真实的自己，大家建立联系，彼此有互动，才是最优的。在培训中也肯定那些行动力差一点、想得多一点、效率可能没有那么多高、或者学东西也没有那么快的一些人，他们同时具有一些其他的被肯定的特质，比如说想象力比较丰富。发现其实就像硬币的两面一样，如果你只是看负面的那一部分的话，就会变得很不接纳，很不喜欢自己；但是你如果换一下看，其实很多的特点是有积极的一面的。于是开始觉得自己还可以吧，我就做真实的我就好了，也不用一定伪装成什么样子了，我觉得这个是对个人来说比较有价值的一个转变。

子康之所以有这样的重新的自我认识，和培训活动调动了参加者的 H-I-P 有关，她的 H-I-P 中有很多在过去的社会中生活而习得的，以他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希望得到团队的认可，在追求认可和成功的过程中，积累了自我不认

可。通过不断的自我觉察，认识到自己的需要和模式，尝试去掌握定义自身价值的主动权。

雪莲也有类似的经历，因为在 NGO 中接触的各种人和理念，开始对未来有了更多的想象，而不再囿于从小来自学校、媒体、身边的人的价值观的灌输。她回忆自己进入 NGO 形意世界之后，

开始对未来发展的可能性有了很多的想象，例如，我从前从来不认为，未来还有一条路是可以回到农村去种地放羊，我以前从来不认为我能够站在大学生面前，给他们讲环境保护的事情，我从前从不认为我自己能够出国，我觉得那都离我太遥远了。但是现在我觉得只要我想，并且去努力了，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总之，在 NGO 的工作，见到的人、做的事情，让我感觉到，这个世界不只有一种生活方式，我的思维不再受限于从小的教育那一套好工作多赚钱的理论的禁锢。从前我是一个很在意别人的看法的人，觉得一切要和别人一样才好，我生怕别人投来不一样的目光，一旦察觉到这一点，我就会很不安，立马趋向于和大家一样。但是现在，我已经可以做到按照自己认为最正确的方式和理念去做事和说话，也认真听别人的看法，不是一味的趋同。这个的不同让我受益匪浅，因为似乎我觉得自己更加独立和自由了。

自我觉察的培训等让雪莲开始更清楚地觉察自己的需要是什么，而不是被其他人的想法带着走。雪莲从中小学开始就接受到要有好工作、赚钱的工作的价值观，也一度认为就是要做这个事情。但是这些抽象的“好工作”、“赚钱的工作”，在她看来并不是很具体的知道怎样的工作才是“好工作”、赚多少钱才叫“赚钱的工作”。而进入 NGO 遇到很多具体的、鲜活的人和他们所做事情的时候，当她看到这些人既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又可以养活自己的时候，她觉得眼前的具体的例子战胜了原来那些抽象、模糊的价值观。

与无力感的协商

然而，有力并非常态，随着运动的深化，NGO 工作者也会经历无力感。因为接触过莲花带入中国的自我觉察与社会发展培训，火客开始意识到自我觉察、爱和慈悲的重要性。2012 年 9 月 18 日在 G 市的反日游行中，他与同事、朋友一起组织了“非暴力，爱 G 市”的小分队，在游行示威的人海中，反对暴力的反日活动，宣传非暴力和爱的精神。那个时候的火客对自己在其中的行动和感受也有一些觉察，他回忆道：

我非常明确地感觉到觉察在我身上发挥一些作用，因为我能感觉到自己在运动中的感受。那时站在那里举着牌子，我是知道自己站在那里举着牌子，但是只局限于此，没有想过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那时更加有的是人潮汹涌对我的冲击，给我心里带来很多感受，然后我自己站在那里，坚定的感受是有的。

在运动中积累了很多感受，让他不知道如何处理，在行动结束后，他觉得

心里有很多感受、不舒服的地方，因为那个场面太冲击了。看着人潮汹涌地在那大潮里边，做着那些不可思议的事情。我想如果发生在我的家乡，我的家人估计也会在里边，会跟着喊日本怎么样之类的，我觉得很恐怖。有一种无力感。同时很不可思议，为什么会这样的感受。这种感受一直在心里，说不出来地想要发泄的感觉，但是没有爆发、宣泄，没有出口，就一直在心里，感觉难受！心里很空虚，但是那时我们都不知道可以怎么面对。

火客 2014 年在泰国参加一个由来自泰国、美国的入世佛教社会运动者举办的培训，之后欣喜地发现在做社会直接行动时，他可以将自我觉察、爱和慈悲带入运动中，对所谓的“压迫者”也带着爱和慈悲，而不是将自己的情绪带入这个过程，这让他觉得很有力量。在一次作为原告起诉对同性恋进行心理矫治的心理医生的庭审上，他感觉自己的变化很大，回忆道

在那个情景下看到那些事情，我好像能够去处理了，看到情绪来了，然后看到情绪走了，也清楚自己正在做什么，和以前的行动中的感受很不一样。因为除了看到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以外，我觉知到自己的心理感受，而且带着一种对敌人、对对方的理解，所谓的慈悲、爱……我觉得那是让自己很有力量的东西。当我看到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带着觉察和慈悲的时候，很平静去面对我要做的事情，不会被情绪、被对方牵走，也不会被愤怒牵着走。我觉得那个过程很美妙。带着所谓的爱的觉知，或者是爱的社会运动，我觉得更有力量。我觉得我把在泰国学习的这个实践出来了。

在 NGO 形意世界中接触到的社会运动者的自我觉察和修习让火客面对自己的运动创伤和无力，尝试着带入慈悲，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于抗争的对象，力量由此产生。然而，这并非一劳永逸的，在我和火客的持续交往中，他虽然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社会运动中，并且以此为主要职业，但是仍常常感到疲惫、无力，尤其是面对着很多社会运动者同伴内在的创伤和暴力，面对来自权力一方的压力。

从以上的分析可见，NGO 工作者在参与社会发展工作乃至社会运动的过程中，不断地疗愈曾经的竞争文化、金钱文化、权力滥用在其“自我”上的沉淀，

变得更有力量和自由，然而，在参与社会工作的过程中又产生了新的创伤和无力。这复杂的张力正是他们正在形成的“自我”的组成部分。除了在“社会”介入中的疗愈和创伤，不少对话人的改变也发生在社区和日常生活中。

四、“自我”之转变：社区和日常生活中的改变 vs 无暇建设自己的日常生活

部分NGO工作者也将社会介入的价值观和行动带入日常生活中。在这方面，女性对话人比男性对话人有更多的叙述。

曾经的美凤被她姥姥的传统性别思想规训，不可以和人吵架，现在她尝试突破这样的思想和身体限制。美凤认为，只有将这些有关社会公正、公平的意识在日常生活中实践，才会更加确信这些理念，同时这也是女权主义所说的将理念带入日常生活中。美凤开始日常生活中的维权的重要因素是因为生了小孩，母亲的责任唤起了她曾经在第一份工作内化的那些价值观，开始发展出维护自己权利的行动能力。她回忆

生完孩子后，我有个巨大转变，再也不能躲在背后了，得走在前面。因为我有了一个孩子，她那么小，我得为这个人负责，我必须保护她。我怎么可以忍受别人这样侵害她。看着我这样忍受，她将来也会这样忍受。而且我也觉得不公平，不能这样对待我。我以前可能退缩、不会争取。但有了在“绿水”的经历，我觉得不行，不能这样。比如，我带着她在外面上公交车，司机突然把门关了，把她夹住，我特别生气，特别凶，我把他大骂一顿，而且理直气壮。他就不吭声，拼命道歉。我第一次“得逞”之后，发现这挺厉害的，后来我就一次又一次，在这种权力斗争时获胜。

她发现在一些小事情上做成一些改变而获得的经验，让她更加增强了对自己的改变力量的认可。当她开始日常生活中不断维权之后，日常生活改变了，于是她觉得自己再也不愿意放弃行动了。但是常常是同伴寥寥，人们不倾向于组织起来、争取自己的权利。美凤在女儿的幼儿园发起了一个家长联署，希望学校停止利用扩招机会压缩学生教室活动空间，但是很多家长都怕担起发起人的位置。美凤回忆道，

开家长会，家长们对老师特别有意见，都没人说。我就会说嘛，否则我为啥要去

呢。这个班应该调到2楼，但是为了扩招，把小朋友都放在一个班里，睡觉吃饭都在一起，这不符合幼儿园管理规定。家长们都忿忿不平，但是跟老师说说说，也没有效果。后来我查了好多资料，关于家委会、幼儿园设置的要求、扩招的目的。扩招的目的是为了更多地吸纳农民工子女，但是幼儿园却把扩招当成他们赚钱的手段。于是我写了一个联署，去找幼儿园校长，家长们都签了字。所有的家长都特别积极，因为他们不希望他们的孩子那样，但是没有人带头。但是有些家长比较胆小，有个家长因为这件事情，孩子转学了，因为老师认为是这个妈妈在背后支持这件事情，她特别紧张，特别在意她的女儿，怕女儿在幼儿园受委屈。

可见，美凤和其他家长表现出不同的社会介入思考和能力。其他家长不知道如何通过合法手段维护孩子的权利，或者没有勇气挑战学校的做法。但是已经在工作中形成权利意识和权利争取习惯的美凤，采取的却是和校方争取，最终实现了诉求。

在环保领域接触的公民权利的论述对雪莲也有较深的影响。她坦言自己以前没有这些意识，但进入环保组织后，接触其中的论述和人，也渐渐的改变着她。她在访谈中，反复提到对她产生影响的王今。王今是“70后”，在1990年代中后期的大学时代便参与到环保运动中，他所在的国际组织是雪莲所在团体的资助机构。雪莲觉得王今对她的影响是“润物细无声”的，她说自己

之前是一个缺乏权利意识的人，妥协于社会、听信于他人，不关心自己所具有的权利。很深刻的记得关于王今的一件事情。我帮助他发快递，没有要发票，他给我打电话，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告诉我作为消费者，我们是如何具有索取发票的权利，而作为企业，又是如何具有提供发票以及纳税的义务。还有一次，我们在饭店吃饭，一个菜里有一个虫子，一般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多半抱怨几句，不吃那个菜，下次也不在光顾这家店。但是那次，王今找来服务员，要求退钱。然后又是一个很长时间的语重心长的分析，说中国社会和一些外国的差距，是因为我们这些广大的人民，在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往往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也选择忍耐和推脱，所以进步才慢。这算是个启蒙吧。

长时间的浸淫在这种“权利”意识的氛围中，雪莲也在发生着改变，她回忆

后来又一次，我带着我的猫去坐地铁，地铁的工作人员说地铁上不让带宠物，我和他理论很久，未果。然后我提着我的猫，很认真的看乘坐地铁的规定，我觉得我带猫并没有违反其中的任何一条……虽然最后我还是没有再进去和工作人员交涉，但是无论如何我已经发生了改变，如果换作从前，我一定是听到工作人员说不能带，连为什么都不会问，就会走。这样的改变让我更加敏感、也更加理性，开始去探究事情的本源，而不是停留在事物的表面。

对于在学校和媒体中较少能够接触这类思想的青年人来说，加入 NGO 团体开始卷入对政治、公共议题的分析。“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对于人与社会的关系的理解对于 NGO 工作者来说似乎是一门“公民课”，开始理解自己的权利，这在“小时代”文化下的、缺乏公共意识和公共参与的当代中国而言，似乎有可能促成公共的参与。

除了在日常生活中的维权行为，一些对话人在生活方式上也在发生着变化。比如钰晶因为对消费主义的反思，在生活中更多的购买简单材质的衣服，更多的吃素，更多的去社区小店购买生活用品等。雪莲在做环境教育的同时，自己也在日常生活中践行环保，而这样的环保行为也在影响着她周围的大学同学。刚开始大学同学聚会时，大家看到雪莲自带筷子，还会开她的玩笑。渐渐地，她们也开始自带筷子、不用一次性筷子了。看到这样的因自己的改变而带来的周围人的改变，她觉得是个很美妙的事情。

虽然很小，但是当我感受到，来自我的力量，让他们也开始考虑环境保护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件十分美妙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改变，大概就是这样，慢慢的，先把自己变成自己喜欢的自己，例如接纳自己，平和的对待生活和工作，如果自己认为是对的、是最好的，那就去践行，然后周围的人可能会和你一起，自然而然的就会有一些改变。

然而，因为工作繁忙、都市化的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等原因，多数对话人都比较少谈及在日常社区生活中的行动。

美凤把很多精力投入在工作上，和众多的上班族一样，没有时间和生活的小区的邻居建立基于日常生活的关系，呈现出工作理念和日常生活实践的割裂：吊诡的是，致力于社区建设的协作者在日常生活中却生活在没有社区感的小区。原因包括：她的工作非常忙碌；大都市的生活的建筑空间和居民心理也愈加原子化，很少有往来；她本身认为自己和一些同样有孩子的父母的价值观差异很大，没有共同语言。

我把很多时间投入在工作上，感觉自己和生活的小区的邻居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比如我不像很多邻居那样去菜市场买菜，相约一起做锻炼。我也没有时间照顾小孩，因此也没有机会因为小孩子之间的联系和和他们的父母建立深层的关联。

有一段时间我女儿不在身边，一个人生活的时候，突然一个人的时候，发现无所适从，睡了一觉起来之后，突然觉得特别心慌，因为这个城市里面，好像你就是在这里睡五天五夜，你不存在了，也没有人知道你，没有人会关心。我觉得好多人都是这样子的。我跟这个城市没有任何联系，包括楼上楼下，你也不和我来往。这正是这个超级城市让人成为原子化的存在，没有一种社区感，人在都市显得异常渺小。

美凤觉得自己和其他同龄人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她觉得那些妈妈们在生活和育儿上是一种中产阶级的想象，而且会用这个标准来检查美凤的生活。所以很难开展对话。她回忆道

我女儿同学的妈妈，跟我在一块就在谈，她让儿子上双语幼儿园，她特别艰苦，租房子住，但是她老公能赚一些钱，她自己不上班。她从孩子两岁开始，花1万6给儿子报了一个英文补习班。她从小就学习不好，把希望就寄托在儿子身上。我肯定跟她不一样，但是她会用她的标准来检查你的生活，但我又拒绝被她检查。在一块聊天肯定就不欢而散呗，没有共同语言，所以大家基本上不讲话。所以你想你在这个社区里面，没什么可谈的。

对于不少 NGO 工作者而言，有着和美凤相似的处境，作为从事人的转化工作的工作者，但是在日常社区中遇到的和自己价值观不一样的人，较多地看到不同之处，而非尝试去看到彼此相通之处、尝试去理解对方，更大的“社会”改变似乎难以发生。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 NGO 工作面临着资金少、工作多而对于工作者产生很大的工作压力，投入家庭和日常生活的时间较少。另外亦可能与在 NGO 形意世界中较多的“主流”/“另类”二元分割的论述和操演有关，这使得一些 NGO 工作者难以反思这类二元分割倾向。

三水的做法有些特别，在一段时期之中，尝试创造一个集体主义的、理想主义的生活工作和共同生活的社区；然而，一些对话人对这一尝试的反思是，缺乏个人生活空间。

三水的工作者的工作和生活都在一个社区内展开。社区中有培训室、办公室、学员和工作人员宿舍、厨房、活动空地、工作人员负责的有机小菜园、生态厕所等。每日三餐准备、院落的清洁等都由工作人员分担。正像黄老师所言，这是一个年轻人共同生活的社区，通过合作一起居住、娱乐、学习，甚至建立自助基金解决内部员工的医疗和保险。水仙回忆中心的新文化、新生活的内涵是

大家有意识地反思现在的主流社会的、小家庭的生活方式，买房买车的生活方式，尝试追求集体的、生活之外的新的社区，比如参与式保障、美好生活促进会啊，这是在我们的工作之外的自发的小组，策划组织活动，比如旅游啊、团队建设。这些集体生活状态肯定跟外面那些上班族完全是不一样的。新的生活、文化更多的表现在：吃饭或者工作赚钱不是主要的。工作赚钱只是最简单的维持大家生活的基础。跟外面的人不一样，他们每天想的是我的工作竞争、工作压力、销售业绩等等，都是为了更多的工资，为了生存、生活。我觉得我们的生活可能物质要求比较低：要健康一点，以这个为基础就行了。而这之外要多发展出一些其他的爱好兴趣，学习和讨论对社会的关注等等。说的普通一点就是，在你的基本物质，基本吃喝生活之外，大家有一个更多的、丰富的追求和思考，这是我们大家达成共识的价值观。

中心鼓励、实践共同生活，在工作之余有不少集体性的休闲活动，比如一起踢球、打比赛、出去游玩等等。水仙对比在城市里的同龄人的生活，他更喜欢这种社区感的生活。

虽然如水仙所述，三水在推动新文化和新生活。但是从另外两位对话人乐晏和马田的叙述中，读到的却是工作者缺乏个人生活的空间和鲜活的生活体验。而仔细辨识水仙的叙述风格也会发现和乐晏与马田一样，多数访谈内容都是围绕着理想、底层社会、社会改造等等话题展开的，几乎很难听到如乡建以外的7位对话人那样讨论她们的日常生活的话题¹⁵⁰。

三水的集体主义的公社生活的另外一面是，工作人员的个人空间和时间较少。对话人谈及，因为是集体式的生活，中心很少给谈恋爱的人私人空间，每个月平均只有一两天可以离开三水¹⁵¹。三水的氛围是比较偏向社会改造的事业，工作节奏非常快，生活被缩窄。乐晏回忆道

那时一周只有一天休息，而且很随意，有工作、出差就不能休息。那时候黄老师连轴转，见缝插针地去讲课。我做不到。他那种压力感给了我。带着大家不停地往前跑。我之前在中心遇到很多问题，心里特别紧张。以前中心就是一种紧张感。我没办法控制这个节奏，一直在培训、出差。

对于进入三水之后的经历缺乏生活细节的叙述，马田的认为乡建的风格生活是比较硬的，没有什么生活，尤其是黄老师负责的时期，更是如此。和三水有合作的一位外机构的工作者来看，黄老师是一个不太愿意关注个人生活，考虑

¹⁵⁰水仙认为，在三水是有集体性的日程生活实践的，但是因为很多参加者习惯了宏大话语叙事，因而在对话中忘记了表述，或者潜意识以为这些微不足道、羞于启齿去细说。

¹⁵¹ 这是2010年前的状况，之后机构转型，有所改变。

的都是国家、社会、集体¹⁵²。在马田的访谈中，进入乡建之前的叙述是有很多细节的，但是进入之后反而细节的描述不多。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马田觉得很多 NGO 中，论述比较多、抽象劳动比较多，他说，

比如倡导，写一些项目书、文案。都不是生活化的语言，时间长了就对思维方式产生影响。NGO 工作压力也挺大的，不像一般社会里，下了班之后就是家庭生活，有孩子。NGO 里面，结婚的也比较晚，这种经验相对来说就晚一点。在乡建就更少。你想黄老师就是那样，整天也是缺少生活细节。

在这类 NGO 组织工作，对社会分析的论述的使用强度较大，渐渐影响了其说话习惯和思维方式。这些叙事展现了，部分 NGO，因为特有的理想主义、社会改造的理念和高强度的工作，对于工作者的日常生活进行挤压，在通过工作平台实践社会理想与工作者的日常生活的摆放之间存在着错位。

五、“自我”之转变：性别意识和行为

社会性别意识也伴随着 NGO 在中国的活动，影响着 NGO 工作者。社会性别视角不仅仅令他们重新检视社会性别文化的操作，而且促使一些对话人意识到更广泛的“主流”文化的运作¹⁵³。接受社会性别视角影响的渠道，多数是通过参加培训以及和性别团体接触。而之所以能够深刻影响其价值观和行为，和他们将之与自身的生活经验结合、进行验证有关。最终接受社会性别视角的对话人是美凤、童淼、文衷、火客、钰晶和雪莲共计 6 人；子康没有明显这方面的改变¹⁵⁴。这个改变的过程是复杂的，对于有些人而言，社会性别培训唤起曾经的性别经验，在参加培训之后快速“顿悟”和改变童淼，比如文衷、钰晶和雪莲 4 人；但是对另外一些人而言，虽然也参加了社会性别培训且生命中也有性别经验，但性别意识没有立即产生直接影响，仿佛一粒种子，撒在土里，但是因为很多因素不具备，没有发芽，等待日后的发芽或者永远沉睡。以美凤为例，最终转变

¹⁵² 根据一份公开出版材料，为了保持匿名，这里隐去出版信息。

¹⁵³ 比如雪莲参加社会性别的培训后，才意识到原来自己一直生活在性别不公平的环境中，但是却没有知觉。不仅如此，这样的反思让她进一步看到“主流价值观”对自己的影响——一直参与塑造自我，自己却浑然不知。可见，社会性别培训的论述资源，不仅仅是对性别文化的理解，更可能带来了更广泛的、对整个“主流”文化的运作及其影响的觉知。

¹⁵⁴ 截止在访谈结束之前。之后她开始接触女性主义团体，渐渐地也主动接触一些和女性主义有关的文章。

和她开始从事和女工有关的社会工作、并且结合自身生命经验中成为母亲、养育孩子的辛苦经历有关，这些唤起了她曾经接触的、强调行动改变以及性别观念，同时也因为她长期和女性主义团体一起工作。

社会性别培训通常是体验式的，包括授课式的演讲和各种参与式的活动，通常会透过召唤个人的成长历史，包括家庭经验、学校经验、媒体经验、就业经验等以理解性别角色是如何被社会化的。社会性别培训认为社会性别不是生理决定的，而是文化和社会构建的。对于大学毕业两年、开始谈恋爱的童淼来说，她吸收到的培训中的资源是恋爱关系中的性别角色。她回忆那次培训

特别好，感性的和理论上的都有，对我的影响很大。我现在还有印象的是，做戏剧角色扮演，有两位参加者扮演一对情侣，女生比较像男生的性格，男生比较内向扭捏的性格。我也参与在那个扮演中，但是有点记不住我演的是什么角色。整个环节给我的感觉是，社会性别和当时处于恋爱的年龄段的人是特别相关的。它影响我们怎么看自己在和恋人的关系中、所谓男性和女性承担的角色以及责任，是非常非常突破传统的。所以那次我最大的收获是，能够批判性地看传统社会性别文化，它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它是怎样影响我长大的，以及慢慢发现我身上的一些传统社会性别的印迹。

从她的叙述中可见，这个培训提供给她社会性别批判的视角，同时是通过戏剧扮演等体验活动达成的，8年之后的今天，她仍记得角色扮演。她带着自己的 H-I-P——在恋爱关系中的女性被期待的角色、对男友的角色的期待等——去理解这个培训中的新视角。在童淼看来，除了社会性别培训对她产生影响之外，也和生活中自己的恋爱、婚姻实践以及在工作的机构中看到的同事的婚恋关系有关。比如她看到，团队的同事都选择了比自己小几岁的男性作为婚姻伴侣，这在她看来是“非常非常反传统社会性别的婚姻组合”，但是让她的“眼界更宽了”。这次培训之后，童淼比较积极地将社会性别培训带入她负责的培训之中。

在 NGO 形意世界中接触的社会性别的视角，也在影响着对话人对自身的性别经验、身份和价值观的反思。当代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影响着中国人的婚姻实践，几千年的婚姻习俗观念与现代的婚姻观念和实践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协商：一方面，传统农耕社会的婚姻制度在当代社会仍有延续，包括结婚作为两个家庭之间的连结而非仅仅是两个当事人之间的私事，对于生育的期许，比如“不

孝有三、无后为大”；另一方面，工业化后，个人主义意识觉醒、社会生活方式和文化多元化，传统的婚恋观念对于青年一代的影响大大降低（沈关宝，2013:17-18；吴小英，2013:18-19）。然而，在转型时期的社会结构分化、人口流动加剧、社会老龄化、独生子女政策¹⁵⁵、社会保障不足等因素的影响下，家庭成为个人在风险社会中寻求安全感的最终堡垒和依托，个体对婚姻的依赖越来越高，成为过日子的支撑，理性计算的传统在婚姻选择市场上获得更多精细化、功利化的支持，“门当户对”的习俗似乎成为不同性别、不同世代在婚姻选择中的共识（吴小英，2013:18-19）。异性恋中心主义的婚姻制度，对于同性恋者，仍是重要的压迫来源；其前提预设是，人们只有结婚和组建家庭，才能获得幸福（魏伟，2013:29-30）。1990年代以来的经济改革，包括国有企业改革造成“铁饭碗”的打破，在媒体和日常生活中又出现了女性回归家庭的论述和实践，对于女性地位的观念和实践都出现了倒退（唐晓菁，2011：362）。本研究中的 NGO 工作者或者一定程度接触、认同社会性别观念或者在 NGO 形意世界中被不断鼓励去认识自己、追求自主生活，因此他们相对更有力量面对来自家庭对于婚姻实践的想象与期待，但是与家人角力的过程依然是充满张力的过程，结果也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而且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价值观的碰撞。

对话人中的婚姻选择、生子选择和性取向各有不同。进入结婚的对话人共有 6 人，其中 3 人育有小孩，1 人选择不育；没有进入婚姻的共有 4 人，其中 1 人有同性伴侣。选择结婚的 6 人中，有 5 人基本属于“裸婚”——婚姻中的男性并没有提供在城市中的自有住房等；另 1 人因为男方是北京本地人，自有一套住房供婚后家庭生活。

社会“主流”的婚恋观——一男一女组成的家庭——对于同性恋群体的压力很大，他们在文化上、法律上都不能走入同性婚姻。有不少同性恋者迫于家庭和文化压力，不敢“出柜”、不得不进入异性恋婚姻（包括“合作婚姻”¹⁵⁶）。火客与家人在这一点上的分歧让他深感痛苦，但是表示不得不选择与之对抗。他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对抗选择，缘于在 NGO 领域的不断工作和社会行动，让他逐渐获得了较强的内在力量——面对“不公平”的事情而采取不妥协的态度或

¹⁵⁵ “80 后”是第一代独生子女代际（主要是出生城市的“80 后”），作为家庭中的唯一孩子，其父母将希望寄托于其身上，包括婚姻的幸福，过好日子（孙沛东，2013:28）。

¹⁵⁶ 由两个非异性恋者协商的异性恋婚姻。参考王颖怡（2014）。

者行动——以及行动策略。也因此他不再选择压抑自己的喜好以迎合家人和社会的期待——比如在恋爱、婚姻和养育小孩上的期待。在他看来，正是长期在边缘身份中的种种抗争行为——无论作为性少数还是在“NGO”工作，让他积累了面对“多数”的压力的力量。正是因为这样的人生经历让他看重自主选择。

火客谈及婚恋观上和家人间的张力：

家人之前一直无法接受我是同志……跟父母依然没有对话，我还小心翼翼地不敢跟他们提起这个话题，我知道他们很不容易，毕竟那么多年的观念也不是一下就能改变，也许他们还期待着哪一天我可以改变，毕竟异性恋的生活就什么麻烦也没有了，但对于我的无法妥协，他们也很无奈。

但是火客选择对抗和不妥协，他认为选择在 NGO 工作本身就是一种抗争，这样的职业选择带来一系列的压力，而面对这些压力、并且坚持下来的过程就是一种抗争。他说，

比起物质上对【家人】的亏欠，他们想让我成家是更大的痛苦。所以还是要去对抗，还没有很好的面对呢，现在还拖着呢。但是我觉得我肯定不会妥协，为了满足这种需要去妥协。我觉得很多人会妥协，因为他们觉得那是孝顺，但是我不觉得那是孝顺……看到各种人还在谈因为家庭压力要去结婚，找一个假结婚，我就觉得这种就是所谓的没有自主的选择。我觉得很悲哀，我觉得我自己不需要这种选择挺幸运的，自己可以跳出那个框…

曾经在 NGO 组织工作的经验以及在其中的自我认识、自我接纳而带来的力量支持着他的对抗和不妥协的位置，

我觉得因为我对于社会的理解、接触多，让我的人变成丰富的，对社会是有理解的，是可以选择的，不是去适应的。因为我看到更多的人是适应生活，我觉得我是有选择的，可以按照自己更想要的东西去活。最大的区别是这个。

火客对比一位在 NGO 之外工作的女性朋友，在家庭中的生育不自主的经历。她的家人希望她生第二个孩子，但是她并不想生，因为她觉得多一个小孩对她而言是一种负累，没有办法工作、出去旅行看外面的世界。火客说，这位朋友

面临所有女性成家生孩子之后面临的束缚，她不想这样但是没有办法。我觉得挺可惜的。如果她有女权主义的力量，她是可以冲破这些束缚的，但是她没有。她跟我说过她不想那样子，但是她觉得没有办法，家里人想要。老公又没有办法跟她一起去照顾孩子，生完以后还是要她照顾。

火客觉得那些选择不得不因为家人的压力而生小孩、结婚的人，没有自主生活选择的勇气和意识，也没有力量去选择自己的生活。而他认为 NGO 工作者比同龄人有可能会更有力量去面对，因为

我们经历的各种东西都是在少数人的抗争里边的，我们已经习惯了作为少数人、面临抗争。当我们某一天又成为少数的时候，我不会那么怯懦、易脆，我会更加有勇气地面对它。我不是说所有 NGO 人都这样啦，但是觉得他们会更加有基础。因为他不是第一次选择少数，不是第一次选择跟大众不一样，不是第一次选择跟主流的抗争，我觉得他选择 NGO 的工作本身就是一种抗争。所以他已经有经验了！经验已经在他体内了。这种经验是会作用在其他的层面上的，但不是从 1 到 100，可能中间还有很多。

火客非常强调自主选择，对抗来自家庭、社会的期待，对抗“主流文化”，在他的叙述中多次提到“自主”、“对抗”、“主流文化”。这样的一种不妥协和对抗的姿态，我认为和他在 NGO 领域接收到的一些价值观是有关系的。他长期浸淫的 NGO 文化是来自于“公民社会”、“多元性别”、“女性主义”、“非暴力行动”等论述资源的，强调“个人的选择”、“个人的权利”、“通过行动带来改变”等，同时也和他在多次的抗争中获得胜利，正面强化了他的内心力量有关。在他的论述中，很少谈及“传统文化”，也很少谈及“家庭文化”中积极的因素。不难看出，经由 NGO 的价值观的影响，火客成为了一个现代的“自我”——强调“自主”、“权利”等。然而，这些现代理念的确一定程度上提供给火客理解自己、“解放”自我的论述资源。

童淼选择了结婚和生孩子。在婚姻选择上，她选择了同在 NGO 领域工作的、出身乡村农民家庭的伴侣。这样的选择被她的表弟、表妹所不理解。她们觉得童淼“很奇怪……选老公也很奇怪……应该选择门当户对的……有钱的”。不过童淼一方面觉得自己“可能跟她们挺不一样，她们还是挺主流的”，另一方面，并不去评价这些表弟表妹的生活方式，觉得那是她们自己选择的、自己高兴就好，因为她们的视野就看到这些，所以选择了这些。所以童淼有时候会把自己的工作跟她们讲，让她们看到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她们知道了之后会觉得童淼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很怪。

童淼在教养小孩上有着很多新的尝试。因为曾经接触社会性别的培训，在生完小孩子后，她冒出一个想法，孩子是不是可以跟随母亲的姓氏。但是最终被

她的母亲打消了这个念头，担心男方的家人会不舒服。童淼接受了这个决定。但是她在给小孩取名字、教养小孩方面也在慢慢尝试带入一些多元的性别意识。比如她给儿子起了一个听上去有些“女性化”的小名，为了这个还和她的表弟表妹们讨论，为什么一定要给男孩子起一个“男性气质”的名字。

我给儿子起名字偏女孩儿，我两个弟就说不要起这么娘的名字，等他长大以后同学会笑他的。然后我就跟他们聊社会性别的事情。我说，现在都什么时代了，现在追求人格的全面、多样，一个人身上有女性的柔和也有男性的阳刚。他们就不说话了，但是看到了。我把老公“和你想的不一样”的微信转发到朋友圈之后，我弟都在关注，我妹还转发。那是个慢慢的过程。

童淼成长背景一直在中国的二三线城市、现居于北京。从她的“90后”的表弟表妹对她给孩子起偏女性化的名字的反应而看，人们对“男性”和“女性”还是有着不同的期待。

钰晶结婚多年，但是并没有生小孩的意愿。她的先生尊重她的选择，但是双方父母、亲人、朋友以及一些在NGO工作的伙伴都常常关心她什么时候要小孩，告诉她应该生小孩。她觉得和这些人沟通起来很烦，有被压迫的感觉，每次都“很生气”，以至于她在微信的朋友圈上发了一条信息：“谁再问我是不是生小孩的事情，我就和他断交”。她说，

我特别讨厌亲戚朋友和你说“生个孩子吧”。我就觉得这个事是我的，明明是我的事，但是这些人一副“你不生孩子就不应该”的态度，我觉得特别讨厌。每天都有人跟你问这个问题。我不希望这些人没事老跟你提，老去告诉你，你应该生孩子。其实这和我自己想不想生，一点关系都没有。不管我想生还不想生，我都不想你没事老问我这些问题，告诉我你应该生。中国人就是这样，爱把别人的事当自己的事管。他们觉得为你好，觉得女人生了孩子才完整。但我不那么认为。即便我生孩子，我也不这么认为。我只是觉得，我自己决定要生个孩子，和女人有孩子没孩子才完整没有关系。谁说一个女人有子宫就要生孩子，是吧？我还认为女人可以没有孩子也很完整。我有自己的价值观，很多人没有。可能很多人也有，只是跟我不一样。我就是希望别人不要压迫我，但是我觉得可能我也要警惕自己不去压迫别人的想法，要去理解他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对我来说，双方父母都跟这件事情没关系。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只有我老公可以说，其他人你们有什么权力要求我生孩子呢？我特别烦别人来干预我的事儿。

如她所述，身边人劝她生小孩的人的观点大抵有几种：1) 认为生小孩是对家庭、尤其是夫家的责任；2) 生小孩才会让女人完整。她的叙述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社会对于已婚女性的生育期待之强，且按照这个价值标准对已婚女性进行要求。不生育的女性面临着较大的因不服从而带来的压力。但是钰晶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生育观和这个主流标准不一样，并未打算选择服从。

然而，另一方面，钰晶的想法和做法，非常强调自己作为一个个体的独立性，不跟从家庭、家族的想法，并不认同“传统”的家庭、家族价值。这是似乎是一种和“传统”观点不同的、受西方现代思想影响的、强调“个人主义”、“私有家庭”的价值观。

除了结婚生子的观念，对于一些女性来说，她们所接受的女性主义思想也在与伴侣日常生活的细节里进行协商。当一个人有了女性主义思想，她看待生活、世界的视角也发生了变化，可能之前认为是合适的关系，现在会觉得无法接受。美凤发现她也开始在与丈夫的家庭生活中发生了转变。她觉得以前他们的关系是依附关系，现在则更在向“两个独立的个体”的方向发展。美凤认为女性主义者需要不断地挑战、战胜传统的那个自己，而且强调理论和实践的整合，但是这并不容易。在面对没有性别平等视角的丈夫，美凤需要不断的在家庭关系中去协商。她说

我们这些有性别意识的，在家庭生活里边其实不那么容易，因为你会特别在日常生活中带性别的眼镜和耳朵，进行检查，其实挺痛苦的。我觉得一般有性别意识的女人在家庭里边挺辛苦的，因为她有自己的价值观，他的丈夫不是一个女性主义的话，是会发生很多冲突的。但你又不能强力去改变，你可能要在日常生活中去处理这些。比如我老公常常会说“都是女权主义害的”。

乐晏虽然没有接受女性主义培训，团队中也没有这样的文化资源，但是她在家庭生活中还是反对那种对妻子、母亲的“传统”期待，这来源于她曾经的工作经历中的深度介入社会行动，因此她不愿意再退回家庭，成为一名“家庭主妇”。她提到家庭成员中关于对女性的期待，

大家还是觉得家庭和孩子比较重要。我也觉得这些很重要，但不意味着把我的身份固定在女性应该相夫教子上。我觉得不是那样的。我一直在挑战家人，我特别不希望大家把我固定在那个位置上。因为我还有我自己的追求。孩子的奶奶会对孩子说，“你妈妈去工作挣钱”。我说，如果不去工作，我就不是一个好妈妈(笑)。我的工作不是为了满足现实的需要，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一种完整性。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也是在学习、在进步，而不是完全在家庭这个层面、在小圈子里的生活。

家人会觉得女的应该怎么怎么样，我不太喜欢这样的一种判断，觉得女性不应该是一个被束缚的状态。我很有我自己的主张，我十多年都是这样，我一直在做我自己的选择。为什么成家了之后，我就要被回归了？我不愿意，我已经走出来了（笑）。

乐晏过去十几年在乡建领域的工作形成的价值观、情感、身体习惯，让她不认可将已婚女性的位置狭窄地定义为照顾家庭为主，也不认可将一个人工作狭窄地界定为以赚钱为目标，而忽视工作对于一个人的完整性的意义。

六、“自我”之转变：如何看待并且协商在发展主义、成功者文化脉络下对“好生活”的希望和追求

正如以上各小节所描述并分析的，在 NGO 形意世界中浸入的对话人，形成了较强的社会介入的意识和行动、对自我的认识、性别平等意识等，他们较为看重生命的丰富性、个人成长甚至精神层面的发展。然而，对话人的 H-I-P 中曾经或者仍旧沉淀着强调金钱、物质发展等的价值观，他们身处的当代中国社会仍旧是发展主义、成功者文化所主导的，同时亦面临着在社会保障低的社会中生活的压力。他们和同龄的青年人一样面临着在大城市生活、安家、养家的需要。然而草根 NGO 机构的工作薪水和福利比政府和企业低，使得 NGO 工作者面对较大的家庭生活压力或者无法满足家人的期待甚至自我感觉价值较低（冯永锋，2015），对于不少 NGO 工作者来说，如何平衡做 NGO 的内在满足感和现实的“好的生活”的需要成为了纠结的问题。因此本节希望回答，这些 NGO 工作者是如何经验、理解这一张力的？

这样的纠结在来自社会基层家庭背景的 NGO 青年的身上，展现出更强得的张力，因为他们没有家庭的经济资本作为依靠。压力的直接来源包括：在大城市的生活成本高，社会保障和福利少，比如住房、子女生活和教育费用、医疗等都需要依靠家庭收入支付；对父母的回报，对于出身乡村底层家庭的青年来说涉及父母养老。而来自中产阶级及其以上的家庭背景的 NGO 青年相对没有迫切压力，但是面临着来自家人在意识形态上的诸多要求。比如，他们期待子女过上中产阶级的好生活，有大房子、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给父母赡养费等。然而，无论对来自哪个阶层的 NGO 青年，都共同面对社会价值中对于收入的看重，

收入常常被用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和社会地位，这正是 1990 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文化中越来越普遍的发展主义文化、成功者文化¹⁵⁷。

出身于小康之家的钰晶，在经济上并没有养家的压力，对金钱的态度较为不重视。但是，家人对她选择的这份收入低的工作表示不理解和一些抱怨。钰晶的妈妈希望她能过上衣食无忧的、中产阶级式的生活。在她妈妈看来，钰晶的生活非常可怜，住的房子小，因为她的妈妈觉得要住一百多平米的房子，才觉得活动得开；而且妈妈买东西从来是买贵的，但是看到钰晶买东西还要比比价钱，觉得她的生活很拮据；在妈妈看来，和钰晶的同龄人的收入相比，她属于非常低收入的人群。钰晶的妈妈也希望她有一份稳定清闲的工作。但是钰晶和妈妈的想法相差很大。钰晶的亲戚中有不少生活非常富足，面对这些，钰晶很淡定，并未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她觉得关键是自己是否有明确的价值体系。她说，

别人在我面前再怎么表现得很富有，我感觉跟我没有关系。比如大家一起去吃饭，出来有的人开车自己走了，或者我有时候搭一乘有时候不搭，走路或者坐公交，我也不觉得有什么。我觉得有自己的价值体系，人就会比较淡定、不会焦虑。

钰晶很清楚自己不愿意用金钱来衡量自身价值，她认为，人的成长比金钱的累积对她而言更具价值。另外，钰晶的生活方式——不生孩子——也是她的策略选择，因为她知道如果生小孩就需要有较多的经济准备。最后也和钰晶及其丈夫的双方家庭背景为小康之家有关，不需要他们在经济上供养父母，而且在有需要的时候，也会向他们提供支持。所以钰晶在这方面没有不安全感。

然而，出身乡村较为贫困家庭的文袁在这方面一直比较纠结。曾经出人头地是他的梦想和目标，但是大学毕业后进入 NGO 机构似乎离他原来的改变家庭经济条件的梦想越走越远。虽然喜欢做 NGO，但是在在大城市的结婚生子的生活、给父母养老等等现实的压力摆在他的面前。他有不少纠结，也在思考如何平衡自己的“社会理想”和现实生活，考虑以后转入基金会或者企业工作。他坦陈，

我想要个小孩，但是我有信心去准备这个孩子的到来吗？生孩子、养孩子都需要钱。父母也在变老，他们没有社会保障，没有低保，所以我压力挺大的。妻子也

¹⁵⁷在第五章中进行过讨论

刚毕业不久，收入也不高。我们俩加起来拿到手里的收入，都不超过七、八千，还赶不上人家半个月的收入。这样的收入水平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还是挺担心的。不过在草根机构工作都面临这个问题。

文衷常常觉得自己很愧对父母，每次回老家就觉得郁闷，因为他觉得自己

完全没有兑现家庭的期待。我在北京，喝喝饮料、吃点小吃什么的，都不觉得是怎么回事。一回家，父母连个雪糕都轻易不愿意吃，还是延续原来的省吃俭用的习惯，一年也不经常吃肉。我觉得父母遥遥无期的，从小供到大学，以为大学供完就拉倒了。没说媳妇时，还得惦记着。说了媳妇之后，也要养孩子，他们又觉得还不行，还要再帮你们。整个过程他们心里总是要帮你做更好的准备。这个过程也让我有压力。我读着以前亢奋时、打鸡血时写的那些日志，琢磨我现在做的事情和当时写的有没有联结？我现在是不是在冒险，所谓忠孝不两全，亏待我家里了，没有承担起责任？这样的想法一直在的。每次回家里都是。

文衷在这样的情感里纠结过很久，觉得很无奈，但是现在的生活状况确实不能实现原来的目标和使命。他认为现在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备，家庭成为主要的承担者，所以压力比较大。拥有安全舒适的房屋、享受健康的学习和成长环境、安全的医疗、有养老金的退休生活作为人的基本生活条件是可以理解的，NGO 工作者有这样的欲望也是一种“正常”的人类情感。但是，在中国快速都市化、房价居高不下、城乡社会保障依然存在分隔、“户口”制度依然未完全解除的背景下，对于来自外地、社会底层的青年人来说，这种正常的人类需要常常不能被满足。

文衷认为这个社会的主导价值还是以收入高低作为评价人的标准，而当他和社会上的人交往的时候，比如和工作对象中的青年人、和来自企业的合作伙伴，他觉得自己从事的低收入的 NGO 工作使他的社会认可降低。他有时候也在思考，自己现在做的 NGO 工作的意义，他说：

我在跟别人打交道的时候，别人会觉得我理想主义，有些道德优越感。我也确实有些道德优越感，但是我到底为这个社会改变了什么呢？我觉得如果我回答不好这个问题，我会觉得没有价值感，没有成就感。到底有没有意义和价值？如果我直接像社会导向认可的那样去企业里做工，那么我是一个这样的人，然后我又赚了这样的一个薪水，让别人看到你是一个榜样，她会向你学习。我现在这样的一份职业是不能成为别人偶像的，就是因为收入问题。公益人士如果没有高收入的话，其实影响力是打折扣的，大家顶多是同情你一下。因为这个世界还是金钱说话。而且大家会觉得，你人品道德比较高一点，你很伟大而已，我只能佩服你、但是我不像你一样去做，其实抬高了参与的门槛。如果大家觉得收入没那么大

差别，既然能做开心的事为什么我不能做一点呢，可能都会参与进来。但是这个社会对公益的本身的评判，我觉得确实收入是一个限制因素了。

一方面，我理解文衷生活中的具体张力，但是从其叙述中，可以看到他的 H-I-P 中长期的生活经验沉淀的“成功文化”的情感模式依旧存在，而且“成功”的标准是需要被认可的、常常以金钱作为主要衡量目标。NGO 工作一定程度上也是使他拥有满足感、被认可的一个途径——通过改变社会而带来一种道德优越感。这种满足感依然是来自于外在的肯定，而并非不依靠外在肯定的、来自内在的自我认同。当一个人更多依靠来自外在的认可，也更容易纠结和摆动。

另外值得追问的是，诚如他所说的，北京的购房成本非常高，社会保障上对于非北京户籍人口也有诸多限定，像文衷一样的 NGO 工作者是否一定要选择留在北京这座大都市生活？这涉及如何看待自身对于生活的理解、对于生命意义的思考以及对于大都市生活的看法。这个选择并不容易。在当下的经济发展之下，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聚集了大量的资金、人才和质量较高的社会保障提供者（比如医院、教育体系等），以及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这使得不少年轻人愿意留在大都市生活。然而，另外一个暗中涌动的潮流是，开始有一些年轻人返乡从事健康农业和乡村发展工作¹⁵⁸。

不仅仅出身基层家庭的文衷，出身小城市/县城的、小康之家的马田和童淼对于 NGO 工作的低收入也有自己的纠结。童淼对 NGO 形意世界中“金钱”的态度进行了讨论。对比自己在衣食无忧的环境下长大的经历，但是现在却常常要为了买东西而掂量自己的钱够不够，这让童淼很焦虑，觉得自己正在向下、向底层流动。她甚至提到，十年后的今天回想进入 NGO 工作有一些后悔，后悔自己不能给父母和孩子提供比较好的物质生活环境。虽然她承认，从视野、知识层面，自己不是底层，能够在教育理念上提供给孩子自由、幸福的成长空间；但是忧虑的地方是，她担心孩子长大之后，不能提供给他较为“自由”的物质生活条件，和同龄人一样的较为富足的物质生活。她进而认为，“这个圈子里的风气和气氛中有一种对金钱扭曲的观点，这个观念曾经也影响了我，刚进入 NGO 之后，有一个潜意识是认为钱是不好的，认为考虑钱、想拥有更多的钱，想拥有更多的物质上的东西是罪恶的、不应该的，会被这个圈子里的人鄙视和歧视，仿佛

¹⁵⁸ 可参考爱故乡计划 <http://www.iguxiang.org/index.php>；也可参考社区伙伴 (2012)。

某种程度上代表没有理想的，不够资格来做NGO似的”。她举例，在NGO中，一个年轻的草根机构工作者如果在北京买了自己的房子，很多人都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让她觉得“仿佛我是NGO人，我就不应该有房子的感觉”。她进一步认为

如果提到想要买大房子或者买车，就会有人鄙视、甚至仇视你。这种感觉挺强烈的。在NGO待时间长了，人们的心态都有点不正常了。住房是人的基本生存的必需品，怎么能变成一个奢侈品了呢？只能说中国的房价有点不正常了，而不能因为这个原因，自己的心态就不正常了。我们要端正我们自己的需求就是有房子住，这是应该的呀，作为一个人，我要生活啊。

从童淼的叙述而看，她仍然受H-I-P的影响，希望过“中产”的生活，她习惯和周期的同龄人进行比较，希望有更好的物质生活。此外，在她的叙述中，也显示出了NGO形意世界对于物质生活和NGO的“理想主义”的二分法，有一种认为NGO工作者不应该有一定的物质基础的生活的倾向。在三水工作十多年的乐晏对此也有相似的反思。

三水曾经经历过一段在没有太多物质资源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艰苦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精神、理想的力量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三水也更加强调理想主义、精神的力量。黄老师曾经提到，理想主义是应该融入在日常生活中的，而非仅仅是一次的行动。他说“当每时每刻都生活在理想信念中，一个真正纯粹彻底的理想主义者就造就了出来”。

乐晏反思，追求一种“纯粹”的革命和理想主义，有时也可能走向极端化，一方面是对自身的道德要求很高、带来一种紧张感，另一方面对于其他人、团体也用这种道德标准进行衡量和要求而且随之对对方进行批判，造成了与三水以外或者乡建团体以外的世界的二元割裂。在乐晏看来，自2000年代初期以来，不少三水的工作者都带有这种道德主义、纯粹的“理想主义”以及按照这个标准对其他人、团体进行评判。她自己也是如此，但是长期下来，发现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非常痛苦、孤独，把自己逼到角落里的感觉。她回忆，

那种张力往往出现在和家人或者这个圈子以外的周边的朋友相处中。会有一种优越感，觉得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因为如果按照我们的知识体系，会觉得这些人都是不纯粹的。做这个事业之后，往周边一看，连朋友都没有了，觉得同学朋友都是在芸芸众生中、

在主流中为自己奋斗。那时其实很纠结，你会觉得你跟之前很好的朋友或者同学没有共同语言，慢慢疏离。其实是自己在意识里边有了疏离感，觉得大家都是那么俗，谈的是很现实的问题。那时候会觉得这些人不可理喻的。看身边的家人觉得他们只是喂养肉身、没有纯粹的理想。所以我越来越有很深的孤独感。

乐晏形容三水的氛围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可以和家庭决裂的、很刚硬的氛围。乐晏刚结婚时，从比较激进的集体工作和生活的状态转入到家庭生活，觉得不适应、无所适从。公婆对于乐晏从事的工作并不满意，主要是工资低、不缴纳社会保险。当时乐晏觉得不能接受公婆的这种期待，她认为自己不能因为一个人的需要而要求改变机构的政策。因此选择了逃避问题、不直接沟通，向家人传递负面的情绪。

在这样的情境中，乐晏反思

那你怎么办？他们是你的包容的对象、理解的对象，还是认为这些人是不纯粹的、不够革命的？后者这种想法越来越把自己推向极端，反而自己其实也没有后路。我同样也面临现实的问题，我怎么去平衡。难道真的做到那种很纯粹的？抛弃家庭？那时，会觉得很多团队是不够革命性的。你首先会设置一个判断，哪怕跟政府、跟资助方合作，都会有这样的看法、判断。其实那时心里很不舒服，因为你已经下判断。戴锦华说过，你所改造的其实都是在原有的废墟上去做的，你真的需要跟不同的人打交道，改变是彼此的嘛。但如果和他们没有任何交集，只是在这个院子里建一个公社、没有跟社会发生任何关系，如何改变彼此？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非常具有道德的阶段，后来看来是很不持续的，对自己、对别人都是这样的。

有了这些反思之后，乐晏觉得

这几年，我慢慢地特别能够理解这些人，大家都是在这种社会结构当中，属于被压迫、没有办法选择的一些人。能理解大家的这种选择是怎么来的，也会觉得不再是一种敌人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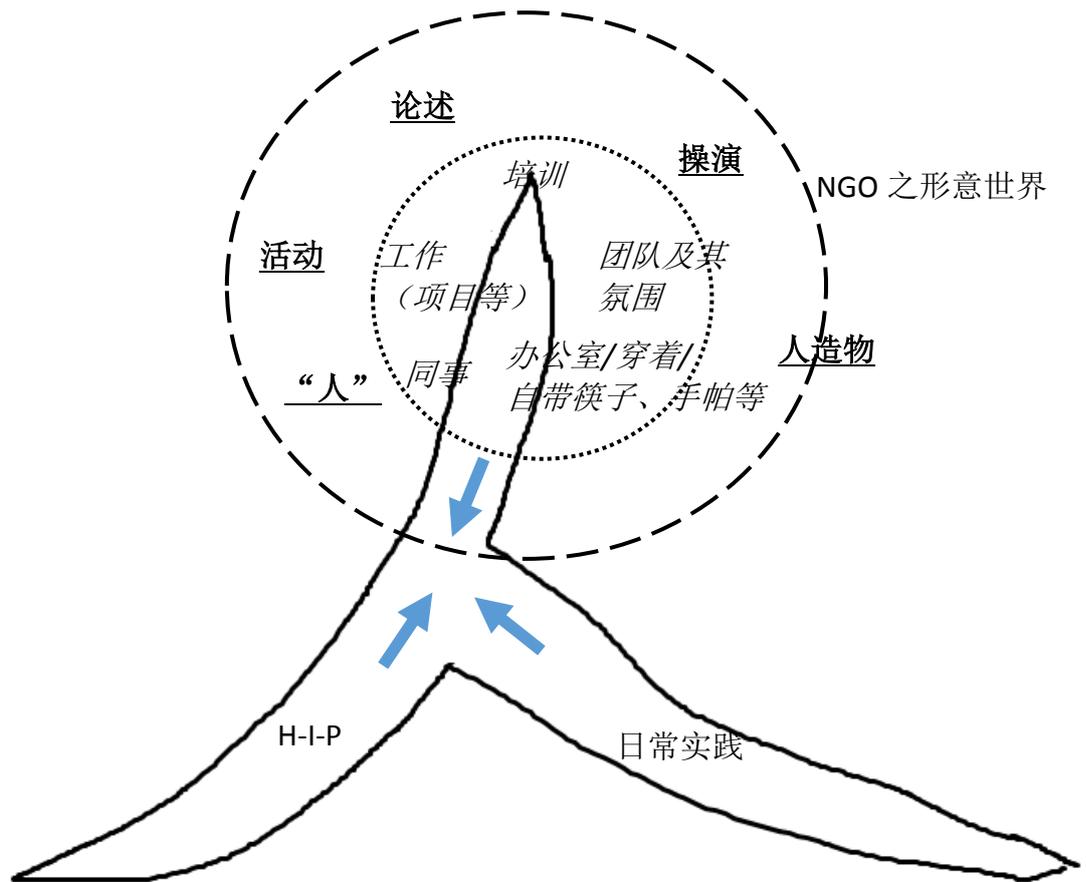
乐晏在家庭中，也开始理解公婆的想法，适当的沟通和理解，而公婆也能够理解她的现实的困境，也慢慢地转变着期待。

乐晏从自己的乡建参与经验的痛苦中反思，道德纯粹主义、二元化地看待和自己不一样的人或者团体让行动者自身感到痛苦、而且无法理解其他人、尤其是社会上的更多的人。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反思，除了和乐晏的自身实践中的反思有关，也有参与三水平台上的知识分子在其中的作用，他们为三水的参与者提供了批判思考资源，而这在很多社团团体中是比较稀缺的。

七、 小结

NGO 形意世界对 NGO 青年的影响的运作过程，归纳如下（参见下图）。形意世界中，对工作人员产生影响的重要要素包括，1) 工作本身，包括设计、执行项目，蹲点等； 2) 培训——既包括正式的、也包括工作中的指导； 3) 团队中或者 NGO 行业内的人，比如同事、上级、合作伙伴等； 4) 团队的氛围及相关人造物，如同事的衣着风格、饮食习惯等。这四个因素互相交织，同时又统合于 NGO 工作者从事的 NGO 工作这一载体。而这一 NGO 形意世界又是处于不断的文化性和社会性的生产过程中，包括 NGO 工作者也参与塑造着这一世界。比如他们作为培训的参加者，透过提问、参与培训中的体验活动等，也在建构着活动，而并非外在于这一形意世界。形意世界的诸元素，可以进一步被归纳成在两个层面发挥着影响，既是观念维度上的影响，也包含着物质维度（Holland 等，1998）。机构团队层面和项目工作层面的愿景陈述、培训中的论述和教学法、同事/上司使用的语词和行为表现、人造物等都沉淀着 NGO 行业的观念。比如自带筷子这一人造物本身沉淀着环保工作者希望减少一次性垃圾对环境资源的浪费，培训中的体验式教学法暗含着相信每一个人的经验非常重要的理念，更不必说机构愿景陈述、培训内容等均含有关于怎么理解“社会改造”的理念——“公民社会”取向、将对人的内在力量的关注带入社会发展的取向、左翼思想对当代社会的批判等。

然而，NGO 工作者并非完全被形意世界的元素所形塑，其“自我”的转变与他们的 H-I-P、日常实践的关系紧密。本研究显示，对话人经由接触 NGO 形意世界中的活动、论述、文化人造物等形成的新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如果能和其生命历史相互印证、产生共鸣，则更容易成为其“自我”的一部分，这一发现与 Urrieta 对墨西哥裔社会运动者的研究一致（2009）。不仅如此，本研究认为在形意世界中新学习到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当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得到积极效果时，则更容易成为其自我的一部分。



图：NGO 形意世界的诸元素及其运作

进入 NGO 形意世界工作后，NGO 工作者开始深入社会改造的实践场景，接触社会发展议题的视野、分析并且产生更多的社会介入行动。不仅如此，NGO 形意世界的影响亦超越工作层面，进入到工作者的“自我”和日常生活之中进行运作：促进其自我认识和觉察、感到内在力量的增强；在日常生活中尝试践行社会公平、公正、民众参与的意识，包括在社区中的公共参与、消费习惯的改变，在婚姻制度中拓展自主空间、生活。这与其之前的较少的社会认识和参与形成不同，亦与去政治化的“80 后”青年文化呈现出不同。NGO 作为一个集体，为工作者提供了认识社会和自我成长的助力。然而，身处发展主义、成功主义主导的、社会保障不足的大都市，以及上述逻辑在其 H-I-P 之中的沉淀，NGO 工作者在日常生活中必须不断重新思考和实践自身对于美好生活的想象，在矛盾和挣扎中前行。

本章也同时提出 NGO 形意世界操作过程中的限制。第一，受“西方”NGO 形意世界的理念、论述的影响，中国 NGO 形意世界中带有大量的和“个人主义”、“权利”、“民主”等未经仔细反省的观念，而这些观念经由培训、人、操作等，影响着 NGO 工作者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塑造着去历史的、去社群的、现代“自我”。NGO 的操作也并未如其声称的总是参与式的、民主的方式，因为草根 NGO 发展时间历史短、论述和实践资源不足，以及工作者自身缺乏批判思考的习惯，团体中的学习并批判思考不同思想资源、理念的空间狭窄。第二，缺乏对社会问题的复杂的政治经济分析和论述乃至相应的操作，使得工作者可能陷入更加无力的境地。第三，NGO 形意世界中对“主流”/“另类”的二元简化处理，习惯将社会问题归于外部，可能失去了对行业内部、组织内部、工作者内在的反省，失去了进一步认识和改变的可能。同时，这样的二分法，将 NGO 割裂于更宽广复杂的“社会”，对“社会”的理解窄化，从而降低了“改造”世界的可能。然而，如果将上述的缺乏学习不同的思想资源、缺乏批判思考——尤其是对于行业内习以为常的概念和理念，缺乏对于社会问题的原因甚至解决方案的深入思考和论述，仅仅归咎于 NGO 或者其中的参与者并不适合，这是在中国社会脉络下发生的：一方面，中学和大学并没有装备青年人批判思考能力和开放的学习能力，在 NGO 之外的社会中也缺乏批判讨论的公共空间；这样的习惯也必然会带入 NGO 的操作之中。另一方面，在中国，研究机构和知识分子与 NGO 工作者之间的合作、联盟还处于较为初级的阶段，其中也包括研究机构和知识分子的自身能力（包括对社会发展议题的批判思考和研究能力）、参与实践的意愿等的限制。

我早先岂不知我的青春已经逝去？但以为身外的青春固在……虽然是悲凉漂渺的青春罢，然而究竟是青春。然而现在何以如此寂寞？难道连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么……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倘使我还得偷生在不明不暗的这“虚妄”中，我就还要寻求那逝去的悲凉漂渺的青春，但不妨在我的身外。因为身外的青春倘一消灭，我身中的迟暮也即凋零了……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纵使寻不到身外的青春，也总得自己来一掷我身中的迟暮。但暗夜又在那里呢？现在没有星，没有月光以至没有笑的渺茫和爱的翔舞；青年们很平安，而我的面前又竟至于并且没有真的暗夜。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鲁迅，1927）

第八章

结论

本章之焦点在于陈述这一研究的主要发现和意义。第五、六、七章展示的素材和浮现出的主题非常复杂，本章试图帮助读者将这些材料进行扣联，以尝试回答研究问题，回应研究目的。本章分为三节。第一节将通过图示对本研究的主要素材进行总结，通过该图示展示 NGO 工作者如何形成 H-I-P，并带着这些 H-I-P 进入大学或者社会的工作之中，试验性地与新的环境中、与“公益”有关的文化因素进行互动与即兴，在 NGO 形意世界中，在不断地日常实践中，逐渐发生“自我”（不）变化的过程。之所以使用“试验性”一词，是表明本研究并不试图在搜集的素材的基础上归纳一般性的 NGO 工作者“自我”的变化过程及影响因素，而通过形象的图示展示是便于读者理解。图式将主要展示三大主题：第一，NGO 工作者在青少年时期——1980 和 1990 年代的脉络下形成的价值观和行为，沉淀于“自我”之上，正是带着这样的 H-I-P，他们进入大学或工作期间进行进一步地即兴互动和发展。第二，NGO 工作者如何带着曾经的 H-I-P，通过进入大学、媒体的世界而参与志愿者活动，使得进入 NGO 形意世界成为可能。第三，进入 NGO 形意世界之中，NGO 工作者的 H-I-P 如何与形意世界中的论述、活动、“人”、人造物、操演等互动，并且在日常实践中不断地协商其“自我”。

第二节提出研究的意义和贡献：这一研究希望有助于 NGO 研究和 NGO 更加

批判性地理解 NGO 的意识形态和日常操作对 NGO 工作者的复杂影响；同时也将协助 NGO 工作者反思“自我”的变化与所处脉络的关系，使得以人的成长为目标、改造脉络的计划成为可能。这一研究将也有助于公众增加对 NGO 组织及 NGO 工作者的理解，并使得其反观自身价值观和行为的成为可能。

第三节将以我的自我反思作为本论文的结束。本论文贯穿的主题是人的成长与转变，而我——作为曾经的 NGO 全职工作者——在这个研究的过程中的“自我”转变得以发生，这使得这份作品有可能助力其读者的“自我”转变。

一、 主要发现及讨论

1. 透过“80后”NGO工作者的H-I-P反观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社会脉络

人是否能够进入某一形意世界、进入其中是否发生“自我”转变，和其H-I-P有关，正是在H-I-P的基础上即兴的互动，“自我”改变的发生成为可能（Holland等，1998）。本研究的发现与此视角一致。10位对话人的H-I-P，显现出“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政治经济脉络的烙印，他们的生活经验与其同龄人是相似的。对金钱和权力的感知很早进入他们的生活。在多数人的观念里，金钱是生活的重要部分，也是人生的奋斗目标。而且，因为城乡不平等、市场化的改革带来的诸多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安排，其家庭常常处于缺少金钱或者为顺应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原则而专注于赚钱致使忽略生活其它面向的情况。这样的经济、权力和城乡不平等的经历，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压迫感和自卑。这正是1980年代改革开放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急速的市场化进程呈现在个体身上的烙印。除此之外，中学的应试教育亦深刻地改变着多数对话人，带来了压抑的、没有自主性的、知识面窄、批判思考能力低甚至充满竞争性的“自我”。对于部分对话人——尤其是女性或者同性恋者，其成长的经历中也带有性别压抑和束缚。然而，正是这些压抑、痛苦、规训的经验，对于部分对话人日后被招募进入NGO形意世界并且进一步改写“自我”提供了鲜活的生活经验。例如，不少对话人认为，他们日后进入NGO形意世界后，正是通过重新回忆并解读H-I-P，他们才更

认可这些新习得的视角；曾经的被压迫经验也令他们更能理解其他被压迫者、更愿意通过工作协助曾经和自己处境相似的人的发展。这说明社会不公平、不公义的生活体验也具有促使人成为社会改造者的可能。然而，曾经的 H-I-P 对于其“自我”转变也可能发生着限制性作用，比如批判思考学习经验的缺乏也令他们进入 NGO 形意世界之后缺乏对其意识形态和操演的反思。这一时期的 H-I-P 中也沉淀了对话人在中小学的课堂和课外活动中、在普及文化中接触到的带有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社会责任甚至朴素的善恶观念的价值观，这为其日后被招募进入 NGO 形意世界、并且进一步吸收相关社会公平、公正论述和操演提供了情感基础。

2. 2000 年前后通过大学或者媒体被招募进入志愿者形意世界

在通过大学或者媒体被招募进入志愿者形意世界之前，这些对话人与他们的同龄人有着相似的价值观和行为，他们并非清楚地因希望推动社会改造而成为志愿者，相反，他们进入其中有着复杂性，但其共性是 1990 年代正是受国际志愿者运动影响、中国政府和官方组织推动志愿者这一语词和实践的时期、也是草根 NGO 开始发展的时期，因此这些志愿者理念和实践、社会发展问题通过媒体、大学空间进行传播和扩散，为青年人——特别是城市里的青年人——进入志愿者形意世界提供了重要的可能条件。

通过材料分析发现，对话人进入这一领域工作，和她们在大学中以及在媒体中接触和 NGO 有关的文化因素有关，通过进入志愿参与这一形意世界，最终选择全职工作。之所以可能进入 NGO 志愿者世界，和其所处的时代脉络有关。1990 年代中后期正是中国 NGO 组织开始发展的时期，并且尤其集中于北京、广州等一线城市以及部分贫困省份，特别的是，这些组织常常在大学中开展演讲、宣传，并且与大学 NGO 社团保持串联、开展志愿者活动，这些使得大学生进入 NGO 志愿者世界成为可能。1980 年代开始、特别是 1990 年代以来，政府也开始积极推动志愿者精神和青年志愿者协会以调动青年人参与社区服务，这些都促使了在城市和大学中的、和 NGO 有关的团体、活动、信息的增多。同时，1990 年代以来，伴随着媒体的市场化，媒体也开始增加对于 NGO 的报道，并且，这

一时期的互联网的发展也令 NGO 信息的进一步传播和通过互联网进行 NGO 动员与组织成为可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0 位对话人得以进入 NGO 形意世界工作。

除了脉络的原因，他们进入 NGO 领域全职工作也和其自身的 H-I-P 有关。正因为多数对话人在中学时代成功通过应试教育的筛选，得以进入大学、特别是一线城市的重点大学，这使得其被招募进入 NGO 形意世界成为可能。城市居民的位置也有利于其在 1990 年代中后期——NGO 组织刚开始发展的时期——便能接触到 NGO 信息。除此之外，本研究发现，对话人多数来自社会中低阶层，其家庭并没有充沛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资本为其规划并选择阶层向上流动的职业选择，这带来的影响是，NGO 工作除了对于部分对话人来说是符合其助人或者社会改造理想的职业选择以外，不少对话人也将其作为一份和其他工作一样的职业机会，或者作为大学毕业后的过渡选择或初步尝试，而并非完全出于明确坚定的社会理想。但是，当他们进入 NGO 形意世界全职工作之后，其“自我”的变化便得以进一步展开。在 NGO 志愿者形意世界之中，对话人的“自我”转变更多地发生在物质性层面，即主要集中于对于社会问题的亲身体验、对于 NGO 的人、文化和氛围的接触和喜爱等，但较少形成理念性层面的深化认识。

3. NGO 形意世界对 NGO 工作者“自我”转变的复杂影响

NGO 工作者正是带着上述的沉淀于 H-I-P 的“自我”，进入 NGO 形意世界，参与其中的活动，价值观和行为开始发生着变化。

NGO 的形意世界是具有历史的：它受 1980 年代以来的、在全球范围内的公民社会运动的影响；它在中国的发展也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停滞而在 1990 年代开始伴随着“改革开放”、政府从对社会的全能管理逐渐退出而逐渐重新形成的，因此中国的 NGO 还处于发展初期，在思想资源、论述能力等方面存在着不足。NGO 的形意世界也与其他社会领域存在着关联，比如与学术研究、教育体系、媒体之间的关系：因为中国的学术研究和问题意识和研究质量的滞后，较难为 NGO 提供高质量的思想资源和研究能力支持；教育体系未能培养较强批判思考的毕业生，影响了 NGO 形意世界中的人的资源；而社会公共空间的缺乏，使得 NGO 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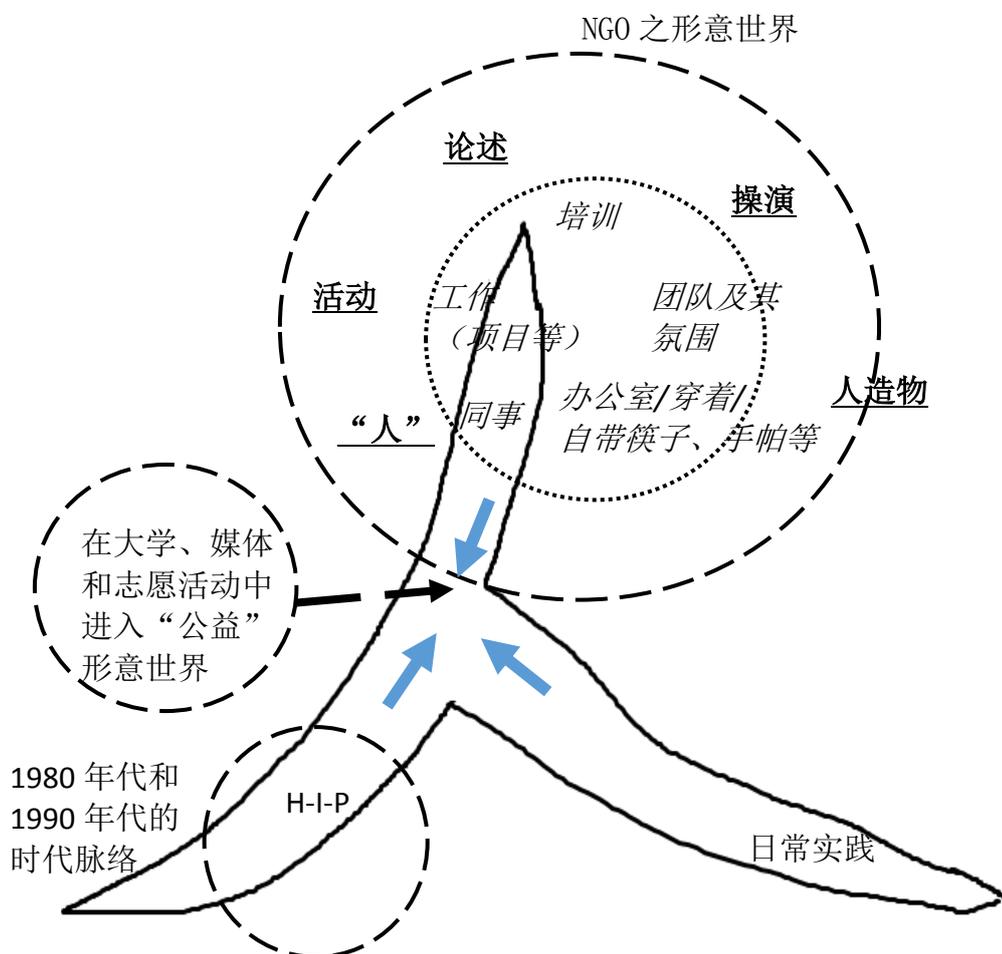
作者无法在 NGO 形意世界之外练习思考。这些皆影响了 NGO 形意世界对于工作者的改变。

NGO 形意世界对 NGO 工作者的影响需要在其 H-I-P 的基础上运作，并且与其日常实践的关系紧密。对话人经由接触 NGO 形意世界中的活动、论述、文化人造物等形成的新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如果能和其生命历史相互印证、产生共鸣，则更容易成为其“自我”的一部分，这一发现与 Urrieta 对墨西哥裔社会运动者的研究一致（2009）。不仅如此，本研究认为在形意世界中新学习到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当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得到印证、证实其有效时，则更容易成为其“自我”的一部分。

NGO 的形意世界仿佛一个微观试验性环境，影响着工作者。形意世界中的诸元素，包括论述、“人”、操演、人造物等交织在日常工作、培训、人与人的互动、团队氛围、同事的衣着风格、饮食习惯等之上。NGO 形意世界处于不断的文化性和社会性的生产过程中，NGO 工作者透过活动也参与塑造着这一世界。

NGO 形意世界对 NGO 工作者的“自我”改变是充满着复杂性的。一方面，NGO 形意世界充满着对于社会发展的论述和操演，塑造了对被压迫者有感情的、具有社会介入意识和实践的 NGO 工作者。这种影响不仅仅表现在工作领域之中，也影响着他们的日常生活，包括争取在婚姻及家庭关系上的自主、平等，在社区生活中，勇于通过集体行动维护社群权益。他们成为了积极的社会行动者。不仅如此，NGO 的诸多理念，也在工作者的 H-I-P 之上进行运作，影响着他们的自我认识，让他们感到内在力量的增强。然而，部分 NGO 的操作中也存在着一些限制，包括部分 NGO 缺乏支持工作者开放地接触不同的思想资源和经验素材、开展批判思考的意识和能力；缺乏足够的思想资源，对于社会问题的成因和改造愿景难以进行深入的分析 and 论述。这些都限制着 NGO 工作者进一步改造自身和世界的可能。

图示：NGO 工作者“自我”转变与脉络的关系



二、 研究意义和贡献

回应本论文开篇提出的，在当代中国，NGO 组织和 NGO 工作者的面目模糊，本研究通过叙事研究的方法，深入 10 位 NGO 工作者从儿时到 30 多岁的生命历程中，以理解其为何逆发展主义和“小时代”文化之流，选择在 NGO 组织工作。这其中有着复杂的社会脉络转变的原因，而 NGO 工作者的价值观和行为中的复杂面。在回观的过程中，为“80 后”乃至其他代际的公众提供省思自身经历与社会脉络的关系的可能性。这一研究也希望成为陈映芳（2007）有关“中国青

年”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的研究的进一步补充，增加对于 1990 年代中后期的“青年”文化的理解。同时，也希望补充学界对于“80 后”工作青年的文化的理解。特别是，通过理解“80 后”NGO 工作者的“自我”的养成，以理解打破“小时代”的青年文化的可能途径。

除此之外，本研究希望补充 NGO 研究以及 NGO 较为缺乏的、以批判性视角分析 NGO 组织对于人的改变等文化层面的影响。本研究提出 NGO 的操作中，可能带有缩窄批判思考和开放地学习多种思想资源的空间，缺乏对社会问题成因和解决方案的深入分析与论述，习惯性地以“主流”/“另类”二元简化的分析视角，这无益于 NGO 工作者的成长，也可能阻碍 NGO 对于社会和人的改造的工作。本研究尝试通过剖析 NGO 组织和 NGO 工作者的“自我”转变的复杂性，希望以此打开改造 NGO 工作者身处的多条脉络的可能性。本文认为，NGO 工作者需要建立自觉，对自身（尤其是所属群体）所处脉络具有较清楚的整理和理解，这是有力量继续前行的基础。NGO 工作者只有建立这种自觉，才能清楚自身、所属团体的历史，与社会脉络的关联，希望达至的人的发展和社会改造的愿景和行动策略，以及这个过程促进因素和阻碍因素。形成这一自觉，需要 NGO 工作者在行动中不断开放地和批判性地思考。

除此之外，本研究认为在研究方法上，叙事研究有利于深入理解 NGO 工作者身处社会脉络转变以及在 NGO 组织形意世界中复杂的“自我”变化过程。尤其是我次原住民人类学研究者的身份，有利于深入地聆听和理解对话人的复杂性，与公众一般认为的——所谓 NGO 工作者拥有道德高尚或者政治正确的观念和为行为——的这一观点拉开批判距离，这有助于一定程度打破固有的关于 NGO 的种种迷思。不仅如此，透过重新叙述和分析这些生命故事，对话人得以回看自身的经历和社会脉络转变的关系以及打开批判性理解 NGO 组织的意识形态和操演。这便是叙事研究的力量。本研究的初稿经由返回至对话人处阅读，不少对话人认为从故事中重新看到了自己的成长历史及其与大时代的关系，同时，也看到其他来自不同组织的工作者与自己分享着相似的经历，并且引发了新的思考——尤其是本研究指出的 NGO 的简单二元的分析视角以及带有的“现代性”的价值观等。

然而，本研究也有种种限制，包括，1) 我曾经较深地浸入 NGO 这一形意世

界且批判视角不足，这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本研究的批判深度；2) 我受研究期限和范围的限制，研究仅仅选取一个跨地区的青年协作者网络在北京的成员，其研究发现无法涵盖广泛的 NGO 领域的工作者的价值观和行为。这些都将是进一步完善以及展开下一步研究的可能。

三、 写在最后的话

当阶段性地完成这份论文之时，我意识到这个研究的走向及其初步结论是极其出乎我的预料的。研究是一条未知的路，人生亦是。我起初是计划总结和我经历相似、在毕业后不久、2000 年代中后期进入 NGO 组织工作的同龄人，通过在这一新的形意世界中的工作逐渐改变自己，成为富有社会责任感、较强公共事务参与意识与能力的、充满内在力量的一群青年人的故事，以理解参与形塑的关键因素，希望有助于为发展主义和“小时代”文化主导的当代中国青年文化提出另外一种可能性。

然而，研究的过程则是不断打破这一假设，推进自我认识并且改造我的思考/身体习惯的过程。上述假设也正是 NGO 这一形意世界在我的“自我”之上操作的结果——而我对此没有意觉。这也正是导师许宝强教授一直说的“缺学无思”的表现。这一研究过程对我而言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对什么是学习、教育，有了更多的理解。学习和教育的工作，首先要进入并理解对象的脉络，而非带着研究者自身的政治正确的想象和主张。这个过程中的慈悲、聆听、开放非常之重要。这也正是叙事研究的关键之一。希望透过本文这一初步尝试，透过聆听对话人的生命故事，透过转变中的研究者的努力诠释，读者也有可能反身这些故事及其脉络与自身的关系，打开思考/行动的诸种可能性。

人的改变并非一劳永逸之事，本文中的多样的生命故事正说明了这一点，她/他们有各自的生命礼物和限制，有着与自身、与家庭、与社区、与更广大的政治空间的即兴、互动与挣扎，不断地寻找身外和自身体内的“青春”——一种希望的能量。这正如鲁迅先生引述诗人裴多菲的话：“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然而他又接着说：“倘使我还得偷生在不明不暗的这‘虚妄’中，我就还

要寻求那逝去的悲凉漂渺的青春”¹⁵⁹（1927）。人的转变、NGO 工作者身处的组织以及剧烈变动的当代中国社会，在我看来正是一个不明不暗之地，充满着非黑非白的多种文化因素和多种可能性，需要不断地直面绝望/希望而上下求索，批判思考力和不断反身将会有助于这一求索的过程。而正像本章开篇引用的鲁迅的话，这青春既存在于外在也存在人的内在，而两者又是彼此相关的，正是在不断地反身和介入身处之脉络的过程中，去创造青春能量。这正是这篇论文要和读者分享的故事。

在将要结束书写本文之际，对于在这近四年的研究/自我转变的过程中曾经给予我支持的人们表示深深的感恩，特别是那些开放地、真诚地、愿意花费大量时间和心力与我分享他们的人生故事、希望、泪水、挣扎、力量的同行者。我从他们身上学习到珍贵的人生智慧。他们身上展现的极强的生命力和行动的力量，支持着我阶段性地完成了这一研究。这一篇小小的成果正是献给他们的。

¹⁵⁹ 之所以与鲁迅这段话“倘使我还得偷生在不明不暗的这‘虚妄’中，我就还要寻求那逝去的悲凉漂渺的青春”相遇，是因为 2015 年 6-7 月与来自北京、广州的 5 位 NGO 工作者伙伴计划组织去参加 2015 年台湾社会研究学会年会的圆桌论坛，希望以个人生命经历叙述在从事社会运动和青年发展的工作中的“自我”改变和挣扎。其中一位计划报告人陈焯宏的发言摘要中引用了这段话。我觉得很切合本研究的主题，因此使用于本文。

附录一：自传书写指引

如果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分，面对自己，思索一个问题“我是谁？”，我会想到什么？

这个现在的我怎么形成的？可能有一些人、事促使了现在的我的形成，请分享一些具体细节，人或者事（可能和儿时的经历，家庭，从小生活的地方，老师，同学，朋友，书籍，音乐，电视剧等等有关？）。

我是怎么接触公益的？

为什么会选择在 NGO 工作？

接触公益或者进入 NGO 工作，对我有改变吗（任何我能想到的改变，让我产生变化）？如果有改变的话，有哪些改变？这些改变是怎么发生的？

我怎么看待我现在或曾经从事的青年人工作？为什么会选择青年人工作？

我怎么理解“改变(change)”？我怎么看待我从事的青年人工作和我所理解的改变(change)的关系？

在当下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我的状态、情绪怎么样？可以用一些形容词来形容吗？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说多一点。

附录二：半结构性访谈大纲

- **“我是谁？”** 当你向别人介绍自己的时候，你会怎么介绍？
 - 视觉化处理。画画。配文字。
 - 可能有身份的、有人生愿景、目标等等。
 - 为什么你会这样介绍自己？为什么你认同这些身份？
 - 你一直这样自我定位的吗？如果有变化，请说一下什么时候变化的，为什么。

- **人生河流绘制**

如果生命是一条河流，我的生命是怎样的一条河流呢？有弯曲、曲折吗？她经历过怎样的风景和变化？在过去的经历中，哪些人、事让你记忆深刻，哪些时刻是这条生命之河的重要转折点？现在慢慢睁开眼睛，在纸上画出你生命的河流。

【画画】

这条河流现在的状态是怎样的？

【画画】

这条河流未来会走向何方？在今后的岁月中你希望在一年之后、五年之后、十年之后和二十年之后自己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将这样的信息用图画的方式绘制在生命之河中。

- 开始做社会发展/NGO/社团的工作，对你有哪些改变？可以分成几个阶段来叙述一下？【可以在人生河流的基础上】

（根据情况，可以适当追问以下问题）

- 可以与**之前的自己**相比
 - 与**同学、朋友**相比
 - 与**父母、家庭成员**的对比
 - 印象最深的经历（人、事等）
 - 追问，之前的价值观、生活方式是怎样的及其形成原因
 - 改变怎么发生的？
 - 你怎么看待这些变化？喜欢吗？或者令你有些不安和担忧？为何发生这些变化？
 - 你觉得 NGO 里的生涯体验，对你而言，对你影响较大的理念、理论、分析框架是什么？NGO 较流行的话语/理念是什么？你怎么看？
 - 左派、中间、右派？怎么形成的？
 - 在“爱国主义”维度上的位置？怎么形成的？
 - NGO 里受到的这些影响，有没有给你的人生、生活带来负面影响？
 - 你的成长和时代发展之间是什么关系？
- 为什么会加入 NGO 工作？进入 NGO 之前的价值观/生活方式。

（根据情况，是否追问：谈谈你的儿时经历吧。）

- 小时候的成长经历中有没有一些因素影响了今天的生活道路的选择？（通过人生河流）特别印象深刻的事情、人或者某种情感、情绪？为什么对（农村问题）那么感兴趣？

- 小时候的理想、愿望（对人生、对职业）等等。
- 价值观
 - ◆ 家乡情况-所在城镇
 - ◆ 家庭（阶级、父母和大家庭、社区、是否介入社会运动）
 - ◆ 个性
 - ◆ 中小学经历（老师等）
 - ◆ 媒体（流行文化）
 - ◆ 课外书阅读
 - ◆ 大学（社团、课外活动、阅读、同学等等）
 - ◆ 宗教/信仰（儒释道等，社会主义信仰）
 - ◆ 校外经历
 - ◆ 工作经历
 - ◆ 有没有考虑过其它职业选择？有没有考虑过考公务员、进事业单位或进入企业？
 - ◆ 婚姻/恋爱关系
- 有没有想过自己从小成长的 80 年代、90 年代有什么对你来说显著的社会氛围对你产生影响？
 - ◆ 80 年代、90 年代——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是怎样的社会文化氛围（家长、同学、老师、街坊都在做什么，说什么
 - ◆ 重点是 80 年代到 2000 年代的分析，因为正是其儿童、青少年、青年时期。（NGO 在 90 年代开始出现；媒体的开放以及媒体呈现的不同的意识形态的争夺；经济急速发展伴随着社会成本的出现-环境问题、教育问题、东西部/城乡不公平等；教育体制中的德育/公民教育及其改革等等）
- 你当下日常生活与工作中的状态是什么？为什么？
（根据情况，是否追问以下）
 - 现在的生活和工作状态怎么样？（精神状态、身体状态、情绪状态等等）有没有情绪特别强烈、虚弱的时候？特别幸福、满足的时候？沮丧、烦恼、无力的时候？
 - 对现在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满意度是多少？哪些地方满意？哪些地方希望做出改变？为什么？
 - 父母、家人的态度？
 - 朋辈压力？
 - 婚姻/恋爱
 - 在北京这座城市的生活状况/压力
 - 对未来怎么看？有什么个人、家庭计划？
- 其它应该了解但是没有问的情况

参考文献

英文文献

Book:

- Baltes, P. B., & Staudinger, U. M. (1996). *Interactive minds: Life-span perspectives on the social foundation of cogn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reswell, J. W. (2012). *Qualitative inquiry and research design: Choosing among five approaches*. Sage.
- Davies, A.C. (1999). *Reflexive Ethnography: A Guide to Researching Selves and Others*. Psychology Press
- Denzin, N. K., & Lincoln, Y. S. (2011). *The SAG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Sage.
- Elliott, A. (2013). *Concepts of the Self*. Polity.
- Fechter, A. M., & Hindman, H. (Eds.). (2011). *Inside the everyday lives of development workers: The challenges and futures of Aidland*. Sterling, VA: Kumarian Press.
- Fetterman, D. M. (Eds.). (2010). *Ethnography: Step-by-step* Sage.
- Gray, A. (2002). *Research practice for cultural studies: Ethnographic methods and lived cultures*. Sage.
- Grossberg, L. (1992). *We gotta get out of this place: Popular conservatism and postmodern culture*. Routledge.
- (2010).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future tense*. Duke University Press.
- Hansen, M. H., & Svarverud, R. (2014). *iChina: The rise of the individual in modern Chinese society*. NIAS Press.
- Hilhorst, D. J. M. (2003). *The real world of NGOs: Discourses, diversity and development*. Zed Books.
- Holland, D; Lachicotte, J. W.; Skinner, D. and Cain, C. (2001). *Identity and agency in cultural world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olland, D. & Lave, J. (Eds.). (2001). *History in person: Enduring struggles, contentious practice, intimate identities*. SAR Press.
- Incite! Women of Color Against Violence. (2007). *The revolution will not be funded: beyond the non-profit industrial complex*. South End Press.
- Jackson, M. (1989). *Paths Toward a Clearing: Radical Empiricism and Ethnographic Inquir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Lieblich, A., Tuval-Mashiach, R., & Zilber, T. (1998). *Narrative research: Reading,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Sage.
- Ma, Q. (2006).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contemporary China: paving the way to civil society?*. Routledge.
- Rofel, L. (2007). *Desiring China: Experiments in neoliberalism, sexuality, and public culture*. Duke University Press.
- Saukko, P. (2003). *Doing research in cultural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to classical and new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Sage.

- Sunstein, C. R. (2009). *Going to Extremes: How Like Minds Unite and Divid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Urrieta, L. (2009). *Working from within: Chicana and Chicano activist educators in whitestream schools*.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 Williams, R. (1977).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Xu, L. (2002). *Searching for Life's Meaning: Changes and Tensions in the Worldviews of Chinese Youth in the 1980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Yan, Y. (2009). *The individualiz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Oxford: Berg.

Book Chapter:

- Bertaux, D. (1982). The life course approach as a challenge to the social sciences. In Hareven; Adams.(eds).*Ageing and life course transitions: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127-150.
- Cole, M. (1996). Interacting minds in a life-span perspective: a cultural-historical approach to culture and cognitive development. In. *Interactive minds*, 59-87.
- Grossberg, L. (2010). Heart of Cultural Studies, In.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Future Tense*. Duke University Press, 7-56
- Lawler, S. (2008). Stories and the social world, In. Pickering, M. & Griffin, G. (eds) *Research Methods for Cultural Studies*,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32-49.
- Li, X. (1995). Gender inequality in China and cultural relativism, In. Nussbaum, M. & Glover, J. (eds) *Women,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a Study of Human Capabilities*, New York: Oxford, 407-425.
- Rosen, S. (2003). Chinese Media and Youth: attitudes toward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In. LEE, C. *Chinese Media, Global Contexts*, 97-118.
- Williams, R. (2011). Culture is ordinary (1958). In. *Cultural theory: An anthology*, 53-59.

Journal:

- Denzin, N. K. (2001). The reflexive interview and a performative social science. *Qualitative research*, 1(1), 23-46.
- Grossberg, L. (2006). Does Cultural Studies Have Futures? Should It?(Or What's The Matter With New York?) *Cultural studies, contexts and conjunctures*. *Cultural studies*, 20(1), 1-32.
- Lu, H. (2003). Bamboo sprouts after the rain: The history of university student environmental associations in China. *China Environment Series*, 6, 55-65.
- Ku, H. (2011) . Gendered suffering: married Miao women's narratives on domestic violence in southwest China. *China Journal of Social Work*. Vol. 4, No. 1, 23-39.
- Petras, J. (1997). Imperialism and NGOs in Latin America. *Monthly Review*, Vol 49, (7)
- Rosen, S. (2009). Contemporary Chinese youth and the stat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8(02), 359-369.

- Salamon, L. (1994). The Rise of the nonprofit sector. *Foreign Affairs*, 73(4),109-122
- Stally, P. & Yang, D. (2006). An Emerging Environmental Movement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333-356.
- Schwartz, J. (2004). Environmental NGOs in China: roles and limits. *Pacific Affairs*, 28-49.
- Spires, A. J.; Tao,L, and Chan,K. (2014). Societal Support for China's Grassroots NGOs: Evidence from Yunnan, Guangdong and Beijing. *The China Journal*, no. 71, 65-90.
- Spires, A. J. (2012). Lessons from Abroad: Foreign Influences on China's Emerging Civil Society. *The China Journal*, no. 68, 125-146.
- Spires, A. J. (2011). Contingent Symbiosis and Civil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Understanding the Survival of China's Grassroots NGO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7(1): 1-45.
- Tsang, M. C. (2000). Education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since 1949: Oscillating policies and enduring dilemmas. *China review*, 579-618.
- Wu, F., & Chan, K. M. (2012). Graduated control and beyond: The evolving government-NGO relations.*China Perspectives*, 3, 9-17
- Wu, F. S. (2012).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civil-society development: The left, right, and neutral among social activists in China. *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 8(2), 25-34.
- Xie, L., & Ho, P. (2008). Urban Environmentalism and Activists' Networks in China: The Cases of Xiangfan and Shanghai. *Conservation and Society*, 6(2), 141.
- Yang, G. (2003). The Internet and civil society in China: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2(36), 453-475.
- (2003). The co-evolution of the Internet and civil society in China. *Asian Survey*, 43(3), 405-422.
- (2005). Environmental NGOs and institutional dynamics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181(1), 44-66.
- (2007). How do Chinese civic associations respond to the Internet? Findings from a survey. *The China Quarterly*, 189, 122-143.
- Yang, G., & Calhoun, C. (2007). Media, civil society, and the rise of a green public sphere in China. *China Information*, 21(2), 211-236.
- Yarrow, T. (2008). Life/history: personal narratives of development amongst NGO workers and activists in Ghana. *Africa*, 78(03), 334-358.

Thesis:

- Lu, K.(2010).*Against Educational Reproduction: The Experience of A Volunteer-Managed School in Rural China*. PhD dissertation. Syracuse University
- Spires, A. (2007). *China's Un-official Civil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Grassroots NGOs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 Ph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 Urrieta, L. (2003). *Orchestrating the Selves: Chicana and Chicano negotiations of identity, ideology, and activism in Education*. PhD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Chapel Hill.

Working Paper:

- Perry, E. J. (2013). *Cultural Govern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Re-Orienting' Party Propaganda*.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Series.
- Lee, S(2003). *Development of the Civil Realm in Shanghai Water Services*. Occasional Paper. 54, London, SOAS Water Research Group, 2003, accessed at www2@soas.ac.uk/geography/waterissues/occasionalpapers/.

中文文献

专书:

- Lieblich, A., Tuval-Mashiach, R., & Zilber, T. (2008). 叙事研究: 阅读, 分析与诠释. 涛石文化. (原出版年: 1998).
- 陈硕. (2004). 经典制造: 金庸研究的文化政治.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 陈佩华. (1997). 毛主席的孩子们: 红卫兵一代的成长和经历. 台湾桂冠图书
- 陈映芳. (2001). 我是这样考上大学的——70位大学生自述. 上海: 学林出版社
- . (2002). 在角色与非角色之间. 江苏人民出版社.
- . (2007). “青年”与中国的社会变迁.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戴锦华. (1999). 隐形书写: 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 江苏人民出版社.
- 杜芳琴. (1996). 发现妇女的历史——中国妇女史论集. 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
- 邓康延, 梁罗兴. (2014). 盗火者. 新星出版社.
- 冯利, 章一琪. (2014). 中国草根组织的功能与价值.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高小贤, 谢丽华编. (2009). 中国妇女 NGO 成长进行时. 金城出版社
- 韩俊魁. (2011). 境外在华 NGO: 与开放的中国同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古学斌. (2008). 男/女声: 女性主义书写的一次实践.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贾樟柯, 赵静. (2011). 问道.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寇延丁. (2007). 一切从改变自己开始. 海南出版社.
- . (2013). 行动改变生存. 浙江大学出版社.
- 李春玲, 施云卿. (2013). 境遇、态度与社会转型: 80后青年的社会学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李银河. (1998). 同性恋亚文化. 今日中国出版社.
- 李政亮. (2012). 中国课: 系上红领巾的中国式青春. 日出出版.
- 陆玉林. (2009). 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研究. 人民出版社.
- 罗小茗. (2012). 形式的独奏: 以上海“二期课改”为个案的课程改革研究. 上海书店出版社.
- 罗爱萍, 王峰, 江宇. (2014). 中国剩女调查. 广东人民出版社.
- 梁恒. (2012). 与索罗斯一起走过的日子. 广东经济出版社.
- 梁莹. (2011). 社会资本与公民文化的成长: 公民文化成长与培育中的社会资本因素探析.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康晓光. (2012). 2012——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康晓光, 冯利. (2014). 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 2014.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 (2015). 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 201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宁应斌, 何春蕤. (2012). 民困愁城: 忧郁症、情绪管理、现代性的黑暗面. 台湾

社会研究杂志社.

秦晖. (1999). 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 中西公益事业史比较研究. 浙江大学出版社.

社区伙伴 编著. (2012). 让梦想扎根. 四川人民出版社.

宋伟杰. (1999). 从娱乐行为到乌托邦冲动: 金庸小说再解读. 江苏人民出版社

陶东风, 周宪主编. (2010). 文化研究(第9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王名编. (2004). 中国非政府公共部门(清华发展研究报告2003). 清华大学出版社.

———. (2008). 中国民间组织30年——走向公民社会.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12). 中国NGO口述史(第1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14). 中国NGO口述史(第2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王晓明. (2013). 横站. 人间出版社.

王晓明, 周展安编. (2013). 中国现代思想文选. 上海书店出版社.

王小妮. (2011). 上课记. 中国华侨出版社.

温铁军. (2013). 八次危机. 北京: 东方出版社.

吴永毅. (2014). 左工二流志: 组织生活的出柜书写. 台北: 台湾社会研究杂志社

夏晓鹃. (2002). 流离寻岸. 台湾社会研究杂志社.

许宝强. (2007). 资本主义不是什么.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15). 缺学无思: 香港教育的文化研究. 牛津大学出版社

许宝强、汪晖编. (2003). 发展的幻象. 中央编译出版社

杨团、葛道顺编. (2009). 中国慈善发展报告.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张裕亮. (2010). 中国大陆流行文化与党国意识. 台北秀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阎云翔. (2012).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 陆洋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赵鼎新. (2007). 国家·社会关系与八九北京学运. 香港中文大学

朱健刚. (2012). 中国公益发展报告.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朱健刚. (2008). 行动的力量. 商务印书馆.

卓晴君、李仲汉. (2000). 中小学教育史. 海南出版社.

学位论文

白亚丽. (2012). 主体教育型青年下乡实践——以当代乡村建设中的大学生支农调研活动和农村发展人才计划为例. 硕士学位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

陈阳. (2014). 绿色营在当代中国的兴起、发展与式微. 硕士学位论文. 北京师范大学

代妮. (2010). 论高校社团文化对大学生成长的作用. 硕士学位论文. 江南大学.

李易昆. (2014). 逆风行者: 朝向“解放-社会变革”的成人学习之路. 博士学位论文. 辅仁大学.

雷启立. (2003). 时尚报刊、广告与当代中国消费意识形态. 硕士学位论文. 香港岭南大学.

苗素莲. (2004). 中国大学组织特性历史研究演变. 博士学位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

潘家恩. (2012). 自我保护与“另类”实践: “双向运动”视野下的中国乡村

- 建设. 博士学位论文. 香港岭南大学.
- 王慧. (2007). 我国电视新闻杂志类节目的转型与走向. 硕士学位论文. 中国传媒大学.
- 吴永毅. (2010). 运动在他方: 一个基进知识分子的工运自传. 博士学位论文. 香港理工大学.
- 袁亚婕. (2014). 大学生短期支教志愿者培训设计. 硕士学位论文. 上海师范大学.
- 张佳羽. (2013). 一孩家庭结构与性别平等意识. 博士学位论文. 香港中文大学.

期刊论文

- 卜卫、米晓琳. (2004). 民间妇女组织与大众媒介的互动: 家庭暴力成为公共问题的过程. 2004第二届亚洲传媒论坛——新闻学与传播学全球化的研究、教育与实践论文集. 中国传媒大学亚洲传媒研究中心. 61-71
- 陈映芳. (2010). 可疑的 80 后政治意识. 文化纵横, (1), 31-32.
- 古学斌. (2013). 行动研究与社会工作的介入. 中国社会工作研究, (1), 1-30.
- 范雷. (2012). 80 后的政治态度——目前中国人政治态度的代际比较. 社会学研究, (3), 54-62.
- 风笑天. (2012). 三十年来我国青年研究的对象, 主题与方法——对四种青年期刊 2408 篇论文的内容分析. 青年研究, (5), 54-63.
- 黄洪基, 邓蕾, 陈宁, 陆焯. (2009). 聚焦“80 后”: 对一代人的透视与研究——关于“80 后”的研究文献综述. 中国青年研究, (7), 4-13.
- 李春玲. (2013). “80 后”现象的产生及其演变. 黑龙江社会科学, (1), 017.
- 李艳红. (2006). 大众传媒、社会表达与商议民主——两个个案分析. 开放时代. (6). 5-21.
- 林尚立. (2007). 两种社会建构: 中国共产党与非政府组织. 中国非营利评论, (1), 3-10.
- 刘海英. (2012). 社会组织的功能在组织社会——伯尔基金会中国项目办首席代表博盟访谈录. 中国发展简报, (3).
- 马秋莎. (2006). 全球化、国际非政府组织与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 开放时代, (2), 118-138.
- 牛鸿英、张奇. (2005). 嬗变中的超越与困惑——从《东方时空》看电视新闻杂志节目的发展.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 50-51.
- 钱刚. (2006). 导向·监督·改革·自由: 透过媒体语词分析看中国新闻传媒. 二十一世纪评论 (香港). (6). 4-16
- 沈关宝. (2013). 婚姻家庭制度性变迁下的焦虑. 探索与争鸣. 2013. (5). 17-18
- 孙沛东. (2013). 中国式焦虑的婚姻缩影——以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为例. 探索与争鸣. (5). 27-28
- 谭建光、朱莉玲. (2007). 广东志愿服务20年: 回顾与展望——兼论志愿服务特色区域与特色团队的发展. 广东青年干部学院学报. (21)69, 29-35

- 唐杰. (2010). 80 后的困境与突围. 文化纵横, (1), 24-27.
- 田方萌. (2010). “我们” 的政治意识. 文化纵横, (1), 16-21.
- 汪晖. (2000). 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 台湾社会研究, (37), 1-43.
- 汪晖. (2001). “新自由主义” 的历史根源及其批判—再论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 台湾社会研究, (42), 1-65.
- 王策三. (2001). 保证基础教育健康发展—关于由 “应试教育” 向素质教育转轨提法的讨论.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5), 59-84.
- 王绍光, 何建宇. (2005). 中国的社团革命——中国人的结社版图. 浙江学刊, (6), 71-77.
- 王绍光. (1991). 关于 “市民社会” 的几点思考. 二十一世纪 (香港), (6).
- 王硕. (2013). 由圣至任——哲学视阈下公益慈善的范式转型.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4期第53卷
- 王小东. (2010). 革命阵痛后的第一代正常人. 文化纵横, (1), 27-30.
- 王晓明. (2010). 文化研究的三道难题. 上海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7(1)
- 王颖怡. (2014). 合作婚姻初探: 男女同志的婚姻动机研究. 中国青年研究, (11), 14-18.
- 王占军. (2008). 高校公益性学生社团的组织资源动员——关于北京师范大学 “农民之子” 的案例研究. 复旦教育论坛, 2008(1)
- 魏伟. (2013). 同性伴侣关系: 亲密关系的多重样态及可能. 探索与争鸣, 2013. (5). 29-30
- 吴小英. (2012). 代际视野中的 80 后认同. 社会学研究, (3).
- 吴小英. (2013). 婚姻的 “祛魅” 与家庭观的位移. 探索与争鸣, 2013. (5). 18-20
- 许宝强. (2014). 民粹政治与犬儒文化. 人间思想, (1), 81-100.
- 阎云翔. (2013). 当代青年是否缺乏理想主义?. 文化纵横, (5), 56-61.
- 杨国斌. (2009). 互联网与中国公民社会. 二十一世纪 (香港), (4), 14-25.
- 曾繁旭. (2006). NGO媒体策略与空间拓展——以绿色和平建构 “金光集团云南毁林” 议题为个案. 开放时代, (6). 22-42
- 曾繁旭. (2007). 社环保NGO的议题建构与公共表达——以自然之友建构 “保护藏羚羊” 议题为个案. 国际新闻界, (10). 14-18
- 曾繁旭. (2009). 社会的喉舌: 中国城市报纸如何再现公共议题. 新闻与传播研究, 第16卷 第3期. 93-100
- 张慧瑜. (2013a). “暮气青春” 的文化面孔. 文化纵横, (5), 62-67.
- 张少强、古学斌. (2006). 跳出原居民人类学的陷阱: 次原居民人类学的立场, 提纲与实践. 社会学研究, (2), 107-133.
- 张瑜、白杨. (2010). “80后” 大学生思想特点与行为方式: 研究现状、问题与对策.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7), 14-16
- 周永明. (2006). 管治私有化与网络信息接收语境. 二十一世纪评论 (香港), (6). 28-33
- 祝小迁、窦贤琨. (2012). 近十年来我国大学生志愿服务研究综述. 当代教育论坛, (2), 109-113.

书中的章节:

- 杜芳琴、闵冬潮. (1996). 对中国历史教科书的性别分析. 载于 发现妇女的历史: 中国妇女史论集.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黄煜、李金铨. (2004). 九十年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媒介建构. 载于超越西方霸权: 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 牛津大学出版社
- 康晓光. (2001). 转型时期的中国社团. 载于 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社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 黄煜、李金铨. (2004). 九十年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媒介建构. 载于 李金铨. (2004) 超越西方霸权: 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 香港: 牛津大学出版社
- 李丁赞, 吴介民. (2008). 公民社会的概念史考察. 载于 群学争鸣: 台湾社会学发展史 (1945-2005) (页 393-446). 群学.
- 鲁迅. (1927). 希望. 载于野草. 北新书局
- 宁应斌. (2013). 现代进步观及其自满: 新道德主义与公民社会. 载于新道德主义: 两岸三地性/别寻思. 台湾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
- 孙歌. (2013). 鲁迅的绝望与历史. 载于竹内好著 靳丛林译. 2013. 从“绝望”开始. 三联书店.
- 谭建光、余冰. (2001). 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志愿服务: 深圳市志愿者及其服务的研究报告. 载于 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社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 唐晓菁. (2011) “从‘走出家门’、‘铁姑娘’到‘回归家庭’——历史、田野、问题意识与研究视角”, 《直面当代城市: 问题及方法》, “现代城市研究丛书”第四册, 陈映芳、[日]水内俊雄、邓永成、黄丽玲等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 王绍光. (2002). 私人时间与政治: 中国城市闲暇模式的变化. 载于王绍光. 左脑的思考. 天津人民出版社
- 王绍光, 何健宇. (2009). 中国的社团革命: 全景描述. 载于关信基、熊景明编. 中外名学者论 21 世纪初的中国.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 吴晓黎. (2000). 90年代文化中的金庸: 对金庸小说经典化与流行的考察. 载于 戴锦华编. 2000. 书写文化英雄: 世纪之交的文化研究. 江苏人民出版社
- 解振明. (2006). 中国出生性别比异常偏高的现象和本质. 载于谭琳主编. 1995~2005年: 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报告.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研讨会论文:

- 李军. (2016). 青年女权运动: 媒介作为核心政治资源. 第十二届国际研究生“当代中国”研讨班会议报告.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举办
- 谭建光、王媛媛、朱莉玲. (2011). 国际视野下的中国志愿组织转型与发展. 社会管理创新与青少年工作研究报告——第七届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暨中国青少年研究会优秀论文集, 374-381
- 王名、贾西津. (2006). 中国非营利组织: 定义、发展与政策建议. 2006年度中国汽车摩托车配件用品行业年度报告, 516-527
- 张慧瑜. (2013b). 中国社会的二元结构与消费主义时代的文化状态. 第一届热风学术青年论坛“新文化与中国的未来”

杂志文章:

赵灵敏. (2006). 中山大学公民社会网络(ICS):ngo的“黄埔军校”. 南风窗, 24期.

报导:

白龙. (2013). 莫让青春染暮气. 人民日报.

线上文献:

冯永锋. (2015). 公益行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取自

<http://weibo.com/p/1001603893424406329349>. 浏览时间: 2015-10-3

——(2015). 做公益就要守清贫?. 取自

<http://weibo.com/p/1001603893041097227009>. 浏览时间: 2015-10-2

贾西津. (2015) 《慈善法》的善意与尴尬 取自

<http://m.aisixiang.com/data/94867.html>. 浏览时间: 2016-1-18

梁漱溟中心网站. (2012). 大学生支农与乡村建设十年历程. 取自

<http://www.3nong.org/?action-viewnews-itemid-1804>. 浏览时间: 2012-11-19

刘韬. (2014). 社会发展与田野调查法. 取自

<http://hicape.com/2014/04/social-development-and-field-survey>.
浏览时间: 2015-6-25

罗鸣. (2014). 另一种书写——有关北京拉拉社区发展的一项口述历史研究. 取自 <http://www.sex-study.org/news.php?isweb=2&sort=72&id=2130&classid=>. 浏览时间 2015-9-10

尼古拉斯. (2015). 下岗工人的“主旋律宣传”之殇. 取自

<http://groundbreaking.cn/dcxs/2842.html>. 浏览时间:2015-9-21

南都周刊. (2009) 80年代:天之骄子,国家包养. 2009-4-27. 取自

http://past.nbweekly.com/Print/Article/7610_0.shtml. 浏览时间: 2015-7-19

钱刚. (2012) “公民社会”: 社会在哪里?. 纽约时报中文网 2012年9月26日取自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20926/cc26qiangang8/> 浏览日期: 2016-1-18

新华网. (2009). 1999年高校扩招: 大众教育代替精英教育. 2009年9月10日. 取自 <http://news.sina.com.cn/c/sd/2009-09-10/144218622828.shtml>. 浏览时间: 2015-7-19

徐永光. (2008), 中国公民社会元年. 人民网 取自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7336201.html> 浏览日期: 2016-1-18

澎湃新闻. (2015). 社会组织管理的重点. 2015年5月8日. 取自

<http://www.thepaper.cn/baidu.jsp?contid=1329172>. 浏览时间: 2015-6-24

全国人大网. (2015). 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审议稿). 取自

http://www.npc.gov.cn/npc/xinwen/lfgz/flca/2015-05/05/content_1935666.htm. 浏览时间:2015-6-25

-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2012). 中国红十字会的发展历程. 2012年8月2日. 取自 http://www.china.com.cn/zhibo/zhuanti/ch-xinwen/2012-08/02/content_26100750.htm. 浏览时间: 2014-3-23
-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2006). 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网站. 取自 http://www.gov.cn/flfg/2006-10/31/content_429392.htm. 浏览日期 2015-6-24
- 中国民间公益组织基础数据库正式发布. (2013). 来源: 南都公益基金会网站, 取自 <http://www.naradafoundation.org/html/2013-09/16417.html>. 浏览日期 2016-5-10
- 黄埔公益领导力协力营第四届招生简章. (2014)
取自 http://gics2012.lofter.com/post/1c14aa_19fb711. 浏览日期: 2015-6-29
- 2014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 (2014)
取自 <http://cws.mca.gov.cn/article/tjbg/201506/20150600832439.shtm>. 浏览日期: 2015-6-24
- 2014 中国公益行业人才发展现状调查报告. (2014)
取自 <http://www.naradafoundation.org/content/3655> 浏览日期: 2015-3-10
-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 (2016) 取自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429/c1001-28313123.html> 浏览日期 2016-5-1

非公开出版物:

- 比邻泥土香. 社区伙伴. 2008-2015年. 取自 <http://www.pcd.org.hk/zh-hant/content/%E5%88%8A%E7%89%A9>
- 梁从诫. (2012). 梁从诫环境文集. 自然之友 (内部出版).
- 孟登迎、何志雄. (2015). 北京地区乡建 (支农) 青年志愿者文化扫描: 以新青年公社、小毛驴市民农园和工友之家为核心. 未刊稿
- “中国公益组织名录” 特别报告. 中国发展简报. 2013. 取自 <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upload/userfiles/files/NGO%20Directory-3-26.pdf>